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政治冒险家

切·格瓦拉 (上)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小 引

切·格瓦拉，是古巴革命的伟大英雄。在夺取古巴革命伟大胜利的历史进程中，起过最为关键的作用。作为卡斯特罗至为亲密的战友，他是古巴名列卡斯特罗其后的最高领导核心成员，是古巴人民最亲切的朋友和最挚爱的领袖之一。为了打破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封锁和遏制，他在玻利维亚开辟新战场，1967年10月9日，他壮烈捐躯，洒尽了最后一滴鲜血。

切·格瓦拉，他以他无与伦比的、崇高的、纯洁无暇的人格力量；以他一往无前，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革命毅力；以他富丽传奇，悲壮色彩浓郁的一生，创造出了伟大时代最辉煌的人的品级，和最璀璨夺目的不朽精神。因而，他赢得了不只是古巴人民由衷的爱戴和尊敬，而且，也越来越不可阻挡、不可抗拒地赢得了全世界各民族人民的最为自然的、朴素的仰慕和尊敬。

切·格瓦拉，今天仍然是风靡全世界的一个时代英雄，是一面猎猎飘动着人类尊严、人类良心的旗帜。他不仅仅是属于光辉照亮过去年代的英雄，他更是昭示着伟大未来世纪的英雄。从1967年10月9日，他被人类最邪恶的势力，最为令人发指残酷野蛮地杀害在玻利维亚，三十年过去了，但他的英名并未被人们所淡忘，反而，他的影响越来越深广，越来越为全世界各国人民深深地怀念和追思。他的光辉，他的思想和品质，他的榜样和风范，越来越被新时代、新世界的人们所敬仰和珍视。从美洲到大洋洲，从欧亚大陆到非洲，在人类社会行将进入到21世纪前阶的时候，全世界独树一帜昭引人们前进的旗帜，最前排的一面，几乎就是切·格瓦拉的旗帜。

1959年1月1日，在古巴革命赢得胜利夺取国家政权以后，在菲德尔·卡斯特罗作为无可置疑的革命领袖的领导下，在古巴人民政权建立以后，切·格瓦拉作为革命领导核心的主要成员之一，主要分管外交事务，意识形态、新闻宣传、并且始终肩负着方面军司令员的职务，主管古巴革命军的政治思想工作，以及全国的准军事组织和民兵工作，而他的工作的侧重点，又主要是在分管全国的经济工作和经济建设，他曾经参与领导了古巴全国的土地改革，出任过古巴国家银行行长，计划委员会主席和工业部长。这使他在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头衔拥有的同时，也成为杰出的金融学家和经济学家。他为了胜任愉快地作好国家银行行长，他刻苦学习了金融管理知识学问，特别专门攻读研习高等数学。他为了领导全国土地改革，他到埃及、印度等诸多国家考察学习，首先使自己成为了土地改革专家。他为了领导发展古巴的农业生产，打破甘蔗和蔗糖生产的单一经济模式，特别到中国考察学习了“多种经营”，“两条腿走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经验。他为了研究发展古巴的农业生产，他大量研究著述农业生产的文章，研究种水稻、种苞米、种棉花，研究养牛、养猪、养鸡鸭、养蜜蜂。为了发展古巴的工业生产，他在未当工业部长之前，就已经开始筹谋石油钻深，钢铁冶炼、机械制造、纺织工业。切·格瓦拉作为古巴革命战争杰出的指挥员，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打游击的时候、在热衷于创办报纸、广播电台和医疗所的同时，也极热衷于创办被服厂和军械制造修理厂，他对创业办厂搞工业生产的积极性和热情，从来都是很大的。因此，在古巴革命胜利时他主管工业生产担任工业部长的时候，也为古巴的国家工业开了先河，奠定了基础。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在三十年前，在切·格瓦拉还健在，还在古巴国家的领导岗位上，负责领导和主管经济工作经济建设的时候，他已经非常热衷

和深刻地进行了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在经济建设和发展中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大举措和大探索。1961年8月，在乌拉圭埃斯特角泛美经济委员会代表大会上，切·格瓦拉作为古巴经济代表团团长，向美国代表团团长，美国总统助理古德温建议开展古美贸易，引进美国的投资，当时，古德温欣然响应。后来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肯尼迪总统的共鸣。然而，由于刚刚在不久以前的猪湾战役中，古巴彻底、干净地消灭了美国武装起来的海陆空雇佣军的大举入侵，引起了美国统治集团的深刻仇恨，他们执意要扼杀古巴人民政权，他们执意要实行封杀古巴的封锁政策，于是便是接下来的延续三十多年的经济封锁，使古巴的经济损失超过了四百亿美元。美国在最初的年代里，遏制古巴，迫使古巴放弃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同时，也迫使古巴不得不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完全首要是靠自己的力量，站立了起来，慨然地屹立着。

而在一定意义上，切·格瓦拉也正是为了打破美国对古巴的封锁，粉碎美国对古巴的扼杀政策，他放弃了古巴国籍和古巴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崇高职务，放弃了古巴军队的最高军衔，毅然走向了玻利维亚游击战的新战场，并且在那里捐躯，为反抗世界帝国主义对各国人民的压迫，为了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他最为宝贵的最后一滴鲜血。

1960年4月，法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萨特，访问古巴哈瓦那，他专访切·格瓦拉，写下了长篇的格瓦拉访问记。在这篇访问记中，萨特结论说切·格瓦拉，是“我们时代最完善的人。”

另一位著名的，勇敢而正直的法国作家德布雷，在切·格瓦拉身赴玻利维亚展开新的游击战时，他也亲临战地，度过了一段与切·格瓦拉并肩战斗的日子，后来他写出许多记述和悼念切·格瓦拉的报告和特写，在他写的《切的游击战》这部书中，他对切·格瓦拉归总的印象是：纯洁而坚强。是最不易腐蚀的人。

而事实上，切·格瓦拉是有血有肉，感情最为丰富的伟人。1961年4月的猪湾战争胜利结束的前方战地，切·格瓦拉在和被俘的美国雇佣军战俘谈话时，一位法国费加罗报的女记者阿尼娜·弗朗科斯，站在一旁进行了观察。在她写下“切”一篇侧记中，突发奇想，在表述对切·格瓦拉的印象时说：“切·格瓦拉真是美极了！整个拉丁美洲的姑娘都会钟情于他的，他那带浪漫色彩的苍白的脸，配上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和并不茂密的蓬松的络腮胡子，实在是美极了，简直是圣茹斯特！”

1967年10月，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战斗日记，一直记到他临被杀害的前一天。在他战斗到最后一刻的行军背包里，背着他的小小的日记本，同时还装载着另外两本书，一本是高等数学课本，一本是拉丁美洲现代最伟大的诗人巴勃罗·聂鲁达的诗集《漫歌集》。聂鲁达曾经与切·格瓦拉有过交往。在聂鲁达的回忆录中，记载着他对切·格瓦拉的深挚情意，他说：“我与切的最后一次分手，竟成永诀。后来，他在玻利维亚大森林里战斗，并悲惨地死去。但是，我仍然看见切·格瓦拉这位好沉思的人，始终在武器的近旁，给侍留下一个位置。”

切·格瓦拉惨烈牺牲的消息闪电一样传遍世界的时候，全世界都引起了强烈的震撼和悲例，苏联老资格的外交家葛罗米柯在他的回忆录中深情地记录了他对切·格瓦拉的永生难忘的印象，回忆起切·格瓦拉的时候，他说：“假如有一座世界公墓用以安葬那些在为争取自由、为社会正义斗争中给人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活动家，那么，切·格瓦拉的骨灰就完全应当安放在那

里。尽管现实中没有这种公墓，但却有人们以自己的怀念建造起来的另外一种公墓，而在这座公墓里已经用金色的大字写上了这个名字。”

切·格瓦拉的最后时刻，是十分悲壮的。

1966年10月7日，他秘密到达玻利维亚尼阿卡瓦苏河畔的游击队营地，在这里艰苦卓绝地转战十一个月，迎来了他最后在尤罗山峡的一场激战，迎来了他在依格拉斯村英勇献身的时刻，那是在1967年的10月8、9日的两天。

切·格瓦拉是在1967年10月8日黄昏时分，突然开始的一场激战中，在子弹打光，长短两件武器全部打坏，身负重伤以后，被凶恶的敌人生俘的。

生俘他的敌人，是由美国总统操纵，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统辖，由美国将军和美国的走狗玻利维亚总统巴里恩托斯直接指挥的，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诸多的老牌特务和美国特种兵部队，以及玻利维亚第四、第八两个陆军师合成的突击营。玻利维亚空军，也全力以赴地参加了对切·格瓦拉游击队的作战。

切·格瓦拉带领着的最后十七名游击战士，在百倍于己的，数千名装备精良，穷凶极恶的顽敌的围剿中，在几乎完全是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走向覆灭的。但是，切·格瓦拉指挥的最后的十七名游击战士，在走向最后覆灭的时刻里，没有任何一个屈服，更没有任何一个投降，他们始终坚持着与敌人血战到底。

在切·格瓦拉游击队覆灭，切·格瓦拉被凶恶的敌人残酷杀害，并且割头断肢解处置以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向美国领导人以及各有关方面，发出一份内部加密通报，在这份通报中，他们也不得不这样写着：切·格瓦拉凛然不屈。他死得很英勇。

切·格瓦拉是20世纪不倒的旗帜。

切·格瓦拉也将是影响在21世纪英雄的旗帜。

切·格瓦拉必将是永垂不朽的旗帜。

菲德尔·卡斯特罗论切·格瓦拉

如果我们想说出我们要我们的子女怎样受教育，我们一定毫不迟疑地说：“我们要他们在切的精神下受教育！”如果要我们找一个典范的人，一个不是只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典范的人，一个属于将来的典范的人，我衷心的说，这样一个在行为上没有一丝污点，在举动中毫无瑕疵的典范就是切！

切不仅具有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家和活动家的双重性，而且切是一个兼备最充分表明一个革命者的种种美德的革命者：一个完全正直的人，一个有最高节操的人，一个绝对真诚——一个生活习惯淡泊，刻苦的人，一个在行为上没有丝毫污点的人。由于这些美德，他就成了所谓真正的革命模范……

作为一个革命家，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的革命家，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他无限相信道德观念，他无限相信人类的良心……

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的革命思想，他的革命美德——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的性格，他的意志，他的坚强，他的工作精神。一句话，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的榜样！切的榜样是我们人民的典范——切的榜样是我们人民的理想的典范！

切·格瓦拉信件、随笔、日记摘录

许多人会称我为冒险家，我是冒险家；只不过是另一种类型的，是一个为宣扬真理而不惜捐躯的冒险家。也许结局就是这样。我并不找寻这样的结局，但这是势所难免的。如果是这样的后，我在此最后一次拥抱你们。

切·格瓦拉：《给双亲的信》

革命的领导人不能经常在他们的孩子身边听到牙牙学语的声音；如果革命要达到目的，他们的妻子也必须分担他们的牺牲。他们只能从革命的同志中间找到朋友。对他们来说，除了革命之外就没有什么生活。如果他们要避开教条主义的极端，贫乏的烦琐哲学和脱离群众的孤立，他们就得有对人民的满腔热诚，正义感和是非感。他们必须天天战斗，把对活着的人们的爱变成具体行动，变成动员的力量和榜样。

切·格瓦拉：《古巴的社会主义和人》

斗争，使我们有机会成为革命者，而革命者是人类最高的品级，也可以使我们成为合格的人，如果有谁到达不了这两个梯阶中的任何一个，他就应该说一声，并且离开斗争。

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日记》

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政治冒险家——切·格瓦拉（上）

第一部 切·格瓦拉在中国

初识铸，诗人兴会的日子

1965年1月下旬，古巴革命的伟大英雄，埃·切·格瓦拉少校，受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全国领导委员会的派遣，以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全国领导委员会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名义，率领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代表团，离开古巴，出访亚、非诸多国家。1965年2月2日，切·格瓦拉率领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代表团，从位处西半球的古巴首都哈瓦那，飞经巴黎、拉瓦尔品第、卡拉奇，飞向东方，首途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首先抵达广州。

在天气气候状况与古巴哈瓦那极为相近的广州白云机场上，中共广东省省委书记林李明，书记处候补书记张根生，热情地迎接了切·格瓦拉少校一行。

晚上，在极为热烈的气氛中，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与格瓦拉少校一行进行了同志的会见，并设盛宴招待了格瓦拉少校同志和他率领的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代表用的全体同志们。

宴会是在同志的，兄弟般的气氛中进行的。

席间，在不无礼仪性质的祝酒词相互致过以后，陶铸和格瓦拉，展开了极为亲切的，热烈的谈话。

他们俩个人，一个是古巴人，一个是中国人，生活成长环境，存在着极大的差距。陶铸出生在1908年，格瓦拉出生在1928年，在出生年龄上，也存在着相当的差距。但是，陶铸和格瓦拉，还存在着更多的共同点，他们都是革命者，有着满腔火一样炽热革命激情的共产党人，而且，他们俩个人，一个在古巴革命的历史上，一个在中国革命的征途中，都有过文韬武略勇将和儒将战将的历程，同时，他们俩人又都是颇富文化修养特别是文学修养的文化人，所以，他们俩人一旦对阵开侃的时候，立刻便会涌出滔滔不绝的热烈话题，亲切而不分你我，完全地，很快地便成为了几乎毫无任何隔膜、隔阂的忘年交的感情至深的朋友。

当一道驰名世界的中国粤菜“龙虎斗”被送到盛宴的桌子上来时，陶铸热情地向格瓦拉让菜推荐着：

“请！格瓦拉同志，请，这道菜，便是中国粤菜中，最驰名的“龙虎斗”。1957年，列宁、斯大林缔造的苏联伟大的革命家伏罗希洛夫元帅来到中国，来到广州的时候，我们也曾经摆上过这样一道名菜，热烈地招待过那样一位最可敬爱的元帅同志。”

陶铸热情地让菜，热情的介绍着。

格瓦拉显得十分兴奋，简直兴高彩烈。

他站了起来，马上不是挥动筷子，而是参观起摆到桌子上的“龙虎斗”来。

“唔，亲爱的陶铸同志，什么是龙虎斗呀？为什么你们这样的名菜，被叫作是龙虎斗呀？”

陶铸说：

“龙，所谓龙，是指一种蛇。虎，所谓虎，是指一种猫。中国人把巨蛇有的时候也看作是青龙，而猫，它的形貌似虎。所以，把猫肉和蛇肉烩在一起的这道菜，便被叫成了‘龙虎斗’。”

格瓦拉坐了下来，笑出了声来，说：

“陶铸同志，你们中国人真不简单。伟大的毛泽东同志，把最强大的美

帝国主义看成是纸老虎，真伟大，真了不起。为此，1960年冬天，我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在北京，在台基厂，我还曾亲自访问过美国的著名作家兼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同志，我向她直接请教过，毛泽东同志是否确实论断过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原子弹是纸老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明确地告诉过我，确实的，毛泽东主席是曾经这样论断过，而且，那还是你们在只有小米加步枪的时候。我听了，只觉得，实在是不可思议，实在是太伟大了。然而，当我今天在你们这里，将要开吃这道龙虎斗大菜的时候，我明白了，原来你们中国人，从来就有着把龙、虎当作小菜吃的习惯和习性，一种英雄的素质啊！是不是这样的呢？陶铸同志。”

陶铸摇了摇头，说：

“不，格瓦拉同志。毛泽东同志论断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与我们吃‘龙虎斗’是联系不上的，完全是两回事。不过，您奇特的聪明的想象力，对我本人，我看是很有启示的。”

格瓦拉沉默了一秒钟，他摇了摇头。旋即又点点头说：

“您说的对，陶铸同志，您说的对。事实上，我们在古巴革命战争的年代里，在我们那一班子年轻人，紧跟着菲德尔在马埃斯特腊山区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游击战的时候，吃猫、吃蛇、吃生蟹，都曾经是有过的事情。特别是吃猫肉，在我们最困难的情况下，是非常难得的给养。马埃斯特腊山区有很多野猫，我们曾经逮到过许多野猫来填充饥腹。特别是古巴革命的伟大英雄，最令人难忘的光荣的烈士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少校，在马埃斯特腊山区坚持游击战的时候，他有过一个小小的酒精炉，经常用来煮野猫肉吃，并经常也用此作为美味，来招待我们这些他的战友。”格瓦拉娓娓地说着。他有一种从容不迫、清晰明白说话的气度。

陶铸是一个性格火爆热烈的革命忙人，但他有春沉静地倾听对话者说话的修养。

陶铸静听着格瓦拉的话语。

格瓦拉的眉宇间，忽然似乎升起了几丝忧戚，他低首垂眉，打住话语，停了片刻，然后，才又抬起头来，看着陶铸，接着把他的话语联接下去。

“关于卡米洛·亚恩富戈斯，古巴革命的伟大英雄，陶铸同志，中国的同志们，可能都已经听说过，大约会是知道的吧？”

陶铸深深地点了一下头，说：

“当然，我们是知道的。卡米洛·亚恩富戈斯同志，古巴革命最著名的伟大英雄之一。我们知道，1959年1月1日，在卡斯特罗同志的指挥下，正是您格瓦拉同志指挥的纵队和卡米洛同志指挥的另一个纵队，首先攻进了哈瓦那。您格瓦拉同志指挥的第八纵队，胜利地攻克占领了哈瓦那的卡瓦尼亚要塞；而卡米洛指挥的纵队，英勇地打下了哥伦比亚兵营。这样，就决定了古巴革命的最终胜利。这样，您格瓦拉同志，卡米洛同志，便都成为了卡斯特罗同志领导下的古巴革命最著名、最重要的英雄人物。这些，我们中国同志，是知道的，是非常尊敬和敬佩的。”

格瓦拉眉头疏朗了一些，接着说：

“不过，陶铸同志，我在这里想说的只是，尽管包括像卡米洛那样非凡的英雄人物在内，我们当时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打游击吃猫肉，除了想到解决饥饿的肚子之外，确实与产生伟大的思想无关，我说在这一点上，您是完全对的。因此，我们也就不能把吃‘龙虎斗’这样的菜，和伟大思想的产生联

系起来。”

听着格瓦拉的话，陶铸释然地笑了起来，再次吁请格瓦拉向‘龙虎斗’名菜开火。并且说：“不过，格瓦拉同志，联系起来也无尝不可，现在最主要的，还是让我们向着我们面前的龙虎们猛烈开火吧！”

格瓦拉也笑了，说：

“对呀，这也符合辩证法。毛泽东同志有过伟大的诗句，叫作‘何时缚住苍龙’，让我们现在就缚吧！”

席间围绕着席面而坐的古巴和中国同志，一个个都欢欣鼓舞起来，迅速地开战，消灭了桌面上摆着的满满的一大盆“龙虎斗”。

宴毕。宾主又坐下来品茶。

陶铸说：

“格瓦拉同志，刚才，您脱口就是一句毛主席的诗：何时缚住苍龙。看起来，你也是爱诗的，很爱好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对吗？”

格瓦拉说：

“是的，我非常非常地热爱诗。我年纪很轻的时候，也曾学习过写诗。可是，不行，我写的诗，人家都说只是白话。不过，尽管如此，我对诗歌仍然痴迷般的热爱，在马埃斯特腊山打游击的时候，不管装满子弹装备和给养的背包多重，我也还要装载上日记本和马蒂、聂鲁达的诗集。我太喜欢他们的诗了。我还特别特别地喜欢意大利古典诗人但丁的《神曲》，简直喜欢的了不得。不过，我在1960年来到中国以前，我还未曾读到过中国的诗。后来我读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诗词，简直妙不可言，我更是立刻就喜欢上了。就在那次我访问中国的时候，毛泽东主席接见并宴请我们古巴代表团，在席间喝红葡萄酒的时候，我冒昧地请问过毛泽东同志，除了闹革命、打仗和领导社会主义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以外，毛主席写诗是否也是中国最伟大的高峰。可是，毛泽东同志的回答是：要谈写诗，中国最伟大的高峰，应该是屈原、李白和杜甫。我也听毛主席的话，于是，我便也要来屈原、李白和杜甫的诗来读，很遗憾的是，屈原的诗，我完全读不懂，比读但丁的诗还难懂。但是，读李白的诗，杜甫的诗，就好多了。特别是读杜甫的诗，我一读就是很明白，一读就非常喜欢，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我读后非常非常感动，因此，后来我到中国的四川访问的时候，我还特别参观过诗人杜甫在成都生活过的草堂，有趣的是，就是在那里，我还第一次听到了您的名字，当时有一位中国同志给我介绍说，革命中国的许多伟大领导人，有许多人是杰出的诗人，除了毛主席以外，朱德总司令，革命的元老董必武，都是著名的大诗人。他们说，朱总司令和董老的诗，都有杜甫的诗风。他们还说还有一位比较年轻些的中国领导干部，写诗也有杜甫的沉郁悲壮气概，他们告诉我的这个人，据说就是当时广东省的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同志。”

陶铸听到这里，忽然哈哈大笑起来，拍着膝盖扬着手说：

“打住吧，格瓦拉同志，本人不敢，不敢……”

格瓦拉说：

“不敢怎么行呢？那一次我从中国返回古巴，向菲德尔和革命领导核心的同志们，汇报了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经验，汇报了我在这神奇的土地上所见到的所有一切、一切，最后我还吁请古巴革命领导核心的同志们，都学中国领导同志们的榜样，都要勇敢的来学写诗，我还特别向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推荐了毛主席向我推荐的中国三大诗人：屈原、李白、杜甫和他们的格

律诗词。对这种中国的格律诗，菲德尔几乎也是一读便爱上了，他立刻表示，一定要学会中国的格律诗，有朝一日还准备来到中国，和亲爱的中国同志们赛诗来呢。”

陶铸静静地听着格瓦拉的叙说，不知几时，这个长满络腮胡子的火爆汉子，泪浸浸的，眼珠都热了起来。

如果不是因为第二天凌晨时分格瓦拉同志还要飞赴北京，这一夕，中国和古巴的两位相差二十岁的信仰一致的同志，大约一定会畅谈夜尽。

分别时分，他们热烈地，紧紧地拥抱久久不肯分开。

毛泽东会见格瓦拉，讲了个本匠的故事

1965年2月3日。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同志率领的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代表团，乘坐中国专机，从广州飞抵北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中国共产党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通常被人们视为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的书记处书记彭真，以及其他许多负责的中国同志，和两千多名北京市的人民群众，在北京机场敲锣打鼓，挥动着古中两国的国旗，招展着热烈欢迎格瓦拉以及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代表团的巨幅长条标语，热情地欢迎格瓦拉和随他而来的其他古巴同志。

随同切·格瓦拉而来的，还有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全国领导委员会成员，书记处书记埃米略·阿拉贡内斯·纳瓦罗，全国领导委员会委员奥斯马尼·西恩富戈斯·格里亚兰，以及其他同志。

在飞机的舷梯旁，邓小平，彭真迎上前去，和切·格瓦拉热情地紧紧拥抱，仿佛久别的挚友重逢，热情地欢迎他和其他古巴同志的到来。

随后，格瓦拉由邓小平、彭真陪同，驱车进入北京城，下榻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

1960年天寒地冻的季节，格瓦拉怀着满腹依依惜别的深情，结束他对中国的第一次访问，离开了北京。相隔五年以后，他第二次来到中国，来到他几乎经常魂系梦绕的北京，他的激动心情，是自不待言的。

熟悉的台基厂路。

熟悉的天安门广场，熟悉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熟悉的天安门。

紧接着，是熟悉的中南海的红墙，是熟悉的新华门，熟悉的新华门旁并列站立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党和国家领导机关以及领导人的英武的哨兵。

格瓦拉简直热血沸腾了起来。

一切仿佛仅仅是在昨日一样。1960年11月17日，作为英雄的古巴人民的代表，切·格瓦拉，率领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第一次访问中国，来到了伟大的北京。11月1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切接见了以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名义率领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的埃·切·格瓦拉少校和代表团全体成员。

在亲切的接见，热烈友好的会晤后，周恩来总理举行隆重盛大的欢迎宴会，热烈地欢宴切·格瓦拉少校和他率领的代表团全体成员。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陈毅，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陪同周恩来总理参加了欢迎切·格瓦拉的宴会。

参加宴会的，还有许多极有影响的、知名的中国同志，包括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郭沫若、林枫，全国政协副主席包尔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以及诸多的中国政府部长，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和人民团体的代表。还特别邀请了几乎所有外国派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和他们的夫人。

宴会充满了沸腾的欢悦和盛情。

周恩来，二十世纪世界久已闻名遐迩的伟大政治家，是格瓦拉早已熟知和仰慕的人物。他对周恩来充满了由衷的热烈向往和尊敬。

周恩来对他，对古巴人民的代表，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的领导人，

同时是已知的古巴革命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的格瓦拉，虽然他的职务仅是一个国家的银行行长，军衔只是一员少校，而年龄又比周恩来整整年轻三十岁，但是，周恩来对格瓦拉，保持着绝对够规格的国家礼仪，仪表亲切而严肃，彬彬有礼而一丝不苟，对格瓦拉充满了绝对不失对等的尊重和敬意。然而，格瓦拉毕竟是一位年轻的少校同志。在致过礼仪性的祝词后，在几个回合的干杯碰杯以后，在有机会可以更为融洽地款谈的时候，格瓦拉忽然操用起了法语，而不是用西班牙语，直接冲着周恩来用法语说起了话来：

“尊敬的周总理，我知道您曾经是中国留法国的留学生，非常清楚您能够十分娴熟地操用法语，因此，我想用法语向您提出一个最恳切的请求，您能不介意吗？”表情亲切而严峻的周恩来，无惊讶之意，分毫不动声色，马上同样用十分娴熟的法语，不为所注意地轻声问了一句格瓦拉：

“什么请求呢？格瓦拉同志。”

格瓦拉说：

“我从古巴出发时，菲德尔和劳尔要求我，来到中国，一定要见到毛泽东主席。这也是我的热切愿望。”

周恩来笑了，马上回答说：“会安排您见到毛主席的。他也是很热切想见到你们的。”

1960年11月1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北京的中南海他所居住的地方，同样十分热情地接见了埃·切·格瓦拉和他率领的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的全体成员。

周恩来、陈毅、李先念等中国的党政领导人，陪同了这次接见。

毛泽东见到格瓦拉后，亲切地拉住格瓦拉的手，高兴地说出来的第一句话便是：

“你好年轻哟！切！”

格瓦拉立刻激动万分，满心震动。

他听清楚了。毛泽东亲切地呼叫了他一声“切！”

这样亲切的呼叫，本来只是在古巴最亲密的战友们那里，才是能够听到的。毛泽东怎么也会这样亲切地来称呼他呢？格瓦拉一时兴奋，竟有些怔住了。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的本来的名字，应该是叫作埃内斯托·格瓦拉·德拉赛尔纳。1928年6月14日，他出生在南美阿根廷的罗莎里奥市，论血统，他祖上是爱尔兰贵族，论国籍，他本来应该是阿根廷人。只是后来他自视为是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儿子，自视为是宁愿为拉丁美洲受压迫的人民四处奔走抱打不平的罗宾汉，他满怀激情地在拉丁美洲各国寻找申张正义的机会，投身一切反对帝国主义殖民压迫、残酷剥削统治的革命，他先是投身危地马拉的人民革命斗争，嗣后，才又在并非偶然的契合中，投身参加了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斗争。

在古巴革命胜利后，在1965年的2月9日，卡斯特罗在庆祝古巴革命胜利的集会上，非常热情郑重地宣布格瓦拉是古巴革命的英雄，并且非常严肃郑重地宣布格瓦拉从即日起正式拥有古巴国籍，正式成为了古巴人。

不过，格瓦拉的国籍是可以变更的。他的血统，却是并不能随便变更的。因为他是阿根廷人，所以，他的阿根廷人的烙印，在他投身古巴革命多年的战斗生活中，总还是能够非常突出地显露出来，这就是他说话的时候，总会自觉不自觉，非常自然地带出一个“切”的词根来。他经常会“切！”“切！”

地感叹和表示什么，因此，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游击战场的区域里，战友们便非常便当地送给了他一个绰号，这就是“切”。而叫来叫去，“切”便成了战友们热爱他的一个亲切的称呼，接着，便逐渐以正式的名字传开了。菲德尔在签署格瓦拉为担任第二纵队司令的任职命令时，也只写着任命切为第二纵队司令的字样。

在古巴革命胜利后，“切”更成为了一个响遍古巴全国的光荣而亲切的称呼。而现在，来到了伟大的中国，来到了伟大的毛泽东身边的时候，这位在格瓦拉心目中至为崇高的伟人，也用“切”这个字眼来亲切地称呼他。

格瓦拉一时热血流遍了全身。他紧紧地握住毛泽东的手，仿佛变成了一个生性羞怯的孩子，久久说不出话来。

毛泽东款款拉着切·格瓦拉的手，在中南海丰泽园的颐年堂里坐下。

毛泽东请格瓦拉抽烟、喝茶。

格瓦拉捏起一支红盒装的“中华”烟来，在手指间轻轻摆捏着。他抽惯了棒槌一般的古巴雪茄烟，捏着白杆儿细细的中华牌香烟，有点儿不习惯。

毛泽东请格瓦拉喝茶。

格瓦拉好奇地把起了光洁明亮，盛满了碧清热茶的茶碗。他品茗了一口毛泽东待客的香茶，一丝清冽的芳菲，结伴着一种苦丝丝的茶味，涌向了他的喉间。

格瓦拉忽然像是孩子般地笑了开来，他不无惊奇地感叹了一句：

“唔，多香的马黛茶呀，这真像是马黛茶，阿根廷的马黛茶。”

“你喝到了家乡的茶叶味儿，就说明你是真的到家了。”毛泽东慈蔼地说：

格瓦拉“嘿嘿”地笑了开来。

他笑得很欢畅，很自然，几乎完全不再有任何拘谨和不自然的羞怯之感了。

毛泽东含笑仔细地端详着格瓦拉，忽然不无感触地扯起这样一个话题来：

“切，我现在大约可以断定这样一个事实了。我想，你大约一定就是现在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银行的行长吧，你信不信？”

格瓦拉摇了摇头，耸了一下肩膀，说：“谁知道呢？我没有调查过、比较过。”

毛泽东说：

“你是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博士，攻读过金融学校、银行学校吗？”

格瓦拉立刻说：

“不。不。我没有攻读过任何金融学校和任何银行学校。我只是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国立大学医学系学过医，我曾经是拥有行医执照的外科医生，从来也没有拥有过经济学家、银行家的头衔。”

毛泽东抿一口茶水，喷云吐雾似地吸一口香烟，更亲切地看着格瓦拉，却说了一句：

“是啊，你不是经济学家，又没有银行家的头衔，可你却是古巴革命政府的银行行长，全古巴的钱，现在都抓在你的手里揣在了你的口袋里。”

毛泽东说得十分幽默，十分风趣。

格瓦拉言简意赅，向毛泽东以及在座的周恩来、陈毅、李先念，叙说了他如何当上古巴革命政府银行行长的经过。

那是在古巴革命胜利夺取政权最初的日子里。由于古巴革命经历的时间并非很长，所以，在全部革命斗争的整个过程中，除了集中全力武装斗争，集中力量夺取政权之外，还没能够有余力腾出手来，悉心培养出一大批在掌握政权后所需要的各业各类的干部，没有来得及能够在夺取政权之前，就拥有一大批可以胜任愉快地管理国家机器的人才。这样，在古巴革命胜利以后，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出任古巴革命政府总理的时候，有一些困难问题，自然而然便产生出来了。

革命政府总理之下，总还要有一大批部长成员吧？武装力量部的部长是现成的，有富有战斗经验，指挥过一路纵队，开辟过第二战线的劳尔·卡斯特罗出任就是了。外交部长，似乎也不缺人选，曾经有一位作家，名字叫罗亚，早从墨西哥古巴革命武装产生伊始，他就站在古巴革命一边，很快成了卡斯特罗兄弟和格瓦拉等人的朋友，这个人见多识广，见过世面，当外交部长，似乎也不会成为困难的问题。还有内务部长，事实上也是现成的。格瓦拉在作为少校指挥着第四纵队的时候，他手下有一位上尉拉米罗·巴尔德斯，为人最为机警，他就可以是现成的内务部长。还有卫生部长这样的职务，也差不多完全是现成的。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游击战争的年代，在孔拉多高地的战斗中，一颗巴蒂斯塔军队的罪恶子弹，无情地钻进了切·格瓦拉的腿肚，医术高超的游击队军医马查迪托，没有碘酒和手术刀，但是，他就用盐水和刮胡子的刀片，挖出了切人格瓦拉腿部的一颗 M—1 步枪子弹，治好了格瓦拉的伤腿。这般如此医术高超的军医马查迪托，在古巴革命胜利后的古巴革命政府中，自然也可以出任卫生部长。

在所有这些已经提到的国家管理部门所需要的人才，在现成的革命队伍巨大的人才库里，是终能物色到的。可是，有一些需要特殊专业知识，业务技术的部门，比如经济管理部门，所能插入的管理干部，就面临着很难筛选出来的问题了。

怎么办呢？

菲德尔·卡斯特罗，作为古巴革命的领袖，在研究安排组阁事宜的议事会上，没有特别的办法，就开始发动群众。

反复排队物色，在现有的干部队伍里，实在找不出哪一个人最适合当国家银行的行长，实在不知哪一个人可以胜任自如地很好地掌握古巴国家的全部财政大权。

于是，卡斯特罗忽然向着所有与会者们发问：

“在坐的各位，哪一位是经济学家，哪一位具有想成为经济学家的热情呀？”

卡斯特罗这样发问，环视着所有在场的人。

而几乎所有在场的人们，却一时都个个沉默着，都只在面面相觑。

然而，正在这时，一直坐在屋角一边的，一直在埋头阅读着一份文件材料的切·格瓦拉，忽然高高的举起了手来。

卡斯特罗一见格瓦拉举起了手，眼睛一亮，马上大声宣布：

“好，有啦，我们有了国家银行行长啦。那我们就决定，由切来担任古巴革命政府的国家银行行长吧。”

而这时候，格瓦拉吃惊地抬起头来，惊异地睁大眼睛，直望着卡斯特罗，他不解地问了一句：

“菲德尔，怎么回事？”

卡斯特罗说：

“我问谁是经济学家，谁有成为经济学家的激情。你不是举起手来了吗？”

格瓦拉忽然歪着鼻子一笑说：

“吓！我是什么经济学家，我有什么成为经济学家的激情，我是个外科医生，我是个技术的专家，你们谁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变成了经济学家，什么时候产生过成为经济学家的激情呢？我倒有替人拔牙的激情，至今还没减。”

格瓦拉说着。在场的伙伴们都喻声笑了起来。

确实，格瓦拉确实曾经是个外科医生，在古巴革命队伍刚刚组建的时候，登上了从墨西哥图克斯潘港出发驶向古巴的革命远征船“格玛拉号”的时候开始，切·格瓦拉便被任命成为这支革命队伍的中尉军医。一开始，他在这支队伍中的主要任务，几乎唯只是抢救伤员，后来，由于形势迫使他必须拿起枪来参战，必须首先拿起枪来成为一个战斗员，于是他便在更主要的方面成为了古巴革命起义军的一员战士，而且，很快成长成了一名极为勇敢而无所畏惧的战士，并且，逐渐在战斗中表现出了他善于战斗的指挥员才能，所以，卡斯特罗很快便破格提拔他，担任了初步发展中组建起来的第二纵队司令，并且使他同时也成为了当时除了卡斯特罗本人以外第二位拥有少校军衔的人，他从此完全充当起了纵队司令军事指挥员的角色。不过，尽管如此，他对行医的行当，还仍然是乐而不疲。革命军中在开始到后来的很多岁月里，基本上不曾配备过牙医，而在号称“世界糖罐”，产糖量极大的古巴，人们由于食糖较多的原因，许多人们的牙齿，经常会受到侵蚀和伤害，所以，在革命起义军中，牙病患者，总是不少。谁来治疗这些牙痛患者呢？几乎没有别人，唯只就是切·格瓦拉这位少校司令了。但，格瓦拉给这些牙痛患者们治疗牙病，有什么治疗牙病的医疗器械吗？可以说，不是基本上没有，而是完全的没有，甚至连拔牙的必须的任何一支麻醉针剂都没有。那怎么办呢？格瓦拉是有办法的，他毕竟有许多现成的医疗知识，他可以靠“心理麻醉疗法”，来给起义军的牙病患者们拔牙。他的“心理麻醉疗法”，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哄”，要一个劲儿不停地对患者说：“不疼，不疼，没关系的，拔掉牙就好了，没关系的，别怕，别怕。”

“哄”如果不凑效，又怎么办呢？那就不用“骂”的办法：“瞧你，什么样子，是古巴人吗？像个起义军的勇士吗？去当谁的老婆子去好了！”“骂”如果也不行，格瓦拉还有一招办法，那就是让患者大喊大叫，他也一起来大喊大叫，就在大喊大叫中，手舞足蹈，来拔牙。这样，牙病患者的病牙，总是能拔下来，总是能除掉病恨的。但是免不了的一次疼痛，总也是疼得人实在钻心。因此，凡是叫格瓦拉拔过牙的人，虽然都治好了牙疼病，却总还是要忍不住骂他一句：“切——江湖郎中！”

这就是格瓦拉在古巴革命战争的年代，在马埃斯特腊山区进行游击战时期，给战友们行医拔牙的故事。这些故事，在古巴革命起义军中，几乎是人所共知的笑料和美谈，所以，当今天在领导核心的会议上，格瓦拉说到自己尚有拔牙行医激情不减的时候，与会的所有同伴，几乎都一起喻声地笑了开来。

菲德尔·卡斯特罗也忍俊不禁，笑了一下，同时皱了一下眉头，看了格瓦拉一眼，说：

“切！既然如此，我问我们中间，谁是经济学家，谁有成为经济学家的激情，你为什么还要举手呢？”

切·格瓦拉转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扬了一下手中拿着的一分文件材料，说：

“我正埋头看这个，关于组织武装民兵的文件，好像只听到您是问了一句，谁是马克思主义者，谁学过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以我就举起了手来。”

卡斯特罗笑了，说：

“这就是你的事情了。既然你举起了手来，不管你是不是经济学家，有没有成为经济学家的激情，反正，我们就这样定了，您，切·格瓦拉同志，要出任古巴革命政府国家银行行长，并且同时拥有革命政府财政部长的全部权力，不再另设财政部长，整个古巴革命政府和国家所拥有的全部财产和资金，要统统拿在你的手里，统统由你来管。”

于是，切·格瓦拉便如此成为了古巴革命政府的国家银行行长。

切·格瓦拉如此这般，把他如何当上古巴国家银行行长的经过，向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和李先念，娓娓道来，有头有尾地说了一遍。

毛泽东听得非常专注，饶有兴趣。

陈毅听得很兴奋，仿佛备受鼓舞。

周恩来和李先念，也都安详沉静地听着，他们有时还会心地交换一下眼色。

格瓦拉讲完了他出任银行行长的故事，但却引发了毛泽东也要说一个中国故事给格瓦拉听的谈兴。

毛泽东请格瓦拉再喝茶，再点一支烟，然后，他就挥起一只手来，用手指对准了在座中的李先念，回过头来，问格瓦拉：

“这位同志，你认识吗？”

格瓦拉笑了，说：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次邀请我们来访问，邀请者用的就是他的名义，是李先念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前天一下飞机，他到机场来接，我们就认识了。我们俩一见如故。他说我们可以是忘年交。他比我大二十岁。”

毛泽东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邀请的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访华，用李先念的名义邀请您，是出于国家礼仪规格对等的考虑。你切·格瓦拉同志，是古巴国家银行行长，我们知道你事实上也是古巴革命政府的财政部长，所以我们邀请你率经济代表团访华，用的是他李先念的名义，因为他不仅是我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是国务院的副总理，而且还兼任着我们的国家的财政部长。他可是个大富翁哟，我们现在全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吃喝穿戴，都由他来管，我们这么大个国家，可是所有的钱，所有的人民币，也都全装在他的腰包口袋里，谁都不敢惹他生气呢，谁惹了他，谁就别想从他那里得到一块钱，因此，他可是个厉害人。”

毛泽东幽默诙谐的说着。

格瓦拉颇能理解地“嘿嘿”笑。

李先念只是板着脸，静静地听。

毛泽东接着说：

切·格瓦拉行长，与李先念部长，似乎也有相似之处。你们俩个，真是

天生的一对，很多地方大有相似之处。我看，这其中有一个产生的原因，就是你们俩个人，都有点儿少年得志的经历。”

毛泽东说着，弹弹烟灰，仍然主要是对着格瓦拉说话：“你，切·格瓦拉行长，你今年是三十二岁。你已经是古巴国家的领导人之一，是银行行长，起义军少校，了不起的够可以了。在这一点上，我们这位李先念同志，也是了不起的够可以。他在中国工农红军的时候，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当上了我们的红三十军军长，指挥着千军万马，而且到处旗开得胜，打胜仗，洋气的不得了。可是，其间，也有打败仗哭鼻子的时候，1936年西路军远征祁连山，他指挥的一个军打光了，差不多成了光杆司令跑回了延安。跑到我那里，我们把他从军级干部一家伙就撤成了营级干部，不过，仍然还又给了他一个营的人马，让他带队深入到豫鄂边界去，那里是敌人的后方，让他到那里去再开辟根据地，发展队伍，后来，在那一带，他就靠一个营的人马作底垫，十年扩展成了三十万人马的中原军区，自然，他也又成了中原军区的司令员，于是后来，因为中原军区像一把钢刀插在了蒋介石统治区的腹地，所以李先念也就成了那位蒋介石的心腹之患，非要斩尽杀绝之，于是，那位蒋介石，就派出了数倍于李先念部队人马的百十多万全副美式装备的大军，对李先念实行包剿。然而，结果呢？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李先念不是还在我们这里当财政部长吗？”说着，毛泽东一顿，接着又对格瓦拉说：“对啦，切·格瓦拉行长，我还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李先念打仗是一把好手，是一把硬手。如果他今天还在军队工作，当个司令什么的，我们是可以授给他大将军衔的，不过，中国大陆解放以后，我们在成立人民政府之始，也为配置经济管理人才费过思量，后来成立财政部的时候，我们就抓了两个大兵来当财政部的部长、副部长，这两个大兵，一个是邓小平，一个就是李先念。邓小平当了我们的总书记以后，财政部长的头衔就落在了李先念的头上。不过，我们接下来可以说到的一点是，这个李先念，他也并不是有资格的经济学家，似乎也谈不上有什么成为经济学家的激情，参加革命工作之前，他仅仅是一个小木匠，是个手工业工人，还没有你切·格瓦拉行长的医科大学毕业的学历和文凭呢。”

切·格瓦拉惊异地望着李先念，马上核对事实，问：

“是这样吗？李先念副总理，您真的是木匠出身吗？”

李先念把手一扬说：

“一点儿也不差。”

毛泽东接着更为风趣地对格瓦拉说：

“你看，格瓦拉同志，一点儿也不差吧？我们刚刚革命胜利夺取政权的时候，也是非常缺乏经济方面的管理人才的，虽然我们在夺取政权前的革命过程，长达二十二年，我们越到后来，越注意培养各类干部的长远战略，但是，我们培养的人手，总还是嫌不够用的，于是，我们也只好抓来个大兵管钱。然而，事实证明，我们这样的作法，没有什么不好。我们的李先念同志，把我们中国的人民币和其他各种钱财就管得非常好。周恩来总理同志，对他这个财政部长，是非常放心的。而周恩来同志放心的事情，作为党中央主席的我来说，就更没得什么用得着操心的事情了。”

亲切、友好、热烈的谈话，延续了很长时间。

经周恩来总理提示，毛泽东主席才说：

“噢，该开饭了。切·格瓦拉行长和古巴经济代表团的客人们来，我们

是要请客吃饭的。切行长，请吧。”

毛泽东还是款款地拉着切·格瓦拉的手，走进了请客吃饭的餐厅。

落座以后，毛泽东用一句话，致过欢迎格瓦拉行长和古巴经济代表团全体成员的祝酒词，然后便开始举酒碰杯。接下来毛泽东非常高兴愉快地请格瓦拉来尝尝他所喜欢吃的油焖红辣椒。格瓦拉说：“谢谢毛主席，我有哮喘病的痼疾，不敢吃刺激性太强烈的菜。”毛泽东很遗憾地摇摇头，又用筷子挟起一块红烧肉来，放到了格瓦拉的盘子里，请格瓦拉尝，并说：“你尝尝这个红烧肉，可以补脑，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道菜。”格瓦拉高兴地吃一口红烧肉，他仔细地咀嚼着，品味着，摇头赞叹，赞不绝口，连声夸赞：“好吃！好吃！”

席间，热情友好坦诚的叙话，一直在延续着。轻松的话题，欢悦的笑语，一直是叙话的主干，但是，在这其间，也时不时地谈论着非常严肃的，郑重的重要话题，不仅仅谈到一般的国际形势，一般的国内建设问题，有的时候，谈话的题目很大，内容深邃，充满着哲学的理论意味，有的时候，谈话的题目又具体起来，谈到非常细微具体的事情，比如关于游击战的一些细节问题，经济建设中自立更生的各种具体办法。在许多回答中，周恩来、陈毅也都作了较多的插话，只是李先念的插话不多，他脸上的表情，也总是严肃多于笑意。

格瓦拉来到毛泽东身边，仅就从年龄意义上说，他也把毛泽东看成是一位最可尊敬的长者。毛泽东比格瓦拉年长三十五岁。何况，中国革命的伟绩，毛泽东关于革命战争，特别是关于游击战的理论和实践、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的论断和其他诸多理论问题方面的权威性解释和贡献，在全世界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无可置疑，在切·格瓦拉的心中，也拥有着备受尊崇的位置。在全心全意自视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格瓦拉的心目中，在二十世纪当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是完全可以理所当然地排列在列宁、斯大林的名字之后的，在古巴革命后，在切·格瓦拉撰写的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文章著作中，他的笔下，几乎总是这样排列着的。

在古巴革命胜利后，在起义军的组织完全统一以后，菲德尔·卡斯特罗，仍然担任着起义军的总司令。劳尔·卡斯特罗担任着武装力量部部长。至于切·格瓦拉，在他担任了许多个古巴革命政府的行政职务以后，在革命起义军中，仍然保留着多个重要的军职，除了担任哈瓦那卡瓦尼亚要塞的司令之外，他还担任着最直接面对着美帝国主义前线的比那尔德里奥省军区的司令，同时，他还负责组建了古巴武装部队的训练部，并由他亲自来担任训练部部长。这个训练部，实质上类同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政治部，是专门对革命部队进行政治训练的机关。

早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游击战的年代，切·格瓦拉在非常突出地显示着诸多方面杰出的才能的时候，他就尤其突出地显示出了他是古巴革命意识形态专家的才能，尤其突出地显示出了他是革命理论和思想热情宣传家的才能。经过菲德尔·卡斯特的授权，古巴革命的第一张油印小报《自由古巴人》，是由切·格瓦拉创办的；使用着最简陋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古巴革命的第一个广播电台，也是由切·格瓦拉创办起来的。

格瓦拉在古巴革命胜利后，组建起古巴革命起义军的训练部以后，格瓦拉深知宣传载体如喉舌的重要，他马上着手创办起了两种刊物，其中一种是思想政治理论性刊物，刊名定为《绿橄榄树》，另一种革命的文艺性质的刊

物，刊名为《波希米亚》。在这属于训练部的两种刊物创办起来以后，格瓦拉在国事活动和军政事务缠身极为忙乱的状态下，仍然成这两种期刊的最积极热情的撰稿人，他把大批的文章、随笔，包括一些理论性的探讨问题的文章，都发表在这两种刊物上，其中包括《游击战》的长篇文章，和《革命战争随笔》，有许多长篇理论文章，具有很高的理论思想水平，比如 1960 年 10 月 5 日发表在《绿橄榄树》的长篇文章：《研究古巴革命思想意识的笔记》，就极富广博的内容和深刻的理论思想，在这篇文章中，格瓦拉对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在二十世纪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伟大实践和贡献，就进行了非常精辟独到的理论叙述。

由此可见，1960 年，三十二岁的切·格瓦拉，不仅仅是古巴革命的杰出英雄，不仅仅已经是一个世界有影响的革命家和政治家，他显然也还是一个思想深邃的杰出的思想家和理论家。而这样一个人物，当他万里迢迢，终于来到了他久已敬仰，渴慕至深的伟大的毛泽东的身边，他会有多少热切的思想，和他正在思考中的实践中的问题，想与毛泽东请教和研讨呢？

格瓦拉十分宝贵和珍惜毛泽东接见他和他率领的经济代表团全体成员的每一分钟，多少思想交流，感情交流和理论交流以及种种见识的交流，似乎比世界上任何江河的交流都更为激越。

无疑，毛泽东和格瓦拉，这两位年龄相差三十五岁的伟大革命家的会见的时刻，是二十世纪世界政治史上的一个令人不能忘怀的珍贵的时刻。

时间不能无限的延伸下去。

毛泽东的接见和宴请结束了。

切·格瓦拉依依不舍地告别毛泽东。

毛泽东坚持走到丰泽园的院外来，送他衷心挚爱的贵宾登车离去。

毛泽东目注着格瓦拉的座车绕着中南海内瀛台之滨的湖海离去。格瓦拉的座车消失在新华门方向的那边，他还站在他站的地方，默立了许久、许久。

无疑，这一位当时已经年近七十岁的老人，他也由衷地珍视着与这个三十二岁的古巴年轻的革命家的会见。

陈毅元帅冲着格瓦拉喊“我的小同志哥哟！”周恩来总理笑了

1960年12月1日。

从11月17日开始，切·格瓦拉率领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在中国辽阔的国土上，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进行了为时半月，紧张繁忙的工作访问和国事访问。

切·格瓦拉，不仅作为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的团长，而且被中国人民视作是古巴人民伟大代表的古巴革命英雄，他在中国各地到处都受到最为隆重的，最为热烈的欢迎。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热情地接见并设便宴招待了切·格瓦拉和他的同志们。

周恩来总理，数度参加了正式欢迎会和宴会，并且在格瓦拉访问中国的整个时间内，始终关注着他的访问，与他保持着联系。其间，格瓦拉在北京参加的一些未经报道的非正式活动，周恩来总理也抽出极为宝贵的时间陪同了格瓦拉。访问美国女作家兼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时候，周恩来也热情陪同了切·格瓦拉。

在周恩来欢迎和陪同格瓦拉的时候，威名响彻全世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几乎也是回回不离周恩来总理的身边，总是热情奔放地与周恩来一起出现在格瓦拉面前。

而且，这位每次都热情奔放，总是身穿军装佩带着元帅军衔出现在格瓦拉面前的中国外长，似乎总是对切·格瓦拉表现出一种不失尊敬的特别的亲切和喜爱。

最意味的是，陈毅不像周恩来。周恩来明明能够娴熟地操用法语对话，而且格瓦拉曾经试图与他用法语来对话，以便直接交流，无须翻译的转述和劳动，但是，周恩来总是绝不主动地操用法语。而陈毅大不相同了，他几乎一有机会，便和格瓦拉操用着法语对话。而且，有的时候他们两个，会长时间地用法语交流和对谈。

格瓦拉的父亲林奇先生和她的母亲塞莉亚女士，都是阿根廷人，但他们也都是欧洲移民的后裔，祖上都是欧洲贵族的血脉。在阿根廷生活着的西班牙贵族移民，多少年间似乎都立下了传统，从来都十分崇尚法语的学习和使用。格瓦拉在幼年的时候，父亲母亲都有丰厚的遗产继承，家庭生活十分富足，所以，在格瓦拉少年和进入青年的时期，都受过极为良好的教育，他掌握使用法语法文的能力和水平，不低于他操用西班牙语语言文字的水平和能力，用法语会话，自然了无困难。

陈毅比格瓦拉年长二十八岁。他们的出身家庭背景，很有相似相近之处。陈毅是出生中国四川省的至乐县，早年家中，也是极盛资产土地的大户，所以陈毅在青少年时期，也有条件受到过最良好的教育，他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后来留学法国，学习文学，但是，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教育，半路出家成为矢志不移，最忠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成为了职业革命家，革命军队的元帅和外交家。

只是，职业革命家也好，革命军队的元帅也好，虽然多年戎马倥偬，战斗生涯，但是他的才学文化水平，仍然总是在日增月进，他所熟练掌握和操用过的法文法语，自然也是分毫不忘的，即使在战争年代，在指挥大战的幕帐里、马背上，密林中的篝火旁，或者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他当上海市市长，华东军区司令员，以至现在当着国务院的副总理、外交部长、中

共中央的政治局委员，忙得几乎完全是不可开交的时候，他却仍然常常会“我以一闲对百忙”，插空抽暇，偷闲阅读着法文原版的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的小说和剧本。

所以，陈毅的法文法语水平，现在用来与格瓦拉直接交流和对话，自然还是绰绰的有余，完全可以应对裕如的。

有一天，陈毅忽然操看法语，直接向格瓦拉发问：

“格瓦拉同志，我知道你们古巴革命领导核心，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是最高司令官，是总司令。知道劳尔·卡斯特罗少校，是分管国防，内务和军事情报工作的，而你切·格瓦拉少校，也不仅仅是国家银行行长，不仅仅只管着经济事务，事实上你还负责分管着政治宣传，意识形态和外交工作。因此，你这次率经济代表团来中国，主要是要谈经济方面的事宜。但是，你作为古巴革命领导核心外交方面的负责人，我作为中国的外交部长，在外交工作事宜方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们不妨也可以进行一下非正式的交流。”

格瓦拉立刻非常高兴表示，作为他本人，他非常希望得到这样的机会。

格瓦拉说：

“我是知道您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丰功伟绩的。是您和邓小平同志与刘伯承元帅，一起领导了世界著名的淮海战役。斯大林认为，你们指挥的六十万人民解放军，纵横捭阖，在一场战役里，一举歼灭了八十万全部美国武装的国民党军队，简直是奇迹。我们古巴的同志们，也认为绝对是奇迹。同时，这奇迹对我们当年在战争岁月中，不仅具有鼓舞的力量，而且几乎还有着非常直接的重要的启示和影响，如果我们没有受到你们的启示和鼓舞的因素，我们似乎也就不敢想象我们古巴革命的起义军，仅仅有四百名战斗员的时候，就敢于和美帝国主义也是武装到牙齿的巴蒂斯塔四万反革命军队作战，并且战胜他们，消灭他们。”

陈毅元帅笑着说：

“是啊，我的小同志哥哟，你们在古巴革命战争中所创造的奇迹，我们也是清楚的。我还知道你切·格瓦拉少校指挥的号称“西罗·雷东多”的第八纵队，在夺取圣克拉腊市的战役中，就指挥你全纵队的一百四十名战将，一家伙就打败和消灭了将近一万多名用坦克车、装甲车和重炮装备起来的巴蒂斯塔反革命军队。你们在革命战争中创造的奇迹，也是令人不敢想象的，是令我们惊异和佩服的。因此，你们的奇迹和胜利，对我们当然也有重要的启示和鼓舞。咱们完全可以彼此、彼此啦。”

陈毅说着，幽默起来，拍着格瓦拉的肩膀。

顿了一下，陈毅还又郑重补充说：

“只是，小同志哥哟，以后你再谈中国的淮海战役，不要忘了邓小平是主帅，刘伯承和陈毅元帅只是副帅，而还有两个重要的指挥成员，一位是粟裕大将，另一位是现在我们党的政治局委员，也是国务院的副总理谭震林同志，如果授军衔，我看他也能有资格被授予于大将。”

格瓦拉赞叹地说了一句：

“中国的英雄实在太多了。所有你们这些英雄，实在是太伟大，太了不起，太厉害了。”

陈毅双眼圆睁说：

“你们古巴的各位英雄也够伟大，够厉害的呀。单说你格瓦拉同志，小

小年纪，巴蒂斯塔军队反革命的上校们、将军们，听到你的名字便望风而逃。美国佬，他们惧怕卡斯特罗。你和劳尔，也是他们最惧怕的对象。而且，令我奇怪的是，苏联的大干部米高扬，他是苏联的三朝元老，在列宁时期已进入苏共中央领导层，斯大林时期，也是重要领导成员，现在赫鲁晓夫同志掌权，他还是赫鲁晓夫的重要伙伴和帮手。但是，令我们奇怪的是，这样一位苏联的老资格的政治家、国务活动家，怎么和你格瓦拉同志打过了一番交道，也就怕起了你来呢？听说，他是苏联的亚美尼亚人，他还送给了你一个亚美尼亚外号，是吗？”

格瓦拉“嘿嘿”地笑起来，说：

“元帅，您知道的事情真多，而且真快。事情是确有这种状况的。那是米高扬来古巴的时候。菲德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以及我本人，还有其他一些同志都和这位米高扬同志举行过会谈，谈政治问题，也谈经济问题。我们有一些交锋，米高扬同志经常提到苏联方面的一些想法和他本人的想法和看法。我们呢，我作为会谈的发言人之一，也理所当然地谈到我们古巴的立场、观点和我们对一些事物，诸多事物事件的想法和倾向。我们在会谈中，有一些事情，是能够有共同点，共同语言的，但也有一些事情，是存在着差距和不同意见的，这本来是正常的，我们完全可以展开平等的讨论甚至争论，以期辩明是非，缩小差距，达成共识，但是，苏联的同志，也许是米高扬同志更为如此，无论在探讨什么问题的时候，他都似乎没有可以接受别人争论的耐心和习惯。于是，在有些方面，我们能够谈得拢，有一些方面，我们就怎么也谈不拢，谈不到他规定或者企求的点子上去。于是，在后来有一次的会谈中，米高扬同志就瞪着眼睛，用手指头敲着桌子说：‘切·格瓦拉少校，我知道古巴的同志们，都管你叫作切，可是，你知道切在苏联亚美尼亚语中，是什么意思吗？在亚美尼亚语中，切就是不！在兄弟国家，我很少听到与苏联的代表说不的人，希望你以后也改变一下你的名字，不要再叫切，不要再说不了。’我当时就回答米高扬说：‘这是不可能的。切，是古巴革命赋予我的称号，也是古巴革命赋予我的骄傲和光荣，我是不能改掉这个名字的。’当时，米高扬气恼的很认真。可是菲尔德·卡斯特罗说，找对米高扬同志的回答，他是十分赞赏的。他说，‘我们古巴人，既然经过革命赢得了自由的古巴人，如果是违背古巴人民自身的需要，我们在不管任何国家，任何人面前，都要敢于大声说出一个‘不’字来，绝不能唯唯诺诺，含糊糊，苟苟且且，模棱两可。’”

陈毅元帅听着，猛然击掌，仿佛要吼喊似的说：

“好！切·格瓦拉少校，你们太成熟了，太了不起了。我们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原则绝对没有苟且过。我们在毛泽东同志以及他的思想的指引下，我们从来是顶天立地的站着，坚持着自己作自己的主人，我们是绝不含糊的，但是，特别自觉起来，特别认识到独立自主原则的必要，珍贵和重要，也还是经过教训和时间的。不过，在这一点上，你们古巴的同志，从一开始的时候，就达到了高度自觉的水平，这是值得我们佩服和尊敬，我们是完全可以引以为知己的。”

陈毅总是非常坦诚而又非常直率地与格瓦拉谈话的，这位著名的中国元帅和著名的古巴少校之间，似乎绝不存在着任何隔阂，他们总能借助法语，来推心置腹地融洽交流。

在这一次的谈话和交流中，接下来的谈话内容是：

“格瓦拉少校同志，既然阿·伊·米高扬同志告诉过你，你的名字‘切’，在苏联的亚美尼亚语中，就是‘不’的意思，你愿意听听我给你说说，你的这个‘切’，在中国话中，包含着的是什么意思吗？”

格瓦拉兴趣盎然，马上睁大了眼睛，向陈毅发问：

“在中国话中，我的这个‘切’，会是什么意思呢？”

陈毅说：

“在中国话里，你的这个‘切’，相当就是一‘好’的意思。比如，亲切、热切、挚切，特别切近。等等，反正一点儿也不会包含着‘不’的意思。只能是包含着‘好’、‘近’、‘妙’、‘切切重要’这样的意思。”

格瓦拉非常欣喜的笑了起来。

格瓦拉非常感动，又非常得体地，接下来对陈毅说：

“元帅同志，确实的，我对中国人民的挚情，我对您和所有中国领导人所给予我的，也是给予革命的古巴人民的真正的挚情和温暖，我们确实是永远也不会说出一个不字的。我的名字‘切’，确实永远会对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国革命英雄们，包含着切切的尊敬和挚爱，切切的深情的。”

无疑，在格瓦拉这一次访问中国的过程中，陈毅元帅，这位中国的外交部长，自然也成了格瓦拉感情特别贴近的一个朋友。

陈毅元帅和格瓦拉少校时间最长的这次满怀挚情的非正式谈话，是在格瓦拉来到中国访问时的第五天的工作晚宴后进行的。

那是在1960年11月19日毛泽东主席接见并招待格瓦拉以后的又三天，是在11月21日的晚上。

毛泽东主席接见并便宴宴请格瓦拉的第二天，10月20日，是个星期天。周恩来总理，曾经提出建议，请长途跋涉，远道而来，辛苦劳顿的古巴客人们，休息上一整天，可以看一看北京的街景，也可以请李先念副总理陪同，游览一番长城。

可是，格瓦拉却说：

“‘不到长城非好汉’，这句毛主席的伟大诗句，在我们古巴领导层的同志们中间，是最长用的，最响亮的一句话。但是我们实际上谁也没有见过长城。所以，我来到中国，去游览长城，是一定要去的，但是，必须是在最主要的工作任务完成以后，在有余暇的时候，才能办这件事。在最主要的工作任务还没有完成的时候，我们即使是在休息日，也是不想休息的。”

由于格瓦拉这样坚持，11月20日这个星期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也不得不在假日加班工作，率领中国政府谈判代表团的全体成员，与切·格瓦拉率领的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的全体成员，一起在这一天进行了极为紧张的，精神高度集中的，十分劳累的工作谈判。

参加会谈和工作谈判的，除李先念、格瓦拉分别率团之外，中国方面参加的有外贸部长叶季壮，外交部副部长耿飚，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卢绪章，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曹菊如，中国驻古巴大使申健。古巴方面参加的有外交部行政副部长艾克托·罗德里格斯，外贸银行总经理阿尔贝托·莫拉少校，埃迪·苏纽尔少校，古巴驻中国大使皮诺·桑托斯。

国家政府间的正式谈判，是丝毫不能含糊的，特别是经济贸易谈判，常常需要一分一厘地计算，而且，包括易货贸易汇率比价，付款方式，付货方式，保险保证，等等方面，非常复杂，有的问题经常会包含着复杂的微妙。

在谈判中，格瓦拉严肃、郑重、严谨、一丝不苟。他在会谈中首先强调的，是用郑重而诙谐的幽默语言表述出来的。他说：

“我们向伟大中国推销的货物，首先可以是大量的，其次可以说是最甜的，这就是我们古巴最丰富，最美好的结晶：糖。同时，我们还带来了一些钱，而且，我们带着的是，世界可以流通的美元。坦白的说，也是实实在在地说，我们古巴革命胜利为时不久，古巴是个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岛国，因此，我们还是很穷的，我们的国有资金没有大量积累，十分有限，所以，我们必须把每一个比索掰成两半来花。我们来到伟大的中国，我们决不想装扮成任何一个腰缠万贯的富商的样子，然而，我们要求我们自己，必须比世界上的任何富商都要会计算和聪明。我们来中国要花的钱，绝对的要求要花在绝对的点子上，我们必须学习中国多、快、好、省的精神，我们一定要力图争取达到，少花钱，多办事，快办事，办好事，而且要特别省，总之必须把钱花好，把一切事情办好，这是我们的期求，也是我们的原则。”格瓦拉侃侃而谈，接下来他提出一些贸易指标，以及一些购买成套设备的具体项目。木匠出身的，军衔可以是大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没有上过什么军事大学或者军事研究院，但终成杰出的军事家，没有上过什么金融大学，没有什么经济学博士的头衔，但是在理财中学习理财，无疑早已成为了最富资格和能力的理财能手和经济学家。

他从容沉静，一身苍山秋湖般的大将风度。他非常专注地倾听着格瓦拉的陈述，倾听着格瓦拉顾问们的具体谈项，错综复杂的贸易往来汇率计算，一宗一宗，一项一项，这一项千万那一项百万。我来你去，你进我出，令人厌恶的抽象的数字统计和计算，搅得任何人似乎都会发烧和头疼。然而，所有这些大帐小帐，经济数字，在李先念的胸臆间，似乎不过是来去几多营团的兵马接受检阅似的，他指挥起来，发布任何指示和命令，不过三言两语也就是了。谈判进行的时间超过了十个小时，是分上、下午两段进行的。

李先念最后的发言，言简意赅的简直令切·格瓦拉几乎大吃一惊。李先念说：

“切·格瓦拉少校，我们这一次的贸易谈判，来往贸易额一共不过六千万美元，你们放心好了，我们愿意保证你们的任何一美元，都不会打了水漂儿！你格瓦拉少校想吃亏，我李先念也不让你吃亏。”

谈判是在严肃的气氛中开始的，但是结束，却是在轻松活泼的气氛中结束的。

国务使命和工作任务有了头绪。格瓦拉向李先念表示，接下来可以客从主便了，接下来的活动，便可劳请中国的同志们进行安排了。

这样，到了1960年的11月21日，北京各界群众一万多人，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盛大的欢迎会，欢迎古巴人民的英雄代表切·格瓦拉和他率领的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周恩来、陈毅、李先念陪同格瓦拉参加了大会。北京市副市长万里，以《觉醒和团结起来的古巴人民一定能够实现伟大的革命目标》为题，发表了庄严的声明和热情洋溢的讲话。在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中，切·格瓦拉少校以天才的演说家的姿态，以《古巴人民通过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击败了敌对集团和它的帝国主义分子》为题，发表了昂扬激奋的讲话。

他的讲话，引起了至为热烈的反响，特别富有感召力，给人们带来的鼓舞和激励，是非常巨大的。

大约正是这样一种因素，在那一天的欢迎大会结束，在工作晚宴结束以后的饮茶室里，陈毅元帅充满挚情地用可以直接交流的法语，与格瓦拉进行了情深意重，语重心长的，然而非正式的，也可谓是忘年之交，兄弟的挚谈。

从11月22日开始，格瓦拉和他的经济代表团的成员们，更为紧张繁忙地开始了参观和考察活动。

古巴革命领导核心的最主要的成员们，以他们无可置疑的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为首，早在古巴革命星火初萌，还在马埃斯特腊山区进行游击战争的年代，就已经提出了在古巴实行土地改革的问题。就提出了农村改革的设想。在古巴革命胜利后，他们最初下最大力气要抓的主要问题，就是古巴的土地改革问题。在最初工作的阶段，菲德尔·卡斯特罗和格瓦拉，都曾参加过全国土改委员会的工作，1959年古巴革命政府刚刚成立不到半年的时候，格瓦拉就受卡斯特罗指派，到亚、非诸多进行土地改革的国家，考察土地改革，农村建设的问题。对土地改革和农村建设，卡斯特罗和格瓦拉，都怀有着极为强烈的兴趣。

现在，切·格瓦拉来到了中国，格瓦拉在完成主要出使使命之后，他迫不及待地就提出要求，希望让他马上去参观和考察一下中国农村。

他的要求，理所当然地得到了能够令他满意的回应。

格瓦拉被安排到北京郊区的红星人民公社访问，参观和考察。

切·格瓦拉，在这里同样受到极为热烈而热情的欢迎。社员们敲锣打鼓地热情欢迎他的到来。在欢迎的人群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许多打着小旗的小学生甚至还有幼儿园的孩子。孩子们都亮着银铃般的嗓音，呼喊着重情的口号，非常有节奏地呼喊：“古巴西、洋基诺！”“古巴西、洋基诺！”（西班牙语：“要古巴、不要美国佬！”）

切·格瓦拉热情地摸着孩子们的脸蛋儿，还伸出手来，热情地和幼儿园的孩子们握手。

孩子们看着切·格瓦拉笑。

孩子们似乎没有一个人，对这个高高大大，壮壮实实，长着大胡子的外国军人，感到陌生和骇怕，没有一个孩子感到羞怯和紧张。

格瓦拉忽然发现一个大约有五六岁年龄的小女孩，热情地看着他，伸着小手，希望和他握手。

格瓦拉忽然满身滚热，他的心几乎“砰”“砰”跳出了声来，他猛得感觉，这个中国小女孩，怎么这么像他自己的女儿小伊尔达呢！

格瓦拉抱起这个小女孩来。

格瓦拉认定这个小女孩儿不过五岁，一定正好与他的女儿小伊尔达一样大。

他想亲一亲这个小女孩儿。

但是，他又怕他的大胡子会叫他所抱着的这个白白净净笑脸圆圆的小女孩儿感到讨厌。

可是，正在格瓦拉如此犹豫的时候，这个中国的小女娃儿，紧紧地搂住了格瓦拉的脖子，把她苹果一般可爱的小脸蛋儿埋在了格瓦拉的连鬓胡子

里。

格瓦拉一时眼热，眼睛里晶莹地转起了泪花儿来。

接下来，格瓦拉听取了红星公社的共产党书记和公社一位女社长对公社

情况的介绍，他参观了几个村子的社员家庭，正在平整的土地，和菜窖、畜棚、养猪场、养鸡场和养牛场。

最后，他和他率领的经济代表团的部分成员，在一间社员食堂里，受到了便饭招待，有很好喝的小米粥和棒子面粥，枣儿白面馒头和玉米面的黄金塔，还有白菜粉条猪肉炖豆腐，好香啊！格瓦拉吃得汗流满颊，吃喝的十分愉快。

红星公社，给格瓦拉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很好的印象。

参观过红星公社。第二天，格瓦拉又被安排参观了北京城区公社的宣武钢铁厂，同一天又参观了石景山钢铁厂。嗣后，在湖北省的武汉市，格瓦拉还兴趣盎然地参观过另外一个小钢铁厂。格瓦拉是个多才多艺的有心人，他的兴趣广泛，有着非常广博的关注和爱好，他尚文好武，关注国计民生，似乎也是他的天性。

在古巴革命还处在游击战争的年代，在开辟为时不久的马埃斯特腊游击区，在革命武装的势力还相当弱小的情况下，为了解决种种方面的困难，格瓦拉在成为一个纵队的指挥员以后，不仅一方面打游击，不间断地寻找战机投入战斗和发展扩大武装兵员，他同时还在游击区困难的情况下，组建筹办野战医院，组建筹办军用鞋帽被服厂，组建筹办为起义军将士所需雪茄烟的卷烟厂，同时，当然也还筹办了制铁厂和修理武器，制造手榴弹的兵工厂。

格瓦拉对兴办世界上的任何必要的有益的事业，几乎都有无穷无尽的兴趣。

离开北京赴外地参观考察时，第一站到达的地方是中国的陕西省省会西安。来到这里，格瓦拉最想去的地方，是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进行伟大革命的红色中心圣地延安。只是因为延安飞机场正在翻修跑道，飞机不能降落，而坐汽车又太浪费时间，为了不失时机赶到四川去验看古巴经济代表团来中国准备购置的成套设备，格瓦拉不得不遗憾地放弃对延安的访问，匆匆忙忙又飞向了四川的成都。

四川省省长李大章，成都军区领导人韦杰中将，到成都机场热情地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

临离北京之前，陈毅元帅曾经向格瓦拉特别推荐过，说四川是一个特别好耍的地方。陈毅元帅还告诉格瓦拉说：

“我就是四川人。”

格瓦拉马上赞叹地说了一句：

“吓，这是个出过元帅的地方罗！”

陈毅不无骄傲，同时又幽默风趣地说：“何止是出过元帅。中国现在的十个元帅，有四个是从四川出来的。这里边有朱总司令，刘伯承司令员，聂荣臻司令员，还有我，邓小平是我们第二野战军的政委，如果授给军衔，他也当然是个元帅。”

格瓦拉说：

“我听说在四川，还可以看到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名字叫诸葛亮，是吗？他当然也是四川人了？”

陈毅一挥手说：

“哦，这可不敢掠美。诸葛亮是从四川沿长江出川之后的南阳人。但是，他的最辉煌的战斗和工作的岁月，是在四川度过的。他文韬武略，出将入相，在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时期，他是蜀国的文丞相和大将军，是蜀国政权的顶梁

柱和栋梁材，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为蜀国的建设和开拓，呕尽了心血，费尽了力气，始终忠贞不二地贡献出了他的全部力量和才智，因此，是一个中国历史上被视为贤哲的圣人。”

什么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己”，格瓦拉有些听不懂。好不容易，陈毅也费了一番思量，把这八个字用法语翻译出来，再解释给格瓦拉听，格瓦拉才完全理解明白了这八个字的含义。

格瓦拉觉得这八个字分量很重。他体味着这八个字，沉默下来，好像思量了很长一刻时间。

接下来，陈毅说：

“切少校，如果你对诸葛亮特别感兴趣，你到了成都以后，你还可以去看上他一下。成都有个武侯祠，在那里还供奉着诸葛亮的塑像，那里也是一个小小的博物馆，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诸葛亮的生平。”

格瓦拉说：

“这个地方，我一定要去。任何博物馆，我都有兴趣去参观，何况是关于诸葛亮的博物馆，我是一定要去的。中国真是个伟大的国家，到处都有叫人看不够的伟大博物馆。‘不到长城非好汉’，我终于攀登了长城。长城真是一个伟大的博物馆，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确实的，登上中国的万里长城，才真正知道了中国人民力量的伟大，完全是顶天立地的，我在北京还终于参观了关于封建皇帝的博物馆。我参观了十三陵的地下宫殿，真是可怕的封建主，他建造墓穴的工程，完全可以建造最少一个大学城，最少十座大医院。我还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博物馆，真是非常感染人，教育人和鼓舞人。我们在哈瓦那，也非常想建造一个古巴革命的博物馆，以教育古巴人民，感染古巴革命的一年轻一代。我们对把建造博物馆作为向人民提供学习的场所进行精神升华和训练的场所，也是非常积极性的。在古巴革命胜利后，我们最早兴办过的一件事，曾经是在哈瓦那，建造了一所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文学大师海明威的博物馆，因为，海明威虽然是美国作家，但他长期在古巴居住过。他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的代表作品《老人与海》，写得就是古巴的渔民，写得就是饱经风霜洗礼困难和挫折折磨但是始终顽强不屈越战越勇绝不泄气绝望的古巴人民。我很喜欢海明威的文学作品。我还读过他的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真是了不起的精采的小说。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也十分喜爱海明威的小说。卡斯特罗年轻时候，作为哈瓦那大学的学生，还曾相识过海明威，那是在一次钓鱼比赛中，卡斯特罗获得了冠军，主办比赛的有关方面，特别请海明威来给获胜者发奖，他曾经亲手奖给过菲德尔一条非常壮观而且肥大不小的马林鱼。总之，我们对海明威这个作家很尊重。虽然他也是美国人。但我们对美国的好人、优秀的人物总是也能够绝对尊重的。何况，海明威文学作品表现出来的崇高的文化精神，是十分宝贵的世界财富。古巴人民同样要特别珍视它，并且绝不放过可以被它感染和亲近他的便当机会。所以，我们在哈瓦那，建造一座海明威博物馆，就在他曾经在哈瓦那生活和居住的日子里，是理所当然，也是举手之劳的大好事。”

格瓦拉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关于博物馆的论题。他的意思，无疑是向陈毅元帅表示，在他到达四川成都的时候，他是一定要去看看陈毅元帅向他推荐的诸葛亮博物馆武侯祠的。

陈毅对格瓦拉的聪敏好学的广博胸怀，实在特别欣赏。他听罢刚才格瓦

拉的一席话，知道了格瓦拉是如此重视和喜欢参观博物馆，于是，他马上想起来，格瓦拉去成都，还可以也应该到另外一个博物馆去参观一下，看上一看。

于是，陈毅接着又对格瓦拉说：

“既然你这样爱看博物馆，到了成都你参观诸葛亮的武侯祠过后，你还不妨再去参观一下诗人杜甫的草堂纪念馆。那一天，毛泽东主席，不是向你推荐过中国的三大古代诗人吗？他们是屈原、李白和杜甫。成都的杜甫草堂，就是纪念杜甫的博物馆。和你们在哈瓦那给海明威造的博物馆一样，就是在杜甫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建造起来的。毛主席向你介绍的杜甫的佳作诗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就是在那里的草堂里写下的，所以你一定还应该到那里去看看。杜甫的诗，确实是很了不起，很伟大的。你曾经向毛主席发问他是不是中国的最伟大的诗人，他的回答是不是。但是，要我说，他当然也是最伟大的诗人中的一个。我们现在的大诗人，也还多得很，我们有一位郭老，郭沫若同志，你来北京，欢迎你的晚宴上，你们见过了。他是我们当代的大诗人。他写的诗，惊天地泣鬼神，实在了不得。但是，他和毛主席，他们写的诗，受屈原、李白的的影响较大，他们都有李白、屈原浪漫和浩放的诗风，写得长江大海，波澜壮阔。可是，我们也还有一些大诗人，他们写的诗，是很注意向杜甫学习的，我们的朱德元帅，我们的总司令，他写的诗，就颇有杜甫诗的苍山云海般的苍劲。我们的董老，董必武副主席，也是诗人，他写过一句诗，叫做：‘学诗当学杜，学书当学颜。’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学写字，练中国的书法毛笔字，要学颜体。什么是颜体字呢？颜体字是中国唐代的一个非常严正爱国忠厚老成的大将军留下来的字体，他的字体写得十分厚重有力，磊落峻峭，字如其人。我们的周恩来总理，毛笔字就是入化地学习着他的字体。这种字体是十分端正和壮观的。所以，我们的董老说，要‘学书当学颜’。至于说‘学诗当学杜’董老就是推崇，学习写诗，可以选择诗风古朴的杜甫作为学习的榜样，由此，你就可以知道杜甫诗作在中国的重要地位和重要影响了吧？我们的董老，董必武副主席，学习杜甫的诗风气韵写诗，就完全进入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当然，我们还有许多诗家，学习杜甫，还可以特别告诉你一个可以注意的人是，我们现在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他写的诗，也颇有杜甫的松树一般的风格，苍劲峻雄得很哩！……”

陈毅给格瓦拉侃侃而谈又介绍了一番这样的中国人学诗学书的情况。

只是，陈毅当然也还向格瓦拉打了埋伏，没有向格瓦拉介绍他自己也是一个诗人，而且也是一个崇尚学杜的诗人，也没有向格瓦拉披露，他不仅是元帅，而且还是中国十位元帅中，唯一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由于有陈毅元帅的推荐和介绍，他飞抵四川成都以后，当然惦记着要参观武侯祠和拜会杜甫草堂。

不过，在陈毅元帅向切介绍武侯祠和杜甫草堂之前，格瓦拉这次来中国的谈判对手李先念，也特别向格瓦拉介绍过一个来到四川可以特别参观见识的地方，这就是成都到重庆之间的小城市：内江。

李先念对他说过：

“切少校，你一定要到四川的内江去看看哟。中国北方的气候，日照和年温度，不具备甘蔗生长的条件，但在中国的南方，那里的许多地方，和古巴的气候相近，是可以种植甘蔗和具有种植甘蔗的传统的。在四川的川南，我们就有大片的甘蔗田，因此，我们就在四川的内江市，造了一个制糖厂，

在那个制糖厂里，可以生产质量相当好的糖，而且，那个制糖厂的设备，全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制造出来的，最大的特点不是黑大傻粗，而是轻巧实用、物美价廉。那里同样的成套设备，中国政府可以向古巴政府尽其所需地提供同时提供保障，可以保修、保退、保换，可以试用和赊销，中国人民可以向古巴人民无私地提供最优厚的条件，我们知道你们古巴独立以后，善于发展国民经济，善于发展生产力、善于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发展，不仅仅种植甘蔗，还力争迅速地发展制糖工业，所以，我们坦诚向你们推荐中国的物美价廉的制糖成套设备，在购买之前，你们可以进行充分的考察和检验。”

格瓦拉对李先念副总理这样的提示，当然是首先要重视起来，铭记在心的。

所以，格瓦拉率领着古巴经济代表团的部分成员，其中包括技术专家，在到达四川成都以后，不及参观游览武侯祠和杜甫草堂，首先就非常急切地直奔内江而来，并且，在到达内江后，便马不停蹄地直接插足到内江制糖厂来，非常内行而一丝不苟地对内江制糖厂的全套设备和制糖流程，以及糖产品，进行了十分全面的考察。在一些工人的劳动位置上，格瓦拉甚至亲自动手，进行了操作，并且，他还和这里的工人、技术人员，进行了亲切的相当长时间的交流和谈话。

他对内江糖厂的所有制糖设备都是中国生产的状况，十分赞叹。他在和许多工人的谈话中，知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仅仅在不久之前，还是耕种庄稼的农民，是农村的公社社员，他对这一点尤其鼓舞，也许他是马上联想到回到古巴以后，他也可以不用发愁和犯难地把一些种甘蔗的农民培养训练成制糖工人，可以把中国这里的情况引为先河吧。

参观考察完内江糖厂以后，格瓦拉和他率领的代表团成员，又参观了储运甘蔗的内江码头。这里的装卸设备，几乎都是小型的，许多农民在卸下小船运来的如同小山一般的一船甘蔗时，几乎全是凭着赤裸着的青铜般的背膀来肩挑。格瓦拉惊异形体轻巧矮小的四川社员们，怎么会有那么惊人的完全可以说是移山填海的力量。

从内江码头回到内江市区的时候，路过了内江铁厂。这里的陪同格瓦拉参观考察的内江市的负责人，对格瓦拉说，这个内江铁厂，是从一个铁匠作坊发展起来的。负责人还告诉格瓦拉说：

“切·格瓦拉团长，你刚才看过的内江糖厂的有一部分设备，是在武汉和上海生产制造的。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如果有些部件出了毛病，我们完全可以不必再拿到上海或武汉、重庆去修理兑换，而是完全可以不出内江，就拿到这个小小的铁厂来修理甚至重造。我们这里有的是不比诸葛亮差许多的能工巧匠，他们很有办法。”

格瓦拉一听负责人如此介绍，立刻便又激起参观内江铁厂的热情和兴趣。他眼睛闪闪发亮，简直激动不已。他说：

亲爱的内江的同志们，李先念副总理指点我来到的这个地方，真是个好学习的好课堂。你们中国自己制造的制糖成套设备非常实用而且轻巧。非常适合我们往古巴搬运，你们的人民肩挑背扛的精神，永远会启发我们用同样的精神去艰苦而愉快的劳动。内江的一切，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是令我感奋而永远难忘，现在你们又给我介绍了一个可以说是具有才能神力的小制铁厂，这样的神奇的去处，你们应该允许我参观。”

格瓦拉恳切地提出了参观内江制铁厂的请求。

然而，内江的中共市委书记和市长却犯难起来。

市委书记说：

“啊呀，要不得。古巴同志们从早上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六七个钟点，不吃不喝，一直在辛苦劳动，在工厂码头上考察参观，该是说筋疲力竭的时候了。我们不能让尊贵的客人们在我们内江饿着肚子办事。所以，内江铁厂就不要参观了。还是请回到内江宾馆，先吃饭解决肚子的问题吧。”

内江市的市长，也说了类似的话。

一直陪同格瓦拉和代表团在中国各地参观访问的中国驻古巴大使申健，也同意内江市地方领导人的意见，希望格瓦拉客随主便，还是先回到宾馆去用餐和休息。

但是，格瓦拉却坚持，一定要看看内江铁厂。

内江市的同志们进一步强调：

“不行，不行，格瓦拉团长，我们的一切都是安排好了的。你在我们内江停留的时间，从现在算，只剩下两个半小时了，必须先去用餐，用餐后稍事休息，你还要准时坐船返回成都，四川省委和省政府，还准时要在今晚欢迎格瓦拉同志以及代表团的全体同志呢。”

内江的同志说的很恳切，很坚决。

但是，格瓦拉忽然笑了，显得特别轻松起来。他说：

“你们是怕我饿肚子，才不让我参观这个制铁厂呀？我以为中国同志，也会有什么秘密武器保存在这里，不让我参观呢？既然仅仅是考虑到饿饭问题，我看，这不是问题，为了革命的胜利，我们已经度过多少饿饭的日子，现在，为了巩固胜利和夺取更大的胜利，我们仍然必须准备绝不拒绝饿饭的日子。所以，亲爱的同志们，我还是衷心地请求，请你们同意安排我进入内江铁厂参观，你们准备好的午餐，我看可以免掉啦，让我们回到成都再补上吧，可以吗？”

格瓦拉的请求是如此坚决。内江的同志们实在难予拒绝他，只好推迟了开饭和招待会的时间，一任格瓦拉和他的代表团进入到比铁匠作坊大不了许多的内江铁厂来参观。

内江的同志们，以为这间铁厂简陋，格瓦拉看一看就会失望的。然而，情况恰恰相反，在内江铁厂打造砍刀的铁匠风火炉旁，格瓦拉一见打造的正是砍甘蔗的大砍刀，他立刻竟也痴迷起来，看个不够，不停地蹲下来用手摸试着砍刀的钢口，他像欣赏艺术品似的，看着内江的铁匠师傅们淬火的方式和淬过火的刀片。

陪同参观的中国同志再三催促，格瓦拉却仍然津津有味地在这个弥漫着焦烟和火星气味的简陋的铁厂里，滞留了足足两个小时，什么事情都询问了个有头有尾。

其间，他和一个铁匠师傅谈话。他拉着这位铁匠师傅的手掌，翻来复去地欣赏地看着，其后说出来的一句话是：

“一样的。我们古巴的工人，农民，也会像你一样，成为工匠，成为了不起的工程师的。”

参观点考察内江铁厂，一直迟滞到格瓦拉一行行将坐上返回成都的班船还剩半个钟点开船的时候，格瓦拉才兴致勃勃地离开了这个小小的制铁厂。

内江市的负责同志们，没有特别的办法，只好把俄了几小时肚子的尊贵

的客人径直送到内江的班船码头，在码头上的客运休息室里，他们请行将离去的格瓦拉和他的代表团成员，每人吃了一碗码头上小食店里出售的一种小吃：懒汤圆。

今内江市的同志们欣慰的是，格瓦拉少校吃着这种四川内江的懒汤圆，简直以为是什么奇异的美食，竟然惊异不绝赞不绝口。

返回成都后，切·格瓦拉一行，如愿以偿，当然也还抽暇参观游览了武侯祠和杜甫草堂。并在成都郊区参观了小水电站。

而后，他从成都飞抵武汉，又飞到了上海。

1960年11月27日，上海市各界人民一万多人，聚集在这一世界知名的最大城市之一的文化广场，隆重热烈地欢迎切·格瓦拉和他率领的代表团。

格瓦拉在从成都飞抵武汉的时候，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长张体学，以及武汉军区的领导人，到飞机场迎送了格瓦拉一行。

格瓦拉在从成都飞抵武汉的飞机上，已经听申健大使给他介绍过，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也曾经是一名将军，是一名战将，是李先念的老部下。

到了武汉，张体学在飞机场迎接切·格瓦拉的时候，张体学马上告诉格瓦拉说：“格瓦拉同志，在您来到武汉的头一天晚上，李先念同志特别给我来过一个电话，让我在您来到武汉时，向您提出一个建议，希望您在参观考察生产成套设备的重型机床厂的同时，再由我们陪同您去看看武汉的长江大桥，再到武汉的大型冶金企业武钢看看。他说古巴可能没有大江大河，无需建造长桥，但是也许有一天你们可能会建造跨海大桥，因为在社会主义的体制下，总是能干大事的，不仅仅是干小打小闹的事情。先念同志提议请您看一看中国的大型冶金企业武汉钢铁厂，不外也有这样的意思。”

格瓦拉非常感激张体学省长转达的李先念副总理的这个提议，他似乎马上领悟了李先念兄弟般的用心和关照，马上理解了其中深意。因此，格瓦拉当时就非常感激地同意李先念的提议，希望张体学省长给予安排。

这样，格瓦拉在武汉，不仅参观考察了小型炼铁厂，不仅参观了与古巴购置中国成套设备有关的重型机床厂，他在张体学省长的陪同下，还特别仔细地参观和考察了武汉长江大桥和武汉三镇位在汉阳那边的钢城武钢，那纵横天地间壮阔长江上的伟大的彩虹一般的长桥，那红色的，铜色的，酱紫色的大型冶金企业钢铁城上空的烟云；那轰隆震响呼啸的炼钢平炉，瀑布一般飞出钢水的风景，那金蛇狂舞一般的巨大的轧钢车间，所有的可以见闻的角落，似乎都在惊天动地，都能够令人惊心动魄。

格瓦拉的胸臆间，立刻激发着这样的情思：古巴也会涌动起这样壮丽的壮景吧。格瓦拉深深地感到壮阔了胸怀，他深深地为参观长江大桥和雄浑的武钢所震撼，激动了许久。

依依借别武汉，来到了上海。

上海热情、盛大、隆重的万人欢迎会开过以后，格瓦拉又被陪同他来上海参观访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告知说：

“格瓦拉少校，李先念副总理给我们打电话过来说：可以向格瓦拉行长以及经济代表团的全体贵宾们，打开上海出口商品陈列室的全部展厅，凡中国所有的，凡古巴需要的，我们可以保证供货，优先供货，任何货物都可以以平价，满足古巴代表团的随意选择。”

格瓦拉立刻也表示高兴。

“李强副部长同志，你们陪同我来到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大上海。

可是，请你们理解我们，也许我们对大上海的小商品会更有兴趣一些，据说大上海的蜜蜂牌缝纫机特别不错，小纽扣也特别漂亮，还有自行车，能象鸽子一样飞，古巴有可能会有需要的，所以，我想都要看一看。”

李强副部长听着，非常感动，情不自禁地感叹说：

“格瓦拉同志，你真不愧是古巴人民举家过日子的理财能手。好当家人啊！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多一点像你这样的少校，那就是那个国家人民的好福气了。”

李强是中国共产党老资格的党员，是有“科学家”“专家”头衔的高级知识分子和政府部长，他早年留学欧洲，所以，他也能操用相当娴熟的法语，来与格瓦拉非常切近地直接交流。

不过，李强用法语说过这段话后，格瓦拉却摇起头来说：“我不希望任何国家多一些什么样的少校。我真诚的希望世界各国都永远丢掉所有的无助于世界和平的军人的军衔，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各尽其能，或者拿起锤子，或者拿起锄头，或者伏在显微镜上，或者操着计算尺，或者握着在教学板上教孩子们学习写字的粉笔，每个人都能为世界的和平，各族人民的幸福，贡献哪怕是微薄的力量，那才是最幸福的。”

格瓦拉深情地说着。接着他又说：“我们古巴革命的前景，无疑是最为美好的。我国人民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领导下，目前最基本的行动口号，是用三个词来概括的，这就是：学习、劳动、紧握枪。学习，就是学习建设，学习文化政治和科学技术；劳动，就是要创造和贡献；紧握枪，也只是为了保卫祖国，保卫我们理想和正义的事业不被蹂躏。至于少校，我们实在不希望更多，而是希望越少越好。不过李强同志，请您别介意，我实在不敢接受您的夸赞，但是绝对没有任何谴责您的意思，我们兄弟般的善意的交流，请您相信，我总是能够非常充分，非常正确的理解的。”

格瓦拉善解人意。

人们也总能为他的坦诚和诚挚所深深吸引。

因此，他来到中国，从南到北，从西到东，他在许多地方匆匆忙忙来去，接触了大量的中国党政干部、工人、农民、解放军将士、服务人员、商店店员和学校里的师生，以及许许多多的老人和孩子，他到处都获得了最深挚的友谊和最亲切的感情，所有他接触过的中国人，都成为了他的彼此可以信赖和能够感到亲切温暖情谊的朋友。

访问上海结束后，切·格瓦拉在中方负责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按预定的时限返回了北京。

经过又是一番交流磋商和对等的谈判，核准敲定了中古两国间的，用文字正式郑重表述的会谈文件，最后双方极为满意和愉快地就中古双方对当前国际形势和进一步发展中古合作关系等问题取得一致看法，同时缔结中古两国经济合作协定，签署了《李先念格瓦拉联合公报》，同时签定了1961年中古两国贸易议定书和科学技术合作议定书。

11月30日，在《联合公报》签署之后，格瓦拉举行告别宴会。

周恩来总理、陈毅、李先念副总理以及中国政府的诸多部长、副部长和各界知名人士，应邀参加了告别宴会。

周恩来、陈毅、李先念再一次与格瓦拉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友好的叙谈。

12月1日，当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少校率领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结束对中国的访问，驱车到达北京机场，在机场停机坪上的飞机舷梯旁，他

眼睛里闪动着激动的泪水，和热情的中国人民作别。

他长时间地，深情地和代表中国政府欢送他的李先念副总理亲切拥抱，久久地久久地不肯分开。

格瓦拉对李先念说：

“我对伟大中国的访问是最难忘的，我留给中国人民的深情是最无限的。”

李先念说：

“中国的大门随时都对你开放着，中国人民永远会张着最热情的兄弟般的随时准备拥抱你们臂膀，热烈地欢迎你的再次到来。”

格瓦拉说：

“谢谢，副总理同志。谢谢，伟大的中国人民。从此魂牵梦绕的伟大英雄的国家，切·格瓦拉少校，是一定会再来的，是一定会再来的。”

洪湖水，浪打浪，格瓦拉盼见贺老总

切·格瓦拉一去五年。多少回魂牵梦绕，心向往之的中国，1965年2月在和煦的春风正在吹起的季节，切·格瓦拉又来到了中国。

邓小平，彭真从北京机场，迎接格瓦拉一行，再次下榻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

邓小平、彭真，与格瓦拉都不是第一次见面。

1960年11月间，切·格瓦拉率领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曾经首途访问的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切·格瓦拉同样是作为古巴革命政府的经济代表团团长率团，这次访问苏联时，适逢其时，参加了苏联十月革命节四十三周年的庆典。在庆典期间的许多活动中，古巴经济代表团的成员，和中国党政代表团的成员们打过照面。但是，当时出于礼仪程序，两个代表团的的活动皆由苏联党政方面安排，所以，当时古中两个代表团，即使是领导人之间，在莫斯科也没有举行过正式的接触。

1960年11月间，中国党政代表团由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任团长；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任副团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等同志为代表团成员，应邀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四十三周年庆典，同时，应邀参加其间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会议。

作为古巴革命政权的代表，切·格瓦拉没有正式或非正式地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会议。

参加这次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古巴人民社会党的代表是这个党的总书记布拉斯·罗加。

罗加领导的古巴人民社会党，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兄弟以及格瓦拉领导古巴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年代，一直坚持着议会斗争的路线，并没有加入古巴革命武装斗争的洪流。但是，这个党给终保持着与苏联共产党的接触和联系，因此，这个人民社会党，一直被认为是古巴的正统的共产党组织体系。

实际上，这个人民社会党，在古巴革命的进程中，不仅没有起过什么积极的作用，也没有建树起来可似令人尊敬的好名声。

在古巴革命胜利后，不管是菲德尔·卡斯特罗，还是切·格瓦拉，都公开地，不止一次地断然宣布，他们和人民社会党，绝无任何的、丝毫的干葛和联系。

切·格瓦拉甚至在电视台的讲话中，在回答电视记者的提问时，也曾郑重地说过：“如果你们问我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可以清楚明白地回答：我是。但是，如果你们问我是不是人民社会党的党员，我也可以清楚明白地作出回答：我不是。”

在古巴革命刚刚胜利的年代，以菲德尔为领袖的“七·二六运动”武装斗争的胜利者们，与古巴正统地位的人民社会党，是不合流的，甚至是有芥蒂的。

所以，有以正统资格的古巴人民党参加的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会议，作为古巴“七·二六运动”武装斗争胜利者的代表，作为古巴革命政府的代表，切·格瓦拉是绝不会参加的。

而这个会议，几乎连全世界的所有公众都知道，有着强大的不协调音，有着明显的裂变的回声。所以，所有与会者，似乎也是很忙的，工作是很紧张的。

当时，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参加的中共代表团，自然也参加了这个会议，自然也会很忙，工作十分紧张。

因此，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除了在十月革命的庆典上和庆祝活动的宴会和其他活动中，照面见过切·格瓦拉以及他率领的古巴代表团人员以外，实在难得接触和相聚。

为此，切·格瓦拉非常遗憾。

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在所有的活动中，在所有和切·格瓦拉照面相聚的时候，都以微笑和热情的点头或握手，表达他们对切的友爱、尊重和深挚的感情，以及深挚的关注。

遗憾的是，这样的时间，在当时总是一闪而过，匆匆而过。

而这样一来，倒更激发了切·格瓦拉心间很久想与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接触和恳谈的愿望和热情。格瓦拉当时在莫斯科想过：与这样一些中国党政代表团的杰出人物在莫斯科不能正式会见和交流会谈，在他正式率代表团访问中国的时候，总可以弥补上这次的缺憾吧？

后来，切·格瓦拉在苏联，参加完十月革命庆典以后，11月16日，便匆匆飞到中国来访问。然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还在莫斯科滞留了相当多日的时间。他们一直迟迟不得回国，逗留在莫斯科与赫鲁晓夫交锋。

正因为如此，格瓦拉来到中国，开始第一次的访问时，他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陈毅元帅和李先念副总理，他见到了他渴望已久想见到的许多杰出人物和英雄人物。然而始终却没有得到过与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直接会面和交谈的机会。

这成了切·格瓦拉第一次访问中国时的一个难得如愿以偿的最大的遗憾。

不过，当格瓦拉在第一次访问中国行将结束的告别宴会上，当他在宴会后接下来把这个遗憾在随便的非正式交谈中告诉周恩来、陈毅、李先念的时候，陈毅当时就说：

“不要紧，格瓦拉同志，山不转水转，相信你还是会到中国来访问的。你下一次来中国，你所有的这样的遗憾，由我来安排给你补偿，我是外交部长嘛。下次你来中国，我们一定安排你和我们的刘少奇主席见面，也要安排你和我们的总书记邓小平，以及彭真同志和你见面。除此之外，我听说你还有两个遗憾这次你没有提起，一是没有见过我们的靠两把菜刀起家闹革命的贺龙元帅，你感到不巧，你感到十分遗憾，关于这一点，我们湖北的张体学省长也已经告诉给我们了。”

陈毅如此说着。

这是确有其事的。在格瓦拉开始访问中国期间，当时，贺龙元帅正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所以，格瓦拉在北京没有见到贺龙元帅。后来，格瓦拉从四川返到湖北省的武汉市访问时，湖北省安排了一场文艺晚会招待格瓦拉一行。在晚会上演出的节目，是歌剧《洪湖赤卫队》。在观看这场歌剧时，张体学省长给格瓦拉解说一句歌词时，张体学提到了贺龙元帅。

《洪湖赤卫队》中有这样一句歌词：

跟着贺龙闹革命，
贺龙跟着共产党。

张体学省长给格瓦拉解说这句歌词时说：

“我们的贺龙老总，贺龙元帅，当年两把菜刀起家闹革命，最初拉起来的革命武装就是这样的长矛大刀武装，就是这样的游击队。”

格瓦拉当时听了，十分震动，颇多感慨，连声说：

“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革命觉悟真了不起，赤手空拳也不怕和带枪的强大的敌人作斗争，决不作奴隶，真是伟大的人民，这样伟大人民的领导者，无疑是世界上最可尊敬的英雄，无疑应该是一切受剥削受压迫人民的伟大榜样，可惜不巧，我在北京没能看到贺龙元帅这样的伟大英雄、真是遗憾。”

格瓦拉表示的这个遗憾，张体学在后来的电话中，报告给了李先念，李先念又郑重其事地把这个情况告诉给中国政府总管外交工作的陈毅元帅，而陈毅元帅，自然也把这件事情，记在了心上。

所以，陈毅给格瓦拉接下来的许诺就是：

“你放心，格瓦拉同志，我可以保证你下一回来北京，一定也要把我们的贺老总贺龙元帅请出来，让他和你见面。”

格瓦拉立刻表示非常高兴，非常感谢。

可是，陈毅接着还说：

“格瓦拉同志，我们还听说你还有一个遗憾，那就是你说你这一回来中国，还没有来得及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好好跑一跑。听说你对人民公社的办法很有兴趣，很想研究一下，所以，你特别要求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写一部关于中国人民公社的书邮给你，你好在古巴出版。关于这一点，也不要紧，如果你兴趣很大，你随时可以来中国，专门考察人民公社的办法。”

格瓦拉由衷地感谢陈毅外长、元帅的无微不至的盛情。

陈毅这样的盛情承诺，不管格瓦拉是否铭记着，陈毅没有忘记。

1965年2月3日格瓦拉率领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代表团到达北京。当时，中国正是在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期间。

正月初三，也就是2月4日，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主持的，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参加的欢迎以格瓦拉为团长的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代表团的宴会上，格瓦拉和陈毅元帅又见面了。

陈毅一见格瓦拉，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元帅马上说：

“你一去这么久才再来，已经让我们等了五年了。”

格瓦拉不无有些腼腆地说：

“在过去的一些日子里，我几乎没有一天不想念中国，不想重到中国来访问，可是，元帅同志，你是知道的，我们实在太忙的。”

陈毅说：

“没关系，你现在来了就好，我们特别高兴地欢迎你的到来。我们上次分手告别时，你说你那一次来访，遗憾的事情，是没有见到刘主席、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贺龙元帅。今天，你一下子都见到了。你是以古巴革命统一党领导成员，书记处书记的身份，作为代表团团长率团来华访问的，所以，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到飞机场去迎接你，今天，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又接见了您，贺龙元帅也特别来参加接见您和宴请您的宴会，我一下子可以把那一次你的全部遗憾都补上了，你不会再有遗憾了吧？”

格瓦拉笑得很大气。他冲着与他热烈而幽默地对座的陈毅元帅，点了点头说：“陈毅元帅同志，我太感谢您了。”接着，他却又摇了摇头，说：“不

过，我不敢保证，我这次访问中国再次结束访问的时候不会带走新的遗憾。”

陈毅说：“但愿我们永远能给你格瓦拉同志弥补你的所有的，一切的遗憾。”

格瓦拉忽然动情地红了眼圈儿，热泪盈盈起来。

接下来，陈毅特别地介绍切·格瓦拉和贺龙元帅见面。

格瓦拉个头相当高，特别是时至今日，他作为古巴的党政军国家领导人，却仍然穿着一双高跟厚底儿的，从马埃斯特腊山区打游击时候起就习惯穿的陆战队大兵靴，而且，裤脚总是扎在高的靴腰内，所以他的个头就显得似乎更有几分威猛了。

但是，当他和贺龙元帅站在一起，和贺龙元帅亲切握手时，他却仍然比贺龙元帅矮着半个拳头，所以，格瓦拉不得不仰视贺龙。

格瓦拉说：

“尊敬的贺龙元帅，您实在是我久已渴望见到的伟大英雄。您的两把菜刀起家闹革命的故事，绝对可以是鼓舞世界上各国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最伟大的榜样和典范。不过，在我想象里，您一定十分强悍和威猛，我没有想到我所见到的元帅您，会是这样父亲般的慈祥。”

贺龙元帅紧紧地握着格瓦拉的手，久久没有放开，他确实是非常安祥慈蔼地深情地望着格瓦拉，明显的可以看出，这一位中国元帅，也是由衷地非常地喜爱着切·格瓦拉这位年轻的古巴少校。

贺龙元帅不及说话，陈毅元帅接着又给格瓦拉介绍说：“切，你今天和刘主席、小平总书记和彭真同志，在谈话中谈到的美好愿望，不妨你再和贺龙元帅同志，我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贺老总谈谈。前不久，他作为我们中国的党政代表团的副团长，和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团长的党政代表团的一些同志，一起去过苏联。人所共知的事情是，1964年10月赫鲁晓夫的下台，事实上，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性的滑坡，带来了十分良好的转机。我们是清楚的，你们古巴的最主要的领导核心的同志们，一直也是并不感冒那位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是这样的吧？”

格瓦拉说：

“确实，是这样的。赫鲁晓夫，实在很难叫我们感冒，他非常愚蠢而且粗鲁，给我们小小的革命的古巴，确实是造成过许多困难和危机，尤其是1962年的导弹危机，他完全是背信弃义地出卖了我们，给我们带来了古巴革命从来也没有招致的耻辱。”

提到赫鲁晓夫，格瓦拉说得相当愤然，接着，他又说：

“赫鲁晓夫给苏联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是很大的。赫鲁晓夫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祸害，也是很大的。在对待赫鲁晓夫的问题上，我们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现在领导层的主要领导成员们，都是倾向着中国共产党一边的。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大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种伎俩，也曾传染到过我们古巴。几年前，原古巴人民党的一些不三不四的领导成员，就举起赫鲁晓夫同样的旗帜，在古巴一度掀起过妄图动摇我们的无可置疑的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领袖地位的妖风。他们也打出了反对个人崇拜的旗号，妄图诋毁菲德尔。但是，我们经过革命武装斗争的革命者，是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的。我们没有给那样一班从阴沟里钻出来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得到钻空子的机会，最终他们是夹起尾巴来，承认了失败。但是，赫鲁晓夫在苏联，

可是一度大大得逞了的，他大反斯大林，不惜把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帜反倒，不惜把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完全泼污。关于斯大林，我们也不是完全一点儿也不知道的。他作为人而不是万能的上帝，他肯定也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办出一些不公道甚至是黑暗的事情来，但是，他领导苏联人民战胜了德国法西斯，他领导苏联人民把十月革命前经济实力只占世界第十一位的俄国，建设成了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大国家，这样的事实，怎么能够抹杀呢？谁又能够抹杀得了呢？所以，我们和赫鲁晓夫的分歧，也是根本的，是由来已久的。对他的下台，我们是拍手称快，我们是高兴的、庆幸的，而且，我们有理由因此而抱着我们现在所有的美好期待和希望，我们实在是由衷地希望中苏两党，随着赫鲁晓夫的被摒弃，也摒弃其中的重大分歧，重新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基础上，更加牢固地团结起来，而且坚如磐石，这样，对斗争中争取摆脱帝国主义桎梏的各弱小国家的人民，必然会带来新的更大的鼓舞和支持，当前，美帝国主义，一直在实行着丧心病狂的扼杀政策，对我们的古巴实行着严密的经济封锁和种种政治的、经济的讹诈和制裁。在兄弟的越南民主主义共和国，美帝国主义的飞机火炮，几乎没有一天不在轰炸和射杀越南人民，特别是在越南的南方，美帝国主义穷兵黩武，出动几十万大军，在那里日复一日地屠杀越南的人民，除此之外，在非洲的刚果，美帝国主义的中央情报局，在那里血腥地杀害了刚果人民的光荣领袖卢蒙巴。帝国主义的横行霸道，在全世界各大洲都在恣意地横行霸道地猖狂，在镇压任何地方的争取自由的人民革命。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堡垒，中、苏两党应完全捐弃前嫌，坚如磐石地团结起来，不再显露着分裂的状态，那将是多么伟大和辉煌的态势呢？那态势，实在就是一种真正的东风压倒西风的态势了吧。”

格瓦拉侃侃而谈，情词恳切，陈述气势磅礴，江河流水一般的浩荡激昂的热望。

陈毅、贺龙两位元帅，两位中国的伟大的军人和伟大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中国的两位伟大的英雄，他们静默地，微笑着，始终欣赏地听着格瓦拉的话语，他们怎么能不英雄所见略同呢！

可是，贺龙元帅终于点燃一支烟，从容地抽起来，然后平静地，词语不紧不慢地开始说话：

“切！少校同志，你要知道，我们完全同意你刚才话语中所说的意思。而且，我们是可以有共鸣的。我们很欣赏你的话，你的看法和你的意见。对于赫鲁晓夫，我们是多年以来，就看透了他，对他不抱希望了。所以，我们发表了九篇文章来揭露他和批判他。他现在终于被轰倒了，下台了，被无情地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对此，一开始，也令我们产生过美好的热望，也令我们产生过中苏两党踢开绊脚石，捐弃前嫌走到一起来的期待。所以，在赫鲁晓夫被轰下台后不久，借着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庆祝盛典的邀请，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核心和毛泽东主席，特别派遣周恩来同志为团长，我为副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在莫斯科，我们和取代赫鲁晓夫的新的一班苏联党的最高领导人，举行过坦率坦诚的会谈。苏联方面出席会谈的，有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波德戈尔内、安德罗波夫，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方面的政策，不准备与赫鲁晓夫当政时期的政策路线，作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改变。确实，他们就是这样说的，他们就是这样表示的，他们不想作一丝一毫的改变。”

贺龙元帅说到这里，止住了话题。他没有往下再说什么。

格瓦拉静静地聆听着这位元帅的陈述。贺龙收住话题后。格瓦拉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他陷在他坐着的沙发座位上，有几分孩子气似的咬着他的合在一起的两只手上的指甲尖，他长久地不再说话，甚至开始走神，陷入了沉思。

陈毅耐心地陪同着贺龙元帅和格瓦拉交流对话。他现在仍然耐心地注视着格瓦拉。陈毅觉得，别来五年不曾相见的火热的朝气蓬勃的年轻少校，显然有些见老了。陈毅有些不无怜悯之情地注视着格瓦拉，他知道这个年轻的革命家，显然被沉重的责任担子，压得有些疲劳不堪了。

陈毅知道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及切·格瓦拉，实在是英雄。美国佬对他们恨得要命，但也怕得要死。而对美帝国主义这样的庞然大物大鲨鱼，同样也不能算是小鲨鱼的赫鲁晓夫那一班好汉们也竟然怕得要死，处处不敢开罪。小小的古巴，仅仅是沙丁鱼一般的小小的古巴，却从来既没有怕过这一大鲨鱼，也没有惧怕过另一条大鲨鱼，而且，他们硬是就在大鲨鱼们争霸的水域里，始终凭着自己的意志和方向的选择，自由而骄傲同时也光荣地游动着。

但是陈毅广阔的胸怀能够理解：这并不容易。

会见刘少奇主席正逢是在一个非常的时刻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以及彭真、陈毅、贺龙和其他一些领导人陪同下，接见格瓦拉以及他率领的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代表团的全体成员的时候，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热烈的谈话。

当格瓦拉知道中国正在传统的节月期间有拜年的风俗时候时，特别向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并请他们转达他对其他中国领导人的拜年之意。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也说了祝福格瓦拉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等古巴领导人的拜年话。说过一些礼仪的寒暄话以后，格瓦拉很快便切入他访问使命的正题。

首先，格瓦拉陈述了他以及他的代表团，受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的派遣，来中国此次访问的最主要任务，就是希望能通过这次访问，能够有效地做一些弥补中苏两党严重分歧的工作。

关于这一个问题。格瓦拉说：“本来，关于这一项使命的完成，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及其他一些领导成员，曾经建议我和代表团其他同志，同时等地访问中、苏两国。但是，我们婉拒了这样的意见。我们对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及其他一部分领导同志说：‘在我作为古巴代表团的团长，肩负使命出访工作的时候，我最愉快最顺利的谈判工作，总是在中国进行的，而最艰难最令人沮丧的谈判工作，总是在苏联进行的。’我已经三次去过苏联，在其他一些地方，我和苏联的同志们也有过交锋，只要我和他们相聚在一起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几乎总是会难以避免地发生争吵。比如我们在和苏联同志进行贸易谈判，请他们购买古巴糖的时候，苏联的谈判代表同志们，总是要拚命的、无情地压低糖价，有的时候，他们提出来的条件，要比世界糖价市场的要价还要低，于是，我们就和他们力争，我们就和他们计算，请他们说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用相对的制糖原料生产出相等的糖来，需要付出多少代价，然后请他们比较，购买古巴的糖，事实上会有多少便宜好占。所以，我们拒绝他们再来更低的压价。可是，他们却也总会有一个比较的尺度，那就是，他们总会说：‘你不要忘了，格瓦拉同志，从前美国人买你们古巴的糖的时候，也是这个价钱。’于是，我就和他们吼。我说，‘同志们，你们不要忘了，你们号称是古巴的老大哥，你们号称是古巴的兄弟，而从前的美国人和现在的美国人都一样，他们是帝国主义分子，他们买古巴糖的时候从来都包含着明显的掠夺和鲸吞。从前的古巴，作为美国事实上殖民地，没有任何权力去和美国帝国主义讨价还价，价格只能是由着他们的帝国主义势力随心所欲来定的。所以，美帝国主义从前购买古巴糖的价格，包括着美帝国主义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那是一种帝国主义的价格，但是，作为兄弟的苏联，作为老大哥的苏联你们怎么能和帝国主义一样。于是，这样一来，我便总是会和他们唇枪舌剑地吵。我和赫鲁晓夫吵过，大吵大闹过，我和米高扬也大吵大闹过，还和其他许多苏联领导人都发生过争吵，所以，我在苏联有吵架能手的名声，赫鲁晓夫还曾拍过桌子，指着我叫喊过：‘我听米高扬同志说了，按照亚美尼亚的词汇来讲，你这个切，就是个不的意思，你就是个不。但是，在我们看来，在苏联看来，任何敢于说不的人，我们是不允许他存在的。’赫鲁晓夫叫得很高，吵得更响，于是我就回敬他，说：‘赫鲁晓夫同志，你不要忘了，我曾经听到过，一方面，还有从中国同志那里，我们也经常能听到冲着你喊不的声音。而且，我们特别愿意听到中国同志对你们回敬的一句

话，叫做绝不围着你们的指挥棒转。还有一句话，也叫我们痛快和高兴，那就是，绝不承认你们是老子党，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是儿子党。对此，我们就特别有共识，所以，请你不要对我们吆五喝六，在我们革命的古巴也不存在着，也不会存在着你们的儿子党，最少现在是这样，而且我还可说将来也还会是这样的。’ ”

格瓦拉说着。

刘少奇同志一直笑迷迷地，安祥地听着。周恩来同志，也是在严肃的面孔中，满含着欣赏和慈霭的目光，听着格瓦拉说话。

格瓦拉接着说下去。他说：

“ 所以，我和赫鲁晓夫那一班人马，早已经不知吵翻过多少个过儿了。因此，我早已经是他们不受欢迎的客人，我见了他们是不会愉快的，而他们见了，则肯定也会头痛。所以如果让我再到苏联去访问，去做弥合中苏两党分歧的工作，我担心我力不胜任，我担心我再和他们吵起来，与事更加无补。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向菲德尔作了解释，因此他也同意了我们此次出访不到苏联去去的想法，而是直接首先飞到中国来，进行使命规定给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意图是，不管我们和你们中国的同志们，不管在对待苏联党的问题上，有多少共同的认识和看法，我们肯定还多一层更强烈的要求，就是希望中苏两个大国的两大党，实现崭新的重新出现的强大团结。一个坚如磐石的强大的团结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重新再现，事实上不仅会对全世界革命人民是鼓舞，而且也会令正在崛起中的正在奋起革命斗争的亚非拉各国人民，能够直接地感觉到，更有靠山了。因此，首先是为着这样的巨大的期望，我们肩负着这样最重要的使命，来到了中国。 ”

切·格瓦拉如此地，坦诚而充满挚情地，向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其他中国党政领导重要成员，阐明了他此次出使中国所要进行的首要工作任务。

接下来，切·格瓦拉深深地皱了一下眉头，接着向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夏等同志，提到了他此次来中国访问，所要进行的第二项主要工作，就是要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学习崭新的革命经验。

格瓦拉说：

“ 古巴驻中国大使馆，不断地把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信息，尽可能仔细地收集起来，向古巴国内作经常的报告。我们很久以来，已经开始注意着这样的消息，那就是在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据说也就是“ 四清运动 ”。根据我们大使馆对中国有关方面的了解，知道了中国正在进行的“ 四清运动 ”，规模极其伟大，简直也是轰轰烈烈，据说几乎像当年的土地改革运动差不多，据说有许多领导干部甚至是主要领导干部，都投身参加了这一运动。 ”

邓小平说：

“ 你们大使馆的信息灵通，报告是正确的，情况确实如此，我们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上下，正在十分广泛和深入地开展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 四清运动 ’。毛泽东主席，一直在直接抓着这项工作，他非常关注这项工作。我们的刘少奇主席，更是直接地投入，他是全国‘ 四清运动 ’的总指挥，彭真同志是副总指挥，周恩来总理和我们，也都经常参与其间工作，这个运动进行的很深入，运动的重点，主要是在解决基层干部政治上不清、经济上不清、思想上不清、组织上不清这四个问题，重点是解

决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问题，主要的目标，是解决干群关系的矛盾，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防止修正主义的出现。”尽管邓小平介绍的极为言简意赅，格瓦拉听着，还是特别地兴奋了起来，他几乎立刻产生出了共鸣。他马上赞叹地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真是伟大、光荣、正确和英明。你们解决中国问题，事实上，在我们古巴，也已经早就出现了。而且，在我们那里，这样的情况，也许出现的更为普遍的严重。我们武装斗争的时间很短，革命斗争的过程不是很长，所以，我们本来就没有十分充分地准备好掌握政权的革命性极为纯粹的大批干部，因此，在掌握庞大的国家机器，掌握了各种各样的权力以后，有很多人，很快便受到了权力的腐蚀，当然，这些被腐蚀的人，首先是那些没有经受过充分革命斗争锻炼，或者是在革命斗争已经是在胜利进程中投机参加革命的人，还有一些是过去的坐而论道没有参加过艰苦的革命斗争生活的人民社会党党员，他们在掌握国家的各方面政要以后，几乎很快的就官僚主义化，变成了作成作福的资产阶级老爷，他们开始讲究住最豪华的别墅，坐最高档的小轿车，搂着女秘书在办公室里办公，而且是在一个屋子里，开着三架空调机办公，他们也搞组织不清，打击参加古巴革命的老同志，而由他们来独领江山风骚，他们宣布由自己来作一个部门的第一把手，由女秘书来当第二把手，由他的舅子来当第三把手，大搞裙带关系，使革命政权的性质变质、腐化。曾经有过一个大企业的经理，他充当着革命政权的代表，我到过他豪华的居宅和办公室里亲自检查过，这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党的大老爷，竟然只他一个人，一家人就享受着十七台电视机的伺候，以便他随时随地在每一个角落、都能听到看到不仅仅是古巴电视台的声响和画面，而主要是收听和看到美国的从迈阿密那边发射过来的靡靡之音和肉麻的黄色图像。”

格瓦拉相当激愤地说着。他接着说：“然而，对这样的家伙，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搞撤职罢官，让他们从权力岗位上滚开，可是，却往往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摠下一个葫芦出来一个瓢，这样的家伙，像是玉米地里的杂草一样，你就是怎么拔，也老是拔不完。可是，这在你们这里，你们马上有了一套办法，而且是堪称榜样的办法，你们搞起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轰轰烈烈进行‘四清’。我们还听说，刘少奇主席的夫人王光美同志，也下到了农村去，长时间地住在那里，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纠察和清除反动的贪官和腐败分子，这实在叫我们感到振奋，鼓舞和感动。”

格瓦拉激动地如此说着。

有的时候，他会目光对视着刘少奇主席，对视着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总书记，对视着彭真。

但是，中国的领导人们，似乎更乐于静静地听着格瓦拉的讲话。他们几乎总是在静静地听着。

格瓦拉当然不会知道，他不会知道，当时在中国，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关于中国的“四清运动”，继续怎么搞，运动的重点应该怎样摆放，在中国党的最高层内部，具体说还可以讲就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一部分领导人之间，已经在发生着严重的分歧和不同的看法。而且，就在格瓦拉访问中国这一回到北京的不多天以前，今天接见他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刚刚在四清工作问题上，和毛泽东主席发生了尖锐的歧见，因而受到了毛泽东主席极为尖锐的批评。

所以，今天，刘少奇主席在接见格瓦拉的时候，说话不是很多，虽然他平时说话也不喜欢很多，比较而言，他今天说话似乎更少，似乎更显持重。

不过，刘少奇主席还是十分安详，沉静，包含着融融大气，对格瓦拉说了一些热情欢迎他来中国访问的话，谈到他所说的要学习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建设阶段的崭新经验时，刘少奇告诉格瓦拉说，许多问题还在深入的实践检验和研究，摸索和探讨中，古巴同志如果作为经验来学习，似乎还是以不匆忙为好。他提议格瓦拉同志就此问题，可以先进行更深切细致的考察，就这一方面的问题，刘少奇主席提议，请格瓦拉进一步直接与邓小平、彭真同志商谈。

周恩来总理，也点着头向格瓦拉表示他完全同意刘少奇主席的意见。周恩来还特别强调说：“格瓦拉同志，作为我们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同志，他也是总理我们党和国家的一切大事的，你想要说的一切话，你想要得到的一切回答，在他这里，都可以得到最权威的回答。同时也是最负责任的回答。”

邓小平送别：“祝格瓦拉同志一路平安！”

1965年2月5日。

这一无也是中国传统春节的正月初四。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和彭真同志，以及其他一些中国共产党中央的负责工作人员，和以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全国领导委员、书记处书记切·格瓦拉为团长的，有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全国领导委员书记处书记埃米略·阿拉贡内斯·纳瓦罗，和全国领导委员奥斯马尼·西恩富戈斯·戈里亚兰等同志参加的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代表团，举行正式的会谈，就双方感兴趣的问题，展开了深入广泛的热烈交流。

格瓦拉谈到了古巴经济建设的话题，这立刻也使邓小平总书记感应起来，兴奋起来。看来，邓小平总书记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建设的话题，似乎更有热情和兴趣。

“格瓦拉同志，你们古巴的同志们都比较年轻。但是，你们却都能够头脑比较清醒，善于把握得住自己而不轻易被他人左右。你们根据古巴的具体情况处理古巴的问题，这个水平，是可以令我们欣赏、敬佩和学习的。你们古巴革命胜利以来，时间不长，困难很多，非常艰难地承受着美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和从来也没有停顿过的捣乱，但是，你们在卡斯特罗同志的领导下，始终实行着学习、劳动、紧握枪的口号。边学习，边战斗，边生产，努力进行国家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在特别艰难困顿的情况下，古巴革命还不仅仅是上层建筑的革命先行，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国家生产力的发展，也总还是在飞跃进步和发展，你们胜利这五、六年间，帝国主义的封锁严重，捣乱频仍，你们几乎总是在举国一致，总是在紧张地着战斗、训练，随时准备着誓死保卫祖国，但是，不管在什么时候，你们仍然不忘国家建设，不忘狠抓经济，不忘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因此，即使是在这样的年代和岁月里，你们的国民经济增长幅度，始终还是在增加而不是倒退，始终还保持在百分之七左右的增长幅度上，这真是非常了不起的。是非常了不起的。功劳嘛，当然，首先要说是古巴人民，勤劳勇敢，不仅善于战斗、革命，而且善于建设和生产。接下来，我还想到也许可能还有一个原因，似乎也是重要的，那就是古巴革命政府和革命人民，还拥有着你这样一位主管国民经济发展的总揽大权的大管家，理财能手，你既是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又是古巴的工业部长，还是古巴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你是古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总参谋长，凭着你的业绩，我说你这个总参谋长当的好，说明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对你的信任，倚特重用，完全是正确的，是真正英明的。”

听着邓小平的话，格瓦拉感到兴奋，同时也感到惊异。他面对着的邓小平，是拥有八亿人民的伟大中国和数千万中共党员的大国大党领导人，周恩来也是这个大国大党总理一切的，是总揽大权的最强有力的手臂之一，在中国国内事情，党内的事情，肩负重任，担子已经够重够多的了，特别是，格瓦拉还知道，据说邓小平还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指挥的，中国反对苏联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主帅之一，据说，中国共产党所发表的有如万炮千钧之力的九篇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文章，即人所共知的“九评”，绝大部分篇章，是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撰写出来的，对此，格瓦拉很久以来，就对邓小平持有特别的尊敬和敬意。而在眼前的中古两党会谈中，格瓦拉听到邓小平的发言，在他的发言中，对古巴的经济建设情况；竟然是如此的熟知其情，如此的了解，并且给予如此高的评价，这令格瓦拉十分感动。

而且，正当格瓦拉感动不已的时候，邓小平在接下来的话题中，又谈到了令格瓦拉简直震惊的问题。

邓小平在谈话中，忽然向格瓦拉提起了在古巴的经济建设中，正在开始实行的，不仅仅是精神奖励，而且实行物质刺激的政策。邓小平间及到这样的政策的制定过程和执行情况。他希望格瓦拉详细一点儿给予说明和解释。

邓小平说：

“也许你们这是正在解决着一个很不简单的重大问题。是在解决一个阶段性的生产力发展的杠杆问题。”

邓小平如此一说，格瓦拉立刻感到备受鼓舞。

格瓦拉说：“邓小平总书记同志，说实在的，我们原先以为，我们在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中执行这样的政策，恐怕还会受到中国同志的非议和批评呢。”

“我们从来不干预兄弟党在处理内政方面，包括经济建设和政策制定方面的一切事务，但是，对好的东西，新鲜的事物，经常会引起我们的关注和研究。你们古巴差不多是近两年来制定的，在促动劳动生产力方面的精神刺激和物质刺激相结合的政策，明显是你们过去特别强调精神刺激的政策的一个转变，而且，显然是一种正确的转变，你们确实是深刻地研究了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被规律规定的劳动收益必须遵循的原则，这些原则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不尊重它，它就必然要惩罚你，必然要和你闹别扭，你只有尊重它了，你才能去真正的把握它和驾驭它，你们古巴同志，确实善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确实是善于总结经验，不断地有所发明，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是善于前进的，这实在说明了你们的聪明，实在很了不起。”

邓小平如此说着。

事实上，一旦扯起经济建设的话题来，格瓦拉也明显有着难以抑制得住的激情。接着他把邓小平希望听到的情况，很从容地，向邓小平同志娓娓道来。

格瓦拉说：

“在古巴革命刚刚胜利，我们刚刚夺取政权和掌握政权的时候，我们的热情充沛，但经验不足。一开始，我们是全凭着革命的热情和革命的理想主义来办事的，所以，我们当时，我们几乎完全不注意革命的阶段性的研究，不是很懂得生产力水平发展对社会发展的制约，因此，我们许多方面，都搞了一些一厢情愿的动作，比如在发展策略上，我们一开始就特别过分地强化工业化的进程，开始强调起了重工业的发展，结果，严重地挫伤了我们的糖业生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我们也搞了一些过急过激的动作；在国有化的进程中，我们把帝国主义侵略性的剥削和掠夺性的机制，实行国有化，我们坚持认为是绝对正确的。但是，把哈瓦那街头的理发铺、修鞋铺，都迅疾地实行了国有化，恐怕这就是太不适当的了，是太过急过激的了，或者说，是太绝对化了。完全不符合辩证法和事物发展的规律。所有制在物质还没有实现极大的涌流的情况下，强调单一的公有制，显然是一种明显产生使生产力发展平稳失衡的作法。这样的做法，我们在推动发展的过程中，很快发现后：我们就逐步地进行了调整和纠正。接下来，就是生产方式和关于分配的问题了。在生产方式方面，我们一开始，完全热衷于照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模式，严格地实行了计划经济，国内活跃的市场迅速地缩小了下来。后来，我们发现太集中也是不行的，无机的计划经济绝对地实行起来，许多

方面会运转不灵，于是我们调整了发展策略，针对过分集中的计划经济产生的问题，我们开始了非集中化方法的试行，这就是在相当的范围内，放开一定的市场，实行小额的自由贸易，并且在国际市场上，我们也力争开始对口的市场化贸易和交流，我们拒绝了帝国主义和一些国家希望我们实行产糖专业化和国际分工的要求，我们也争取实验着引进一定的外资，进行与国际市场贸易挂钩的生产。当然，我们所说到生产分配，我们一开始的奋斗目标，是缩小极端的不平等现象，但是相伴出现的却又是平均主义的问题，后来我们看重精神奖励的作用，但是接着我们很快发现，仅仅着重精神奖励，实质上势必产生着巨大的不公平。后来我们又试图开始了一定的物质奖励，一开始我们试行多奖励集体，少奖励个人，一个工厂或研究所，如果完成任务好，我们不管这个工厂或研究所谁的贡献大，谁的贡献小，只对工厂或研究所进行奖励，但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的这样的做法，也是幼稚的，是可笑的。于是我们开始了有限地注重个人物质刺激的试验，我们奖励工资，实行工资差别，给予物质奖励，发给生产奖金，这样一来，确有成效调动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我们不认为奖勤罚懒，一定就会导致劳动群众道德的堕落。”

格瓦拉侃侃而谈一席话，简明扼要，谈得相当抽象，却又相当具体，相当透彻。

邓小平一直极为认真地听着。专注地注视着格瓦拉，他不无欣赏地看着格瓦拉，不停地抽着他喜欢抽的熊猫牌香烟，显然，他一边听，一边同时进行着紧张的逻辑流理，理论过滤和思考。

待格瓦拉讲完以后，邓小平说：

“你讲得好。讲得很好。看起来你格瓦拉同志，不仅仅已经是成熟的革命家、成熟的政治家，你还是了不起的成熟的经济学家了。很不简单。我很欣赏你就经济问题，就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和我对话。我觉得，你是进行这方面对话的一个极有创见的对话者，是一个难得的对话伙伴，我们之间的年岁虽然也有很大的差距，我比你年长二十多岁，但是，你的思想成熟程度，如果要我选择一个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研究者对话，我宁肯选择你格瓦拉同志，希望我们能越过大洋和湖海，经常能有交流对话的机会，我觉得我们在与你对话的时候，会有大的启发，会有非浅的获益的，我这样对你说，完全是由衷的，是实实在在的。”

格瓦拉说：

“然而，如果实实在在说，我来到中国访问，我们的主要目的，由衷地说，是请教来了。我们毕竟是年轻一代的革命者，经历、知识，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相对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实实在在是揣着满满一脑袋的问题，到中国来请教的，是来到中国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的，比如治一治官僚主义的顽症，我们就实在不知道会有什么根本的办法，我们就非常急于想从中国这里，得到一些启示。”

格瓦拉说得确实词情恳切，由衷而诚恳。

后来邓小平似乎是避免充当一个好为人师的角色似的，几乎是在漫不经心的语调中，谈到了关于社会主义国家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的话题。他没有泛泛而谈，扯开来讲。而是差不多不经意地告诉格瓦拉，在中国，当时除了全国轰轰烈烈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四清”工作以外，同时还在进行着一项重要的工作，这就是当时同时在进行关于领导班子革命化的运动，

特别是强调县委班子革命化的运动，也和四清工作一起，正在全国广阔的基层展开。

邓小平在谈到这方面的情况时，相当动情，相当熟知情况地对格瓦拉说：

“我们要求的领导班子，干部革命化的问题，我看你们古巴的同志们，几乎一直在进行着。比如说，为了深入实际，了解情况和广泛地联系人民群众，我们在要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们在实行革命化的过程中，一定要到群众中去，和人民群众在一起，同吃同住，积极参加生产劳动，放下架子，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不要当官作老爷。我看这一条，你们古巴的同志们实行的好，可以说是我们中国领导干部的好榜样。我们的驻在你们那里的大使馆，也会经常打报告回来，传达你们那里的信息。我们早已经听说过，你格瓦拉同志，甚至还包括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劳尔·卡斯特罗同志，到了古巴的砍甘蔗季节，都是要到古巴的甘蔗田里去抡大砍刀，砍甘蔗的。他们还报告给我们一个惊人的数字，说是古巴的全国领导委员，党的书记，最忙的部长之一切·格瓦拉同志，在砍甘蔗的季节，竟然只是在一个季节，就光着膀子义务劳动二百四十个小时，那该是多少个劳动日呢？那就是意味着三个月重干了一个月的艰苦劳动，这比我们对我们的县级领导干部的要求还高的多，我们对我们的县级领导干部每年直接参加体力劳动的时间，要够满三十天，就是优等生的水平了。”

邓小平是中国党的总书记，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但是显然他对古巴的事情也知道的很多。

他说着。接着，又深情地看着胡须卷曲，眼睛炯炯有神的格瓦拉说：

“我们还看到过一张劳动群众在古巴的海港码头肩挑背扛装船或卸船的照片，也是我们的大使馆寄回来的。我们许多政治局委员传看过这张照片，其中一个光着膀子正扛着大包的劳动者，被我们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还有李先念副总理，一眼就都认出来了，那正是你，正是你切·格瓦拉少校，古巴政府的部长，古巴国家的领导人之一。我们听说你还到建筑工地和泥砌砖，学盖房子，还到新工厂去装配机器，学着操作。我们真佩服你的精力，更佩服你们的思想境界，思想精神。我们还听说，在古巴革命已经胜利的许多年代里，你们的杰出的领袖卡斯特罗，每年都还要穿着大兵的长靴，背起游击队员的沉重背包，回到当年打游击的游击根据地马埃斯特腊山区去，沿着当年的从始至终的行进路线，再来一次长途行军和跋涉，以示绝不忘记过去，绝不忘记创业的艰难。你们这样的自觉作法，这样的崇高境界，实际上就是杜绝官僚主义的侵蚀的最有效的，最灵验的方法。只要是革命的最高领导层，能够始终是纯粹的，革命化的，脚底下即使有些风吹草动，也是动摇不了你们的，更动摇不了你们的根基，你们就能最终把一切事情管好，可以慢慢来，又急又不急，不急不行，太急也不行，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只要你们最高领导层是顶天立地的，有什么动静还能让古巴的天塌下来呢？古巴的天看起来是塌不下来的，你不妨稍安勿躁，增强一些耐心和信心。我对你说的这些话，完全可以算是一个比你年长的，长兄般的挚言。请你格瓦拉同志三思，这也算我个人出于对你的特别的友谊的特别的赠言吧，不知你能不能愿意接受和记下。”

邓小平说得实在诚挚。

格瓦拉受到了特别深切的感动。

格瓦拉深切的感受到了，他所聆听到的，确实是良师益友，最亲切而诚

息，最深挚而最具分量的珍贵的话语，这是真正的伟大的朋友和兄弟的话语。

1965年2月9日，切·格瓦拉率领古巴社会主义统一党代表团，结束了在中国的访问，也是他的对中国的第二次访问，他又要再一次离开中国，再一次地飞走了。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彭真同志，再一次亲自陪他来到北京机场，为他送行。

北京机场，再一次聚集起数千名各界的人民群众，他们敲锣打鼓，挥舞着彩旗，高呼着口号，向古巴人民致敬！向英雄的非德尔、格瓦拉同志致敬！他们冲着邓小平、彭真同志亲切陪同走过来和群众见面的切·格瓦拉呼喊：

“格瓦拉同志，请你保重！”

“格瓦拉同志，祝你一路平安、一路风顺！”

格瓦拉由邓小平、彭真同志陪同来到飞机的舷梯旁，他又一次的伤别和惜别，流露出了难以离去的依依深情。临要登机前，他再一次地抬起手来，仰望一眼正有几朵白云飘动的北京上空的湛蓝的蓝天，他忽然眯缝起眼睛来，有几分激动地颤抖着他鬓间的胡须，冲着邓小平和彭真同志又说了一句：

“这一次去后，不知道我还能在什么年月再来。我真像热爱古巴一样，热爱着中国，热爱着北京，因为这里有着你们，你们是我们真正最亲爱的兄弟，最赤诚的朋友啊！”

邓小平、彭真深情地向着露着一张挚诚的格瓦拉的笑脸的飞机舷窗摆手，一直在高举着，摇动着，一直到载负着格瓦拉的专机离开飞机跑道，飞上蓝天。邓小平、彭真，以及机场上迟迟不肯离去的欢送格瓦拉的人群，一直遥望这一架飞上蓝天，消失在白云深处的机影，久久地，久久地没有离去，不肯离去。也许人们不无觉察的预感到了，切·格瓦拉同志从此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从此人们再也见不到这位古巴革命的伟大的英雄了。切·格瓦拉飞走了。中国、北京、伟大的中国人民，多少亲他、爱他、尊敬他宝贵他的同志、兄弟和朋友，多么期望他再来，期望他再回到这里来啊！然而，人们当时意想不到，切·格瓦拉如此一去，竟然再也不会回来，再也不会回来了……

第二部 热吻埃入与黑非洲土地

格瓦拉又到开罗的时候

1965年2月11日。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告别北京，告别中国，经由中国的最大城市上海出境，又经过了巴基斯坦的卡拉奇，飞到了非洲大陆和阿拉伯世界的革命中心，飞到了具有源远流长古代文明史的埃及，飞到了尼罗河畔的开罗。

埃及人民无比热爱和拥戴的领袖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派遣他的最亲密的助手，代表他本人，在开罗机场热情地迎接切·格瓦拉的到来，热情地欢迎他的到来。

根据纳赛尔的指示和关照，切·格瓦拉被安排下榻在开罗最豪华最高水准的谢泼德饭店第十一层，专门为接待各国国家元首的总统套房内。

这里的设施，当然是世界级水平，当然是第一流的。

从谢泼德饭店格瓦拉下榻的总统套房的凉台上，俯瞰开罗，可以把开罗城区几乎完全尽收眼底，从这里远望开罗古城远处的阡陌，可以遥见尼罗河两岸广漠的椰林婆娑的绿洲，也可以隐约看到在壮阔的远处，在连绵起伏的沙漠丘陵的波浪里，高耸巍巍默然挺立的金字塔，以及神奇而神秘的斯芬克司人面兽奇观。

切·格瓦拉和所有的古巴的真正的革命英雄们，几乎无不都是生活极度简朴节俭，绝不追求豪华奢侈，都是绝对不事奢靡排场的人。在国内的时候，他们都居住着像是军队兵营里的，确实不过是少校级军官居住的那样的简陋的房子，不过是在房子里摆上两张行军床，在十二米再不多一点的房间里再摆上一张桌子，墙壁上当然还要钉着老大的钉子，挂着他们战斗指挥员的文件包，以及他们经常佩带的手枪和有时候也需要随时带在身边的冲锋枪。

在古巴革命胜利以后许多年过去，时至今日，他们的生活条件，居住条件，仍然是坚持着最低标准的，坚持着最普通的标准。

也许他们实在是艰苦生活磨炼惯了，养成了完全适应这样的生活条件的习惯，一旦改变这样的生活条件，反而会很不习惯似的，因而也会很不舒服似的。

切·格瓦拉有过这样的经历，那是在1959年年初，古巴革命刚刚胜利，刚刚夺取了政权的时候，当时，事实上，那还是处在一个非常的时期，一方面，人们已经完全沉浸在了胜利的欢乐中，而另一方面，革命的胜利者们仍然面临着艰巨的困难的任务。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切·格瓦拉，作为最终捣毁古巴反动的巴蒂斯塔政权，第一个指挥起义军纵队进入哈瓦那的纵队司令，并且马上成为了哈瓦那最重要的卡瓦尼亚要塞司令，这实际上是成为了扼守哈瓦那的卫戍司令。突然，有那么一天，切·格瓦拉的身体，本来年轻健壮的身体，突然之间，几乎完全跨了下来，他窒息地倒在一个特殊的地方。

1959年1月，古巴革命彻底推翻了反革命的，反动的巴蒂斯塔政权。这是在1956年11月25日，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八十三人的古巴革命起义军，高唱《七·二六战歌》，登上用多方筹集支援革命的资金，用一万五千元购得到手的小小游船《格拉玛号》，在暴风的雨夜里，冲出墨西哥的图克斯潘港湾，经过整整七天七夜的，后来完全断绝了粮食和淡水的海上漂流，终于搜寻到了古巴海岸的克鲁斯角的灯光，接着把《格拉玛号》驶进了科腊洛多斯海滩。然后，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指挥下，八十三名起义军战士开始弃船登陆，通过了一片难于爬涉的泥泞的沼泽地，终于登上了古巴的海岸，

终于掀起了古巴革命在古巴土地上展开大旗，展开艰苦的游击战争。

在经过两个多年头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生活中，从起义军登上古巴土地，在阿莱格里亚德皮奥地区第一次遭到巴蒂斯塔政府军的包围和袭击，八十三人的起义军队伍，几乎一时倾遭全军覆没。好在最主要的战斗精华和战斗骨干保留下来。留下了硕果仅存的十二人，在被打散的状态下又集结起来，然后又进入到贫瘠险峻的马埃斯特腊山区，展开了无与伦比的，战斗生活简直难说是多么艰难的游击战争，除了不断的激烈的战斗，连续的袭击和被包围被袭击的危险的战斗生活以外，物质生活的匮乏，经常的缺粮、断水，也几乎是无法想象的，马埃斯特腊山区天上飞的鸟，地上跑的兽，包括海滩上爬行的活螃蟹，都曾经是起义军捉来就吞食的好给养，而且，在最困难的时候，没有淡水可饮，起义军战士们用望远镜的圆孔作量杯，仔细地量着仅存的淡水，非常公平地分配给每一个被饥渴严重折磨的人来喝。为了解决淡水不足和饮用水的问题。当时作为起义军领导人之一的切·格瓦拉，还力图使自己成为一个饮用海水的发明家，一次又一次地尝试饮用海水，只是一次又一次都失败了，他没有摸索出可以使用海水的良好办法。

古巴革命的发展相当迅速，马埃斯特腊山区的游击战很快扎下根来，扎稳了根基，接着开始了不断的胜利，节节的胜利。古巴革命精神勃发冲天的革命领导人，以菲德尔·卡斯特罗作为无可置疑的领袖，在革命进程越是迅速发展，越是处在胜利发展的状态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战斗精神越是勃发，越是具有冲天的气概。

在马埃斯特腊山区的游击战蓬勃展开仅仅一年多一点的时候，最初被几乎全军覆没的八十三人起义军，后来又集结起来的十二人，在又经过一番游击战以后，队伍不断壮大，迅速壮大，很快发展成了将近有三四百人的队伍。

最初在起义军成立的时候，被卡斯特罗指定为起义军干部工作的负责人，同时被卡斯特罗列为指挥部参谋，又被正式任命为中尉军医的格瓦拉，在马埃斯特腊山区进行游击战争的起义军中，也确实是以军医的身份和军医的姿态参加斗争的。但是后来的形势发展，在许多次猝然来到的战斗中，迫使命游击队中的军医也不得不拿起武器来直接参加战斗和向敌人开火。

格瓦拉第一次直接参加向敌人开火，参加战斗时，敌人也向他开火，他当时胆怯的很厉害，竟然也曾发主过弃枪逃走的可耻行为。关于这一方面的故事，切·格瓦拉在成为最受人尊敬和热爱的古巴革命英雄之一以后，在许多篇公开发表的革命战争回忆录文章中，都坦然公开的披露过。

格瓦拉把最初的战斗中的胆怯行为，作为一种真实的，难以避免的过程来看。格瓦拉从来不把自己极力打扮成一个天生的无所畏惧，顶天立地的伟大英雄。他对自己的评价和看法，始终是最自然的，是最朴实的。

不过，格瓦拉在战斗中的胆怯现象。很快就过去了。他在战斗中锻炼和迅速成长，很快就成了最勇敢的战士，很快就成了最善于作战的战士。

后来，在 1957 年的 5 月里，也就是在古巴革命起义军，在马埃斯特腊山区开展游击战争，时间已经届满半年以上光景的时候，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直接指挥下，进行了一场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游击战中非常重要的战役：乌维罗之战。

在这一场战斗中，卡斯特罗指挥着八十名起义军士兵，分成八个战斗小组，突然袭击一个由一名巴蒂斯塔政府军尉级军官指挥五十三名装备精良的政府军把守的兵营。这是一个在马埃斯特腊山区，巴蒂斯塔反动政府设置的，

专门防范起义军游击活动的，设在一个名为乌维罗伐木场的政府军基地。

卡斯特罗指挥八十名装备很差，穿着破褴衣衫，几乎总是经常饥肠漉漉，拿着各种各样不整齐枪枝武器的起义军，攻打五十三名装备精良。同时是养精蓄锐训练有素的政府军，不能说是以强制弱，不能说是集中了优势兵力，只能说进行的大体上是一次旗鼓相当的战斗。

但是，对这次战斗，卡斯特罗仔细地进行过准备和策划，仔细地进行过侦察，完全摸清了敌人的防备情况，因此，卡斯特罗怀着果决的必胜的决心，决定打响这一次战役。

1957年5月28日，这一场战役终于打响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确定了自己的指挥作战位置。卡斯特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指挥第一战斗组，担负正面突击主攻的任务，切·格瓦拉指挥的第八战斗组，和后来是古巴革命另一位著名的革命英雄胡安·阿尔梅达指挥的第三战斗组，成为劳尔·卡斯特罗指挥战斗组正面主攻突击的犄角，从左右两侧超前切入敌人的阵地，由古巴革命后来著名的另外几位革命英雄：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吉列莫尔·加西亚等人指挥的另外几个战斗组，迂回前出现到敌人兵营的左右两方侧翼，配合正面的主攻突击，同时展开对敌人兵营的猛烈突击和进攻。

战斗是完全按照卡斯特罗指挥规定的时间，骤然间激烈地打响起来的。

一直都在紧张中积极备战的政府军，对起义军的进袭，立刻展开了迎击和强有力的反击，战斗一度进行到了空前白热化的程度，政府军在牢固的阵地后面，用轻重机枪和火箭筒，封锁起义军进攻的路线，敌人兵营里的指挥员，甚至还打电话，马上调来了三架增援政府军战斗的战斗飞机，只因为飞机无法投弹和扫射，只能又夹着尾巴飞走了，而起义军越战越勇，而且他们知道战斗必须决战决胜，速战速决，因此英勇顽强、奋不顾身，前赴后继，完全以蛟龙闹海，猛虎扑食之势拼力扑向敌人，结果，经过两个小时又四十分种的紧张激烈战斗，起义军以六名英雄烈士献身为代价，毙伤敌军三十三人，除了六名敌人在战斗中逃跑之外，包括敌军兵营的指挥官在内的其他十四人，也统统成了起义军的俘虏。

起义军取得了完全的胜利，除了消灭大批的敌军，并在古巴全国一时引起巨大的轰动和震动以外，起义军还缴获了非常珍贵、非常难得的大量武器、弹药，包括大量的粮食被服和其他种种装备。

于是，马埃斯特腊山区战斗的起义军，像是受到催发似的，更加迅速壮大起来，很快又从八十多人，发展成了一百数十多人的队伍，后来很快又接近到有二百人了。

这时候，为了行动方便，当然首要的考虑是为了形成战斗的犄角，菲德尔·卡斯特罗决定把起义军一分为二，把二百多名起义军指战员分兵成为两个纵队。人数较多的第一纵队，仍然归由菲德尔·卡斯特罗直接带领和亲自指挥，第二纵队的司令员，卡斯特罗就决定在战斗中已经负过两次伤，经过两次血的洗礼，已经由中尉军医早已变成了上尉战斗指挥员的切·格瓦拉来担任。并且，卡斯特罗同时发布命令，命令切·格瓦拉成为了在古巴革命起义军中第二个拥有少校军衔的指挥官。

从这时候开始，切·格瓦拉成为了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下的独立带兵，独立指挥作战，独立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的纵队司令员。

当时，为了迷惑敌人和震慑敌人，切·格瓦拉开始指挥着的古巴革命起义军的第二纵队，还被号称为第四纵队，和卡斯特罗直接统领指挥的第一纵

队，分兵到马埃斯特腊山区东西两个重大的区域进行战斗的开拓。

又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战斗洗礼和锤打锻炼，又经过几次相对说较大的，重要的战役，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起义军，得到了进一步的壮大和发展，到了1958年年初的时候，经过两次阿瓜松林的伏击战，消灭了更多的政府军士兵，缴获了更多的武器弹药，起义军补充了更多的兵员的时候，菲德尔·卡斯特罗又决定成立了两个新的纵队，一个纵队被命名为“弗兰克·派斯”纵队。弗兰克·派斯是古巴革命城市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他强有力地组织城市革命力量，支援了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起义军在马埃斯特腊山区的斗争，后来被巴蒂斯塔反动政府的特务发现，逮捕后死在古巴第二大城市圣地亚哥的监狱中。新的纵队以他的名字命名，表明着革命起义军对他这样的革命烈士的伟大感情和崇敬。这个纵队成立以后，卡斯特罗任命劳尔·卡斯特罗担任了司令员，是时，劳尔也晋升为少校。当然也是为着迷惑敌人，劳尔·卡斯特罗指挥的这个“弗兰克·派斯”纵队，同时，也还被称之为第六纵队。

接下来新成立的再一个纵队，卡斯特罗任命胡安·阿尔梅达上尉指挥，旋即，他也被任命为少校。他是古巴革命起义军中第四位被任命为少校级指挥员的新纵队司令。也是古巴革命起义军中第一个拥有起义军最高军衔的黑人同志。

随着两个新的战斗纵队的成立，在马埃斯特腊山区，事实上起义军已经完全控制和解放了整个西部地区，控制区已经是个相当可观的区域了。

这时候，菲德尔·卡斯特罗进一步考虑的，不是为求稳妥而停滞革命发展的速度，而是宁肯迎接更为艰苦严峻的挑战，进一步加大革命快速发展的力度，他作出断然的决定，决定从1958年的春季开始，古巴革命起义军进行游击战的活动区域，以分兵出击的姿态，开始向马埃斯特腊山区中心游击根据地广阔的外线延伸。

菲德尔·卡斯特罗命令劳尔·卡斯特罗指挥的，拥有一百多名战斗成员的“弗兰克·派斯”纵队，也称第六纵队，猛插疾进，穿过马埃斯特腊山外的东部平原，进入到另一片名为比那尔德马亚里西部的地域曼戈斯德巴拉瓜，在那里迅速地拓开了第二战线，也就是东方战线。

同时，菲德尔·卡斯特罗仍然亲自指挥，统领起义军第一纵队，也是起义军中最具战斗实力的，同时还号称是“何赛·马蒂”

纵队的战斗劲旅，并且指挥胡安·阿尔梅达统领指挥的起义军第三纵队为战斗犄角先锋，开始走出马埃斯特腊山脉的边沿，向古巴的第二大城市，位在古巴东部的圣地亚哥城逼近，逐渐地形成对圣地亚哥城包围和进击的态势。

而在这样一些必备的态势已经摆布好以后，当劳尔·卡斯特罗开辟的东方路线，也即第二战线迅速打开局面以后，当菲德尔·卡斯特罗亲自统帅的第一纵队，在阿尔梅达指挥的第三纵队的协同下，开始对圣地亚哥城形成了进击态势以后，菲德尔·卡斯特罗殚精竭虑，仔细的运筹和磋商，在后来的运筹和磋商中，新成立的又一个纵队的司令员，在起义军中最被人喜爱的小伙子卡米洛·西恩富戈斯，也参加了进来。

卡米洛·西恩富戈斯，是卡斯特罗带领的从《格拉玛号》登陆的八十三名起义军几乎全军覆没在第一场遭遇战后硕果仅存下来的十二名勇士之一，是卡斯特罗最为信任和忠勇的战士之一。是一个打起仗来特别勇猛顽强而且

极为动机灵活的作战能手。1957年7月间，当切·格瓦拉被任命为第二纵队，也称为第四纵队的司令员时，卡米洛·西恩富戈斯，以上尉军衔，被任命为格瓦拉纵队的突击队的突击排和前卫队的“巨头”。在格瓦拉纵队的战斗中，屡建大功，因此，不仅深被格瓦拉器重，而且也日渐被卡斯特罗所特别地看重。

后来，在战斗的过程中，有一度，切·格瓦拉被卡斯特罗调回到他身边，以便协助菲德尔在总司令部的工作，于是，原先由切·格瓦拉领导和指挥的第四纵队，就交托给了卡米洛·西恩富戈斯来指挥和领导。卡米洛·西恩富戈斯便也成为了起义军第四纵队的军衔升为少校的司令员。

后来，当菲德尔·卡斯特罗决定从实力强大的第一纵队，再分出将近一半的人马，组成了一个战斗纵队，也就是起义军的第八纵队时，菲德尔·卡斯特罗又命令切·格瓦拉出任了这个新建的，比第四纵队战斗成员多出将近一倍的第八纵队的司令员。

接着，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和切·格瓦拉，以及卡米洛切磋运筹一番之后，就下定了一个更大的决心，作出了一个更为大胆的战略性的伟大决策。

菲德尔·卡斯特罗决定，在崭新的革命发展形势中，必须采取更为可以利刀斩乱麻的摧枯拉朽的伟大战略步骤。决定由切·格瓦拉统帅他的，拥有将近一百四十人的武器比较精良起来的第八纵队，与卡米洛统帅的拥有八十多人的，原先由格瓦拉指挥的第四纵队，走出马埃斯特腊山区，走到古巴腹地的平原上去，长途跋涉，快速疾进，穿过奥连特省的广阔平原，再穿越古巴土地面积仅次于奥连特省的卡马圭省的从东到西的全部地域，然后进入拉斯维利亚斯省，接着进入到拉斯维利斯亚斯省的，有如马埃斯特腊山区广阔的山区，在那里建立起完全崭新的根据地来。

这样的战略决策作出以后，从1958年8月末的最后一天，开始了果决的实施。敌人把起义军准备走过的交通道路上的机动车辆，差不多全部放火烧毁和破坏掉了，起义军的部队，只能拖着必不可少的必备的后勤给养和作战装备，骑马或步行，开始长途跋涉，风餐露宿，不停地经受着狂风夹着暴雨的袭扰，赤着脚穿过漫长的烂泥滩地，晚上宿营的时候，每个起义军士兵裸露的躯体，几乎无处不成为足有半寸长的黑蚊子嗡嗡飞来吮血的场所，后来敌人的飞机拦截轰炸，破坏了起义军行军部队的给养和装备，行军的队伍完全断了粮草和盐，每个人几乎尝到了连续多天吃不到盐，生吃马肉、兔肉的痛苦滋味，行军中的多少硬汉和英雄倒了下来，有多少人倒下了再也爬不起来，再也没有起来。但是，部队为了生存，为了发展和胜利，还要马不停蹄地拼力疾进。纵队司令员切·格瓦拉，多少年来，始终如一日一般，与战士们完全是同甘共苦，绝无任何的特殊和被优待的享受，因此，在这一回长途跋涉疾进的路上，也不止一次被疲累和饥饿击倒，被身体里严重缺少盐分所带来的软弱所击倒，他竟在跋涉行进中困乏地睡着和晕倒过多次。只是经过了抢救，他才度过了险关。

当然，在这次长途跋涉的突击疾进中，切·格瓦拉带领的部队，不管在多么困顿疲劳的情况下，总还是要奋起和不断阻截的，有时候势力强过自己的强悍的敌军作战，不断地付出牺牲和流血的代价。

然而，无论如何历尽了千辛万苦，有着坚韧不拔，顽强卓绝的切·格瓦拉统帅着部队，他所带领的第八纵队，终于胜利地完成了他们预定的行军任务，终于胜利地到达了他们预定的到达的战略地域。

在格瓦拉纵队和卡米洛纵队胜利到达青青的拉斯维利亚斯山区之后，本来，照着预定的步骤，格瓦拉统帅的第八纵队，可以在这里盘营扎根了。而卡米洛带领的纵队，还应该继续行军疾进，然后再穿过马坦萨斯省，穿越哈瓦那省，最后再进入到比那尔德里奥山区去，在那里也开拓一处游击根据地。

但是，当格瓦拉指挥的第八纵队，和卡米洛指挥的第四纵队，分别从两个方向，进入到拉斯维利亚斯山区的南北两边时，他们所面临的战斗形势，开始迅疾地发生着变化，在第八、第四两个战斗纵队的面前，出现了极为可以寻觅和把握的战机。

这时候，安坐在哈瓦拉的巴蒂斯塔反动政府军的将军们，已经在那里再也安坐不住了，他们开始手忙脚乱，举止失措地大肆调兵遣将，迅速地在拉斯维利亚斯省内布署重兵，并且不断地用装甲运兵车，把经过精心训练的战斗部队的坦克大炮，运输到了拉斯维利亚斯省来，特别加强了省城，古巴第三大城市圣克拉腊的武装防卫。这样，在古巴革命起义军来说，事实上就拥有了绝好的战斗对象，就有了可以下口人胃的肥肉。虽然，巴蒂斯塔政府军，当时迅速调入拉斯维利亚斯省的兵马，既有坦克，又有大炮，而且全都是美国帝国主义“援助”巴蒂斯塔政府的最精良的武器。而当时开到拉斯维利亚斯省的切·格瓦拉指挥的第八纵队和卡米洛·亚恩富戈斯指挥的第四纵队，统共加在一起，也还不过二三百人。但是，他们毫不畏惧强大的敌人，而把这样的强大的敌人，视作是可以吞食的美味和佳肴。

他们通过无线电讯工具，向已经逼进圣地亚哥城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作了内容仔细和计划周详的新的作战意图的汇报。菲德尔·卡斯特罗完全同意和赞赏格瓦拉与卡米洛的新战斗方案。卡斯特罗深知格瓦拉和卡米洛指挥战斗的能力和水平，完全授予他们决战的全权，一任他们决断指挥行将在拉斯维利亚斯省展开的巨大战役。

于是，古巴革命史上一场最为震撼人心，惊天动地的，暴风骤雨般的，摧枯拉朽的激战，在拉斯维利亚斯省，迅速地拉开了激动人心的序幕，并且迅速地把一场奋起夺取古巴国家政权的大戏，令人眼花缭乱，简直是难以想象，几乎是不可想象地推向了高潮。

仅仅是二百多人的古巴革命起义军，在切·格瓦拉和卡米洛·西恩富戈斯两位少校指挥下的两个小小的，加在一起不比一个战斗的加强连的人手更多的战斗纵队，一级一级地开始打大仗，吃大肉，啃硬骨头。

进入1958年12月16日，格瓦拉和卡米洛联合指挥两个纵队的起义军，突然奋起攻打巴蒂斯塔政府军戒备森严的福门托镇。这里是一拥有一万多居民的城堡，格瓦拉指挥两个纵队的战斗成员，在敌人还不知不不觉的状态下，就已经攻入了城内，然后展开激烈的巷战，经过几乎整整两天激战，毙伤大量敌人，逼使余下来的一百四十一名守军全部交械投降，有意思的是，起义军在这次战斗中，伤亡人数几乎只是零。

在这里一场恶战以后的又四天，格瓦拉、卡米洛指挥的起义军，简直完全不让巴蒂斯塔政府军稍有喘息。12月8日结束福门托镇之战，12月21日，起义军又展开了攻打拥有将近有两万居民的卡瓦伊古安城，起义军仍然是迅速地潜入城内，展开逐屋争夺的激战。

在每一次战斗中，包括每一次的近战和激战中，格瓦拉绝对身先士卒，指挥在前，战斗在前。在卡瓦伊古安城的激战中，格瓦拉跳到一间二层楼的房顶上去，指挥冲击作战的起义军战士，由于当时战斗激烈，他脚下一闪失，

从二层楼的屋顶上摔下来，脑袋前额上摔破了一个流血的大口子，最遭糕的是他的左臂，摔成了粉碎性的骨折。剧烈的疼痛，立刻使他痛苦难忍，但是，他叫来随军作战的军医，由他自己靠他所具有的外科医生的技术知识指点，让军医给他进行了包扎，并把伤臂打上了石膏。然后又挽一个吊带把伤臂吊在脖子上，继续投入了战斗指挥。

卡瓦伊古安城在一日之内拿下来，又是毙伤俘获数百名敌军。欢迎起义者的老百姓，和一向在战斗结束后总是被宽大处理和优待释放的政府军士兵，也包括一些下级军官，纷纷要求志愿加入起义军的队伍。起义军在战斗中，更加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起义军现在完全有的是美国造的，本来是美国佬援助政府军的精良武器，可以充分地用来武装要求参加起义军队伍的人民。

1958年12月21日，格瓦拉在战斗中摔伤骨折，但指挥部队拿下了卡瓦伊古安城。负伤的格瓦拉，这一天绝不安排自己来休息一下，他也不让自己指挥的部队休息，在卡瓦伊古安战斗结束，战场还不及打扫以后，他又指挥部队连夜行军，在12月22日拂晓之前，把部队拉到了距离拉斯维利亚斯省省会城市圣克拉腊只有三十五公里的，拥有三万多居民的普拉赛塔斯城，部队连续作战，马上展开进攻，经过一整天的激战，在黄昏到来的时候，这里的守城军队也打起了白旗，向起义军宣告了投降。

在普拉赛塔斯城里，格瓦拉和卡米洛商量决定，让起义军略事休整。但休整的时间没有超过一天。勇于连续作战，趁热打铁的格瓦拉，马上又指挥他的纵队，迅速进袭和包围了除了省会圣克拉腊之外，拉斯维利亚斯省的另外最大的城市，拥有将近十二万居民的桑克斯皮里图斯城，当然这里又是一场浴血争夺的激战，攻坚战持续了两天，仍然以政府军的完全败北和无条件投降而宣告结束了这里的恶战。

接下来，已经有机动车可以运载部队的切·格瓦拉指挥的第八纵队，毫不迟疑、毫不延误战机地展开了通向圣克拉腊的最后一个卫星城雷梅迪奥城的冲击，从现在开始，巴蒂斯塔的政府军，进入了兵败如山倒的状态，起义军所向披靡，切·格瓦拉指挥的第八纵队打到哪里，那里的敌军便纷纷交械投降，或者争命地弃械望风逃窜。

从1958年12月27日开始，切·格瓦拉开始组织指挥第八纵队的全部战将和勇士，进入到了主攻圣克拉腊城的战役前阶。第八纵队在几天内，摧枯拉朽消灭了近千名巴蒂斯塔政府军之后。

自己的队伍业已发展成了一支拥有三百多名战斗成员约武装力量。而且，这三百多人的武装力量，现在已经完全变成了装备精良的机械化部队了。全部战斗成员现在行军已经拥有了载重汽车，而切·格瓦拉也开始坐上了轻便的指挥车：吉普车。

12月28日中午，切·格瓦拉的指挥所，已经设置在可以俯瞰圣克拉腊全城的卡皮罗山的山腰间。巴蒂斯塔政府军在圣克拉腊的防卫阵地，已经尽收眼底，历历在目。敌人在那里修筑了相当坚固的工事，在阵地上有两辆坦克车摆成犄角的阵势，在那里不远的地方，还停靠着一列车厢很多的铁甲列车，列车上配置着许多令人羡慕的重武器，比如火箭炮，迫击炮和可以用来平射的，威力巨大的高射机枪，装甲车上载着足有四五百名战斗的兵员。

当时已经查明，指挥这一方阵地作战部队的政府军指挥官，是一个名叫罗塞尔·莱瓦的上校。

乍一看上去，格瓦拉的纵队，在这里可能是碰上了难以进取的，固若金汤的阵势。

然而，登上卡皮罗山腰指挥所阵地的切·格瓦拉，一见这阵势，便悄然笑了，他连声说：

“很好！”

“很好！”

格瓦拉迅速下达命令。他下达的第一道在此一役中的作战命令，不是马上向正面的敌人展开猛烈的进攻，而是命令他手下的一名善于猛打猛冲的上尉，赶快率领一部分战斗成员，赶快离开主攻阵地，绕到远处去行动。

格瓦拉命令那位上尉说：

“你带领你的排，赶快绕开去，绕到敌人的铁甲列车的退路上去，把它们退路的铁轨炸掉。敌人的铁甲列车既然开来了，就不能让它再逃走。”

上尉坚决执行了格瓦拉少校的命令，他很快便完成了任务，迅雷不及掩耳地炸毁了大段敌人铁甲列车的退路。

然而，奇迹马上鬼使神差地出现了。格瓦拉一下炸掉铁甲列车路轨的命令，他手下的上尉刚刚带人炸掉好大一段铁甲列车的路轨，满载敌人强兵壮马重武器的铁甲列车指挥员，便迫不及待地下达了退走逃跑的命令，妄图夺路而逃，他指挥机车全速开进过来，正当车轨被炸断的时候，高速行驶的铁甲列车冲过来，于是接下来便是一阵轰隆隆爆炸的声响，二十二节铁甲列车的车厢，轰然间统统翻转过来。从翻转过来的车厢里连滚带爬爬出来的四五百名巴蒂斯塔政府的强兵壮马，就统统作了那位指挥一排起义军战士炸断敌人铁甲车退路的上尉和他的战士们的意外收获的副产品，一个又一个肥肥胖胖的俘虏。

这还不算，敌人翻转过来的铁甲列车上，还载有着火箭炮，迫击饱和机关炮，起义军的士兵们，立刻又操起这些家伙什来，让火箭炮射向敌人的坦克，让迫击炮射入敌人阵地的掩体，让号称高时机枪的机关炮，也像秋风扫落叶一般，横扫起敌人坚固阵地上的敌人来。

敌人在圣克拉腊的城防阵地，几乎就这样在格瓦拉的谈笑指点间，就被瓦解了，摧毁了。格瓦拉指挥他的第八纵队，立刻攻击进入城内，把城内的各处守敌，包括兵营、警察局、市政府和司法厅大厦、都分割包围起来，然后开始各个击破。

巴蒂斯塔这个屠杀古巴人民，双手沾满鲜血的屠夫，在哈瓦拉密切注视着圣克拉腊的战事，这里的巨大的败迹，完全动摇了他的反动统治的根基。于是，他气极败坏，丧心病狂，开始歇斯底里大发作。他遥控指挥着圣克拉腊的战事，这里的惨败使他绝望到了极点，他期望着最后转机，想从撤掉他手下的司令官开始，他马上电令把圣克拉腊城的城防司令查维亚诺将军撤职，任命一位名叫卡西利亚斯·伦普伊的上校为城防司令，然而，这个家伙，原本是一名臭名昭著的屠杀游击队员的屠夫，他知道起义军对他更深仇大恨，于是，接到城防司令的任命立刻怯阵，立刻开小差离开“莱昂西奥·比达尔”兵营逃跑，结果，他难以逃得出去，被起义军抓住，就把他枪决了。

圣克拉腊城的守敌，还有很大的残余力量。他们最后盘踞在“莱昂西奥·比达尔”兵营里，他们还有两名巴蒂斯塔政府军的上校，九名中校和少校，十名上尉，统领着近千名战斗武装人员。

格瓦拉力图尽可能避免付出宝贵的起义军士兵流血牺牲的代价。他脖子

上吊着打着石膏绷带的伤臂，右手始终握着一支随时准备开火的机关枪。他站在已经占领的市广播电台的播音间里，向圣克拉腊城最后的残敌发出严格的规定时限的最后通牒的投降命令。格瓦拉并且大胆地派出他手下的两名助手，驱车进入敌军仍然盘踞的兵营，和敌人进行劝降的谈判。残余的守敌还想要耍花招和拖延时间。格瓦拉最后发出命令：不投降即令开火歼灭。

这样，圣克拉腊城的守敌，最后接受了无条件的投降。

而这样一来，巴蒂斯塔反动政权的国家机器，几乎同时也就从此完全进入了最后上崩瓦解的阶段。

1958年12月31日，巴蒂斯塔的军队参谋总长塔维尼亚向巴蒂斯塔报告，由于政府军在拉斯维利亚斯省和圣克拉腊的惨败，全部政府军的四万军队，已经完全崩溃，完全丧失了战斗力，武装部队已经完全不能阻挡切·格瓦拉的战斗纵队进入哈瓦那了。

巴蒂斯塔知道他的末日来到了，必须迅速出逃才能保住性命，于是，马上席卷起他从古巴人民血汗中榨取来的巨额财宝和金银细软，同时带着他的一大批最亲信的走狗，一些将军、部长、特务和刽子手，连夜登上飞机，向美国逃跑，惶惶地跑到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所在地吉弗尼亚洲去了。

而此时，留在哈瓦那的一个巴蒂斯塔分子，一位名叫坎蒂略的将军，亲自把巴蒂斯塔送上飞机，祝愿独裁者一路平安以后，他忽然又异想天开，谋图在哈瓦那宣布政变上台，以代替巴蒂斯塔的空缺，阻止古巴革命起义军向哈瓦那的进军。

格瓦拉和卡斯特罗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卡斯特罗立刻向格瓦拉指出巴蒂斯塔分子坎蒂略将军的阴谋，严令格瓦拉率领起义军迅速向哈瓦那进军，并完全夺取和占领哈瓦那。切·格瓦拉早已命令部队作好了如此的战斗行动准备。于是，用刚刚夺来的坦克，炮车武装起来的格瓦拉纵队，完全以高速机械化的步伐，有加滚滚铁流般地冲向了哈瓦那，并且在1959年1月1日凌晨时分，开始进入到哈瓦那的市区，迅速扫清了哈瓦那“卡瓦尼亚”要塞最后残存的巴蒂斯塔军队。

1959年1月2日，一直在协同格瓦拉纵队作战的英雄的卡米洛指挥的第四纵队，也开进了哈瓦那，并且攻占了哈瓦那的“哥伦比亚”军营，和格瓦拉的纵队，牢牢的控制了美丽而迷人的古巴首都。

在这大体上的同时，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东方战线攻克了古巴的第二大城市圣地亚哥，并最终解放了东方诸省。

1959年1月7日，古巴革命无可置疑的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飞到了哈瓦那。

古巴革命完全胜利了。

然而，胜利的日子，远不比战斗的日子清闲。远不比战斗的日子更轻松。

何况，切·格瓦拉在进入哈瓦那，事实上成为古巴革命进入哈瓦那的第一个最高代表，第一个铁的权力的象征，事实上的城防治安和一切秩序的最高司令，他的权力和责任重担，一时显得实在太沉重，也实在太沉重了。

所有的巴蒂斯塔政权的部长、将军、上校、特务、刽子手，和形形色色罪恶的歹徒，死顽到底的种种反革命分子，反动分子，统统已经逮捕，监押在格瓦拉充当要塞司令的要塞里。

于是，一时，格瓦拉成了几乎哈瓦那所有的人包围的对象。

庆祝解放，欢庆胜利的人民热情地包围着他；

接受各种指令和行动命令的起义军官兵们在无时不刻地包围着他；

名界人士，包括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好的，坏的，和不好不坏的，和也不知道难以断定是好是坏的政治家、政客、党派活动家、文化人、外国人士，也都纷纷包围着他。

最个人头痛的是来他这里说情的，讨官的，奉承的一些说客和令人哭笑不得的家伙。

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古巴本上和外国的，电台、电视台、报纸、刊物，种种媒体的有良心和正直的，或者是黑着良心，昧着良心，歪门邪道的记者们，形形色色的记者们、录音的，照相的，帮忙的，捣乱的，给你搭桥开路的，给你挖好陷阱让你跳的，种种种种，这是最难缠的一些男女，而且，他们总是不招自来，挥之不去，轰之不去，难缠的令那些缺少应付经验的人，简直应付不了。

显然，在胜利的日子里，切·格瓦拉忙乱的简直脚打后脑勺，忙乱的全然不可开交。

而正在这样大忙其乱的时候，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又别出心裁，忽然闹出一出惊人的大喜剧来，他完全是出于一种人道主义的，兄弟般的友爱之心，在哈瓦那机场被卡米洛的纵队管制以后，那里停着几架闲置的同时是完好的飞机，卡米洛忽然想出一条妙计，调了一架飞机就飞到阿根廷去了，然后，他就把思念儿子，眼泪都哭干了的格瓦拉的母亲塞利亚，从那里接到了哈瓦那这里来。卡米洛想令切·格瓦拉获得一个突然的惊喜。然而，事实上，事情显然很糟糕。卡米洛通知格瓦拉到机场接人，所接的人一下飞机，格瓦拉认出来是经别多年不曾见面的亲爱的妈妈。他的母亲，当然也一眼从出了早日认定已经生离死别的儿子。结果，在机场上就出现了令人心碎的最悲壮的一幕，格瓦拉投入到母亲的怀抱中去。母亲呼唤着格瓦拉的小名：“泰泰——！”“泰泰——！”

妈妈禁不住悲恸万分地哭泣，悲泣出声。

身经百战，饱经血火洗礼的切·格瓦拉，不禁也落下泪来，紧抱妈妈一时喘不上气来，呼喊道：“吓！吓！妈妈！亲爱的妈妈呀！”

切·格瓦拉呼喊道，大声地喘气，大声地呼喊道，但他终于呼唤不出声音来了，他的哮喘病，他的从孩提时候就因过敏症引起并坐下根的哮喘病，突然又严重的发作了。

格瓦拉和母亲一起，被送到了格瓦拉的住处。

格瓦拉在哮喘病发作的同时，由于许多日子以来的连续作战，没日没夜紧张的战斗和工作，他也许是疲劳过度，也许是亢奋过度，总之一定是生理机能超负荷过度，他开始突然出现了严重的失眠症，一连三天五天，除了哮喘发作，不断的喘息抽搐以外，他简直一刻也得不到安静和休息，而打扰他的工作事务，繁忙的繁重的工作事务，以及众多的，众多的种种人物的来访，仍然一刻也不中断。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终于完全支撑不住，完全地垮了下来。

医生命令他必须找一个地方，要躲到一个最安静的地方去休息和静养。

可是，到那里寻找这样的，可以躲身静养的去处呢？

他的助手们忽然发现了一个地方。

原来，就在卡瓦尼亚要塞的辖区之内，有一方叫作是塔格拉的别墅区。那里临近海滩，筑有一幢又一幢，鳞栉比别墅小楼，是巴蒂斯塔政权专门为

那个政权统治和压迫人民的权贵们修建的，是供他们休闲和避暑的地方。由巴蒂斯塔政权的倒台和时下还不是旅游度假的季节，这一大片别墅小楼都还空置着。

所以，格瓦拉的助手们，提议请格瓦拉来这里，挑上一套别墅小楼来住。

格瓦拉接受了这个建议，来这里准备挑一坐小楼暂时借住。可是。他来这里只挑一下，他立刻惊骇不已，几乎完全被吓住了。这些别墅小楼，几乎一坐比一坐排场、豪华和讲究，楼内的设备，简直是齐备万端，应有尽有。

格瓦拉一边参观，一边摇头：简直不敢相信曾经在这里享乐的老爷们会如此奢侈。让格瓦拉现在住进这样豪华奢侈的别墅里来，格瓦拉肯定自己会更睡不着觉了，肯定会无以复加地不得安生的。

于是，格瓦拉坚决拒绝搬到这样的别墅来居住。

后来，终于找到一座比较朴素的小楼，据说是当年别墅区守备队长的官邸和居舍，因此，谈不上豪华和奢侈，格瓦拉这才同意暂借居住这一栋小楼，在这里住下来养病。

后来，他的病好了，哮喘发作减轻，失眠症也克服了，他立刻便退出了这栋别墅楼，回到他原来的兵营司令官的不大的平房套房里来居住。

他的助手们力劝他仍旧住在那栋条件事实上也相当好的别墅楼内，格瓦拉却坚决拒绝说：

“住在那座楼里，离起义军的战士们太远了，离古巴的住茅草房的大多数人民也太远了，所以，我不住，现在不住，将来也不住，坚决不住，等古巴的人民群众，工人、农民都能住上那样的漂亮房屋的时候，我们再住那样的房屋也不迟。不然，现在这里的房子不会塌下来，人是会塌下来的，人的心是会塌下来的。”

纳赛尔指示破格接待格瓦拉

切·格瓦拉，在古巴，在后来，影响越来越大，名声越来越高，职位越来越显赫，但是，他的所有一切行迹，仍然磊落透明，一如当初。他从来不事奢侈，鄙夷一切靡靡，不仅仅是珍惜国家的每一个比索，甚至十分严格地珍惜着国家的每一支铅笔，每一张纸。他绝不允许有任何浪费，对所有的奢侈、靡靡、浪费的败家子现象，他都嫉恶如仇，他仍然一如既往，保持着不仅仅是朴素的生活，而且简直甚至仍然是艰苦的主活，他保持着绝对的清廉，他虽然是国家的银行行长、工业部长、计划委员会主席，国家和党的最高领导成员，掌管着整个古巴国家的所有金银和财物，但他本人，他自己，几乎仍然可以说一直还是一贫如洗。他仍然靠着领一份少校的工资养家糊口，维持家庭的经济生活，仍然是粗茶粗食，穿衣戴帽，也极不讲究。还是在马埃斯特脂山区打游击的时候，格瓦拉就在他的纵队控制的地区，兴办过起义军的被服厂，在格瓦拉的建议和指点下，那里的被服厂裁缝师傅，作出了一种软帽，当时那种帽子，被起义军战士们戏称为是“瓜吉罗帽”，所谓“瓜吉罗帽”，是加勒比海地区人们对公共汽车司机的一种昵称，因此，所谓“瓜吉罗帽”，自然也就成了一种昵称，当时生产的第一顶这样的瓜吉罗帽，首先是送给了菲德尔·卡斯特罗戴在了头上，后来，切·格瓦拉也配置了一顶这样的无沿的“瓜吉罗”软帽，而从此以后，这种帽子，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的头顶，古巴革命胜利以后又许多年，他一直还总是戴着这种样式的帽子，也许这有一点儿恋旧的情结，这可以从他穿的鞋袜上考察，他穿着的大兵靴，一双一双接着穿，每一双几乎都穿得很破很旧，他也不会抛弃。而且，他一直始终，似乎一以贯之，总是穿着这种靴子。虽然在古巴革命胜利后，在有一次出访外国的时候，他曾买回来过一双回力牌球鞋，穿起来十分轻便，因此他总是穿了又穿，喜爱不止，而且，后来这双回力牌高腰球鞋，他也穿得又破又烂，绝对够本，但他也还不肯抛弃，每上运动场，网球场参加锻炼时，虽然露着脚指头，他却仍然常常总是穿着这双旧球鞋。

切·格瓦拉如此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节俭清廉的生活习惯，在他的家庭的居住条件，他本人的居住条件方面，自然也一直绝对不是奢华的。他在工业部的办公室，始终只是一间仅有十二平米的小屋，他既在那里办公、学习，也在那里接见各种各样的来访者，同时他也睡觉和休息在这十分简朴的小办公室里。

切·格瓦拉，是没有养成过十分舒适的华室之居的生活习惯的。

然而，现在，1965年的2月11日，当他出国访问，来到埃及，来到开罗访问时，纳赛尔总统却亲自指示，要破格接待切·格瓦拉，一定要安排他到开罗最高级的谢泼德饭店的最漂亮，最豪华的总统套房里来居住。

切·格瓦拉客随主便，接受安排，住下来了。

但是，一住下来，一住进如此豪华、排场、宽大，简直难以想像的宫殿一般的客房和居室，格瓦拉就严重地不安起来。

他马上操起电话来，亲自给他早已熟悉的，他也早已视之为可以信赖的朋友的纳赛尔总统的有部长级资格的亲密助手和秘书哈桑·霍利先生打电话，再次向这位先生表明，他格瓦拉本人，此行到开罗来访问，最主要的目标并不是要完成什么重大的国事使命，而主要的目标，有一半是为着作正式的，专门来看朋友，专门来探望纳赛尔总统的。所以，格瓦拉提出请求，对他的接待不要大破规格。不要安排他住在仅供外国元首来访埃及时才能居住

的最高级的房子。

格瓦拉在电话中，说的很恳切，甚至有几分激动。

纳赛尔总统的秘书，哈桑·霍利先生以阿拉伯人特有的教养，非常安然，静默地听完切·格瓦拉在电话中的陈述和请求。但他在电话的那一方，马上传来了“嘿”然一声的笑声。

接着。哈桑·霍利先生开始给切·格瓦拉解释说：

“尊敬的切·格瓦拉先生，我已经向您表达过，对于您的这一次开罗访问，纳赛尔总统非常强调的一个明确的指示是，要破格给予您以国家元首级的规格接待。所以，我们对您下榻之处的安排，完全是遵照纳赛尔总统的指示来办事的。因此，也是非常适合的。”

切·格瓦拉在电话中再问一声哈桑·霍利先生：“先生，您“能告诉我，纳赛尔总统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什么吗？”

在电话中，哈桑·霍利又是一声“嘿”然的笑。接着，他说：

“格瓦拉先生，纳赛尔总统指示我们说，对古巴革命的主要领导人来访，我们一定要给予破格的接待，他还特别指出，只要你们来开罗，一定要安排住进最漂亮、最豪华、最好的房子里去，他特别强调这一点，而且要求我们必须非常认真地照他的这个指示办，绝对不能差错。”

哈桑·霍利温文尔雅，在电话里非常郑重地说着。

切·格瓦拉听着，有几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起来。于是，他也不禁一笑，却还是又问了一问：

“纳赛尔总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还是不能明白。”

哈桑·霍利在电话那边说：

“纳赛尔总统也许是因为有气，才一定要这样来作，他好像不无赌气的成分这样来做，想特别让一些人看春，想特别让一些人不舒服吧。”

切·格瓦拉仍然听不明白其中意思。而且，最后哈桑·霍利先生在电话中对他说的话，几乎使他更摸不着头脑，难以明白其中意思了。但，他知道也许不便再问什么，他搁下了电话，然后便在谢泼德饭店十一层宽敞的辉煌的，宫殿似的总统套房里，纵横来去，大散其步起来，他一会儿走上有花园的凉台，一会儿产生游泳的冲动，但是他马上想到了他可怕的哮喘病。他不能游泳，因为他的哮喘病，就是在他两岁那年，正是在一次游泳池里跟着母亲学游泳的时候，突然发作，罹患痼疾在身的。

他不能随便游泳。

他突然想到，为什么不请奥斯马尼·西恩富戈斯·戈里亚兰来这里游泳呢？

于是，他马上打电话，请戈里亚兰到他的总统套房来游泳。

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全国领导委员，负责国际联络工作的领导人戈里亚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离开后，继续陪同切·格瓦拉来非州访问。切·格瓦拉在古巴革命胜利后的核心领导层中，一直是分管和负责外交和对外联络的工作事务的，所以，戈里亚兰同志，也是他多年以来的工作非常默契的亲密助手。

戈里亚兰被安排在另一层楼房里的也是一套宫殿般的房子里，在他的那一套房舍里，也有花园凉台和室内游泳池的设施。但是，当切·格瓦拉请他到他的这套房子里来游泳时，戈里亚兰还是马上来了。

戈里亚兰开始下池游泳以后，切·格瓦拉就站在游泳池岸上观赏。后来，

他任戈里亚兰自由地游动，自己绕着游泳池的旁边，继续散起他的步来。

一边散步，他一边又在想起此次来访开罗，纳赛尔总统为什么一定要对他如此破格接待的问题来。特别是，纳赛尔总统本身清廉节俭的美德佳话世界驰名，世人皆知，怎么此次格瓦拉来访他偏偏要格瓦拉排场一下，为什么一定要格瓦拉住到如此豪华的居处来呢？

格瓦拉简直百思不得其解。他实在难解其中包含着什么意思，而他知道，了无意思，了无思想的事情，纳赛尔总统是绝对不会办的。

埃及和古巴息息相通的脉络

早在 1959 年的 5、6 月间，那是在古巴革命刚刚夺取政权仅仅几个月之后，菲德尔·卡斯特罗就派遣切·格瓦拉出国作重要的国事访问。那一次，切·格瓦拉首途访问的国家，便是埃及共和国。

从那一次访问开始，切·格瓦拉就已成为了纳赛尔总统的，感情非常赤诚深挚的朋友。从那一次访问开始，他们就有了一种由衷真挚的，兄弟般的私人感情，从那一次访问开始，他们成了非常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的知己和至交。

开始的时候，早已名噪于世的二十世纪阿拉伯世界最伟大的英雄人物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便是后起的古巴革命英雄们非常尊敬和崇拜的一个伟大的偶像。

早在 1952 年，当埃及军队拥有中校军衔的的纳赛尔，和另一名拥有埃及军队少校军衔的阿密尔，两个人各持一把左轮手枪、虎彪彪地进入埃及军队总参谋大楼，把枪口对准着埃及军队的最高指挥官，首先夺取埃及武装部队的军事指挥权，进而开始有条不紊地调动由埃及军队早已产生的秘密组织，在军官俱乐部的活动场地上组织起来的，自由军官组织的年轻的校官们指挥的军队，包括一支装甲兵部队，迅速地开进开罗，迅速占领所有的中枢和要害的部门和地域，然后，封锁一切公路和通道，占领国家电台和所有媒体组织，占领国家通讯枢纽中心，掐断和控制一切电报、电话，进而占领国家政府大厦，包围王室宫庭宫邸，接着派出早已训练有素的包括一些情报军官在内的专员，分赴包括美国英国大使馆在内的各国驻牙罗使馆，在国家电台宣布埃及自由军官组织军事政变成功，已经完全掌握国家政权和控制国家局势的消息的同时，专员们向各国大使馆进行通报；同时宣布保护各国在埃及的利益，警告任何国家不得干预埃及的国家内政。

最初，加麦尔·阿卜勒拉·纳赛尔，就是如此，领导埃及自由军官团的年轻的校官们，近乎是轻而易举地，差不多是兵不血刃地夺取了埃及根深蒂固的庞大的法鲁克王朝和这个王朝的五脏俱全的国家机器所拥有的统治国家的权力。

接着，随着昏庸而荒淫无耻极为肮脏的法鲁克国王被逼迫退位和被“体面”地放逐，而后，统治埃及历史长达一百五十年的穆罕默德·阿里王朝寿终正寝，古老的埃及正式宣布成为共和国，一颗灿烂的明星耀眼地出现在新埃及的上空，纳赛尔在 1954 年的岁尾，不仅仅再只是以 1952 年 7 月开始的军事政变以来，实际上掌握着埃及命运的自由军官组织的领导人亦即革命委员会主席的身份，领导和掌握着埃及革命发展事宜，而且现在完全以埃及的国家最高的领导人的正式身份，掌握和领导了埃及在二十世纪历史海洋中航行的舵盘。

早从这个时候开始，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就完全成为了一个已经震动世界的世界知名人物。他的英名和创造世界奇迹的壮举，已经传遍了全世界。并且，在地球的另一面，在拉丁美洲，他已经特别地成为了拉丁美洲未来在革命斗争中成名也将震动世界的诸多未来的英雄们的心扉，这期间特别包括着菲德尔·卡斯特罗和格瓦拉这样的当时的拉丁美洲勃勃雄心烈烈燃烧着的青年革命者，无疑，从那时候，或者从那时候前后开始，纳赛尔对卡斯特罗和格瓦拉这样的拉丁美洲的青年革命者，开始产生着无可置疑的影响，产生着巨大的鼓舞。

1952年，7月19日，纳赛尔和他的亲密战友阿密尔，各持一把左轮手枪进入埃及的最高参谋本部夺取军事指挥权，拉开了埃及革命的序幕。在纳赛尔的指挥下，1952年7月26日，纳赛尔另一个亲密的战友毛希丁少校，指挥军队攻打和占领开罗的蒙塔扎和拉斯赛两座王宫，法鲁克国和他的首相阿里·马海尔阁下宣布屈服，同意无条件交出国家政权，这样，1952年的7月26日，也就成了纳赛尔领导的埃及革命胜利的日子。

一年以后，也就是到了1953年的7月26日。在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的古巴，也在这一天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震动世界的革命运动。这就是在古巴哈瓦那大学法学系学习获法学博士头衔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及与他同在该所大学学习的亲兄弟劳尔·卡斯特罗，一起领导和带领一班古巴各大学的大学生，为了谋图冲击和打垮美帝国主义强加在古巴人民头上的屠夫政权，为了推翻美帝国主义豢养的反动的巴蒂斯塔政权，策划了一场攻打蒙卡达兵营，以图夺取武器，掌握武装，实现推翻巴蒂斯塔反动政权目标的行动。

那一年，卡斯特罗是二十六岁，他的弟弟劳尔只有二十一岁。由于他们年纪很轻，完全缺乏武装斗争和战斗的经验，这一次攻打蒙卡达兵营的武装斗争，是以失败的结果告终的。参加攻打蒙卡达兵营的许多大学生英勇牺牲和被杀害了。卡斯特罗和劳尔，是在蒙卡达兵营攻打失败后，古巴人民和世界许多国家人民声讨巴蒂斯塔屠夫政权残酷杀害造反学生的声浪中，被巴蒂斯塔军警在追捕中捕获的，由于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巴蒂斯塔政权不秘密杀害卡斯特罗和劳尔，于是就决定对卡斯特罗和劳尔，以及其他一些攻打蒙卡达兵营的参加者们，进行公开的司法审判。

结果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毫不畏惧这样的审判，在1953年10月16日，在古巴圣地亚哥的法庭上，菲德尔·卡斯特罗，以法学博士自我辩护的权利，面对法庭，面对旁听席上众多的旁听者和诸多新闻媒体记者，慷慨陈辞，进行了后来作为世界的世纪性文献，冠以《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为题的长篇辩护。

这一篇辩护词，成了慷慨激昂地声讨反动的巴蒂斯塔政权的檄文，旁听席上的听众，不顾主审法官的禁止，不时地激起一阵阵的热烈掌声，有的参审法官，完全被辩护词深深打动，完全站到了被审判者的立场上来，审判卡斯特罗的法庭，完全变成了对巴蒂斯塔反动政权的审判，众多的古巴和包括美国记者在内的一些记者，把法庭辩护的录音和辩护词，数万字的长篇文章，从这里的法庭带出去，发表在了许多重要报纸和刊物的版面上。

巴蒂斯塔反动政权，对此又恨又怕，赶忙下令草草结束对卡斯特罗以及其他攻打蒙卡达兵营起义者的审判，并且粗暴凶狠地宣布判处卡斯特罗十五年徒刑，判处劳尔十三年徒刑，把他们关进了松树岛监狱。

但是，接下来，为此而声讨巴蒂斯塔政权的呼声，和声援被难中的卡斯特罗以及其他被难者的呼声，始终不断，从来也没有稍停过，于是，在两年后，在1955年，巴蒂斯塔政权为捞取一点“民主”的好名声，特赦释放了卡斯特罗、劳尔和他们同案的其他二十六名同伴。

然而，被释放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及他的许多追随者，与反动的血腥屠杀镇压人民的巴蒂斯塔政权，是完全势不两立的。获得释放，走出牢狱以后，卡斯特罗与劳尔，以及其他一些同志，马上离开古巴，潜入到墨西哥去，开始筹组新的革命组织。为了纪念1953年7月26日攻打蒙卡达兵营的壮举，

他们新组建的革命组织，就起了个名称叫“7·26运动”。

从那时开始，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及劳尔·卡斯特罗等人，在墨西哥开始了伟大的古巴新的革命的紧张的准备工作，筹备着开始新的武装斗争事宜。

也就在这个期间，菲德尔·卡斯特罗与格瓦拉实现了今他们永难忘怀的历史性会见，并且从第一次会见和相识开始，他们就成为了相互之间永世不违的同志，朋友和兄弟。

当时，格瓦拉是先于卡斯特罗和劳尔来到墨西哥的。

格瓦拉比卡斯特罗小两岁，比劳尔长两岁，卡斯特罗生于1926年，格瓦拉生于1928年。劳尔生于1930年，他们成长的经历有所不同，但他们家庭生活的环境他们曾经共同所处的拉丁美洲的时代背景，却不无有着许多的相似和共同之处。而且，特别有趣的是，这三个后来完全为了拉丁美洲人民，明确指向主要是为了拉丁美洲的穷苦人民，劳动人民和无产阶级献身的伟大革命者，他们各自家庭的种族史上，竟都有过欧洲贵族的血统，都是属于西班牙或爱尔兰贵族移民的后裔，而且，在进入二十世纪他们各自出生的年代里，他们各自的家庭分别在古巴和阿根廷，都是十分富足显赫的大庄园主，是家资十分优裕丰厚的人家。

大约不能排除他们高贵的血统对于他们的这几个分别出生在古巴和阿根廷的年轻人的满腔热血所产生的激情和他们的极度聪明的头脑和个性有着明显的影响。他们对受苦受难的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深刻同情，他们对美帝国主义以及它的走狗们对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残酷的压榨、剥削和统治的愤怒激情、仇视和反抗意识，并不是墨西哥城他们相聚，相识见面才碰撞激发！夹集合起来的。

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

1953年7月26日以前，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哈瓦那大学热心学习和研究法律，以及他后来在其他一些高等学府研究各种各样学问的时候，一开初，他并没有谋图充当一名叛逆的革命者，但是，后来，反动统治者巴蒂斯塔对古巴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屠杀，把他激发成了一个完全彻底的革命者。他的弟弟劳尔，和他的情况经历大体相同，以前甚至是哈瓦那耶稣教会学校的学生，他被激发成为一个革命者，完全是与他哥哥同样的原因。

和菲德尔、劳尔同时期的大学生格瓦拉，1953年夏天，在阿根廷的名牌大学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院毕业以后，他取得了可以行医的资格和文凭。在最初的时候，他满怀热情地想成为一个可以解危扶困的外科医生，他和他一个朋友，一位名叫阿尔维托·桔拉纳多斯的治疗麻风病的外科专家，曾经深入到多数避居在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深山老林里的麻风病院去，热心地进行麻风病的研究和义务巡回医疗。正是在这样的巡回医疗活动过程中，格瓦拉来到了拉丁美洲北端的危地马拉国家的危地马拉城。

当然，在此以前，格瓦拉在中学、大学读书的时候，由于他酷爱阅读的习性，在自然的阅读状态中，他理所当然也阅读到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的大量著作，对他产生着极大的影响，早已经非常深刻的激发他产生了革命的思想、意志和热烈的向往。

来到危地马拉后，其时是1953年的岁尾。在这里被朋友最初介绍认识的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活动家，是一位名字叫伊尔达·加德亚·阿科斯塔的女士。她是秘鲁人，是秘鲁共产党员。

这位秘鲁的女共产党员，热心的帮助格瓦拉在危地马拉城找到了住处，联系了可以维系经济生活需要的工作，并且他们很快地成为了挚友，产生了热烈的爱情。而就在这个时候，在进入 1954 年的危地马拉，酝酿着一场意义重大的革命，同时开始出现了严重危机的势头。

其时，危地马拉在 1950 年的总统选举中，一名很有教养的军人，是危地马拉政府军中一名很有民主思想意识，具有爱国主义倾向的上校，名字叫哈科博·阿本斯。他以很高的得票率，当选了危地马拉总统。

哈科博·阿本斯本人不是共产党人。但是，他在他当选总统的过程中，得到过危地马拉共产党的很有力量的帮忙。

当时，危地马拉共产党创始成立不久，党员人数不多，但是，这个党一成立，在它的创始人霍赛·曼纽尔的组织下，展开活跃而有成效的工作，他们创办了一张党报，报名为《人民报》，热情地宣传劳工联合和维护劳动者的利益，所以在广大危地马拉群众中，这个党和它的党报很快具有了很大的影响。由于这个党和它的党报，对阿本斯的正直和善良以及他的民主意识、进步倾向的热情宣传，使危地马拉广大的人民群众，认识了阿本斯，同时也成了这位阿本斯总统的拥护者。

而阿本斯本人，在他当选总统以后，很自然的也开始接受共产党人的影响和鼓励，他开始制定和执行危地马拉不完全依附美国的政策，竟然也敢于和苏联，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远在欧洲的共产党国家发生起联系，主要是发展起贸易关系来，而后，接着在国内，他也开始制定和实施近乎共产党国家的劳工政策，竟然也兴师动众，大张旗鼓地搞起了土地改革，用赎买的办法，征收属于外国人所有的，本来也大量荒芜闲置着的土地，然后分配给危地马拉的农民。

一个距离美国很近的小国，搞起了这样的模仿共产党国家作法的动作，虽然明显是一种进步的举措，连美国的知识界、报刊媒体，也给以相当的评价和赞扬，但是作对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的制定者们来说，他们开始对危地马拉的变化和举措，提起了密切的重视和注意。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们，开始大量地渗透到危地马拉来，在危地马拉的邻国，也组织起了针对危地马拉的特务网。

事实证明，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的制定者们，并不是完全没有一点儿远见的。他们的警惕，很快被证明不是没有根据和没有必要的。

阿本斯政府在顺利地推行各项进步政策，有了相当的成效以后，他们开始要进一步地进行维护本国利益，限制外国公司在危地马拉贪得无厌的剥削和榨取了。而在危地马拉的所有外国公司，加在一起可以有一个什么样的统称呢？那就是，加在一起，可以统称为美国公司。危地马拉当时的经济命脉，完全掌握在美国公司的手里，是由美国佬独霸着的。而在所有这些美国公司中，最庞大的大鲨鱼，是号称“联合果品公司”的美国公司。

危地马拉这个小国，有一个甜蜜的昵称，名号叫“香蕉国”。它以盛产香蕉出名。它的香蕉，在美国市场上是最受欢迎的。联合果品公司，完全垄断着危地马拉以香蕉为主的果品经营，实际上也统治着危地马拉的经济。美国在危地马拉的联合果品公司，在二十世纪初期已经进入危地马拉，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完全殖民地的经济机构，队一开始，就是美国政府的掌权者们投资和参股经营的利益特别稳固的经济构架，在进入五十年代美国政府的艾森豪威尔作为总统的年代，美国政府中许多重要当权人物，比如国务卿杜勒

斯，中央情报局长小杜勒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洛奇，都从危地马拉联合果品公司定时地获取十分丰厚的利益。由此可见，美国在危地马拉的联合果品公司，实在不是一个可以等闲视之的，不仅具有经济势力，也同时也具有政治势力，直接说是具有着帝国主义势力的公司。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有帝国主义背景和实力的大鲨鱼，危地马拉的阿本斯总统，也要在它头上动土，敢于要给它带上笼头，敢于对它进行限制，敢于要对它征税甚至要将它的一部分，收征为危地马拉国家所有，人民所有了。

这还了得吗？

美帝国主义怎么能容得这样一个小小的香蕉国在它的面前显示力量呢？

从危地马拉仅仅还在搞土地改革的年代，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就开始着手在危地马拉的邻国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组织反对危地马拉的反动势力，他们在那时候，就已经经过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批准，由美国中央情报长艾伦·社勒斯，制定了一个所谓的“帕比隆克赛斯”的行动方案，这个方案制定了美国策划推翻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的各种手段的实施和各种计划的投入。

当阿本斯政府终于要在美国在危地马拉最主要的利益所在，即在联合果品公司的头上有所动作时，美国把这种动作，不仅看作是阿本斯政府在经济方面的挑战，而且也是一种在政治方面显示不驯服的挑战。在美帝国主义看来，这就叫做是在太岁头上动土。

于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们，迅速地更为加大力度地行动起来。他们首先是挖空心思地物色和招募到了一个野心勃勃的，劣迹斑斑的，本来对阿本斯政府心怀不满的退役上校，此人名叫卡斯蒂洛·阿马斯。

美国中央情报局拿出大宗票子来，这个阿马斯上校立即被招募成功，他马上见钱眼开，乐不可支借用洪都拉斯的丛林，从拉美各国招募雇佣军，开始了目的在于入侵危地马拉推翻阿本斯政权的军事训练。

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当时的局长比德尔·史密斯的直接领导下，由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普里福伊为组长，组员包括美国驻洪都拉斯大使惠廷·威劳尔，以及美国驻哥斯达黎加大使罗伯特·希尔和美国驻尼加拉瓜大使托马斯·惠兰，还包括一大批直属中央情报局的联络员和专家，组成了支持雇佣军头目阿马斯推翻阿本斯合法政府的组织领导小组。

但是，卡斯蒂洛·阿马斯臭名昭著，同时也是个无能之辈，他花着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大量资金，重金收买雇来了一百五十名雇佣军，结果，不过是一些散兵游勇，乌合之众，一人危地马拉，阿本斯动员人民和军队进行抵抗，立刻把阿马斯又赶出危地马拉，赶回到了洪都拉斯。

美国佬不甘心让阿马斯失败，开始直接插手，越俎代庖，他们一手包办，以阿马斯武装集团的名义，建立起了高频率的广播电台，对危地马拉人民展开心理战，同时，中央情报局大量编写和印制传单，并且雇用飞行员，驾驶一些“赛斯纳”之类的小型飞机，入侵危地马拉上空，超低空飞行，有的时候扔下一两枚炸弹，有的时候扔下来绑着炸药块的集束手榴弹，轰炸危地马拉城的平民百姓，有的时候，这样的入侵飞机，还扔燃烧弹，引起港口的轮船爆炸，更多时候，这样的飞机大量投下来造谣攻奸的传单，攻击诬蔑阿本斯是共产党分子，已经把危地马拉出卖给了苏联。或者进行恶毒的蛊惑。

为了抗击美帝国主义及它的走狗们的武装入侵和挑衅，甚嚣尘上的捣乱和破坏，危地马拉合法政府的总统阿本斯，在危地马拉人民的拥戴下，一开

始的时候，坚决地领导危地马拉人民进行了绝不屈服的斗争。

危地马拉广大工人，农民、爱国学生和士兵，以及广大的各界进步人士，都积极坚决地支持阿本斯政权，都行动了起来。

危地马拉共产党，在这一场斗争中，更显示了它的活跃力量，它的劳动党成员都响应号召，拿起了武器，投入了保卫危地马拉祖国和阿本斯政府的战斗行动。

当时，拉丁美州的许多进步青年，革命人士，也云集到危地马拉来准备投入支持阿本斯政府，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

当时已经在危地马拉生活和工作的后来成为格瓦拉妻子的秘鲁共产党员伊达尔·加德亚，直接参加了阿本斯政府机构的工作。

其时投奔伊达尔而来到危地马拉的格瓦拉，简直是“遭遇”上了为正义事业而投入献身的机遇。他从一开始，就积极地参与了保卫阿本斯政权的斗争，他报名加入了狙击入侵飞机的防空战斗组织，一次又一次的投入了狙击敌人入侵飞机的战斗。其间，属于阿马斯雇佣军的，同时也是属于中央情报局的两架入侵的轻型飞机被击落在危地马拉城的城防阵地上，这战绩中也许也包含着格瓦拉投入危地马拉斗争中的贡献和功劳。

危地马拉一个小小的“香蕉国”，和庞然大物巨兽一般的美帝国主义斗争，自然绝不是势均力敌。最后，美帝国主义终于通过中央情报局策划的行动，推翻了危地马拉的阿本斯合法政权，终于把中央情报局招募的那一位雇佣军上校阿马斯扶上了危地马拉总统的宝座。

于是，接下来，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们开始开黑名单，指令阿马斯这个驯服的走狗，迅速逮捕革命者。格瓦拉及时地躲身进入阿根廷大使馆，受到本国大使馆的保护，最后又设法逃出危地马拉，在逃生中来到了墨西哥。

1954年9月21日，格瓦拉抵达墨西哥城以后，他像所有从危地马拉逃出的革命者一样，受到了墨西哥渴望民主政治同情进步人士的前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领导的支援危地马拉革命的组织的帮助。

一开始，他被帮助有一个安身之处住下，得到了一些急迫的生活资助。但是，靠着这样的安排和资助，格瓦拉是无法在墨西哥城生活居住下去的。

好在这时候的格瓦拉，已经二十六岁，他已经是一个饱经生活磨练，很有生活能力的思想成熟的年轻人了。

格瓦拉自幼出身南美阿根廷的比较富裕的家庭，他的父亲林奇先生，曾经是很大的马黛茶庄园的庄园主，他的母亲塞利娅，有过大宗的遗产，格瓦拉在幼年的时候，曾经过着极有保障的非常优裕的生活，他从四岁起，便开始读书识字，上中学的时候，都是母亲亲自驾车来去送他上学下学，后来他考入著名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学医，家庭在他的经济生活方面，也从来是给予着十分充足的，优裕的保障。

但是，天性奇特的格瓦拉，从年龄还很小的时候开始，他就对优越的充裕的物质生活相当不予重视，他倒是越来越强烈地倾向重视自身的精神生活，这大约是与他从很小开始，就受到了大量的优秀的文学作品的影响不无关系。母亲的指导，他天性的聪颖，使他从很年幼、粗通文字、初具阅读能力的时开始，就进行了大量的阅读，当然是往往首先从大量的阅读文艺作品开始，在最初的时候，结合着法文法语的学习训练，大量地阅读了法国作家诸多的作品，大仲马、雨果、巴尔扎克的作品，他都爱不释手。后来他的阅读面越来越拓宽，他开始阅读了塞万提斯的《唐·吉柯德》，他阅读到了杰

克·伦敦的小说，更为向往和振奋。他开始崇拜那些心地善良，同情劳苦群众，对所有不义和邪恶的剥削和压迫都嫉恶如仇的，或者是拔刀相助弱者，即使在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也绝不气馁，绝不屈服，绝不示弱的大义凛然伸张正义的英雄，以及在任何艰难曲折，劳顿困苦，甚至流血流汗，甚至在战斗中牺牲一切，献出生命都绝不反悔，绝不自艾，绝不退缩的百折不挠的追求真理的英雄。还有那些在任何的黑暗和一切险恶的环境中，即使忍受着包括难以忍受的贫穷和苦难，在漫长日月的煎熬中，都坚信着崇高理念、崇高意志、崇高品德的崇高的英雄。

无疑，格瓦拉在他最初的成长过程中，在他大量阅读文学书刊的过程中，他备受过这样的文学的崇高禀赋和崇高的人性和崇高情怀的熏陶。

所以，在他很小的时候，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决不甘心于沉迷在优越的可以养尊处优的生活环境中。他渴望着到暴风雨中去磨砺，到艰苦的主活中去锻炼，渴望着靠自己的双脚和双手去独立行走和开拓创造。为此，父母兄弟姊妹的亲情，家庭生活的温暖，甚至初恋的情人热烈的爱情和缠绵的温柔都不能成为他行动的束缚和羁绊。

1951年岁尾，在圣诞节刚过的第五天，1952年的元旦将要来临的时候，二十二周岁的格瓦拉，已经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院的三年级学生。这时候，适逢大学里的寒假来到，大学里不再授课和学习。有一位年纪比格瓦拉年长六岁的医生，名字是阿尔维托·格拉纳多斯，此人后来是格瓦拉终身不渝的朋友。当时，这一位阿尔维托·格拉纳多斯，已经拥有医学博士头衔，因此，他想要在医疗研究方面大有作为，他把他的研究选题，对准了当时在拉丁美洲各国都几乎普遍流行的一种可怕而讨厌的疾病：麻疯病。有志于研究治疗克服这疾病的格拉纳多斯，大胆地提出一个想法和作出一个决定，这就是，他准备骑上一辆摩托车，准备一点可以周转的盘缠钱，然后就由南至北，到拉丁美洲的各同去旅行，到处去巡访麻风病院，如果有可能的话，在这样的巡访医疗中，筹集一点儿资金以便投入支持他的研究。但是如果他要如此行动起来的话，他单枪匹马，纵横南北，独来独往，恐怕难以克服所有的困难，所以，他就向当时还是医学院大学三年级学生的格瓦拉，提出了结伴同行的想法和愿望。

格拉纳多斯是格瓦拉多年朋友。格瓦拉本来是格拉纳多斯弟弟托马斯的中学同班同学，他们已经相识多年，格拉纳多斯很了解格瓦拉的人品、志向和抱负，所以，当他要实行一个大胆的行动的时候，他希望格瓦拉来结伴，同时，他也估计到格瓦拉很有可能接受他的邀请而不会拒绝他。这样，他就向格瓦拉展示了他的愿望。

完全不出他的所料，他要采取的这个行动步骤，对格瓦拉来说，实在是一个最具吸引力，非常有刺激性的行动计划。格瓦拉几乎是完全求之不得的，他早已经渴望着有这样的勇敢深求和冒险锻炼的经历了。

格瓦拉几乎毫不犹豫地，马上就答应了阿尔维托·格拉纳多斯，非常振奋地毅然表示，决定和他同行地去远征。

格瓦拉的父母，非常热爱他们的小名叫“泰泰”的儿子格瓦拉，但是，他们都是“骑士风骨”的大家后裔，他们有一种非常开放的传统，他们有大家风度，因此，他们从来不想把儿子像小鸟一样关在小笼子里作为玩物，他们没有那样的琐鄙的感情，他们并不阻拦儿子去探求和冒险锻炼的选择，只提出一个请求就是希望儿子在该返回大学攻读拿到毕业文凭时，能够回

来，不要延误了这件事情。

格瓦拉答应了父母的请求。

接下来，格瓦拉来见其时他已经与之热恋了许久的情人奇奇娜。格瓦拉热情地送给奇奇娜一件他十分珍爱的礼物，是一只名字叫“坎·贝克”的非常可爱的小狗，这是格瓦拉亲自饲养长大的，几乎与他总是形影不离的宠物。

格瓦拉郑重地把他的心爱的礼品送给奇奇娜以后，激发起了奇奇娜由衷的欢乐和喜爱的感情，奇奇娜实在高兴极了，惬意极了。

而在这时候，格瓦拉才又向她说出了他准备远行的决定。

奇奇娜一听格瓦拉的这样的决定，她简直不可思议的惊叫出“啊”的一声来，几乎差一点儿晕倒在地。

奇奇娜是阿根廷最著名的牛场主、最富裕的“名门望族”门第的千金小姐，形象十分漂亮，简直宛若天仙，她当时虽然也还极年轻，但在她的名头下，已经有很大一宗巨资，她的父母已经慷慨明确地赠予了她，作为是她的第一部分遗产。

这一个奇奇娜，非常喜爱格瓦拉的聪明的头脑和英俊的面孔，他们是同学伙伴，还在他们开始热恋之后不久，奇奇娜就已经非常热情而且不无骄傲地把格瓦拉引进她家庭的晚会上，把格瓦拉作为她的未婚夫选择展示在她的家庭的面前。

而且，从那以后开始，奇奇娜已经在热心而积极地筹措着她与格瓦拉的结婚事宜。他们当时都已经年过二十岁，他们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

然而，奇奇娜的热望，现在不能实现了，因为格瓦拉已经决定要远行。而且，奇奇娜能明白，格瓦拉的决定，从来是不容易改变，是很难改变的。

于是，奇奇娜对格瓦拉，只能情怀依依，垂泪而别。

1951年12月29日这一天，格瓦拉和阿尔维托·格拉纳多斯一行，踏上了他们远征的征途，他们骑着一辆从旧货市场买来的破旧的摩托车，驶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的摩托车上，也拖载着他们的医疗器械和简单的行李，以及少量的给养和水。同时，由于格瓦拉多年以来爱好摄影，他们还带着一架不大的照相机。

当繁荣美丽灯火辉煌的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在他们身后迅速地飞逝的时候，他们所驾驭的快马，沿着安第斯山脉，开始进入森林和蛮荒的地方，他们开始无休止的晓行夜宿，有的时候，能够借宿庄园农家，但也有许多时候，不得不裹着单薄的毯子，露宿在静穆的森林中和怪石嶙峋的山砬子上。给养很快吃完了，盘缠很快花完了，他们开始了经常忍饥挨饿的困难生活，有的时候，找到了访问麻疯病院可以工作的机会，或者在别的场合，比如给缺医少药的农民治病，他们可以再获得一些开展活动必须花销的经费。但是，如果一时难得找到这样的机会，他们就只好有什么活计就干什么活计了。后来，他们的摩托车不堪负重和长途跋涉，完全坏了，怎么修也不能再修好，他们两个难兄难弟，就丢弃了破摩托，开始扛着行李，背着药箱漫游。

为了吃饭和解决其他的生活必需品，两位入医，有的时候不得不去当兽医，给牛、马、猪看病，或者干脆到饭店里去打杂，洗盘子洗碗，或者去当搬运工、装卸工，或者设摊照相，修理收音机，最后他们找到了一件极好的差事，到一艘油槽船上当了水手，他们吃饭居处有了保障，而且也解决了继续漫游代步的问题。

这期间，艰难困苦的生活始终为他们挥之不去，但他们仍然坚持着他们

的崇高的奋斗目标，他们仍然在拉丁美洲各国，在许多与世隔绝的地方，寻访着麻疯病院、麻疯病人，进行着医疗和研究活动，阿尔维托·格拉纳多斯担任着主治医，格瓦拉充当着医助和技师的角色。

1952年2月18日，这两位自动肩负征服麻疯病造福人类的崇高使者，艰难跋涉来到了智利的特木科城，那里的地方报纸《南方日报》，对他们的行动进行了相当详细的报道。这是格瓦拉在他早期的活动中，第一次在公开正式的媒体刊物上留下了他的足迹的文字记录。

从智利离开以后，他们又游历了秘鲁、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后来到达了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

在迈阿密，格瓦拉一度山穷水尽，简直困难到了极点，巧的是天助英才，叫他偶然巧遇一名流落美国多年发了一点小财的远房亲戚。这位亲戚给他头了一飞机票，让他返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完成了医科大学最后一年的学业课程，使他获得了外科医师的行医证书。

1953年，他医科大学毕业后，作为外科医生，仍然想接着进行麻疯病的医疗和研究，他不想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找到一个可以平静舒适地工作和生活的市区医院住院医生的工作岗位，他竟再一次踏上征途，去巡访各国各地的麻风病院，去为那里被苦难不幸命运折磨的人们服务。

于是，格瓦拉又游历了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巴拿马、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最后，奋起独立自主革命，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压榨的香蕉危国危地马拉发出了战斗的召唤，格瓦拉满腔热血，满怀激情地飞奔到危地马拉。

大约从危地马拉开始，格瓦拉开始成了一名成熟的自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成为了一名真正觉悟的革命的战士。

但是，危地马拉的革命和解放斗争失败了。

格瓦拉作为危地马拉新上台的反动统治集团黑名单上的通缉犯，潜逃来到了墨西哥。进入到了里西哥城，并且受到了这里的进步人士的同情和关照，格瓦拉一时在这里安顿了下来。

最初，和他一起从危地马拉潜逃出来，来到墨西哥城的，还有一位危地马拉的劳动党员，名字叫帕托霍。危地马拉劳动党，确实就是危地马拉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共产党的性质，但是名称不叫共产党，只是美帝国主义中央情报局宁肯在大多数时候把危地马拉劳动党直呼为是危地马拉共产党。

这个帕托霍，从危地马拉城打击美帝国主义及其雇佣军的入侵飞机的空防组织开始。他和格瓦拉结下深交，他们当时，都曾经是打击入侵飞机高射机枪的机枪手。

后来，理所当然，帕托霍也上了美国主义走狗的黑名单，成为通缉镇压的对象，他不得不也逃离了他的祖国，和格瓦拉一起，来到了墨西哥城。

随托霍和格瓦拉在墨西哥，被这里的支援者安排住进了同一间铁皮小房里，在支援者们开始给过他们一些生活资助以后，接下来的生活出路，只能靠他们自己来想办法了。

帕托霍从危地马拉逃跑出来的时候，他连一分可以流通的货币都没有带在身上，他是两手空空，一贫如洗的。

格瓦拉似乎还好一些，他一直在身上珍藏着几个比索，准备在最困难的时候买饭的。现在，这几个比索开始浓上用场了，格瓦拉曾经在他的漫游经

历中，干过靠照相挣钱的事，于是，他就用仅有的几个比索，买来了一架半新不旧的照相机，在墨西哥城的公园里，招揽给人照相，千方百计挣几个小钱，来维持生活。

帕托霍也四出去找一些出卖力气的零活干，什么零活都干，脏的、累的、恶的、臭的，一律在所不辞。就这样，格瓦拉和帕霍彼此照应着，度过了来到墨西哥城以后最初的难关。

后来，渐渐的，他们闯开了新的局面，帕托霍被招聘到一家小报去当了记者。格瓦拉在墨西哥有进步和革命倾向的卡德纳斯前总统的直接关注下，根据他的医生资格，被安排在了墨西哥城的市立医院工作，并且在市医学院的心脏病研究所，还兼做了一份动物实验室实验员的工作，这样他就开始有了两份工资。

他和帕托霍分别租到了房子来住。

他们的生活都有了改善。接着，危地马拉革命失败后，一直在东躲西藏中隐匿的阿本斯革命政府的支持者和参加者，年轻的秘鲁女共产党员伊尔达·加德亚·阿科斯塔，也从危地马拉逃奔出来，来到了墨西哥城。

格瓦拉在初到危地马拉时，他被朋友介绍投靠伊尔达·加德亚·阿科斯塔。伊尔达十分负责的热心地照应了他。而且，当时，格瓦拉初到危地马拉时，他的哮喘病严重发作，一度病得十分严重，时时不能没有人照顾，于是，伊尔达就对格瓦拉还进行了特殊的照顾，就是在这样的照顾中，格瓦拉对伊尔达产生了感情，伊尔达也爱上了格瓦拉。他们两个在危地马拉的那些战斗的日子里，同时热恋起来。现在，伊尔达·加德亚·阿科斯塔这个有印第安人血统的漂亮健美的秘鲁女共产党员，来到墨西哥城，和格瓦拉又会聚了在一起，他们马上举行了充满热烈情谊的幸福婚礼。而且，他们的蜜月，以及接下来的爱情和婚姻生活，曾经是极甜蜜，极幸福的。伊尔达·加德亚很快就怀上了格瓦拉的孩子。1956年的2月15日，他们共同的甜蜜的爱情和幸福婚姻的结晶出生了。伊尔达生下来的，是一个胖胖的，十分漂亮的女孩儿。格瓦拉十分惊喜。伊尔达幸福地笑着，他问丈夫：“当家的，该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好？”格瓦拉高兴而且激动地说：“我要感谢你，亲爱的老婆子！感谢你给我生下这么漂亮的女儿，为了感谢你的功劳，为了让咱们的女儿，长大了像你一样聪明、漂亮、勇敢而坚强，为了像你一样如阳光灿烂如明月一般的温柔，我给她起个名字叫小伊尔达吧，你看怎么样？”伊尔达·加德亚当然十分高兴，她兴奋地对格瓦拉说：“好，那就让咱们俩的宝贝和结晶，叫小伊尔达吧！”

1956年2月15日，这是重要的一个日子，对于格瓦拉和加德亚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是他们第一个孩子、爱女出生的日子，因此也是他们最难忘，最愉快兴奋的一个日子。

伊尔达·加德亚是幸福愉快的。

格瓦拉同样是最幸福，最愉快的。

不过，对于格瓦拉来说，这一天还有几乎不可比量的另一桩最重要，最愉快的事情，这就是，就这一天，他必须离开墨西哥城，马上去到距离墨西哥城三十五公里外的一个名叫“圣罗莎”的大牧场去，因为在那里，这一天将正式拉开古巴革命起义军的最必要的战斗训练的序幕，在这个古巴革命起义军的秘密训练基地上，格瓦拉已经被古巴革命起义军司令菲德尔·卡斯特罗正式地任命为了主管起义军干部组织工作的政委。

格瓦拉初识卡斯特罗兄弟的往事

切·格瓦拉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第一次会见，是在1955年7月里的一个晚上。在墨西哥城的埃姆斯帕朗街49号，格瓦拉怀着不可抑制的兴奋和激动的心情，急切地来到这里，寻访会见菲德尔·卡斯特罗。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1955年5月间，在古巴的松树岛监狱大赦出狱以后，他在古巴又滞留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不管在出狱以前，还是在出狱之后，他的革命信念始终是越来越坚定，推翻巴蒂斯塔反动政权的决心，从来没有动摇过。

早在他还在哈瓦那大学攻读法律学博士学位的时候，他就相当大量地阅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包括《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他甚至也研究过《资本论》，第一次阅读《资本论》，文字艰深，很不好懂，他曾一度搁下，准备以后再读。后来在松树岛监狱里熬日子的日子里，他才终于完全读完了《资本论》。

他的思想、眼界、胸臆更开阔了。他的思考能力，认识能力和分析洞察能力，他的全部理论水平，有了更为飞跃的增长。

他的思想灵魂深处，更具备了彻底的革命性。

只是，这时候的菲德尔·卡斯特罗，还不是一个加入过任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组织的共产党员。

但是，他在思想上，无疑，已经纯粹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纯粹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了。

他认定了对反动的统治阶级，对古巴的巴蒂斯塔反动政权，永远绝不能抱任何幻想。对于这样的反动阶级的反动政权，唯一正确的办法，只能是以暴风雨一般的彻底革命，来彻底地推翻它。

在这样的思想认识和精神状态下，菲德尔·卡斯特罗从黑暗血腥的松树岛监狱出狱以后，他几乎来不及充分地享受一下自由的空气和恢复一下被折磨到极度的肌体，他立即又展开了紧张的宏图大略的谋划。

他迅速的串连所有被释放的因攻打蒙卡达兵营被判刑的志士，同时，串连所有的革命同情者，动员他们离开古巴，到墨西哥城来重新聚集，重新集合成为革命的力量。以图展开更为坚决的斗争。

这样，他首先派遣与他同时出狱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来到了墨西哥城，接着，其他曾经攻打蒙卡达兵营的壮士和热心参加古巴革命的志士们，也纷纷应召来到了墨西哥城聚合。

从松树岛监狱释放的革命者，纷纷地来到了墨西哥城，同时，在攻打蒙卡达兵营失败以后，没有被捕判刑，当时在巴蒂斯塔政府的通缉和追捕中逃出古巴的蒙卡达兵营攻打的参加者，现在也响应菲德尔，卡斯特的号召和召唤，从他们流落所在拉丁美洲各国，也都开始纷纷踊跃地重又聚到墨西哥城里来。

在这些从拉丁美洲各国踊跃聚集来到墨西哥城古巴革命者中，相继出现了这样几位人物，他们是一位名叫涅哥·洛佩斯的青年革命者和另外两位他的同志：马利奥·达尔里和达里奥·洛佩斯。

他们其中的涅哥·洛佩斯，来到墨西哥城后，有一天患了一点肠炎之类的小病，于是使到了墨西哥城的市立医院来看病。结果，就在他这个看医生的过程中，他意外地惊喜地欢呼起来，他在这里撞见了已经在市立医院从事

医师职业工作多时的格瓦拉。

他们立刻相互欢呼拥抱起来。格瓦拉也马上认出了涅哥·洛佩斯。

原来，他们两个，曾经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在危地马拉城最紧张危险的那些战斗的日子里，他们俩人，也曾共同在一个打击美国佬及其雇佣军飞机的防空高射机战斗组，并肩战斗过，原来，这个涅哥·洛佩斯，本来也是曾经响应古巴大学主联合会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召唤，跟随着卡斯特罗奋起攻打古巴圣地亚哥有一千五百名兵员的蒙卡达兵营的，以及同时攻打巴亚莫兵营的一百六十二名革命的大学生中的一员，攻打失败后，在敌人的通缉追捕中，他逃出了古巴，流落进入了危地马拉，后来，几乎是理所当然地，也就参加了保卫危地马拉革命的战斗生活，而就在这个期间，他和格瓦拉同在一个防空高射机枪的战斗组合里，成为了并肩战斗的战友和同志。

其时，格瓦拉早已闻知古巴革命的大学生，攻打反动政府兵营的壮举，他早已经对于这次壮举的英雄参加者，怀有着无限的敬佩和同情，甚至也产生着无比激越的向往之情。因此，当攻打蒙卡达兵营的一员直接参加者涅哥·洛佩斯来到格瓦拉的面前时，他当然给格瓦拉作了最全面，最具体，最生动的绘声绘色描述。

格瓦拉当时十分专注投入地倾听了涅哥·洛佩斯的描述，他非常受震动，特别激动，强烈地流露出了向往之至的激情，表明他当时如果也是在古巴的一名大学生的话，他也绝对会热血沸腾地投入到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攻打蒙卡达兵营的激烈的完全不计危险的战斗中去。

格瓦拉的这样的强烈的精神情绪，给涅哥·洛佩斯留下了强烈至深的印象。

而且，在后来的保卫危地马拉的战斗生活中，涅哥·洛佩斯也充分地看到了格瓦拉的勇敢、顽强、善战忠诚，不惜在战斗中流血牺牲的彻底革命激情，而且还有格瓦拉总是克己让人，助人为乐，普写人处的秉性格，也引起了他对格瓦拉充分的尊敬、爱戴和看重。

这样一个格瓦拉，这样一个涅哥·洛佩斯，现在，他们在墨西哥城的市立医院里，再一次久别重逢，相聚在一起了。他们在欢呼激动的拥抱中，他们的热烈感情，是难以比拟的。

格瓦拉问：

“涅哥·洛佩斯，听说你从危地马拉回到了古巴，你怎么又来到了墨西哥？”

洛佩斯说：

“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又在集合人马，约定在墨西哥集合，所以我们又来了。已经又有许多人来了。”

格瓦拉的眼睛闪亮了起来。他马上激动地问洛佩斯：

“菲德尔·卡斯特罗现在在墨西哥城吗？你能不能介绍我去认识他？”

洛佩斯说：

“不，菲德尔·卡斯特罗现在还不在于墨西哥城。不过，他即将就要来了。现在，他的弟弟已经在墨西哥城里了。”

格瓦拉感到惊喜：

“是劳尔·卡斯特罗吗？”

洛佩斯说：

“是他。是劳尔·卡斯特罗。”

格瓦拉激动地说：

“那你就先介绍我去见劳尔·卡斯特罗，我非常渴望见到他。”

涅哥·洛佩斯高兴地带领格瓦拉，来见劳尔·卡斯特罗。

劳尔·卡斯特罗形象也是特英武而秀气，他比格瓦拉小两岁，形象和性格，几乎和格瓦拉十分相近，他的外表特征，似乎也和格瓦拉一样，仿佛含有着一种男性的腼腆。但是，他在和格瓦拉初次见面的这一刻，他们两人却完全好像似曾相识，仿佛是久别重逢的老友，近乎完全是一见如故。

涅哥·洛佩斯介绍他们认识和见面以后，忙着去干别的事情。而格瓦拉和劳尔，却开始了热烈的交谈，他们怎么也分不开了。

他们一连深谈了好几天。

他们的话题十分广泛，谈论了许多方面。

但是，最后，他们集中谈论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来。

劳尔和格瓦拉一样，也和他的哥哥菲德尔一样，已经大量地阅读过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著作，包括革命政党的组建，国家与革命等等深刻而重要的问题。格瓦拉向劳尔提出了组织革命，必须建立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政党亦即共产党的必要。劳尔·卡斯特罗极为兴奋，激动地对格瓦拉的主意表示了认同和响应。于是，格瓦拉就对劳尔·卡斯特罗说：“好，从此我们就照着共产党员的标准和规则来行事。”格瓦拉说：“对此，我们必须进行严格的保密。甚至连菲德尔，卡斯特罗你的哥哥，我们也不要透露，以回避他可能不一定赞成我们的倾向。”

劳“好，就这样办。不过菲德尔来到墨西哥城后，你一定要见他，他不仅是我的兄长，也是我十分敬爱的师长，他的革命性很强烈，他的战斗激情，也是不可抑制的。”

格瓦拉说：

“当然，如果他来到了墨西哥城，你一定要让我马上见到他。他已经是经过巨大锻炼的，已有革命斗争经验的英雄，今后我们的革命斗争事业，必须在他的领导下进行。”格瓦拉和劳尔进行了如此的约定。

1955年7月9日，菲德尔·卡斯特罗终于也来到了墨西哥城的时候，劳尔·卡斯特罗第一桩向他哥哥报告的事情，就是要他和格瓦拉见面。当然，劳尔·卡斯特罗同时向菲德尔·卡斯特罗报告了他对格瓦拉的全部印象。

劳尔·卡斯特罗对格瓦拉的介绍，促使菲德尔·卡斯特罗立刻特别地感奋起来，令他也产生了急于要与格瓦拉见面的强烈愿望。马上指示劳尔迅速安排这次见面。

于是，格瓦拉自然也是马上就来了。

他们见面的地点，墨西哥城的埃姆帕朗街49号，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下榻处，这里是一个名字叫玛丽亚·安东尼娅·冈莎雷斯的妇女的家室。这一位玛丽亚·安东尼娅女士，是一个古巴人，她的丈夫是墨西哥人，颇有一些资产，他们的房宅是很宽大的，是一座有套院的小楼，楼内有许多居室。

玛丽亚·安东尼娅在古巴有一个唯一的亲兄弟，名字叫伊西罗，由于参加反对巴蒂斯塔反动政权的斗争，被巴蒂斯塔特务逮捕，以野蛮凶狠的酷刑棒打致死。

这使玛丽亚·安东尼娅在无限的悲痛中，认识到了巴蒂斯塔政权的血腥和残暴，所以，她开始了对古巴有血性的年轻革命青年的深刻同情。她听说菲德尔·卡斯特兄弟要来到墨西哥重新集合造反的队伍，她就主动地提供方便，

请卡斯特罗兄弟来充分利用她的家人所拥有的深宅大院来居住。

而卡斯特罗来到墨西哥后，他立刻就决定在玛丽亚·安东尼娅提供的这个住处，建立他的秘密组合队伍，组合起义军的司令部，这个地方就成了他的一个开展秘密活动，有所安排保卫措施的战斗机关。

格瓦拉在劳尔的陪同下，在这里见到了菲德尔·卡斯特罗。

他们俩人也是一样，未曾见面，彼此就都怀着难以抑制的激动心情，而一旦见面，几乎当然也是一见如故，他们差不多马上就热烈地交流起来，越过所有的鸡毛蒜皮的细事和趣谈，他们立刻开始纵论世界大事。深刻地谈论国际形势，从苏联的强大，中国革命的胜利，朝鲜战争的结束，谈到埃及革命的奇迹，他们的话题非常广泛，从重大的世界形势，进而又推演到深刻的革命哲学、理论问题，他们同时很快的把激热的话题，归结到当前的拉丁美洲最迫切的革命话题上来，他们很快在相互之间共鸣着一个促令他们俩人都激动不已，激奋不已的共识，那就是为着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绝不畏惧付出一切牺牲的代价，以革命的武装斗争，展开推翻一切暴力压迫的革命。

菲德尔·卡斯特罗强调，如果是为着这样的目标，古巴人，宁肯承担全部牺牲的代价，也可以担当美洲革命的先锋。于是，格瓦拉坚决毅然地说，如果是这样作为阿根廷人的他，他也可以绝对无条件地和古巴人站在一起，他也可以成为这个革命先锋中的一员。

格瓦拉和菲德尔·卡斯特罗进行了彻夜的长谈。在雄鸡报晓的一个新的黎明即将来到时，卡斯特罗根据格瓦拉的坚决请求慨然地进行了一个十分严肃郑重的举措，他展开刚刚装定好的一个古巴革命起义军的登记名册，在第一页第一位的位置上，写下了格瓦拉的名字，然后接着写下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的名字。

然后，他们是兴奋地、长时间的拥抱和握手。这时候，劳尔也参加了进来。他们三只巨手相握在一起，以菲德尔·卡斯特罗为核心的古巴革命起义军的领导中心，就这样，在这个伟大的时刻形成和诞生了。格瓦拉从此成为了古巴革命起义军中的一员。在墨西哥的生活中，他有了又一重要的身份。

菲德尔·卡斯特罗，作为革命的伟大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在墨西哥城里，开始了毫不间断的发展革命组织的工作，热情奋发地进行着壮大革命势力的其他一切工作。组织队伍，是一个方面，筹备革命投入的资金，以便购置武器弹药和置办给养，还有其他种种事情，他都必须充满不息的热情，耐心细致地来做。避居在墨西哥的诸多的古巴侨民，同情古巴青年革命者的人不在少数，同时，还有许多墨西哥进步人士，都尽他们的可能和力量，对古巴革命的筹划者，给予慷慨的解囊相助。因此，卡斯特罗来到墨西哥城以后，很快集合起了人数不算少，革命斗争意志坚决的战斗队伍，同时，他还筹集到了大量或者说是相当可观的革命活动资金。有了资金，他们就开始秘密地购置武器弹药，开始进行着武器弹药的储备工作了。

与此同时，他们开始想到了，武器使用和掌握武器去战斗的战斗人员战斗素质的训练，他们明白打仗本身也是一门学问，甚至是一门艺术。也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开始结识着一位非常重要和非常杰出的人物，他就是阿尔维托·巴约将军。此人是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革命军的一位将军。西班牙革命军失利以后，他离开西班牙，来到墨西哥，在墨西哥城找了个解决吃饭问题的的工作，即充当了墨西哥国防军军事航校的一名教官。在军事教学之余，他

仍然对研究战争艺术富有兴趣，在 1950 年前后，他写过一本研究战争艺术的著作，书名叫《游击战争的一百五十个问题》，这本书，差不多可以说是一本进行游击战争的知识全书，其中非常全面地介绍着游击战争的各种战略、战术和战法，包括袭扰、突击、埋伏、爆破、制造武器、炸弹、挖掘掩体地道，开车驾机，以及躲藏和隐蔽，越狱潜逃，仿生和自救，各种生存手段，等等。

这样一本重要的著作被古巴的革命者看到了。于是，这些革命者们，就热情地来拜访这位对游击战战法颇有研究的将军。

当拜访者和被拜访者了解了各自的情况以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很自然的便亲切了起来。

古巴革命的组织者们，最初和巴约将军见面，当时也联想到了一个热切的愿望，这就是，想到了，能否聘请巴约将军来作古巴革命起义军的教官，来对参加起义军的全部青年大学生，来一番充分的军事训练。

一开始，巴约将军拒绝了古巴革命领导人的如此要求，接着开价很高，他并不热衷于要做这些准备起义的大学生的军事教官。但是，他后来透彻地了解了古巴革命的组织领导者们的志向和品位以后他不仅终于慨然答应充当这些革命者们的军事教官，而且，他还提出了赞助这场革命的请求，他卖掉了自己的一所家具工厂，把资金完全用来投入古巴革命，自然，他同时完全情愿充当古巴起义军的军事训练基地领导人，也不再收取任何报酬。

接着，巴约将军还迅速行动起来，他亲自到墨西哥城的城郊以外相当远的地方，勘察选择了一处可以用来进行军事训练的场地，然后花销两万六千美元买下了这个场地。这个场地，便是座落在崇山峻岭之中，遍地是荒草和荆棘的圣罗莎牧场，远距墨西哥城郊三十五公里之遥。

1956 年 2 月 15 日，在格瓦拉和他的妻子伊尔达·加德亚的小女儿小伊尔达出生的这一天，正好是卡斯特罗已经组织起来的古巴起义军进入这个训练基地的日子。

所以，格瓦拉和加德业热烈地庆祝了一番他们的爱女小伊尔达灿然出世的幸福时刻以后，格瓦拉旋即就毅然离开了刚刚结束了一场初产婴儿的妇女强烈震痛以后的妻子，离开了从此一刻开始便难分难舍的可爱的女儿，迅速地也离开了墨西哥城，走出城郊，飞奔着赶赴到了这个“圣罗莎”训练基地。在这里，阿尔维托·巴约将军正等着他的到来，准备着与他这个卡斯特罗指定的基地干部负责人，一起研究训练计划，展开训练进程，同时，他们已经作出了规定，在“圣罗莎”基地准备好一切以后，他们立刻就将从那里开始，迈步踏上揭起古巴革命新的战斗大旗的征途。

堪为照亮古巴革命的明灯

在“圣罗莎”基地，紧张的军事训练开始了。

菲德尔·卡斯特罗有时候，也来到“圣罗莎”训练营地，和所有起义军战士们一起，接受各种严格的军事训练。

在这个军事训练营地里，完全按照临战的战斗部队一样，实行严厉的军事虞斗纪律和生活制度，按时起床、吃饭、训练和息灯睡觉。夜间正在大家睡梦酣沉的时候，突然一声哨响，紧急集合，然后就打起背包，挎起枪枝子弹，手榴弹和所有必备的饮水和辎重，开始急行军训练：摩上峻峭的山岭，专门选择布满荒草荆棘嶙峋怪石的道路，走到大家都走得几乎精疲力竭的时候，指挥员往往发出跑步或突进的命令，进行最后五分钟甚至是最后十五分钟的冲刺，接着，可能是就地宿营，露营或进行野炊，或就地觅食，学习断绝给养的生存手段。

这支队伍，如此这般地进行着军事化战斗化素质的训练和培养，有的时候，也进行实弹射击、刺杀、投弹和标识地图，战地救护包扎的训练，每个人都要学会使急救包，捆绑担架，抬运伤员，给伤员注射止痛针或强心剂。

卡斯特罗有时候会时间许久地离开这里，他回到墨西哥城去，继续筹办其他重要事情，比如继续筹款，购置武器，通讯器材等等在卡斯特罗离去的时候，格瓦拉受命在训练基地上同巴约将军进行管理和组织工作。

巴约将军主要主持军事训练和实战演习，有的时候也教授武器修理拆卸和擦洗，故障的排除，以及用饼干或罐头盒制造莫洛托夫鸡尾酒式的手榴弹。

格瓦拉是最刻苦奋发的军事技术军事训练的参加者，这个个头不大的经常被哮喘病折磨的脸色苍白的书生，他很快成为了投弹能手、射击能手，行军和军事演习，伪装学习和执行警戒任务包括侦察训练的时候，他都显得极为顽强和机警，非同一般。

除了作为学员以外，作为医生，特别是作为外科医生，他还兼任着训练基地的战地救护的教员，他耐心教战友们包扎自救止血打绷带骨折正位的技术，教会每个人肌肉、皮下和静脉注射的技术，他经常会伸着胳膊，露着肩膀或屁股蛋子，用他的肌肉和静脉，来教会他的学员们进针。

“圣罗莎”军事训练基地的军事训练，严格而不简断地紧张训练着，成效是绝对明显的。

在军事训练的同时，在这里事实上还进行了活跃的政治思想教育，格瓦拉亲自到墨两哥城的书店里去选购书刊，在训练基地上办起一个小图书馆，供参加训练的伙伴们阅读，大多数，主要是马列主义的书刊，也有不少文艺书刊，其中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两本书：《毁灭》和《青年近卫军》，差不多成为了鼓舞基地训练参加者的政治思想教材。

总之在这里参加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的起义军战士，通过训练和学习，体能、军事技术，政治思想觉悟，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和加强，他们已经都准备好了投入战斗，他们已经都变成了斗志极为昂扬的即将临风出山的猛虎。

然而，就在这时，古巴革命在这一个阶段的运作中，突然遇到了一次差一点是毁灭性的挫折。

事实上，出狱后纷纷离开古巴的攻打蒙卡达兵营的参加者，他们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古巴巴蒂斯塔反动政权的无处不在的特务们的密切跟踪和监视，特别是卡斯特罗兄弟的行踪，更是他们紧密盯梢的对象。

卡斯特罗来到墨西哥城后，古巴驻墨西哥大使馆，立刻变成了古巴巴蒂斯塔反动政权特务们云集起来，密切侦探卡斯特罗行动的中心。

他们很快发现了卡斯特罗活跃的革命活动。他们发现了卡斯特罗正在紧锣密鼓地筹措着新的更为重大的革命战斗步骤，于是，巴蒂斯塔政权的特务们，开始使用特务惯用的伎俩，试图从多方打入卡斯特罗新组建的战斗组织机构，他们终于得到了一个机会，使一个狡猾的名叫贝内里奥的特务，混迹进入了卡斯特罗正在扩大组织的队伍。

结果，这个家伙，很快掌握了卡斯特罗一些难予绝对保密的活动范畴，接下来，这个特务就潜回到古巴大使馆，并从那里向巴蒂斯塔特务组织告密索赏。

美国一直顽固死硬地支持着在古巴已经人心丧尽的巴蒂斯塔政权，美国中央情报局，一直和古巴特务机关联手，拼力维护着巴蒂斯塔政权在古巴的特务统治。所以，他们接到贝内里奥对卡斯特罗革命活动的告密以后，古巴巴蒂斯塔政权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立刻向墨西哥政府施压，要求墨西哥政府镇压正在墨西哥展开的反古巴巴蒂斯塔政权的活动。

墨西哥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马上命令墨西哥警务部门，开始搜捕作德尔·卡斯特罗以及他的所有追随者，他们搜查了卡斯特罗在墨西哥城筹措起义的司令部，即墨西哥城埃姆帕朗街 49 号的玛丽亚·安东尼娅家的宅院，他们在那里逮捕了所有正在与卡斯特罗联系的人，接着，他们出动大批警车和警察武装，突袭和包围了在墨西哥城远郊的“圣罗莎”基地，他们从基地上抓走了差不多所有的人，包括巴约将军和格瓦拉。

在墨西哥城里，他们也同时逮捕了格瓦拉的妻子伊尔达·加德亚。

他们统统被关进了一个名叫“米格尔·舒尔茨”的，专门关押外国侨民的庞大监狱。他们开始在那里接受审讯。

墨西哥政府的这一次迫于压力不得不为之的镇压和逮捕，是一个影响轰动的大事件，它立刻激起了墨西哥公众的广泛注意和关注，广大的墨西哥人民，十分同情被他们的政府逮捕镇压的有着强烈革命倾向的古巴的年轻人，墨西哥所有的进步人士都集合了起来，包括政界的开明人士、工人群众和他们的领袖，以及知识界文化界的诸多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以及许多群情激昂的大学学生和教授们，纷纷声援被逮捕的古巴青年革命者。

在强大的声援和正义人民的压力下，墨西哥政府终于以“活动证据不足”为理由，先后逐渐释放了卡斯特罗以及他的大部追随者。

格瓦拉因为当时不是古巴人，而是阿根廷人，他释放的稍晚了一些天。

经过这一次严重挫折，菲德尔·卡斯特罗兄弟和格瓦拉正在组织酝酿中的革命队伍，难说不会受到伤害性的影响。有的人对革命的行动气馁起来，有的人对革命的目标开始产生怀疑，有的人提出了这样的思想；巴蒂斯塔政权根深蒂固，而且一直受到美帝国主义的全力支持和维护，它有四万多用美国的精良武器武装起来的武装力量，一直不择一切血腥手段铁腕统治着古巴，而对着如此强大的敌人，战胜它，打败它，难道是确实可行的，而不绝对是一种幻想吗？

这样的思想问题，开始像严重的流感病毒一样，在一些人中间传播了开来，造成了一些抵抗力较弱的人，患得了流行性感冒，他们开始在发烧的状态下打起了哆嗦，颤抖了起来。

这时候，该有一种什么样的良药，才能彻底防治和治疗这样的流感病毒

呢？

非常凑巧的是，正在这时，果然有一种非常宝贵的良药，忽然之间从天外飞来，这就是，忽然铺天盖地的，震动世界，震惊世界的这样的消息从天外飞来，这即是在远方的埃及，杰出的伟大英雄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拉开了苏伊士运河从英法两大帝国主义的联手殖民统治下，在 1956 年 7 月 26 日这一天。突然宣布收归埃及所有，并且马上宣布了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政策的大幕。

这一惊天动地的壮举，迅速充满了惊心动魄的传奇色彩的描绘，据说革命英雄和革命天才的统帅纳赛尔总统，极为巧妙地策划和安排了这场从两大帝国主义国家的虎口里夺取肥羊的步骤，据说纳赛尔总统事先完全不动声色，他一方面麻痹埃及人民的死敌，一方面运筹调动自己统帅的革命力量，他实施了对泄密者一律枪毙的严格的保密纪律，他在为所有人不能知晓其战斗意图的状态下，把所有埃及战斗部队为人所不知不党的状态下，调人到最关键的作战位置上来，调集到了帝国主义势力的咽喉部位，他丝毫不动声色，绝不虚张声势，大事张扬，绝不宣传蚂蚁吃大象的神话，然而，他暗地里周密地计划，精心极致地规定着步骤，正准备着往日任人宰割的羔羊一口吞食两只恶虎，甚至是三只恶虎的必将是为人们所不可思议的伟大行动。他使一切世人，包括他行将被一口吞下的两只或三只恶虎，都绝对不会想象到他所具有的吞食愿望和吞食的胃口。

然而，时间到了。

一切都布置停当，准备停当，他说采取行动的时间到了。

1956 年的 7 月 26 日晚上的 7 点 40 分，纳赛尔总统来到了埃及的第二大城市，也是苏伊士运河口岸的最大的城市亚历山大市。他登上了亚历山大解放广场的讲台，面对着他的 25 万英雄的埃及人民，开始发表时近三个小时的长篇讲话。在此时刻，埃及的全国广播电台，都被命令转播纳赛尔总统的讲话。而且，埃及所有的司令、军长、师长和一切官员们，都被严格命令守候在收音机前，认真倾听纳赛尔总统的讲话。在此前为时不久的时刻，纳赛尔总统分别单独召见了一系列军队的司令和要害部门的官员，每人都交给了他们一封火漆密封加盖了保密印章的命令封。纳赛尔总统告诉他们每人一个暗号，这就是要他们注意倾听 1956 年 7 月 26 日晚间 7 点 40 分钟纳赛尔总统本人将在亚历山大解放广场的讲话广播，如果纳赛尔总统在讲话中说出那个暗号，所有接到绝密命令封的人，必须立即开封阅读命令，并且规定，在前此时刻打开命令封和打开命令封后拒不执行命令封内命令的人，都要立即处决。

所以，所有已经持有纳赛尔总统秘密命令封的人们，他们是相当一大批司令和长官，在纳赛尔总统在亚历山大解放广场慷慨陈词，开始发表长篇讲话时，他们当然都紧张地围拢在收音机旁，非常聚精会神地收听着纳赛尔总统的声音，专心致志地收听着纳赛尔总统的每一句话。纳赛尔总统严格地掌握着说出那个秘密暗号的时机。

终于，时刻到了，纳赛尔总统在讲话中，突然提高声音，说出了曾经负责开凿运河的法国人的名字，纳赛尔总统在讲话中，提到了“斐迪南·德·勒赛普”。这就是暗号。

这个暗号一经从广播电台的直播间中传出，所有那些持有命令封的司令和官员们，立刻开始拆阅秘密命令封中的命令，拆阅所有秘密命令封的司令

和长官们，立刻几乎都惊呼出声来：“真主啊！”

然后，他们没有一个人犹豫，开始无条件地执行纳赛尔总统亲手签署的手令，马上从各个方面，突然开始，从上游到下游，沿着整个苏伊士运河的所在口岸，在埃及武装部队的保障下，行政官员们迅速从英、法两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者手里，全部接管苏伊士运河的治辖权，并且立即宣布了苏伊士运河为埃及国家所有。

纳赛尔总统断然果决地采取的革命行为，在突然的奇袭中，赢得了完全的、全面的胜利。纳赛尔总统在7月26日深夜在亚历山大解放广场的讲话中，在行将结束的时刻，立刻宣布了多少年来被老帝国主义集团霸占的苏伊士运河已经完全收回埃及国家所有。他大声地宣布，在埃及的国土上，有12万埃及人献出生命，有更多的埃及人献出了血汗开凿的苏伊士运河，从此再也不会属于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者了。

整个埃及，举国顷刻间为如此的大喜大庆之事欢腾起来，整个埃及都沸腾了。

但是，所有帝国主义者，都一时统统惊呆了。

美国惊呆了。

英国惊呆了。

法国惊呆了。

还有一个以色列。一时也惊呆了。

虎口拔牙。虎口夺食。绵羊开始吞食猛虎，没有一匹猛虎是不被惊呆了的。

但是，他们能怎么样呢？

美帝国主义一时不知所措，不知如何应对才能为好。

英帝国主义、法帝国主义，都从嘴里被拔下血牙，被夺下了肥肉。而且，是被他们先前随心所欲任意吞食的羔羊来拔他们的牙，夺他们的肉的，这还了得吗？他们疼得要死，恨得要命。

于是，他们接下来要发威了，他们要出动海陆空军，他们联合起了本来已经和埃及一直对峙着的以色列，他们向埃及宣布开战，展开了一场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帝国主义战争。他们疯狂地向埃及展开了海陆空并进的新的侵略战争。

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来势凶凶，气焰嚣张。他们以为风卷残云，摆个架势也能把埃及吓倒、扫平。岂知，埃及现在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埃及了，而且，他们还有了纳赛尔这样的伟大的英雄领袖，埃及人民是吓不倒的，纳赛尔总统是吓不倒的。埃及人在纳赛尔总统的带领和指挥下，迅速投入反击侵略者的战争，迅速掀起了全国性的反抗斗争，埃及军队空前英勇地投入了血战，纳赛尔把40万件枪械，分发给了埃及的人民。侵略者如果与埃及人民为敌到底，广阔的埃及土地，一定将会变成全部侵略者的坟场。

帝国主义老虎恐惧了。

帝国主义老虎害怕了。

整个世界上的善良然而伸张正义的人民，各国人民，都来声援埃及人民，都来支援埃及人民，苏联甚至宣布，要把志愿军派到埃及来了。

帝国主义的虎胆终于崩溃了。

帝国主义终于收起了他们的虎势虎威，夹起了他们的老虎尾巴，滚回他们的老家去了。

英、法联军和以色列，撤出了他们的作战部队，停下了他们危险玩弄的

战火，只好伸长脖子咽下苦果，不得不无可奈何地放弃苏伊士运河的治辖权以及由此而来的其他利益，他们不得不从此一劳永逸地承认了苏伊士运河完全属于埃及国家和人民的主权。

以小吃大。

以弱制强。

这是二十世纪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在如火如荼的民族独立，民主革命运动中出现的伟大奇迹。

这样的奇迹。这样的埃及人民的伟大胜利，在 1956 年的下半年间，就成了治疗在墨西哥城中古巴起义军中患得流感病毒侵害的流感病人的最好的良药。

埃及人民在这一年反对帝国主义国家所赢得的伟大胜利，以及纳赛尔总统英雄地领导埃及人民举重若轻的胆略和艺术，确实非常有力而有效地鼓舞了当时在墨西哥正在秣马厉兵的古巴革命者。菲德尔·卡斯特罗、格瓦拉、劳尔·卡斯特罗，他们所受到的鼓舞和启示，无疑也是十分巨大的。

纳赛尔与格瓦拉一见如故

对于古巴革命的胜利，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总统，也是感到十分惊喜，十分惊异的。

无疑，古巴革命，从它开始投入不久之后，便已引起了整个世界的震动，和整个世界的注目。

埃及 1952 年的革命胜利以后，刚刚三十多岁的纳赛尔，一直处在埃及这场革命的革命领袖的位置上，特别是在一开始的最初的年代里，举目环绕着几乎总是难以战胜的惊涛骇浪，特别是在 1956 年收归苏伊士运河，接着与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和以色列的入侵埃及奋起开战的时候，以及后来的严重事件不断发生的状态里，作为埃及年轻航船的坚定不移的伟大舵手，纳赛尔其时的工作负荷，是极为繁重的。他的面前摆满了急切要办的各种事情，他的耳朵里几乎每时每刻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欢呼，咒骂；请示，报告；控诉和乞求。等等，等等。在革命烈火中新生的古老的埃及，一切百废待兴，到处都在翻天覆地，遍地都在恢复生机和振兴。纳赛尔一直是很忙的，无疑他是极忙了，完全可以说是忙得不可开交。

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时有耳闻，听到了从就在美帝国主义的眼皮底下的加勒比海岛国，传来的古巴革命的消息。

最初，那还是在 1957 年的初春的季节，一个有思想，有良心，人品正直，怀有正义感和英雄气的美国记者，名字叫赫伯特·马修斯，一个年纪已经五十八岁，并非十分年轻的，富有敬业精神气概的人，他不惜冒险探寻，深入到古巴广漠大荒的丛林中去，完全以第一手的耳闻目睹，采访到了古巴革命确实已经无可置疑地发生的消息。

马修斯在古巴奥连特省高岸雄峻的马埃斯特腊山区的深处，在一片布满松荆的林莽中的空地上，见到了身材魁梧，体格健壮，大胡子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所带领着的古巴革命起义军的队伍。

马修斯在马埃斯特腊战斗的游击区，见到菲德尔·卡斯特罗时，已经是卡斯特罗带领着古巴革命起义军，从墨西哥的港湾登上他们的《格拉玛号》，驶回古巴海域，从古巴的科洛腊多斯海滩登上古巴的海岸，从此展开在古巴本土革命战斗的旗帜，从那时候开始的第 49 天了。

当然，也仅仅是刚刚第 49 天。

那一天是 1957 年的 2 月 17 日。

应该佩服美国一部分新闻工作者的高工作效率。就在马修斯在古巴马埃斯特腊山深处的密林里，见到卡斯特罗并且开始采访活动的第七天头上，远在美国的《纽约时报》，于 1957 年 2 月 24 日，发表了报导卡斯特罗领导古巴革命起义军 in 古巴马埃斯特腊山区展开游击战的第一篇报道。

报道非常客观清楚明白地写道：

“领导古巴青年的造反派菲德尔·卡斯特罗仍然活着。他正在该岛南端的马埃斯特腊山的怪石林立，难以攻破的要塞中，成功地进行着艰苦的战斗。

弗尔享西奥·巴蒂斯塔总统将精锐部队部署在该地区。可是，他的部队，现在遇到了旨在歼灭巴蒂斯塔将军军队的，在巴蒂斯塔将军自从作为古巴领导人和独裁者以来的漫长而又惊险的生涯中，所遇到的最危险的敌人。

“这里的战斗，迄今一直在进行中。”

《纽约时报》在发表这篇消息报道时，还发表了编辑部按语：

“这是第一篇肯定菲德尔·卡斯特罗仍然活着，并且仍然呆在古巴的新

闻报道。除了本记者外，没有任何别的与外界有联系的人（更不用说新闻界了），曾经见过卡斯特罗先生。在本报道发表以前，哈瓦那没有任何人（其中包括具有各种收集情报途径的美国大使馆人员在内），知道菲德尔·卡斯特罗，确实确实已经在马埃斯特腊山。”

在《纽约时报》发表这篇编辑部按语和记者马修斯的消息报道以前，已经有着这样的背景，这就是，《纽约时报》也曾经比较多的报道过发生在古巴的，由古巴大学生联合会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攻打蒙卡达兵营的事件，还曾经报道过在这次攻打兵营的行动失败后，巴蒂斯塔将军的独裁政府，对参加兵营攻打者的镇压和审判。《纽约时报》比较详细地报道过参加攻打兵营的大学生，有十六人在战斗中牺牲，有八十多人在被捕后遭到了极为残酷的杀戮。这家报纸还报道了这些杀戮的详细情况，比如，施用酷刑令他们致死，在头盖骨里嵌进粗长的铁钉，令他们在痛苦中死亡；有的人还被架到飞机上，然后推下来摔死；有的人被带到了出海的轮船上，被捆帮着手脚推进大海，任凭鲨鱼啄咬和吞食。巴蒂斯塔的刽子手们，施用如此残忍的手段，还嫌很不过瘾，他们还要无以复加地挖空心思作恶，他们还把他们的猎获物进行肢解，肢解后的血肉模糊的躯体，有的被扔进垃圾箱，有的被扔进阴沟，更可恶的是有的这样被肢解的青年的躯体，或者头颅，或者手足，被寄赠给这些被残害的青年的父母。对这些血腥罪恶，《纽约时报》都作为社会新闻，绘声绘色地报道过。除此以外，后来对卡斯特罗等一批青年革命者的审判，也曾经报道的十分详细。所以，古巴革命青年的活动的状况，后来也就成了《纽约时报》读者关注的焦点，《纽约时报》也利用炒这样的新闻，来扩大它报纸的发行量。

卡斯特罗率领《格拉玛号》的起义者们，在 1956 年最后的日子，登上古巴的土地以后，在最初一战的时候，整体八十三人的战斗部队立刻被打散，几乎全军覆没，但是顽强的核心被庆幸地完整保存下来，接下来仍然主动地投入了新的战斗，使他们的锋芒所向，显示出了对巴蒂斯塔反动政权和独裁统治的严重威胁。

卡斯特罗领导的起义军在古巴登陆，进行战斗的情报，通过军队的情报系统，早已为巴蒂斯塔独裁者所掌握。他们从一开始就对这样的消息怕的要命，恨的要死，听到这样的消息以后，他们就开始了蚂蚁在热锅上一般的日子。他们惧怕这消息传播开来，在古巴国内引起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所以，他们一开始就严密地进行新闻封锁，严格封锁消息，并且在加强镇压行动武装围剿的同时，开始大肆散布谎言和蜚闻，造谣宣传卡斯特罗和他的起义军已经被消灭，造谣宣传说菲德尔·卡斯特罗已经不再是一个活着的造反者了。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新闻背景下，《纽约时报》报导了卡斯特罗不仅活着，而且还正在古巴马埃斯特腊山区展开和领导着反对巴蒂斯塔政权的游击战争。

这样的新闻报道，无异是一个晴天霹雳。它打破了巴蒂斯塔政权的新闻封锁，戳穿了独裁者的造谣和谎言。于是，这样报道的消息，同时也无异是一声报春的春雷，震动了古巴，也震动了全世界。古巴革命的烽火，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名字，立刻成为了一个令全世界注目的中心。

巴蒂斯塔政权立刻张慌失措，慌了手脚，他们马上发表声明，指责马修斯的新闻报道是在弄虚作假，制造谎言，并且说在古巴根本没有发生卡斯特罗领导起义军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扎下根来的事情。

《纽约时报》真不乏大炒新闻的行家老手。《纽约时报》一任古巴独裁者大肆发表指责马修斯新闻报道为假新闻的声明，等巴蒂斯塔反动政权把它的声明广泛地传播开来以后，《纽约时报》不慌不忙地又发表出一张特别放大的照片来，在这张照片上，一眼可以看到马修斯站在卡斯特罗的身边，而卡斯特罗领导人武装起义者们又围绕在他的周围。

事实胜于雄辩。这张图象清晰的照片，当然比文字语言更令人可信。巴蒂斯塔政权对马修斯报道假新闻的指责，马上彻底破产了。而这样一来，马修斯的新闻报道，更具有了在全世界各地的轰动效益。

当时，这样的具有世界性轰动的新闻从美洲传到世界的时候，自然也传到了埃及，而当时日理万机掌握着埃及革命政权的纳赛尔总统，自然也还是注意到了这一条新闻。

纳赛尔总统一向胸臆广阔，他一向密切关注着世界形势，特别是关注着世界革命形势的。他的视野从来不是狭隘的。他没有任何不良的嗜好和不健康的习惯，但是他总是喜欢沉默寡言，还有喜欢专注地学习和阅读的爱好的，他每天都要阅读埃及的阿拉伯文报纸，特别是，他总是要非常仔细地阅读埃及的《金字塔报》。他阅读这家报纸的所有社论和重要文章。除此以外，他也大量地浏览外国的报纸。他能高水平地掌握英语的文字和会话能力。所以，有一些较大影响的世界性英文报刊，也是他经常浏览的对象，像伦敦的《泰晤士报》，美国的《纽约时报》，他总是要不时翻阅浏览的。而在这样的阅读和浏览中，他十分自然地也注意到了《纽约时报》对卡斯特罗领导古巴革命起义军在古巴揭竿而起闹革命的新闻和消息。

这消息当然极容易引起他的注意。

这消息肯定会令他在最初看到的时候，就会产生兴奋和鼓舞。在美帝国主义的鼻子底下的美国势力范围之内的小小岛国，揭竿而起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走狗政权的革命斗争，不能不令人视为是开怀的快事，不能不令人拍案叫绝。

但是，纳赛尔总统不是寻常的普通人，他是胸有颇深城府的战略家。在他最初看到《纽约时报》上登载的关于卡斯特罗领导古巴革命的消息时，在他脑海里，开始涌起的思考，有两个问题，其一，这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其二，这场革命的前途，其胜利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纳赛尔总统不仅是埃及的备受人们热爱的总统，同时，他也是广阔的阿拉伯世界广泛乐于推崇和承认的领袖，因此，纳赛尔总统自然也还是忠诚而虔诚的穆斯林信徒。

但是，纳赛尔总统也是具有现代文化和思想眼光的杰出人物。他的胸襟意蕴，从来都绝不仅仅置于阿拉伯世界和穆斯林世界的范畴。

他从来也还以极为宽广的胸襟，关注着这个世界以外的其他各国人民，各民族人民的正义的、解放的事业。凡是正义的事业，民族解放的事业，特别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事业，纳赛尔总统总是给予最忠诚的支持和同情。

因此，在他看来，当时，在古巴已经开始展开的，由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如果确实是反抗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伟大的民族独立和争取人民民主的革命，纳赛尔总统本人，以及埃及国家和人民，对这场斗争，无疑也会给予全部可能给予的同情和支持的。

然而，如果确实是这样性质的革命，就是在美帝国主义嘴巴的虎须可以

触及的地方展开，美帝国主义会怎么样呢？美帝国主义会麻木不仁，听之任之吗？而如果它不听之任之，那样的结果，又将会是怎么样呢？

纳赛尔总统为此曾经联想起了危地马拉共和国的遭遇。1954年，危地马拉的民主政权，人民革命，最终不是像被美国佬吞食香蕉一样地剥皮吃掉了吗？

纳赛尔总统曾经是密切注视过危地马拉的人民革命事业的。毋庸置疑，在这种密切的注视中，纳赛尔总统总是同情危地马拉人民，站在危地马拉人民一边的。可是，危地马拉人民的充满民族独立热望，充满人民民主激情的革命，最终是令人痛心失败了。

为什么会失败呢？纳赛尔总统的眼睛，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他眼睁睁地看到了，危地马拉革命的失败，原因就在于，危地马拉离美帝国主义太近了，它完全处在美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之内，它怎么能在危地马拉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时候，不会进行冷酷无情的镇压和蹂躏呢？简直是不可能的。

所以，危地马拉革命的失败，简直是个明显的前车之鉴。

因而，纳赛尔总统在最初的时候，看到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在古巴发生的消息，他是亦忧亦喜，喜忧参半的。他曾产生过对古巴革命者命运的担忧。

但是，后来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而且是迅速地发生了变化。在埃及革命飞跃发展的进程中，纳赛尔总统也热切地注意到了古巴革命的突飞猛进的飞跃和发展，特别是在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的胜利进程中，纳赛尔总统进一步认识到站起来的革命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因而敢于在帝国主义的腹部开刀，并且完全有可能赢得胜利的情况下，他对古巴革命的进程也充满了期待，充满了对古巴人民在美帝国主义的鼻子底下大胆进行革命斗争而且终能赢得胜利的热望。

纳赛尔一向认定美帝国主义是世界帝国主义的堡垒和元凶。因此，纳赛尔总统一向极为鄙视、仇视美帝国主义。纳赛尔总统在许多时候，在经常的讲话中，有一最爱说的口头禅，这就是，他每逢谈到埃及人民的胜利，或者谈到兄弟国家的胜利事业和胜利发展的进程时，总爱说上一句：“让美帝国主义气死吧！气死吧！”

所以，后来，随着古巴革命的飞速的、惊人的，甚至令人不可思议的顺利的发展和赢得胜利，纳赛尔总统简直极为开怀，极为高兴。为此，他不止一次联系古巴革命的伟大胜利，痛快他说过：

“让美帝国主义气死吧！”

“让美帝国主义气死吧！”

这时候，人们就可以看到了，纳赛尔总统事实上，对古巴人民的革命斗争和革命胜利，深怀着多么深厚的感情了。

而古巴革命，和埃及革命，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不知怎么巧合而来，这两个国家的不同性质的革命，却都与一个日子有着不可不令人好奇注意的联系，这就是“7月26日”。

1952年，纳赛尔领导埃及自由军官团奋起革命夺取埃及国家政权的胜利之日，是7月26日。

1953年，卡斯特罗领导古巴革命大学生奋起革命攻打蒙卡达兵营，行动选定在7月26日。后来继续组织的革命团体，就定名为“七·二六运动”。

而时间到了1956年7月26日，纳赛尔总统又是在这一天，宣布了埃及

从英法帝国主义手中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

而这一次的埃及的7月26日的惊天动地的壮举，再一次激动了蒙受严重挫折的，在墨西哥城中正在准备启动革命行动的古巴革命者。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联系呢？是一种完全的巧合，还是本来就具有着实在的联系呢？或者，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巧合，也就自然地就产生出某种联系吧。古巴革命和埃及革命，实在在内在的深处，在感情的共鸣方面，即使原来没有什么联系，后来也会必然地发生深刻的亲密的联系。

果然，从苏伊士运河到加勒比海，从革命胜利中的古巴到胜利的革命进程中的埃及，在古巴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起义军刚刚夺取胜利果实，建立革命政权还处在热月的时期，1959年的5、6月间，卡斯特罗派遣他最信赖，也最器重的切·格瓦拉，首先来联系的兄弟国家，就是埃及，就是开罗。

在那一次来访时的切·格瓦拉，满身似乎还披着没有来得及洗刷干净在战火中落在身上的硝烟灰尘。他当然是风尘仆仆而来的。因为一场刚刚结束的摧枯拉朽的创造奇迹的伟大战斗，似乎只是刚刚发生在昨天，许多新闻记者的摄影和报道，远还没有追赶上古巴革命迅速发展同步的进程，许多宣传和事变的真实报道，还没有充分的展开，人们还没有非常谙熟在这场革命中哪些人是伟大的英雄，哪些人扮演了最主要的角色，许多人一时还并不十分的清楚知道完全的底里，这很象是在1952年埃及革命刚刚胜利时候的情况一样，那时候包括那次革命的革命委员会主席纳赛尔，一直仍然肩佩中校军衔，默默地隐蔽在舞台的帷幕之后而并没有立刻站到舞台的中心位置上来。那时候的纳赛尔中校，采取得是那样的活动形式。在这一点上，古巴人是否也欲模仿，很难为人所知。但是，总之，当1959年5、6月间，切·格瓦拉第一次来访埃及的时候，他最显赫的职位，不过是一个军衔为少校的哈瓦那要塞的司令，其他职务他还没有，几乎仍然还是一个没无闻的人物。

但是，因为他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派遣来的，因为他是作为古巴的革命代表来的，因此，尽管当时切·格瓦拉还不特别显得重要和显赫，他来访开罗的第二天，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总统，还是亲自接见了，切·格瓦拉少校。

而最令人惊讶的是，纳赛尔总统第一次接见切·格瓦拉少校，他们没有经过更为深入的谈话，一开始相当矜持郑重的，甚至是极为严肃的双方，几乎是在眨眼间就变成了亲切的热情的，仿佛是兄弟老友重逢的双方。

切·格瓦拉把埃及革命作为一个伟大样板，把古巴的革命者引以为镜，把纳赛尔总统如何作为一个胆略冲天的伟大革命英雄受到古巴革命者的尊敬和钦佩的真实情况，告诉给了纳赛尔。

格瓦拉特别说到：

“埃及，作为一个疲弱的古国，在力量的对比方面，和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英、法帝国主义集团比较，可以说是沙丁鱼和大鲨鱼一样具有差别。但是1956年炎热的夏天，在墨西哥城，当我们刚刚起步的革命步骤，遇到了一次严重峻的挫折的时候，有的人怀疑起了我们自己的力量来，那时候，我们清楚地估计，就我们的力量而言，我们实在仅仅可以比成是小小的沙丁鱼，而我们给自己确定的革命目标和革命任务，是抱负要吃掉和吞下有如大鲨鱼一样强大的敌人。沙丁鱼怎么可以吞下大鲨鱼呢？这样的怀疑不能说是没有根据的。怎样回答这样的怀疑，解开这样的怀疑呢？恰好就在那样一个时候，埃及收归苏伊士运河，奋起勇敢地打击英法侵略者老大帝国和对以色列战

斗，而且，事态的发展是，埃及人民赢得了完全彻底的胜利，这叫我们第一次大开眼界，活生生地看到了沙丁鱼吃下并消化了大鲨鱼的美丽奇迹，这对我们的鼓舞，会是多么巨大呢？简直是无法比拟，最关键的时候，给我们注入了最宝贵的动力，这就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使我们终于更大地鼓足了献斗必胜的信心和勇气。所以，我们可队非常坦诚他说，埃及革命，纳赛尔总统顶天立地的惊人胆略，给我们古巴革命的趋动力，是非常难以估量，非常非常巨大的。”

切·格瓦拉说得很真诚，很实在。他在说出埃及革命对古巴革命的影响和推动的时候，切·格瓦拉的沙丁鱼吃大鲨鱼的这个形象的比喻，反过来给了纳赛尔总统极大的启发，纳赛尔总统引起了深刻的哲学思考。他马上反过来，也认识到古巴革命英雄们的冲天的革命胆略和气概。原来，他们有这样的胸怀和志气：沙丁鱼吃掉并消化大鲨鱼，怪不得古巴革命会是那样果决地展开，会是那样果毅地夺取到最辉煌的胜利呢，主要的原由，也许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冲天的气概吧！

纳赛尔和切·格瓦拉，思想感情开始了深刻的共鸣和交流，这第一次会晤超过了礼宾司商定预定的时间，又延续了连续好几个小时，后来纳赛尔和格瓦拉两个平时都是寡言少语的人物，忽然双方都如江河奔流，滔滔不绝地展开了打破一切边界的交流和对话，他们好像从来就是推心置腹的老朋友一样，完全无话不谈起来。

而且，就在这一天他们俩人第一次见，立刻变成莫逆之交进行一番超过预定时间的深谈长谈，在行将结束这场谈话时，纳赛尔总统不管他自己肩上的担子多么沉重，事务多么繁忙，他和切·格瓦拉商量，要求格瓦拉在接下来的新的一天到来时，他们再接着深谈，接着畅谈。

切·格瓦拉，当然是欣然接受了这个令人愉快的约定。

家庭宴会上的真情

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生于1918年1月15日。

他比切·格瓦拉年长整十岁。

纳赛尔出生在埃及纪罗河三角洲的上埃及地区。

切·格瓦拉出生在阿根廷的名城罗莎里奥。

他们俩的出身家庭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出生在比较富裕的多子女家庭。他们在家庭的兄弟姐妹排行中，都是老大。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相似之处是，他们俩所处的家庭背景，都还有着相似的母亲家庭更为富足的背景。纳赛尔的母亲是一个大承包商人的女儿。切·格瓦拉的母亲是一个大马黛茶庄园主的女儿。他们的家庭，都得到过母系家庭经济方面的强有力的支持。纳赛尔的父亲性格宽厚，母亲异常精明。切·格瓦拉的父亲性格老成，母亲聪明好动。纳赛尔和格瓦拉，都曾备受他们家庭的极至关怀和宠爱，同样都在八岁前开始接受家庭的非正式教育，从八岁以后开始进入了正规学校上学。后来接下来都在良好的环境中，接受了系统的中学教育和高等学校的教育。纳赛尔在高中毕业后，最初准备选修法律，准备将来作一个法学家，但是，后来又被军事学院吸引，他成了开罗军事学院的大学生。格瓦拉在高中结业后，原来准备选修文学，期望将来作一个文学家，但是后来又被医学所吸引，他成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院的大学生。

格瓦拉和纳赛的尔脾气、个性，有许多相似相近之处，他们俩人从年少的时候开始就喜欢阅读，特别喜欢阅读高尚的文学作品的爱好也是极为相近的。

格瓦拉在少年时期，最初开始，结合学习和掌握法文法语，在父亲母亲的指导下，他大量地阅读了法国的许多文学作品，后来更大大拓宽了他的阅读范围，他受到了文学作品的极为深厚的熏陶。

纳赛尔在这方面，也与格瓦拉有着近似的阅历，他从很早开始，通过阿拉伯文译本，在大量地阅读埃及和阿拉伯经典文学作品的同时，也大量地阅读了许多世界文学的经典名著。法国维克多·雨果的《悲修世界》，狄更斯描写法国革命的小说，拿破仑的传记，卢梭和伏尔泰等人的著作，都对纳赛尔进行了深刻的熏陶。纳赛尔特别赞赏法国人文革命的思想家伏尔泰，早在纳赛尔还是一个中学主的时候，他就在一家中学主刊物上，发表过一篇题为《伏尔泰——自由的斗士》的热情赞扬伏尔泰的文章。他热情地赞赏伏尔泰反对统治阶级滥用权力和宗教进行神权统治的思想、纳赛尔赞赏伏尔泰的思想“冷静而不残酷”，他非常崇拜伏尔泰。

而对伏尔泰和卢梭，格瓦拉也从小就阅读他们的著作，熟知他们的思想，信念，自然也是这些思想巨人的崇拜者。同时，格瓦拉也曾迷恋过写诗，以至到他后来，甚至陪伴他终身的情愫，都包括着热爱诗歌，大量的阅读诗篇和试图写诗的激情，这一直到他的最后，他在玻利维亚的尤罗山峡被凶残的刽子手们杀害以后，人们在他了无半点儿可以供食的给养背包里，所发现的三个小本本里，其中还有两个本本是诗集。

格瓦拉毕生都有着浓烈的对文学的热爱和诗人的情愫。

共同的，良好的教养、文化修养、人文情愫，也使纳赛尔和格瓦拉在广泛的思想语言的交流共鸣点上，迅速把他们的相知和相亲，感情和友谊汇合了起来。

在纳赛尔总统的性格深处，他是喜欢离群索居，落落寡合的。但是，这

样的性格，并不影响他结交大批的至为亲密的朋友，在埃及国内，从他年轻的时候开始，以及到后来成为埃及革命的领袖，纳赛尔总统始终有着众多的不仅是忠实忠诚的追随者，而且也往往是极为亲密的，兄弟般的朋友。

在国内如此，在国际上也是如此。

在二十世纪国际政治史上，有一个非常能够令人灿然开眼的奇观，那就是在广泛开展的国际交往中，曾经有过一个几乎叫人迷惑不解，难以置情的最伟大的朋友的圈子，这个圈子是逐渐形成，进而牢不可破，贯彻始终的。

在这个圈子里，处在环节位置，或者说中心位置上的，是纳赛尔总统。

纳赛尔总统在国际政治生活的交往中感情笃深，最可钦佩尊敬的朋友，包括着伟大的中国总理周恩来，伟大的刚果总理卢蒙巴，伟大的加纳领导人恩克鲁玛和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

纳赛尔伟大的朋友，尊贵的朋友，是可以开出一个很长很长的名单的。

但是，还有一些纳赛尔总统不仅在国际交往中，而且在私人的交往中，感情情致特别特殊的国际伟大的政治家，与纳赛尔总统形成了一个极为令人惊奇的至诚的伟大的朋友圈子。在这个伟大的朋友圈子里，包括着年龄最长的，出生于1889年11月14日的，来自崇信佛教的印度的，伟大杰出的国家领导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包括着年龄居中的，出生于1892年5月7日，来自南斯拉夫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南共联盟的主席和南斯拉夫总统约瑟夫·布罗兹·铁托；接下来的一个，便是于1918年1月15日，出生在笃信伊斯兰教的埃及的，埃及革命的领袖和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了。

尼赫鲁比铁托年长三岁。

铁托比纳赛尔年长二十七岁。

纳赛尔恰好比尼赫鲁年轻三十岁。

他们是三个年龄差距相差甚大，信仰和生活习惯绝不相同，民族各异和有着完全不同生活经历的世界著名政治家。是民族独立的革命潮流，和不结盟运动的国际政治，把他们连结到了一起，使他们成为了兄弟手足般的最亲密的朋友。

尼赫鲁、铁托、纳赛尔，他们三个国籍、民族、信仰各不相同的二十世纪国际政治家，他们之间在这个世纪，在这个世界上，在最动乱的世纪风云变幻最复杂诡谲的年代里形成的特殊友谊，其传奇色彩，几乎可以比作是中国古典文学《三国演义》中描述和表现的中国历史上的刘备、关羽、张飞的“桃园三结义”，几乎实在具有同样的传奇色彩。

尼、铁、纳，他们的这个特殊的朋友圈构筑成一个结构以后，他们三个人，几乎总是极为频繁的互访，三个人经常会比较长时间地访问贝尔格莱德，访问新德里，更多的时候，他们经常聚会的地点是开罗。在他们三人的各自领导的国家里，不管那一国遇到了麻烦或困难的问题，他们都几乎会毫不例外地聚会相见，进行一番非正式的，然而是最为至诚的磋商。

1956年，在纳赛尔总统准备进行一场小鱼吃大鱼的举措，正在酝酿毅然决然从英、法帝国主义者手里，收归苏伊士运河的前夕，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被纳赛尔请到开罗，他们共同讨论广泛的问题，共同进行了至为细致极为周密的运筹，贾瓦哈拉尔这个极富政治斗争经验的聪明的智者，他作为印度从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压迫了冲出来获得解放和独立的最主要的印度领导人之一，他熟知英帝国主义的脾气个性和他们的独特行为，所以，他为纳赛尔下定决心宣布埃及把英法帝国主义者实行殖民掠夺的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肯

定地献计献策不少，给予了最为肯定的支持和鼓励。

至于铁托元帅，行为也是一样，如果纳赛尔遇到什么困难和麻烦，这位元帅几乎总是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手来，给予埃及和纳赛尔最为强有力的支援，而且，在一定意义上，铁托元帅还在纳赛尔总统所需要的时候，绝对给他无条件地提供避风港，在反击英法帝国主义和以色列的侵略战争时期，南斯拉夫总是纳赛尔总统和国际社会联系来来去去最为安全可靠的通道。而且，纳赛尔总统每次路经南斯拉夫，更不用说是每次来南斯拉夫正式访问，铁托总统总是打破一切礼仪规格，给纳赛尔以完全是兄弟般的接待。不仅在贝尔格莱德，有的时候，铁托总统还要邀请纳赛尔总统到他在地中海布埃俄里岛的私人别墅去，亲自驾着电瓶车，陪伴纳赛尔总统在他的庄园里，轻松地游览和休息，同时进行无所不及的畅谈。

这样，在1959年5、6月间，在切·格瓦拉第一次出现在埃及开罗之前，纳赛尔总统最为知己的推心置腹的国际政治家朋友，便是两个比他年纪很老的老人，这样的朋友，与其说是兄弟般的，还不如说是更近乎是父兄般的。但是，在切·格瓦拉出现在纳赛尔眼前之后，纳赛尔几乎是“桃园三结义外加赵云”一般地，又把切·格瓦拉视之为是一个足可以与尼赫鲁和铁托比拟的最为亲密的朋友。而且，格瓦拉比纳赛尔年轻十岁，他们的年龄距离与尼赫鲁、铁托比较，相距更小，于是他们俩个，纳赛尔与格瓦拉的友谊，也就更近乎有了一种完全是兄弟般的性质，因此，也就具备了更为亲切，可以格外随意的意蕴。

实在的，纳赛尔总统也是非常喜欢满怀赤诚的真挚感情，结交真正的忠诚而宝贵的朋友的。

正因为如此，1959年的仲夏时分，当纳赛尔总统第一次接见来访的切·格瓦拉，一见如故，立刻在交谈中亲切地产生感情融汇，产生强烈的共鸣，从而认定可以与切·格瓦拉建立至诚的朋友关系以后，纳赛尔总统马上兴奋地约定和切·格瓦拉，接下来在第二天，再畅怀进行深切的交流。

纳赛尔总统所以要这样做，更深层的原因是，他在通过与切·格瓦拉第一次的接触和谈话，他不仅是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了，古巴革命所陶铸出来的领导人，不仅仅是他已经接触到的这一位切·格瓦拉，还有在谈话中，切·格瓦拉总以满怀由衷敬佩的感情提到的菲德尔·卡斯特罗，甚至还有经常提及的劳尔·卡斯特罗，显然都是一些难得的罕见的杰出人物。纳赛尔总统听到了切·格瓦拉对埃及革命的由衷赞叹，听到了切·格瓦拉所说的，埃及革命对古巴革命的影响和鼓舞，纳赛尔总统完全能够听得出来，切·格瓦拉的话，是非常质朴的，诚挚的，绝不是虚饰和包含恭维，他的真诚，不仅能令人听到，而且也是完全能令人

深切地感觉到的。

而正因为如此，事实上，在纳赛尔总统内心的深处，引起了巨大的回响和震动，他从切·格瓦拉诚挚的陈述中，听到了古巴革命的领导人们，在他们展开进行伟大的革命战斗的行动时，明显似乎是更自觉的，是更富有伟大理性的，他们绝不是仅仅凭着满腔的激愤，一时的冲动，然后就草率地行动起来，完全凭借运气和机遇去达到目的，赢得胜利。不是这样的，纳赛尔总统从切·格瓦拉的交谈中，认识到了在古巴革命的全部进程中，从始至终，都是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和战略思想的，他们的目标是极为明晰的，他们的纲领是至为明确的，他们行动的每一步，都包含着至为深刻明晰冷静而坚定

的自觉。这是十分令人钦佩，十分富有价值的。因此，在世界各国各族人民所面对着的共同死敌帝国主义的面前，在领导人民向如此凶恶的帝国主义死敌进行斗争的前沿阵地上，出现这样的指挥员、领导人和领袖，出现这样的杰出人物，这是十分难得的，简直是真主对人类解放事业，进步事业和革命事业的赠予，是一种伟大的，宝贵的赠予，是一种宝贵的，伟大的力量支持。

基于这样的认识，纳赛尔总统不仅马上激发和产生了与格瓦拉加深友谊培植真挚兄弟感情的热望，他也开始产生出一种强烈的向往，他想更多地知道一些古巴革命的事情和古巴革命其他主要领导人，主要是菲德尔和劳尔这样一些主要人物的更为具体的情况，在他已经与切·格瓦拉成为兄弟般的朋友关系的同时，他开始热切地向往，将来也创造结识和见面的机会，以使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这些杰出的人物，也成为他的具有兄弟般挚情可以携手并肩战斗的革命战友。

纳赛尔是最知道朋友的珍贵的，他不仅需要珍贵的老朋友，他也渴望和需要珍贵的新朋友。他深知在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在进行与帝国主义集团和一切反动派进行伟大的斗争时，或者在这样的强大的敌人面前胜利地骄傲地鼎立着的时候，是需要革命同志的彼此相助和彼此相依的。

正是怀着这样的深切热望，纳赛尔总统向切·格瓦拉提出在第一天接见和谈话以后，在紧接下来的第二天，再接着进行与第一天会见和谈话可以衔接的交流和谈话。

而这第二天紧接着进行的纳赛尔与切·格瓦拉的谈话，完全已经没有了第一天见面时不可能没有的陌生感和拘谨。他们的感情升华的很快。第二天开始谈话和交流的时候，他们完全已经是感情可以融融流通的老朋友了。

他们的这一天的这第二次的见面和谈话，是从这一天的上午九点三十分开始的。

纳赛尔总统的在他的接待厅会客室里刚刚迎接切·格瓦拉落坐，非常亲切询问了格瓦拉休息的如何，能不能习惯开罗的生活，得到切·格瓦拉的满意的回答以后，纳赛尔总统便开始向切·格瓦拉扯开话题。

纳赛尔总统似乎很有兴趣地提问起了古巴革命领导人的生活习惯。

“你们在古巴是怎样生活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一天能睡几个小时。你看，我是刚刚半个小时之前，才从床上下来的。昨天晚上，我们结束谈话和会见以后，大约已经是零点时分了。我回到工作室以后；又处理一番国务工作事宜、电报文书。然后上床的时候已经是凌晨的三点四十分了。但是，我每天都是这样生活的。每天总是在凌晨三点以后上床，然后在早上的九点钟下床，喝一杯奶茶，接着就来上班，完全就像今天一样，几乎总是天天如此，除非有什么紧要事务，一般是不变化的。你们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是不是与这样紧迫的生活方式，也大有相似之处呢？”

格瓦拉回答说：

“当然，这样的生活方式，大约会是全世界所有革命忙人们的一种独特享受。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打游击的时候，在后来最紧张的战斗岁月，古巴的所有领导人，都和古巴起义军的士兵一样，完全过着同样的艰苦生活。领导人，往往是更忙，更辛苦的，睡觉的时间，领导人往往比战士们拥有的更少，那时候卡斯特罗和我们这些他的主要助手，常常白天参加战斗，晚间分析形势，制定战略，或者亲自带人去作最急迫的警戒和侦察任务，休息时间，几乎总是很少的。现在革命胜利，赢得了政权，开始比较有步骤的工作节奏以

后，逐渐也开始形成了新的生活规律。卡斯特罗以及我们一些人，大体上也和纳赛尔总统相似，几乎是每天按着相近的时间表工作和休息。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少校，每天晚上睡觉的时间，大约晚你一个来小时，每天凌晨四五点钟或六六点钟上床，八九点钟或十来点钟起床，每天保持着四个小时左右的休息时间，其余时间，几乎完全投入工作。”

纳赛尔总统问：

“吃饭呢？你们大家是怎样吃饭，都吃什么样的饭食呢？”

纳赛尔总统怀着兄弟般的，自家人的感情展开的这些话题，似乎很有意思。纳赛尔总统喜欢队人们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方面来了解人，了解朋友，甚至有的时候用这种方式来考察任何人，比如也门王国的王子来埃及访问，他不仅要埃及外交部提供这位王子的各种背景材料，还要求外交部有关人员，专门在事先来给纳赛尔总统讲述一番这位王子有什么样的生活习惯，脾气和爱好，甚至还先要了这位王子的几张照片看过，然后才接见这位王子和这位王子展开了接触。而在这样的接见和接触中，纳赛尔总统凭着看过一张这样照片，即从一张这位王子正趴在一棵树上嚼食大麻叶的照片，他已经得到了非常深刻而且正确的印象，完全可以非常正确自如地掌握和这位王子交往的分寸了。

纳赛尔如此了解人，甚至了解朋友，几乎已经成了一种程序，形成了他独特观察人和考察人的一种角度。这包括他对尼赫鲁和铁托总统，他在最初和他们相识和接触的时候，似乎也进行过这样的生活习惯方面的了解。纳赛尔总统以为，任何一个人的生活习惯和他的个性行为、品德禀赋，几乎总是有联系的。因此，他在最初和尼赫鲁这位伟人接触前，他就了解到了尼赫鲁喜欢清淡生活的习性，比如他几乎总是不吃荤腥，甚至连牛奶也不喝，最开荤的饭食，不过是偶尔吃一个鸡蛋，吃一片鱼干，而他汲取生命必须营养的饮食习惯，常常是只以蔬菜和水果维生，一只香蕉，可以是他的一顿饭食，几只榴莲，可以是他的一餐夜宵。纳赛尔对尼赫鲁的无比崇敬，几乎首先是从如此的尼赫鲁的清淡至极的主生活习性开始的。

与尼赫鲁的清淡至极的生活习性完全不同的是铁托元帅。这位徒工和士兵出身的元帅，和贵族家庭出身的尼赫鲁，在生活习惯上，确实有点几天壤之别。铁托元帅是喜欢大吃大喝，甚至是暴饮暴食的，他很能吃肉，很能喝酒，很能吞食面包，只不过，他喜欢大食大嚼的肉食，往往只喜欢是自己亲手烧烤出来的肉食，他所最乐于畅饮的各种度数的葡萄酒，几乎一定是他自己劳动栽植葡萄树，自己亲自动手酿造和储存的葡萄酒，而他最喜欢吞食的面包，也往往是自己亲手烤制的。不管在什么位置上，这位元帅，始终热爱劳动，喜欢自己动手，自食其力。纳赛尔总统从铁托元帅这样的主生活习性方面，也使他得到了对铁托元帅的深切了解，铁托元帅的如此生活习注，实在也表露出了他伟大人品的可尊敬的特质。

最有趣的是，纳赛尔总统除了喜欢以生活习惯来了解朋友的习性、心性的品质以外，他在他的行为中，甚至还经常以他的生活心性来考察人和检验别人，他有生活俭朴的习性，喜欢住俭朴的房子，在埃及革命胜利许多年以后，作为革命委员会的主席，作为埃及共和国的总统，他几乎仍然居住在以前他是一个中校军官的时候居住着的旧房子，即使后来为了安全的需要有过迁居，他仍然住在十分普通的房子里，绝不去居住过去留下来的王朝的金碧辉煌的皇宫，也不去住任何豪华排场的别墅。他绝不肯贪饰浮华。在埃及革

命即将发动之前几天，纳赛尔总统当时的中校军衔，按照正常的晋职年限，已经晋升为了上校。所以，在后来埃及革命后，有的人称纳赛尔为中校，也有的人称纳赛尔为上校，但是，从来也没有人称谓过纳赛尔为将军，更没有称谓过元帅。这倒不是说纳赛尔总统即使在后来也没有过称谓将军和元帅的资格。作为埃及军队的最高统帅，指挥近百万军民和世界上的老大帝国开战，胜利地赢得震动世界的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作为总司令，他有资格得到各种规格的光荣军衔，他的许多朋友的助手，事实上都得到了这样的军衔，有的人被称之为元帅，有的人被称之为少将，中将或上将，而纳赛尔总统自己，如果他有时候偶然需要佩戴军衔，他仍然始终只佩带着中校军衔或者是上校军衔。而他这样作的结果，在埃及似乎也并没有什么影响，并没有影响他的地位与任何威望和权威，只是他想不到他这样作的结果，在国外则是影响的，最大的影响就是发生在古巴。

在纳赛尔总统和切·格瓦拉第一次见面和交流中，还曾经有过这样一段非常有趣的对话。

纳赛尔总统问：

“切·格瓦拉少校，在古巴，你是少校，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少校，劳尔也是少校，据说你们还有多少少校，可是，为什么没有中校，没有上校呢？”

格瓦拉当时曾作过这样的回答，他说：

“这是由菲德尔和我们大家一起研究决定的。我们当初，所以不设中校，上校军衔，仅只以少校军衔为古巴革命起义军的最高军衔，有一个重要的考虑和比较就是，我们的最高军衔，不应超过埃及在苏伊士运河反侵略战争中，打败英法帝国主义和以色列侵略军的埃及革命领袖物最高司令的纳赛尔总统的军衔。我们不可以高于中校军衔。”

对于切·格瓦拉的回答，纳赛尔总统十分感动。但他同时马上表示了欠意。他表示了遗憾。纳赛尔总统说，他真没有想列他的低军衔，竟然影响了古巴少校们的军衔提升。然而，他在和切·格瓦拉的谈话中，他仍然请求格瓦拉和其他古巴少校们原谅，他仍然不准备调整自己的军衔，当然，他也真的郑重地表示，希望古巴的少校们的军衔晋升，从他发出郑重的请求以后，最好不要受他的影响，他请格瓦拉一定把他的郑重请求，转达给菲德尔·卡斯特罗。

切·格瓦拉当然也郑重地作了表示，他将一定转达。

真的，后来又是多少年后，直到纳赛尔总统年仅五十二岁，积劳成疾，最后因心脏病突发猝然而死，他也不曾调整过他的军衔。

他的军衔，始终只是上校。

像加麦尔·阿卜杜拉·纳赛尔这样不尚虚饰，不尚浮华的伟人，在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

纳赛尔总统不居华室，不尚虚饰的美德，是令世人皆知的。纳赛尔总统在个人生活饮食习惯方面的一些情况，似乎也还鲜为人知。

纳赛尔总统也是出身军旅，但是军校生活也曾十分清苦，即使在庆祝生日的时候，也不过是吃一盘扁豆，吃几个栗子，外加上几支甘蔗。可是，后来，由于频繁地经历中东的多次战争，多年在野战的战场里摸爬滚打，在饮食习惯方面，也养成了堪说是暴饮暴食的习惯。然而，尽管如此，也是只求餍足，不求美食佳肴，吃饭喝水，只求吃饱解渴就行，不讲究滋味。他的食谱几乎总是千篇一律，一日三餐，差不多总是米饭、蔬菜和鸡肉，刺激性的

饮料他一口不喝，除了果汁之外，他完全是滴酒不沾，他这种饮食习惯，在埃及的政界军界上层，是最粗淡的一种习性，许多埃及的军政高官都几乎接受不了，他们习惯了讲究佳肴美食，适应不了粗茶淡饭，因此，许多部长和将军，在造访纳赛尔总统时，都最怕纳赛尔总统留饭，在这些官员们中间流传着一种并非玩笑的说法，那就是，谁若让纳赛尔总统留过一餐饭，陪吃过一餐饭，那完全就等于是受过了总统的一次惩罚。而这些官员们当然也还知道，凡是纳赛尔总统留他们在私邸吃饭时，纳赛尔总统肯定会通过他们的吃相考察他们。凡吃总统粗茶淡饭加蔬菜鸡肉显得十分香美的官员，纳赛尔总统似乎就会对这位官员的清廉品质感到放心。

从起居饮食习惯方面考察人和了解人，也许逐渐形成了纳赛尔总统考察人了解人的一种习惯性的方式；和他习惯或喜欢掌握的一种了解人和观察人的特别角度，所以，他在今天和切·格瓦拉展开一次新的亲切的，兄弟般的谈话时，他向格瓦拉打听过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及其他领导人的休息习惯后，紧接着又提出了关于古巴领导人的吃饭习惯问题。切·格瓦拉回答说：“关于吃饭问题，古巴人在这方面的教训是很多的。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打游击的时候，我们最昔不堪言的时候，往往是长时间缺粮断炊，常常在很多天内吃不到一点东西，因此肚皮完全饿瘪的时候，而是在这之后，忽然遇到了什么吃食，有的时候是不得已杀了一匹马来吃肉，有的时候是找到了一些其他什么可食的东西，包括猫、生蟹、各种各样的爬虫，或者是玉米面包之类的东西，在饿极以后来吃，我们常常会不仅暴饮暴食，而且一吃就吃很长时间，经常整夜整夜的用来吃饭，然后吃得所有的人都不能再迈开脚步走路，所有人再弯不下腰来，直喘着粗气，然后就是接下来的放屁和沉睡，那才是最苦不堪言的时候。还有就是我们在最紧张最急迫行军的日子，不仅长时间的吃不上饭，更可怕的是吃不上盐，在多天吃不到盐的状况下又不得不吃兔肉，生老鼠肉的情况，那也真叫苦不堪言。不过，在古巴革命胜利后，我们不再有这样的饮食困难了，我们一度因为不再奇缺任何食品，甚至也不再缺乏什么酒类，我们曾试着放开来过瘾，每夫好好认真来吃饭、吃肉，甚至大量的喝酒，喝各种异味而有刺激的饮料。可是后来，我们发现，虽然这些可吃可喝的东西绝对并不亏乏，特别是领导干部们享有这样的食物和饮料，是可以有保障的。然而，可怕的是，这样吃喝下去，最大的浪费是我们的工作机会和时间，每天有许多时间消耗在吃饭事务方面。简直过上了无异于蠢猪的生活，所以，我们觉悟起来，很快警惕了起来。从此，菲德尔·卡斯特罗就带头节食，每天绝不贪食任何食物，每天严格规定只吃两顿饭，绝不再多吃一顿。卡斯特罗每天的两顿饭，一顿在上午的十一点钟进食，下一顿要在晚上七八点钟以后。我和劳尔，也执行这样的吃饭制度，非常严格地执行，晚上进入后半夜以后，如果饥肠辘辘，如果还要坚持工作，我们宁肯喝一杯加放糖块的咖啡，也绝不再进任何食品。”

切·格瓦拉说着。

纳赛尔总统一直专注地听着。

当切·格瓦拉说到这里时，纳赛尔总统禁不住“嘿嘿”笑了起来，他非常罕见地显示着幽默，忽然打住切·格瓦拉的话说：

“少校，尊敬的少校！你们既然下定决心，准备如此这般地和你们自己的肚子过不去，准备这样厉行节食，我想古巴的土地，即使不实行土地改革，也不存在问题了。你们用不着很多的粮食，干吗要迫不及待地操心土地改革

的问题呢？”

格瓦拉也笑了起来。

切·格瓦拉接着说：

“我们即使真的不吃粮食，或者即使古巴真的不缺粮食，我们也会关心土地改革的。我们解决土地改革的问题与其说首先是为了解决生产力的问题，还不如说先是为了解决剥削和压迫的问题，首先是为了解决世道的不平问题。在1952年革命以后，当时埃及并没有发生饥荒，可是你们自由军官团领导的革命，不是也曾迫切地提出了土地改革的问题吗？”

纳赛尔总统说：

“是啊，确实的，我们当时，首先也是为了解决世道不平的问题。世道不平，我们的革命，就不会有平坦发展的基础。不过，我们要想有这样平坦发展革命的基础，在最初，当我们开始厉行土地改革的时候，我们的同志，我们自由军官团的许多成员，并不是全部完全支持土地改革政策的，因为他们中间，有些人，家庭出身也可能是拥有很多土地，土地改革政策将要针对到他们的家族家庭的时候，有的人就站出来，反对土地改革政策，这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样的情况，你们古巴也不会是完全没有的吧？我估计可能也总会有的吧？”

纳赛尔总统谈到了切·格瓦拉此次来埃及访问，主要要进行的使命，即考察埃及土地改革的话题，纳赛尔总统的语调显得特别郑重起来。他并非不经意地提到埃及在制定和实行土地改革时遇到的问题。提到在古巴实行土地改革也可能遇到同样的问题时，他忽然顿了一下话题，他看着切·格瓦拉说：

“切·格瓦拉少校，我已经知道了，你的根是在阿根廷。那里有你的家庭、家族。我已经知道你的家庭，曾经是大庄园主，知道你的母亲曾经继承过几万公顷土地的土地遗产，可谓是阿根廷很大的地主了吧？我现在想向你请教的问题是，假如你现在的土地改革经验，制定和执行土地改革政策在阿根廷施行，还会是完全满腔热憎，全心全意的吗？”

切·格瓦拉告诉纳赛尔总统说：

“我的家，我的母亲塞莉娅女士继承的上万公顷的马黛幕庄园，后来在我父亲的经营过程中，已经由于经营不善，转卖了出去。所以，现在把埃及的土地改革经验用在阿根廷，将不会对我家的其他拥有财产，再发生任何触及。不过，埃及的土地改革政策，如果用到古巴的时候，确实倒会直接地，非常直接地触及到我们的革命最主要最重要的两位领导人的家庭。他们俩人的家庭，无疑是古巴奥连特省最知名最大的地主。这两位属于这样大地主家庭的古巴主要领导人，并不是别人却正好就是菲德尔和劳尔两个。他们的父亲拥有的甘蔗田，大约有一万三千多公顷之多，他们的母亲，也还有一大部分所继承的土地遗产，大约也有数百公顷，这样大的土地拥有者，在古巴实行土地改革时，肯定会被根深刻的触及到的，而且，还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也是绝不会有被例外和保护的可能。”

切·格瓦拉说得十分冷静。

纳赛尔总统听得十分冷静。

格瓦拉说出了已经说出的这些情况后，他打住了话题，不知接下来还该怎么说。

纳赛尔总统听过切·格瓦拉的陈述，他心的深处，肯定引起了回响和震动，但是，他似乎不再想继续刚才的话题了。

他沉默了片刻。沉默了相当时间的一刻，接下来，他对格瓦拉说：“土地改革，对任何一个民族独立的国家，摆脱封建主义的桎梏，实行真正的民主，摆脱殖民者的剥削和压迫，都是最重要的一项基础性的，必须进行的革命性的工作，当然，在采取革命的策略时，可以同时采取温和的或者是铁腕的手段，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实施有步骤的政策，在埃及，在本民族内部实行的土地改革，第一，我们也执行了全面改革的重新分配土地的方针，目标在于使广大的凭借土地赖以生存的人民，都能得到他们可以得到生存寄托的土地；第二，我们总结了一些其他国家的土地改革经验，比如印度的经验，我们在实施民族内部的土地改革时，在更多的情况下，是采取了虽然仍不失彻底和坚决，却也还是包含着充分耐心的比较温和的手腕。我们没有搞枪毙富农和打倒地主的动作。我们在使无地农民得到可以生产劳动的土地以后，也还保留了以前的土地大拥有者们的生活生存基础，不过，因为土地已经重新经过分配，他们对农民的过分的剥削和压迫，显然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过分也是不能被允许的了。”纳赛尔总统语调清晰，逻辑严密的给切·格瓦拉介绍着埃及的土地改革政策和实施土地改革的经验，但是，仅仅说过这些比较原则的活题以后，他又想在和格瓦拉继续谈话时，打住这样的专门性业务内容很强的活题。纳赛尔总统接下来讲：

“不过，关于埃及土地改革的问题，我们还是有专门从事这方面工作和研究的专家的。我们当时在领导这项工作方面，也就是直接主持全国土地改革的领导人，曾经也是一位军官，是一位很有头脑的军官，他的名字叫加麦尔·萨利姆。我说他很有头脑，可以告诉你的根据是，我们这位加麦尔·萨利姆，在受命负责专门领导埃及的全国土地改革事宜时，他马上非常聪明地聘请和依靠了两位重要的顾问来充当他的帮手，而且，这两位“进步人士”，其中一位是被列之为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的名叫艾哈迈德·福阿德的经济学博士，另一位更了不得，是共产主义者的圣经《资本论》阿拉伯文的翻译者，也是一位经济学博士拉施德·巴拉维。有着这两位有资格的经济学家权威的帮忙，加麦尔·萨利姆在解决土地改革中遇到的一切问题时，也就用不着发愁没有办法了。”

纳赛尔总统说到这里，难得有这样的表情，不无狡黠表情微笑着看了一眼切·格瓦拉，接着说：

“我向你介绍这样的情况，是想告诉你，你如果还想特别深入全面地考察和了解埃及土地改革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情况的经验办法的话，你也不必发愁，我们已经作出了安排，准备请加麦尔·萨利姆医生，和那两位高级的经济学家、土地改革专家，向你来介绍情况，他们对你的一切问题，都会有问必答的。”

格瓦拉说：

“这样很好。非常感谢纳赛尔总统周到的安排。”

接下来，纳赛尔总统说：

“我的吃饭的时间到了。我很想邀请您和我一起来吃一顿家庭式的便饭，我们接着边吃边谈，好吗？我们这样吃饭和谈话，可以得到你们古巴领导人现在讲究的吃饭效果，可以非常节省宝贵的时间。”格瓦拉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十分开心。他当然非常爽快地接受了纳赛尔总统便饭招待，不搞任何祝酒之类的礼仪程序和排场动作，吃饭就是吃饭，而且边吃边谈，这实在是一种最亲切而又经济、实惠的吃法。于是，就在纳赛尔总统的会客室的侧而的

一间并不容小的小餐厅里，纳赛尔总统和格瓦拉围着餐桌坐了下来。饭菜马上端到了他们各自的面前，每人满满一大盘于，当然主食还是米饭，此外是番茄汁鸡块，还有凉拌的扁豆和卷心菜、菠菜、饭料是果汁，绝不备酒。

除了每人各自一盘的饭菜以外，一盆子白生生热腾腾的米饭还摆在餐桌的当间，还有另外一只烧烤的很嫩的童子鸡，也摆在盘子里，摆在餐桌的中间，旁边加放着胡椒瓶和装着精盐的小瓶。显然，这是如果分到盘子里的饭菜还不够足食以外，是可以另加的饭菜，那只另烤的童子鸡，可以是期望餐桌边的食客别开胃口，再来补充和加食的。

这样的便餐，明显的家庭气氛，用不着繁文缛节的礼仪表演。纳赛尔总统略作了个请用餐的手势，格瓦拉和纳赛尔总统便一起操起长柄的不锈钢饭匙，铲起盘子里的饭菜开吃起来。

纳赛尔总统原说要边吃边谈的。

可是，格瓦拉那里能容他边吃边谈。这位少校，实在难减大兵本色，他一到餐桌边，说吃饭就吃饭，马上大吃大嚼，十分香甜可口地大吃着米饭和鸡块，并且连声赞叹“好吃！”“好吃！”，而吃起来，简直是风卷残云。

纳赛尔总统看着格瓦拉的吃相，不禁笑了起来，忙说：“慢吃，少校，有的是饭菜，保证你够吃，不要太忙。”

格瓦拉坦白他说：“在正式的宴会上，我的这个肚子很难吃饱。又是礼仪，又是碰杯祝酒，许多外国大使和他们的夫人们，还有许多男男女女的记者们，眼盯盯地盯着看你，一分钟一秒钟不停歇地冲着你照相，怎么能吃喝。事实上也不敢大吃大嚼，如果大吃大嚼，丝毫不讲吃相，帝国主义及那些走狗老爷们，更会造谣说我们是一些生性原始的吃人的生番了。然而，总统，现在我是来到了你的，兄长般的家庭宴会上，只有你在看着我吃饭，我也就没有什么担心和顾虑，吃起来，吃什么，怎么吃，自然也就不在话下了。”

纳赛尔高兴他说：

“那就吃吧，吃吧，尽情地吃吧，我在当少校的时候，比你现在吃饭还猛，吃得还多，仅仅几年前，我也还能很多很多的吃喝，可是，后来，有人向我发出了警告，是我们的先生，然而，有的时候，我还是想吃，不过，有的时候，也有了怎么也吃不下去的时候。”

纳赛尔总统现在吃饭的节奏，显然比不上格瓦拉的快捷，因此，尽管格瓦拉吃饭的节奏很快，纳赛尔总统事实上仍然还是在与他边吃边谈。

终于，切·格瓦拉从贪吃的饭菜盘子上，把一直埋伏着的蓄有卷曲的蓬松的连鬓髭须大胡子的脸盘抬了起来，显然他已经非常香甜可口地吃得很足，吃得很饱了，因此，他现在有功夫从食盘子上抬起头来看着纳赛尔总统了。

他抬起头来，眯虚起眼睛来看着纳赛尔总统，饱食显然使他十分满足和兴奋。他显然是吃到了一餐香甜的开心饭。

他抬起头来，不无真诚感激地望着纳赛尔总统，他满脸忽然还近平洋溢着一脸的孩子气。

纳赛尔总统几乎忍俊不禁地差点喷饭笑了出来，他看着切·格瓦拉抬起头来的脸盘，只见他满脸卷曲的鬃髭上，不仅披附着好几个饭粒儿，而且还沾上了好几点几浓红的番茄汁，脸相实在完全是变成了一个似乎刚刚吃过一餐美食的孩子的脸。纳赛尔总统笑着，看着格瓦拉这张孩子般的脸，他差点儿笑的鼻子都酸了，他忙指着格瓦拉的脸说：

“快擦擦，快擦擦你的脸，擦擦你漂亮的大胡子上的饭粒儿和番茄汁，快擦擦吧！”

格瓦拉马上操起了餐巾来，擦尽了挂在胡子上的番茄汁和饭粒儿。这时候，他似乎也有些腼腆和羞怯起来。他静静地正襟危坐起来，看着纳赛尔总统终于也搁下的饭匙。

纳赛尔总统任何时候都极为注意和把握分寸。他感到了格瓦拉的羞怯，于是不再谈论菜饭和吃相之类的问题，在接下来细细地饮吮果汁饮料时，他忽然又向切·格瓦拉发问说：

“切！说真的，你的蓬松的，卷曲的大胡子很漂亮。你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的大胡子，都根漂亮。我还没有和他们两人见过面，但是我已经看过了他们两人的许多照片和录像，知道他们两人都像你一样，蓄有着这样的大胡子，你们的大胡子现在全世界都很有名，你们古巴革命领导人 的大胡子是很独特的，几乎也是很令人羡慕的。不过，我注意到，所有的拉丁美洲人，包括古巴的大多数人，除了你们以外，许多人也并不追求大胡子，而且，许多人，也总是把脸刮得干干净净的，可是，唯独你们，你们却留蓄着这一种非常独特的大胡子，简直成了一种奇观，成了古巴革命者的一种标志。不过，我不知道你们这到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炫耀你们的男性之美，是为了使你们的形象格外漂亮而引人注目吗？”

纳赛尔总统似乎又不经意地向切·格瓦拉提出了一个好奇的问题，。

这一问，又叫切格瓦拉有机会“嘿”的一声笑起来了。

他回答纳赛尔总统说：

“你完全误会了，总统。其实，在很久以前，我们是非常注意和崇尚刮胡子的，不管是菲德尔，还是劳尔，还是我，我们都是很注意刮胡子的，可是，后来，我们进入到马埃斯特腊山区打游击的时候，刮胡刀和刀片，都成了很宝贵的难得的锱重，在最初，我们有的人在战斗中身负战伤以后，有的时候，子弹伏在身上的肌肤里，最初的时候，我没有军医院，没有完备的手术器械，没有总可以常备使用的手术刀，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有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选择刮胡刀片来割在血肉里的子弹，动一些枪伤手术，这样，我们就发现了刮胡刀的更有价值方面的用处，于是，我们就再也舍不得用刮胡子的刀片来刮胡子了。而且，后来，德菲尔又给大家算了一笔很吓人的帐，这就是刮胡子每天所要浪费的时间，如果每人每天刮净胡子的话，因为我们都有浓须，所以，大家得浪费十五分钟，而一天浪费十五分钟，一年下来，花在刮胡子上的时间，会需要多少呢？大约是需要五千多分钟，八十多个小时，而八十多个小时，如果用在阅读方面，大约可以阅读多少书呢，以每小时阅读五万字计算，大约可以阅读四百万字，这大约可以是几十部大书和重要著作。还有，如果把每天的十五分钟的时间，用在体育锻炼方面，也将会有多大的收益呀？自然是不可估量的。而完全用在刮胡子上去，除了使脸上光净一些之外，还能有什么用处呢？没有用处就只能是浪费时间了。而浪费那么多的时间，实在也就太不合算了。正因为如此，所以，菲尔德·卡斯特罗算清楚这一笔帐目以后，他不再刮胡子，把大胡子蓄了起来，我们大家也就相伴相随，统统蓄留起了大胡子来，而所以如此，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什么炫耀男性之美，也绝不想追求什么漂亮的形象。让那些漂亮的形象，还是完全归属给全世界的公子哥儿和纨绔子弟，让他们享有专利，去独占独有吧，我们是用不着那样的东西的。我想纳赛尔总统也会是这样想的，不知我说的对也

不对。”

纳赛尔回答说：

“对极了，格瓦拉，好极了，格瓦拉！看起来，历史真是给我们提供了成为兄弟和朋友的最好机会，不管谈论什么事情，我们都能受到绝非平庸的宝贵启示，都能产生重大的价值，我将珍视我们的友情，但愿我们能够不间断的常来常往，永远以兄弟相亲，以朋友相知，以同志相视，不管世界上会有什么样的风雨，也不要我们的联系冲断。”

格瓦拉说：

“当然，纳赛尔总统，我们应该如此，我们一定要如此！”

他们最后以实在完全是兄弟般的拥抱和亲吻脸颊，作了极为深情依恋的告别。

劳尔也到埃及来的时候

切·格瓦拉在埃及共和国，进行了至为成功的访问

切·格瓦拉接下来，还访问了苏丹、巴基斯坦、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锡兰、日本、摩洛哥、南斯拉夫、西班牙。

他连续进行了将近四个月的国外访问，直到1959年9月初的时候，他才返回了古巴。

他向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其他革命领导人，汇报了他出访各国与各国领导人会见和会谈的成果。

其间，当然的，谈到在埃及访问时，他非常突出而特别地讲述了他从纳赛尔总统那里得来的印象，也特别地向菲尔德·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表述了纳赛尔总统对古巴领导人的亲切问候和深情的友谊表示。理所当然，切·格瓦拉还向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介绍了与纳赛尔总统友情的交往中的许多细节和花絮。

菲尔德·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以及古巴革命的诸多领导人，确实的，在非常久的期间，一直把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总统崇拜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最杰出的英雄之一，而且，他们觉得，纳赛尔总统不仅从事的革命斗争内容，即埃及革命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全部经历的内容，和古巴革命斗争内容，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全部历史，是十分相近的，而且，实在的，他们又是二十世纪年龄相仿的属于是年轻一代的革命家，所以，他们之间在思想感情上，自然似乎有着更近一层的相亲相近的热望，有一种自然地寻求共鸣和互助，依恃和彼此鼓舞的热望。所以，古巴革命在纳赛尔总统那里所有的回响，在菲德尔·卡斯特罗为首的古巴领导人们这里，不仅也会具有，而且也是最为珍视的。

切·格瓦拉生动地汇报了纳赛尔，总统对古巴革命的至诚而热烈的回响。不管是菲尔德·卡斯特罗，还是其他人，都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并且，这是自然的，许多人也产生了热切期望能见到纳赛尔总统的向往之情。

就是在这样的热切向往之情的支配下，1960年的7月里，也就是切·格瓦拉访问埃及的又一年，这是在埃及准备隆重纪念和庆祝埃及革命推翻法鲁克王朝八周年的时候，菲尔德·卡斯特罗又派遣劳尔·卡斯特罗，率领古巴革命友好代表团，像是走亲戚似的，来到埃及参加庆祝和纪念活动。

纳赛尔总统完全像接待切·格瓦拉一样，破除礼仪规格，超规格地亲自接待劳尔·卡斯特罗，他不仅要求他的最亲密的战友和朋友，曾经与纳赛尔总统一起，各持一把左轮手枪，两人两枪，在1952年埃及革命开始发生的那个日子，他们冲进可以向全国军事组织发号施令的总参谋部最高司令的办公室，一举兵不刃血地夺取到埃及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从而胜利地驾驭了埃及革命，在埃及革命胜利后，协助纳赛尔总统掌握全部埃及的武装部队成为埃及共和国的副总统兼国防部长和军队总司令的阿密尔元帅，形影不离地陪同劳尔·卡斯特罗少校，纳赛尔总统也是尽可能抽出时间来，亲自陪同劳尔·卡斯特罗。

劳尔·卡斯特罗的形象，不特别与菲尔德·卡斯特罗相象，虽然他们是亲兄弟。但是，劳尔·卡斯特罗与切·格瓦拉，似乎倒有更多相像的地方。他们个头、体形，同样卷曲的不象菲尔德更为浓密，而是那么蓬松的胡子，以及他们沉默时候几乎同样有着忧郁情调的眼睛和笑起来同样像孩子般的列开来的嘴巴，纳赛尔总统觉得，实在是，见到了劳尔·卡斯特罗，仿佛也就

见到了切·格瓦拉。而由此，他也情不自禁地特别产生一种亲切的感情。他与劳尔·卡斯特罗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却没有出现过像是与格瓦拉第一次见面时出现过的那种时间短暂但毕竟曾有过的一刹那的陌生感和难免的拘谨。

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景。

然而，在这样的感情极为融洽的状态下，劳尔·卡斯特罗访问埃及，却似乎出现过很大的不愉快和几乎掀起很大的风波。

那是，劳尔·卡斯特罗来到埃及，已经和纳赛尔总统亲切见面和接触以后，纳赛尔总统因为在庆典期间必须亲自接待众多的来访，准备参加庆典的各国客人，他们中间有的是元首，有的是国王亲王或王子，有的是总统，副总统或副总理级，部长级的外交特使和代表，所以，纳赛尔总统极忙，他不可能全天候的陪同劳尔·卡斯特罗这位古巴革命政府武装力量部部长，但是，他把陪同接待劳尔·卡斯特罗的任务，完全交给了他最亲密地副总统兼国防部长阿密尔元帅。阿密尔一向，十分尊重纳赛尔总统，并总是坚决执行他所交托的任务，贯彻他规定的意旨和意图，他知道纳赛尔总统分外地看重来自古巴的客人，感情上实在亲密至极，所以，阿密尔元帅尤其尽心尽力，热心地肩负着代表纳赛尔总统接待陪同劳尔·卡斯特罗少校的使命。

不过，元帅现在已经权高势重，他即使全力以赴来负责陪同和接待劳尔·卡斯特罗，具体的接待事宜，活动安排，却也不要他亲自来运作和操心，在他的手下，还有许多专业技术人员，帮他办事，处理任何琐碎的事情。在这些人员中，当然也有许多人，是专家级的，也可以说是属于他的顾问，甚至是可以参佐的指点他的。在这样一些专业人员中，当然，来自埃及政府外交部的一些专家和顾问，几乎有时候还会有可以超出元帅授权按照外交部的规定，直接行事的权利。

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劳尔·卡斯特罗在这次来埃及的访问中，一场不大不小的但是很可能成大问题的风波，几乎就要突然地爆发出来了。后来，只因为适逢一个特别的转机，这场风波才没有成为严重的事实。

这场几乎造成重大问题的未起风波，来龙去脉是这样的。这就是，纳赛尔总统请阿密尔元帅转达他一个诚意，即，纳赛尔总统有一个想法，希望在1960年7月26日，在埃及第二大城市亚历山大举行的隆重庆祝和纪念埃及革命推翻法鲁克王朝八周年的大会上，想请英雄古巴革命的代表劳尔·卡斯特罗发表一次讲话。

这是一个重要的邀请。

劳尔·卡斯特罗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他马上请阿密尔元帅报告纳赛尔总统，劳尔·卡斯特罗，非常愿意在埃及人民欢庆革命胜利的盛典上，发表一次讲话，他将十分珍惜这个可以向埃及人民表达感情和敬意，同时表示兄弟般战斗声援的机会。因为，在1960年的这个时期内，由于埃及革命胜利发展，影响到了中东一个重要国家叙利亚的革命发展，埃及和叙利亚第一次实现了联合，已经合并成为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因此，阿拉伯人民的革命力量，显示出了更强大的势头，而这样一来，世界上最反动最凶悍的美国帝国主义势力，就开始对此怕得要死，恨得要命。自从1956年，埃及人民在纳赛尔总统的领导下收回苏伊士运河，把英、法帝国主义的殖民势力逐出埃及以后，又经过胜利的反击英法联军和以色列的侵略战争胜利，英法帝国主义，不得不夹着尾巴从中东地区逃开，退避三去了。而美帝国主义，并不甘心英法帝国的退避三舍而形成的中东势力的范围空间，当时，美帝国主义处在五

星上将艾森豪威尔当总统的期间，艾森豪威尔总统所指挥使用的美国政府的国务卿，正是臭名昭著死顽反动的约翰·杜勒斯。当时，美帝国主义的这个国务院卿杜勒斯，是一个疯狂推行美国强权政治，战争边经政策的大将和老手，他们趋使美国帝国主义强大势力，在世界上到处兴风作乱，称王称霸，到处打家劫舍大钻空子，在英法帝国主义不得不退出一些他们所难以控制的势力范围后，美国佬总是前脚走狼，后脚来虎，在这些地区捷足先登，不甘落后。

在此期间，美帝国主义变本加厉地武装和支持以色列，企图遏止埃及的革命进程，遏制阿拉伯世界的独立和革命势头，而同时，在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总是谋图着挖下陷阱，企图分裂或者控制所有阿拉伯国家，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着企图控制埃及。

在埃及革命胜利后，推翻了法鲁克王朝，实行了土地改革，埃及人民在纳赛尔总统的领导下，为了发展国家的经济，从埃及革命胜利以后不久的年代开始，即已经在白尼罗河和青尼罗河汇合处的尼罗河的上游阿斯旺地区，开始运筹策划宏大的阿斯坦水坝工程，以期把总是泛滥成灾的尼罗河上游诸多支流的定期泛滥的洪水拦蓄起来，造成一个巨大的水库，以此来改造埃及尼罗河三角洲以外的沙漠变成良田。

这可是一个效益明显而巨大的工程。但也是一个需要大宗投资的工程。于是，埃及为了筹集建造大坝的资金，特别向世界银行提出了贷款上千万美元的申请。作为世界银行的成员国，埃及是有权力提出这样的贷款申请的。

但是，美帝国主义者，它的聪明的运作势力的国务卿约翰·杜勒斯，马上看到这是一个可以操纵和控制埃及的机会，于是，他马上插手左右世界银行。

确实，美帝国主义是很有钱的，他们也许有的是多余的美元，但是，这个美帝国主义，一向为富不仁。虽然他们有钱，甚至有着相当宽绰的余钱，但是，他们从来决不用这样的钱，来施行不带任何罪恶谋图的善举。

美帝国主义的强大势力，事实上在很大的程度上，控制着世界银行，于是，在埃及向世界银行申请贷款时，约翰·杜勒斯就马上跳了出来，他要越俎代庖，他要替世界银行办事了。

怎么办呢？埃及不是要贷款修筑阿斯旺水利大坝吗？可以，很好。世界银行可以贷款，七千万美元，可以由美国来支付，但是，动作可以慢一些来进行，美国必须和埃及达成一些协议，什么协议呢？那就是美国国务院准备起草一份协议文件，然后，由埃及领导人签字。签字以后，协议立即生效，埃及就可以马上得到七千万美元的现钞贷款了。不过，接下来，埃及还要干什么呢？那就是，接下来，埃及就要照着美国规定的乐曲，按照美国规定的舞蹈动作、在美国的指挥棒下，开始跳舞了。跳什么舞呢？第一，埃及要承认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侵略和鲸吞是合理的；第二，埃及不应该，也不可以再去支持别的兄弟阿拉伯国家革命；第三，从此在以冷战为中心的国际事务中，埃及要无条件地站在美国这一边；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美国佬准备用七千万美元，来收构埃及的主权，收买埃及完全变成阿拉伯世界、阿拉伯革命的叛徒，成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和走狗。

美国佬是何等的如意算盘，何等的痴心妄想！

纳赛尔总统，绝对不会以七千万美元的贷款，带上美国佬挽结的走狗项圈。纳赛尔在美国佬如此无耻而鄙劣的伎俩面前，简直完全怒不可遏。

他马上毅然绝然，中断了向世界银行的贷款申请。

水库，大坝还是要修建的。但是为了埃及人民世代代的事业和福祉，这伟大的壮丽事业，仍然还是要办的。

纳赛尔总统开始筹措别的办法，从别的渠道，准备另行借货。这时候，苏联和其他一些国家，表示可以不附加太多条件地向埃及提供修筑阿斯旺水坝工程的全部贷款。

而这样一来，美帝国主义又开始急眼了，它开始丧心病狂地攻击纳赛尔，攻击埃及，诬指纳赛尔把埃及出卖给赤色帝国主义苏联了，于是，更加变本加厉地武装着虎视眈眈与埃及为敌的以色列，不断地进行挑衅，不断地开始对埃及进行可恶的战争威胁，一时间，美帝国主义比昔日的英、法帝国主义更为凶恶而咄咄逼人地成为了革命的埃及人民的死敌，成为了埃及人民最重要的，最凶恶的敌人。

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纳赛尔总统的领导下，埃及人民准备庆祝革命胜利八周年的节日。

而在这样的庆典集会上，纳赛尔总统特别邀请古巴革命的英雄人物和古巴革命政府的代表劳尔·卡斯特罗来讲话。劳尔·卡斯特罗该讲一些什么内容，会讲一些什么内容呢？

劳尔·卡斯特罗接受邀请以后，他马上兴奋地开始准备他的讲话稿。

在当代世界政治家们中间，大约很少人会像古巴的这一代领导人一样，发表任何讲话，几乎都绝不用任何一个秘书来代劳撰稿。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巴蒂斯塔政权审判他的法庭上，他可以不聘任何律师代劳，他就用自己的嘴巴，自己的舌头，像施利剑一般地和凶恶的敌人开战，他可以口若悬河，逻辑严密，条理清楚，出口成章，震撼人心地连续辩论、演说一连许多个小时。格瓦拉，古巴的革命领导人，一站到讲话的喇叭前，宣传真理语言，申张正义的语言，就会像喷泉而出，往往很难遏止得住，这样聪明敏捷的人们，他们充满了思想和才智，哪能有什么秘书人物可以与他们同步，为他们任何一次演说和讲话中捉刀代笔呢？

没有。

菲劳尔、劳尔和切，在他们拟定任何讲话稿时，几乎是不用任何人来草拟讲话稿的，他们从来都是自己动手，自己亲自用他们出手写字很快的西班牙语，写下他们的讲话提纲，或者草稿。

这一回，纳赛尔总统邀请劳尔·卡斯特罗讲话，劳尔·卡斯特罗也很郑重地准备了这样一份讲话稿。

自然地，他在讲话稿中，首先是热烈地祝贺和对埃及革命伟大胜利的盛赞，接着，他表达古巴人民，古巴领导人对埃及人民的尊敬、友谊的感情，表达对纳赛尔总统最崇高的敬意，而接下来呢？劳尔·卡斯特罗准备利用埃及革命庆典的讲坛，愤怒地展开对美帝国主义的炮轰和声讨，以此来表示古巴人民，古巴革命和埃及人民站在一起，表示对埃及人民的由衷声援。

劳尔·卡斯特罗是准备大讲一番这样的内容的。

他准备好了这样的讲话内容的讲稿。

然而，就在这时，埃及外交部礼宾司的一位官员，来到劳尔·卡斯特罗面前，非常客气，非常谦恭地，表示要索取劳尔·卡斯特罗的讲话稿，来由他们看看。

劳尔·卡斯特罗懂得外交礼仪，他是不会轻易拒绝被访国家外交部的官

员的合理的正当的请求的。

劳尔·卡斯特罗把他的讲话稿交给了这位礼貌客气的埃及外交部官员。这位埃及外交官员过了不长时间，又转回到劳尔·卡斯特罗面前，他十分婉转，然而是非常坚定地要求劳尔·卡斯特罗修改他的讲稿，明确要求删掉过分谴责美帝国主义的词句。

劳尔·卡斯特罗对此迷惑不解，经过一番磋商，他同意稍加克制，删掉火气最炽的几段讲词。

但是，不行，埃及外交部的官员，仍然不肯接受这种修改结果，后来，他们干脆提出要求，希望劳尔在讲话中完全删去谴责美帝国主义的词句。

劳尔·卡斯特罗一听这样的要求，几乎马上难以克制地怒吼了起来：

“如果这样，讲话还有什么意义，我们不讲话了。我们不参加这样的庆典大会了！”

埃及外交部的官员们马上慌了手脚，他们开始强调古巴代表团是纳赛尔总统最尊贵的客人，已经答应过在庆典上发表讲话，如果古巴代表团突然离去，对埃及是极为不利的，可能给帝国主义造成钻空子的机会。

古巴代表团的其他一些人，也来安抚劳尔·卡斯特罗，陈明利害，不能过份感情用事。在再三的劝说下，劳尔才冷静了下来，但是他从此开始沉默，大大消减了在埃及的生活和访问的热情。

他心中开始谱写不愉快的文章，他准备回古巴去后，要向所有古巴领导人报告，埃及很难是古巴最坚定的朋友，因为他们首先不是敢于和美帝国主义势不两力的国家，埃及的政策，可能具有虚伪的方面。

劳尔·卡斯特罗带着这样的腹稿，他情绪勉强地参加了在亚历山大解放广场举行埃及革命庆典的庆祝大会。他在大会上，几乎是了无声色地照本宣科，发表了他内容空洞，毫无力量可言的祝词和讲话。然后，他一直非常沉默甚至是无精打彩闷闷不乐地坐在主席台上，几乎毫无耐心地等待庆典的收场和结束。

然而，就在接下来的会况变化中，劳尔·卡斯特罗的情绪，骤然被振奋起来，这是在到了纳赛尔总统发表长篇讲话的时候。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这顶天立地的埃及革命的英雄领袖，他在他的长篇讲话中，娓娓道来，用很长时间，很大篇幅，讲述了埃及革命的伟大成就，讲到了埃及革命的深远和现实的影响，以及这样革命的伟大意义，而接下来，谈到埃及人民面临的困难和必须殊死进行战斗的战斗任务，提到埃及人民最主要的战斗对象和死敌的时候，纳赛尔总统忽然不可遏制地提高了嗓门，以最愤怒的气量，展开了最无情、最坚决的声讨和谴责，他的声讨和谴责直呼美帝国主义其名，大点美帝国统治者艾森豪威尔社勒斯的名字；不仅愤怒地揭露着他们的帝国主义罪恶和种种丑行，而且，异常果决地断然表示着埃及人民将和美帝国主义战斗到底的决心和誓词，其激烈程度，几乎是空前的，完全是重炮猛轰，是毫不犹豫，毫不留情的。

在纳赛尔总统慷慨激昂的愤怒讲话和声讨声中，数十万解放广场上的埃及人民也激扬着冲天的强烈的反美呼声。

庆典纪念大会，在热烈昂中 昂扬的氣氛中结束了。

接下来，参加庆典的外国贵宾，被邀请去参加盛大的庆祝宴会。纳赛尔总统十分敏感地注意到了在庆祝大会上闷闷不乐的劳尔·卡斯特罗，他邀请劳尔·卡斯特罗与他同车前往举行庆祝宴会的某一个大厦去。

在汽车上，纳赛尔总统马上亲切地询问劳尔：

“怎么了，少校，你好象有点不高兴，是吗？”

劳尔·卡斯特马上直率地说：

“我实在迷惑不解，尊敬的纳赛尔总统，您今天在大会上，那么强烈愤怒地声讨美帝国主义，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丑行和罪恶。可是，你们为什么不同意我们古巴人也一样，和你们发出同样的声音呢？”

纳赛尔感到迷惑不解了。

他转过脸来，盯着劳尔看，然后问：

“我们会不同意你们声讨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

劳尔说着，他把他用西班牙文字的讲话稿，即已被埃及外交部官员们用红笔删去几乎三分之二的讲话稿。出示给了纳赛尔总统。纳赛尔总统接过来一看，马上问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纳赛尔总统马上命令停车，并且马上命人找来删节劳尔·卡斯特罗讲话稿的那位外交官。纳赛尔总统马上盛怒地质问这是怎么回事。这位开始倒运的埃及外交官申辩说，因为今天的大会也邀请了美国大使参加，所以怕古巴人的调子太高，刺激得美国人坐不住屁股，因此，通过删节，叫古巴人降低了讲话的调子。纳赛尔愤怒地申斥了这位埃及外交部的倒霉的外交官，斥责他说，“从此你可以去官僚主义部去工作了，你不能再在埃及外交部工作了，埃及的外交部，不能给美帝国主义的任何走狗和奴才管饭吃。你可以走了，先生！”

据说，纳赛尔总统几乎从来没有如此盛怒地申斥过任何一位官员，特别是任何一位职位较小的官员。

不过，这一次纳赛尔总统的断然处置，却令劳尔·卡斯特罗完全彻底地消除了一次严重的误会，使他更坚定地明确了切·格瓦拉在第一次访问埃及回到吉巴以后，传给菲德尔的这样的观念：纳赛尔绝对是一个可以引为同志的革命英雄和革命领袖。劳尔进一步认识到，切·格瓦拉的这个认识和结论，是完全正确的。

卡斯特罗与纳赛尔见面

在二十世纪中的美国，在战胜德、日、意法西斯，拯救人类免于大灾大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英明伟大的杰出人物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的领导下，奋力冲破在美国内部对德、日、意法西斯主义完全实行纵容政策的强大的孤立主义势力集团，投入巨大的力量，参加了与苏联、中国、英国等等诸多国家共同进行的伟大斗争，扫除了席卷世界的法西斯血腥笼罩，拯救了人类世界，拯救了人类文明。因此，美国和苏联、中国、英国等等诸多反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对人类社会作出的伟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但是，在罗斯福总统逝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很快又完全进入了为富不仁的帝国主义角色，开始了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极为丑恶和凶恶的帝国主义表演。它在全世界到处伸展它的势力范围，进行最为疯狂的几乎总是夹杂着血腥气味的控制和掠夺，特别是到了美国执行臭名昭著的战争边缘政策的时期，即冷战政策时期，美帝国主义总是在全世界耀武扬威，大干坏事，大行恶事，大作丑事，对整个世界和全体人类进行破坏。

美帝国主义总是口口声声要带给世界以民主、自由、幸福，口口声声要为世界建造和维持和平的秩序，塑造最为仁慈安乐的天堂，但是美帝国主义脚下所行的，手里所干的，却几乎总是妄图对世界各国民族人民的绝对包含歧视和压迫的操纵，美帝国主义所要带给世界人民的自由，不过就是佩带美国的锁链和枷具，它要带给人民幸福的许诺，永远不过是带给灾难的同意语，而同时，美帝国主义为了保障他所需要的扩张、侵略、操纵、控制和压迫的“和平秩序”，他什么时候停止了发动一场又一场流血战争？他在美国的本土并没有建造什么仁慈的天堂，他在美国的国外的势力所控制的所有国家里，所建造的仁慈的天堂，也完全就是建造黑暗地狱的同意语。

美帝国义如此为富不仁的黑暗伎俩，为富不仁的帝国主义表演，在当年的古巴，是最充分，最透彻的。

古巴，实在是美帝国主义老虎唇髭舌尖底下的一个小小岛国。如果说庞然大物的美国像是一只雄踞躁伏的饿虎或者是大鲨鱼的话，古巴在它的面前，确实是更像是只双蹄跪奶的羔羊或在大海里无声的来去的小小沙丁鱼。

古巴距离美国很近，几乎仅是一湾细水相隔，从美国南部突出延伸到加勒比海深处的佛罗里达州的岩角之外的海岸线，通往古巴的距离只有短短的九十海哩，坐一条轻便的机帆船或快速行驶的游艇，来去不过需要几个小时。

美国佛罗里达州南部的海滨城市迈阿密，和古巴的首府哈瓦那，从来都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在古巴革命胜利以前，几乎完全就是一个隔水相望而又连接在一起的旅游区。美国的富豪们，有许多人在迈阿密一侧的棕间滩上，建筑起了豪华的宫殿般的行宫，他们可以居住在这样的行宫里，整天到棕间滩的布满柔玉般的细砂上去，进行海水浴、日光浴和沙浴，他们可以在这里极尽嬉戏和游乐。有的时候，为了更加尽兴，或者突然涌起了多种野趣的念头，他们也会驾起轻快的游艇来，一直轻骑快马般驶到加勒比海的深处，驶到古巴的哈瓦那港湾，那些许许多多的富豪们，他们不仅在美国拥有大宗的财产，他们在古巴也往往拥有大宗的财产，他们不仅在美国的迈阿密建造了宫殿式的行宫，在古巴的哈瓦那海湾或最富丽豪华的别墅区，也建造起了至为豪华的行宫式的宫殿，因此，他们不仅可以在美国，也可以在古巴不受任何限制地穷奢极欲地玩乐。他们在美国是主人。他们在古巴甚至可以是更具威福权利的，更为排场而且颐指气使的主人。

因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革命前的古巴，完全是美国的殖民地。美帝国主义完全控制着古巴的一切，包括完全控制着古巴的一切，包括完全控制着古巴的政府，控制着古巴的军队、警察、一切财政和银行。

当时美帝国主义在古巴全力豢养的巴蒂斯塔政权，完全是美帝国主义势力的百依百顺的最驯服的走狗。

当然，这自然一定会是一个相当庞大的走狗集团。它们既包括完全是个屠夫的脑满肠肥总统巴蒂斯塔将军，当然也还会包含着一大批他所指使的走狗，包括着一大批杀人如麻的刽子手，和腐朽的官僚，以及形形色色的美国资产的经营者和代理人。

在古巴革命胜利以前，美帝国主义就是利用和驱使着巴蒂斯塔反动政权的走狗集团，通过他们，控制着古巴 50% 以上的耕地和甘蔗田，美国在古巴的私人资本投资高达十亿美元，从而控制了古巴的大部分加工工业，控制了古巴的进出口贸易，因此，古巴不仅完全是一个美帝国主义富豪们奢侈游乐的游乐场，而是还是它们压榨剥削古巴人民，把古巴人民的血汗变成装满他们口袋的钱财，大发横财的自由俱乐部。

巴蒂斯塔政权的走狗们，为了维持美国帝国主义殖民者在古巴残酷压榨、剥削压迫、掠夺和控制的秩序，从而对古巴人民进行血腥的警察和特务统治，进行了令所有人都毛发悚然的血腥的镇压和压迫，关闭大学，广开监狱，施行酷行，无毒不用，巴蒂斯塔从 1952 年被美国主义扶植上台的，至 1958 年，在古巴这样一个人口当时不足六百万的小国，酷刑致死的爱国人士竟有两万之多，有数万工农和青年，特别是众多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被投进了黑暗的监狱，十多万爱国人士和进步人士，被迫逃离古巴，流亡到了国外，当时古巴，完全变成了一个古巴人民遭受灾难的地狱。

而正是在这样的血腥统治和非人的残酷压迫和压榨下，古巴人民在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下，揭竿而起，展开了革命造反的大旗，经过艰苦的战斗洗礼，很快赢得了古巴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巴蒂斯塔政权。这当然也无异是打翻了美帝国主义加在人民头上的枷锁，直接推翻了美国的掠夺和压榨的权利，使古巴完全地，摆脱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控制。

因此，古巴革命的胜利，对反动的巴蒂斯塔政权和罪恶的美帝国主义来说，完全是同时斩除他们的双刃剑，对他们同样都是致命的，然而，怎样看待古巴革命的胜利呢？

这在美国统治阶级内部，事实上也存在着不同的评价和认识。

在 1960 年竞选美国总统并且当选的约翰·肯尼迪总统，在他竞选美国总统的日子里，曾经写过一本很著名的著作，题为《和平战略》。在这部著作中，肯尼迪在提到古巴革命时，他指出：他毫不怀疑，正是富尔夸西奥·巴蒂斯塔的残酷、血腥、专制独裁，招致了他本身的灭亡。因此，肯尼迪断然指责美国前政府，不该那么长久地，那样地不分青红皂白地全力支持巴蒂斯塔政权。

其实肯尼迪总统在竞选总统的过程中说的这样的话，并不能表明他的特别聪明和特别开明善良。说这样的话，在他当选美国总统后，是要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的。他当时之所以说这样的话，实在的，是因为他当时还不是美国总统。不是当家人不知帝国主义的日子应该怎么过。他还不知道美国当年所以绝对地，无条件地支持连美国也认为是残酷血腥专制独裁的巴蒂斯塔政

权，实际上本身不过是在绝对地，无条件地维护着美国帝国主义的自身利益。

而关于这一点，在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以前，在古巴革命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在美国的总统舞台上表演角色的人，不管是总统艾森豪威尔也好，还是副总统尼克松也好，他们当时在台上时，在处理和对待古巴问题时候，便是采取的另一全全然不同的态度。

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政权支持巴蒂斯塔政权，一直到古巴革命把巴蒂斯塔的四万政府军彻底消灭以后，美国的帮凶巴蒂斯塔训练政府军的军事顾问团，还仍然赖在古巴，长期不肯滚回美国。

而且，古巴革命在它胜利的最初日子里，由于它对巴蒂斯塔黑暗统治骇人听闻的罪恶披露，美国的知识界，新闻媒体，特别是被古巴革命的英雄行为和正义事业感染的广大的美国青年，曾经一度出现过相当规模的，同情赞助古巴革命的十分激越的热流。

美帝国主义的统治阶级，也曾经有过一度对古巴革命可以堪称是比较冷静的观察。而且，在这样的观察中，也同时产生过收买和试图控制古巴革命的动念。

美国驻古巴的大使，在古巴一向有着“第一号重要人物”的绰号。美国的原驻古巴大使，始终都是古巴反动统治者最亲密的朋友。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立刻召回了在古巴和巴蒂斯塔同样臭名昭著的原大使，在1959年3月，美国承认了古巴新政府，并派来了一位名叫邦斯尔的新大使，美国政府同时向古巴新政府的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发出了访问美国的邀请。菲德尔·卡斯特罗当然不会放弃访问美国，向美国人民宣传古巴革命的机会，在1959年的4月间，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古巴政府总理的身份和名义，访问了美国。他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美国人民和新闻媒体的热烈欢迎和密切注视。卡斯特罗在美国的各处巡回演讲，他的形象引起美国人民的痴迷，他的激越的宣传古巴革命真理和正义性质内容的讲话，在所到之处，几乎都能听到他的讲话，能见到他的形象，因而兴高采烈的美国人，特别是美国青年知识分子，大学生们的欢呼和激动。对他访问新闻报道，一时占满了美国几乎所有新闻媒体的版面。就是在这样的同一时间，美国的统治者，也出来接待他，当然事实上是进行对卡斯特的摸底和测验，他们当然要看看卡斯特罗是不是也会被收买，也会进而被控制。

当时艾森豪威尔政府拥有权力影响活跃的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华盛顿接待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尼克松几乎立刻热情地向卡斯特罗表示，美国政府已经在拟议中，准备向古巴提供一项援助。

菲德尔·卡斯特罗马上领会到，美国拟议中的援助计划，不外就是要给古巴一个枷锁。

卡斯特罗了无热情，不理睬尼克松的热情提议，非常冷淡地结束和尼克松的会见。

结束了这样的会见，卡斯特罗在接受美国记者的采访时，立刻表示，古巴领导人到美国来访问，绝不是来这里出卖灵魂的。我们决不是来这里要钱的。卡斯特罗这一明白无误的表示，自然立刻使美国的统治者们完全领悟到了，他们难以给卡斯特罗和古巴套上新的枷锁。

在这样的情况下，已经和卡斯特罗会见和接触过的尼克松副总统，立刻使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准备依附美国的外国，肯定就是对美国存有敌意，因此，必须马上转而制定进攻性的强硬政策，而且必须马上采用“应急”政策，

使美国迅速行动起来，对古巴实行必要的遏制。

尼克松立刻向艾森豪威尔汇报他的印象和拟议采取的决定，很器重和依恃尼克松副总统的艾森豪威尔总统，立刻表示了同意尼克松副总统的意向，于是，马上便开始了与美国中央情报的协调，开始谋划和制定起了新的对付古巴的政策和行动计划。

而在古巴这边，已经在革命中赢得了独立和自由的古巴人，他们不仅将不容美帝国主义给他们带上新的枷锁，他们还要彻底铲除和卸下全部的，已经由美帝国主义加在古巴和古巴人民的头上的旧枷锁。

卡斯特罗从美国访问返回古巴以后不久，古巴政府宣布了全部外国的殖民经济和外国资产收归古巴国有的政策，这当然首先包括着已经被外国资本鲸吞了古巴 50% 的耕地和甘蔗田；当然包括着已经被外国资本家把持着的以制糖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和加工业。而这样一来，美国对古巴的掠夺，立刻被终止下来，美国在古巴的巧取豪夺，从此不能再延续下去了。仅仅在巴蒂斯塔政权统治古巴的六年时间里，美国已经从古巴攫取走了将近八亿美元的脂膏和纯利润，美国的资本在古巴的投资，纯利润一直多达 30—40%，古巴这里有美帝国主义赚钱最为便当的买卖，古巴一旦取消这样的美国特权和利益，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分子们，将会作出怎样的反应呢？

完全是可想而知的。

美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分子们，立刻就又痛，又恨，火冒三丈地大跳特跳起来了。

他们用金钱堆积着他们的舆论，他们开始大肆攻击古巴革命的凶狠和野蛮无情。

古巴革命开始镇压在古巴的，曾经杀害过无数古巴人的刽子手，那些血债累累的巴蒂斯塔政权的爪牙和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判他们重刑，甚至经过审判处决枪毙一些民愤极大的坏蛋。美帝国主义更加狂乱地大跳起来，愤怒地指责古巴革命的残酷，攻讦古巴革命的镇压绝非人道。

然而美帝国主义在这样的愤怒暴跳指责古巴的同时，他们开始紧锣密鼓地制定颠覆古巴革命政权，暗杀古巴革命领导人的，绝对“有情的”、“人道主义的”行动计划。

经过艾森豪威尔的政府授权，美国中央情报局，承担起了对付古巴革命的行动使命。艾森豪威尔总统立刻批准一项庞大的预算，决定拨款一千三百万美元，作为第一笔来对付古巴的资金。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立即用这样一笔大宗的金钱，开始招募雇用那些在古巴革命的暴风雨中，被驱赶或逃脱离开古巴的巴蒂斯塔政权的爪牙和走狗，一大批血债累累的刽子手和恐怖分子，以及那些在古巴革命运动中一度投机，但又投机不得，野心又没有得逞，因而脱离革命的心怀不满的分子，总之网罗一切肮脏的渣滓，展开了公开秘密双管齐下进行反对古巴的行动。其间经美国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亲自组织专家和行家里手制定，经过艾森豪威尔总统特别批准同意实行的暗杀古巴领导人，主要是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及劳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的行动方案，就不仅是一个，而且是有一打之多。

同时，美帝国主义已经把那些网罗招募来的渣滓和罪犯，组织武装起来，成为雇佣军，开始强化训练，开始准备了对古巴的直接干涉和入侵。

一时，从 1959 年 1 月开始的革命的古巴共和国。经过不到两个周年的时间，到了 1960 年秋天的时候，和美帝国主义已经完全成了相互剑拔弩张而严

重对立对峙的死敌。

这时候，美帝国主义往往公然地支使古巴的反革命分子，开始在中古进行破坏活动，策动反叛，暗杀起义军英雄和司令员，派遣间谍飞机侵扰古巴的领空，派遣雇佣军驾驶轻型飞机，带着炸弹和机关炮，轰炸古巴的设施并进行扫射，杀害古巴军民，丧心病狂的进行不间断地挑衅。

就是在这样的气氛和背景下，1960年的9月下旬到10月初，在联合国大会召开世界各国领导人的高层会议的时候，菲德尔·卡斯特罗，作为联合国大会成员国古巴革命政府首脑，决定率领古巴代表团，出席这一次联合国的高层会议。

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准备宣传古巴革命政府的独立、自由、和平发展和建设的革命政策的，同时，理所当然的，面对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甚嚣尘上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侵略，战争威胁和不间断地频繁展开的捣乱，破坏颠覆暗杀活动，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准备要愤怒控诉和声讨的。

菲德尔·卡斯特罗，准备充分地利用联合国大会的讲坛。

但是，这可吓坏了美帝国主义这只既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的可恶的恶兽。

美帝国主义到处倒行逆施，施布黑暗，但它往往乔装打扮一番，在恶虎的嘴脸上蒙上一层天仙美女罩脸的柔纱，它甚至往往收起老虎的粗尾，在有的时候，露出尾巴稍来像狗一样摇尾乞怜，装出一副和平善良友好的样子。而正因为如此，美帝国主义最怕对它进行大加揭露和彻底揭露的。

它的本性怕揭露。

它的罪恶怕揭露。

而菲德尔·卡斯特的嘴巴，完全是钢嘴铁牙的演说家的嘴巴，他的锋刃如剑般的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舌头，美国人是领教过的。卡斯特罗讲起话来，往往令美帝国主义以及他们的走狗们感到如雷轰顶，往往会使他们完全真正气极败坏地在地上打滚儿，头疼得不可抑制。美帝国主义外强中干，它因为富不仁而永远不掌握真理和正义，永远理屈而理亏，所以，它最惧怕无情的揭露，无情的控诉。

所以，美国的总统，美国的国务院，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听说卡斯特罗要到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大厦来发言，来讲话，他完全被吓坏了，几乎完全被吓坏了他们的虎胆或是狗胆，于是他们设计起了一些伎俩，掀起了一些黑潮，决定采取一些办法，千方百计地阻拦菲德尔·卡斯特罗来到联合国总部所在的属于美国纽约市的街区，妄图阻挡住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出现。

美国佬作恶和干丑事的时候，一贯地无所不用其极、不择手段，同时，他们的伎俩又往往黔驴技穷似的令人感到可笑。

他们组织鼓动一些百无聊赖的昔日的歹徒、罪犯、叛徒和变节者组成的古巴流亡分子，在古巴代表团准备租用的饭店门前游行、鼓噪、谩骂、疯狂的捣乱、破坏，试图阻止菲德尔·卡斯特的到来。

处于纽约联合国总部所在地区的美国饭店，美国政府发出行政命令，要他们如果哪家同意接待古巴代表团的话，必须要向古巴代表团提出签署古巴代表团必须接受歧视性条款的租房协议。

而这样的侮辱性的、歧视性的协议，古巴代表团是肯定不会签署的。

这样的要挟发生效果以后，美国佬开始得意起来，开始手舞足蹈，以为

他们此一举就足以阻止古巴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上出现了。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代表团，何况是参加高层会议的国家元首，如果不能居住讲究排场的饭店的房子，似乎就会有失身份，仅仅由此，菲德尔·卡斯特罗也就不会来了。

然而，在这样的困难情况下，菲德尔·卡斯特罗决定决不退缩。他决定一定要粉碎美国佬妄图阻止他参加联合国大会的阴谋。于是，他让古巴代表团的得力助手们，去想办法向美国备受歧视和压迫，特别是去向备受种族歧视和压迫的穷人和黑人社区组织寻求支持和帮助。

卡斯特罗的这一决定，立刻收到了成效。对美国政府倒行逆施愤怒不平的黑人社区社团，立刻想办法，在黑人聚居的哈莱姆区租到了相当规格的房子，邀请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及古巴代表团来下榻和展开工作。

但是，美国佬还不甘心捣乱破坏失败，他们又利用他们金钱收买的新闻媒体大登文章，大造其谣，诬蔑造谣说古巴人居住在哈莱姆区的饭店里，随地杀鸡拔毛然后烧烤来吃，因此，古巴人下榻的饭店、立刻已经变成脏乱污垢不堪的垃圾场，鸡毛乱飞，腥臭难闻，很有可能制造和产生出瘟疫和流行病来。

美国佬以此无耻卑鄙的伎俩，百无聊赖，穷凶极恶地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的古巴代表团，进行无休无止的捣乱，意在一定要把古巴代表团从美国的联合国所在地轰赶出去。

对美帝国主义泱泱大国以如此丑恶的劣行给古巴代表团制造的麻烦和困难，实在也不能不令古巴代表团深感讨厌和难以忍受，不能不令古巴人感到麻烦和困窘，实在是令人厌恶的心烦极了。

怎么办呢？

怎么才能有力的，更有力的回击美帝国主义如此卑鄙无耻的捣乱和破坏呢？

古巴人正在极需要伟大朋友支援的时候，1960年9月23日，古巴人民和古巴革命领导人们最尊敬的革命领袖之一，埃及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率领埃及代表团，从开罗路经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稍事停留后飞到了美国的纽约来，他住在了埃及代表团早已租定好的纽约最高级的饭店里。纳赛尔一到纽约，马上命令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处，马上联系和接洽，他第一个要拜会的友好国家领导人，便就是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美帝国主义欺人太甚卑鄙无耻对古巴人民采取的丑恶伎俩，纳赛尔总统到达纽约以前，已经耳闻，所以，他到达纽约以前，已经满怀义愤，因此，一到纽约，他马上便要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处安排，他立刻要到哈莱姆区去，首先去拜会菲德尔·卡斯特罗。

纳赛尔总统其时在全世界是威望最高的世界领导人和革命英雄之一，他不仅被认为是埃及国家的总统和人民的领袖，他在非常广泛的方面，还被认为是阿拉伯世界的具有崇高权威和威信的发言人，美帝国主义，已经对他不敢公然的招惹，纳赛尔总统的伟大魅力，不仅吸引着阿拉伯国家人民，也吸引着全世界包括美国广大的人民，所以，纳赛尔总统一旦来到美国的纽约，马上使来拜会菲德尔·卡斯特罗，这立刻便成为了最轰动联合国，也最轰动美国全世界的新闻。纽约的从来不见国际要人出现的哈莱姆区，现在一下子变成了世界上其时最为轰动世界的英雄们会聚的场所，这里立刻变成了整个世界瞩目的焦点，世界各国当然也包括美国的上百成千的记者，一起拥到

这里来，一起把他们的摄影机和电视转播机的镜头，对准了两个亲密会见热烈拥抱的真正伟大朋友的雄姿，那样强有力，深情而长久地热烈拥抱的时刻，完全成了足令整个世界为之振奋和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纳赛尔和卡斯特罗完全是同志般的、兄弟般的会见，使任何人都只能相信他们是久别的兄弟，仅仅是相隔经年的故友重逢，绝对不会令人感到他们是第一次的邂逅和见面。

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总统，真是为朋友两肋插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汉子。他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会见以后，立刻马不停蹄地在联合国的与会国领导人们中间，展开了最为强有力的外交活动。活动的中心题目是：埃及准备拟议提案，鉴于美帝国主义不断在破坏和捣乱，鉴于美帝国主义企图阻挡菲德尔·卡斯特罗出席联合国的高层会议，埃及将要求联合国迁出美国！

纳赛尔总统的这一杀手锏，无异是把一颗不亚原子弹氢弹威力的重型炸弹扔到了美帝国主义的头上，美帝国主义害怕联合国迁出美国，如果联合国迁出美国，美国势必再也不会拥有操纵联合国，利用联合国为其工具的机会了。美帝国主义为纳赛尔总统的这一杀手锏，简直是又要吓死了，又要照着纳赛尔总统惯用的口头禅：让美帝国主义气死吧！气死吧！它真的就要气死了。

由于纳赛尔总统的这一强有力的支援，美国佬开始收敛了它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的古巴代表团的破坏和捣乱。

美国佬终于没有得逞，没有阻挡住菲德尔·卡斯特罗在1960年9月26日走上了联合国庄严的讲坛。

卡斯特罗开始了铿锵有力的，词语清晰，音调低沉，饱含悲壮和愤怒的发言。他从容不迫，为了照顾翻译的跟进，他放慢了说话的节奏，更显得有条有理，逻辑严密，字字玑珠，他绝不抬高嗓门，绝不大喊大叫，绝不吵吵嚷嚷，绝不像赫鲁晓夫式的狂乱和没有水平。卡斯特罗是真正的雄辩的思想家，也是真正的所向无敌的雄辩的辩论和演说家，他的发言实在可以像大念金箍咒一样，让一些猢猻头痛的完全坐不住屁股，难以忍受的不得不在地上打滚儿。

他一条一条，把可怕的可鄙的事实清楚明白地说出来，这些可怕的可鄙的事实，都是美帝国主义捣乱破坏的证据确凿的恶行。卡斯特罗控诉着美帝国主义的掠夺，美国佬掠夺霸占了古巴50%以上的耕地和甘蔗田，他们逼使一半以上的古巴农民成了没有土地可以耕作、可以居住的流离失所的季节工或者纯粹的无业游民，而在如此残忍无耻的掠夺的进行中，美国佬拼命地极力反对革命后的古巴进行土地改革，他们用尽了一切捣乱破坏的伎俩，甚至派出一架又一架机翼上涂画着起义军空军标志的间谍飞机，狂轰滥炸古巴农民分到土地后开始营建的制糖厂和正在耕植中的甘蔗田。他们的一次狂轰滥炸，就使八十多个古巴农民的家庭成为丧失亲人家破人亡的灾民和难民，而他们这样的狂轰滥炸，绝不是偶然的一次，而是一次又一次，连续不断地进行，一次比一次地造成严重的灾难，但是，美国佬一方面为他们的罪行得意洋洋，弹冠庆贺，一方面却死不要脸，绝不承认他们所犯下的罪恶。只是非常可鄙的，终于有一架轰炸古巴甘蔗田和平民的强盗飞机，由于故障栽在了古巴的海岸上，飞机摔碎了，驾驶员摔死了，是美国的驾驶员，他的尸体上还装着美国飞行员的全部证件，于是，狐狸尾巴藏不住了，狐狸尾巴被抓住

了。卡斯特罗一面陈述着这样的美国佬的罪恶，摆着这样的丑行的经过，同时拿出了可以向世界展示的轰炸古巴平民的美国飞机的碎片、残骸和飞行员尸体的照片，以及他完备的证件，全世界众多国家的国家元首和领导人，凝视着卡斯特罗手持的美国佬的罪恶证据。屏息静气而义愤不平地倾听着卡斯特罗的愤怒而悲壮的控诉。

美国的领导人完全不敢参加这样的控诉会。他们托词逃避来到会场。但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会的大使先生，他是不得不参加大会的，他是必须来到会场的。于是，这个倒霉蛋，自然也就是卡斯特罗以血泪的事实控诉美帝国主义罪恶丑行时无地自容的猢猻。卡斯特罗在控诉到美帝国主义派飞机杀害古巴的老人和孩子令人发指的罪行，控诉到如此惨烈的事实令人悲痛的时候，他突然冲着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座席很礼貌、客气，同时是平静地说“阁下，美国代表阁下，我要趁这个机会告诉你，有许多古巴母亲还在古巴等待着阁下去唁电，为她们被美国炸弹杀害的孩子致哀呢！”

卡斯特罗冲着美国代表阁下这样说。

“嘘”得一声，所有坐在联合国大厦会议大厅里的世界各国国家领导人和外交官，一起都目光投向了坐在那里的美国大使。人们的义愤填膺的注目，仿佛产生着一种巨大的力量，它突然都集中投射到美国大使的身上时，美国大使立刻变成了一只跌入熊熊燃烧起来的怒火中的猴子，他忽然猛地急跳起来，气极败坏猛打着转转，挥着左手，又挥着右手，然后张慌失措，气淋淋地，急步退出了会场。

联合国大会何曾有过这样的事情，何曾有人敢于在这里如此公然的、直接了当地指责美国、控诉美国，无情地揭露它和啼落它，美国佬简直向马戏团的猢猻一样，被卡斯特罗像个训兽员似的对它挥着长鞭进行了耍弄。事后，艾森豪威尔总统为他没有出席这天的大会深感自慰庆幸，他热烈地表扬和夸赞美国国务院的高水平的外交官，非常巧妙地安排使他本人躲过了也可能被直逼得团团打转转的灾难。

不过，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官们，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如此表扬和夸赞，仍然并不满足和十分高兴，因为他们还埋怨艾森豪威尔总统没有看到或忘记了提到他们在这件事情上的更大的功劳，这就是在这档事上，美国国务院的高水平的外交官们，不仅千方百计巧加安排，避免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坐在联合国大会的会议厅里充当被控诉被审判的罪犯角色，另一方面，他们还千方百计，巧妙安排，让另一个满腔热血，容易激愤，特别想伸张正义，打抱不平而且绝不畏惧任何敌人厉鬼和恶兽的汉子，在卡斯特罗大会发表演说中，没有坐在大厅里的埃及代表团席上。

美国佬骇怕听到卡斯特罗对他们的愤怒控诉和审判。

美国佬也特别骇怕让埃及人民的英雄、埃及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听到卡斯特罗对美帝国主义的控诉和指责。为此，美国国务院“高瞻远瞩”地进行了巧妙的安排。他们在提前量好长时间以前，和埃及方面达成协议，这个协议，恰好是规定在卡斯特罗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的时间内，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要和纳赛尔总统举行埃美两国有关事务的双边会谈，这个双边会谈安排在美国的白宫进行，那里离联合国大会总部，有着相当的距离。

就这样，艾森豪威尔总统逃过了听卡斯特罗控诉和审判的现场，美国佬也巧妙地把纳赛尔总统调离了那个纳赛尔总统与卡斯特罗总理可以同志共鸣，兄弟般地鼓舞的战斗现场。

当卡斯特罗看到美国的代表席上，美国总统缺席的时候，他丝毫也没有奇怪。但是，当他发现纳赛尔总统在他发言时，也没有坐在埃及总统该坐的位置上，卡斯特罗当时，实在感到不无遗憾，同时，他当然也会想：这是为什么？

而就在那一天的晚上，就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最成功的演说，受到与会者的极大同情，在演说过程中被一阵阵的掌声打断，在演讲结束后长时间的热烈掌声经久不息，卡斯特罗无论怎么估量，都是又赢得了一次巨大胜利的行动结束之后，当他率领古巴代表团回到哈莱姆区他们下榻的宾馆时，时隔不大一会儿，在美国白宫那边结束了和艾森豪威尔进行双边谈判的纳赛尔总统，马上又径直地赶到了哈莱姆区古巴代表团的驻地来，再一次拜会卡斯特罗，专门来表示他对卡斯特罗在联合国大会演说成功的热烈祝贺！

卡斯特罗说：

谢谢你纳赛尔总统！今天大会你缺席，真叫我想到了遗憾两个字，同时也曾一时涌起失落之感，好像突然少了一个膀臂，真好像是在阵地上，战斗中，少了一个战友和兄弟依持，当时我甚至为此而感到了一阵的骤然紧张，可是，旋即我马上想到了，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不管我们是否同在一起，我们的兄弟的血脉是联在一起的，我们的同志之情，同志之志，是完全心心相印在一起的。关于这一点，我们最可贵可爱的切·格瓦拉，他向我保证过，劳尔·卡斯特罗·鲁斯少校，也向我证明过，所以，想到这里，我就放心了。我就想到你是另外出击去了，我们战斗的同志之心，同志之情，同志之志，是永远同在的。想到如此，后来我就像你完全和我一起一样，充分地支配使用了联合国大会的讲坛。

纳赛尔总统听到卡斯特罗的这一番发自肺腑中的话。当他听到菲德尔·卡斯特罗提到切·格瓦拉和劳尔·卡斯特罗另外两个兄弟和朋友时，纳赛尔不无感叹地说：

“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我真应该十分感谢你，感谢你还在古巴革命还刚刚胜利不久的日里，你就派出了你亲密的战友和同志，我们共同珍贵的最可爱的切·格瓦拉，出访了我们埃及，正是他那一次到埃及，使埃及认识了你们，他使你们认识了埃及，并且马上建筑起事实上牢不可破的渠道，沟通了我们完全的兄弟的同志的血脉和情谊。我本人，和埃及人民，是十分宝贵十分珍视这样的情谊的。特别是，后来，劳尔·卡斯特罗·鲁斯少校再一次访问开罗，更加深了这种兄弟和同志的情谊，使我们增加了战斗的兄弟支持，增加了战友的可以生死与共、同舟共济的相依力量。因此，我们对埃古两国人民，两国革命的兄弟同志之情和关系缔造者们，充满了怀念和敬意，切·格瓦拉好吗？劳尔·卡斯特罗少校好吗？我们郑重地邀请您，古巴革命政府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阁下，在您认为方便的时候，访问埃及。我们还想请您转达对切·格瓦拉和劳尔少校亲切问候的同时，欢迎和邀请他们在他们方便的时候，再度访问埃及。”

纳赛尔总统在接下来的谈话中，郑重地提出了欢迎菲德尔·卡斯特罗访问埃及的邀请。同时，也诚恳热情地希望转达纳赛尔总统对切·格瓦拉和劳尔·卡斯特罗再次访问埃及的邀请。

卡斯特罗特别感动，他非常由衷地感谢纳赛尔总统的盛情，他对纳赛尔总统表示：

“只要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我是一定要到埃及访问的。我们在任何时候，还准备着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纳赛尔总统光降到哈瓦那去。至于切·格瓦拉，劳尔·卡斯特罗·鲁斯少校，他们的心，是永远向往埃及的。在他们有必要访问埃及的时候，他们是一定会非常高兴和愉快地飞到埃及，飞奔到您这样的伟大的革命英雄，我们的同志和兄长，尊敬的纳赛尔总统的身边去的。”

卡斯特罗向纳赛尔作出了这样的肯定的表示，亲切的表示。

纳赛尔总统十分高兴，十分欣慰。

可是，他太忙了。

他们是中小国家的领袖但是他们各自的国家：古巴和埃及，当时，都是首当其冲，直面面对着，世界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元凶的前线国家。他们的战斗形势严峻，帝国主义的严重压迫和威胁，始终地不间断地横在他们头上，常常会突然或渐进地制造出临在他们头上几乎可以致使他们倾覆和被消灭的危险。

当然，革命的埃及不怕任何帝国主义，自然也不惧怕美帝国主义。

当然，革命的古巴从它诞生之日开始始终在对抗着美帝国主义的威胁和压迫，它已经习惯了和美帝国主义纸老虎展开战斗的阵势，它自然也是始终不怕美国佬的。

埃及挺立着。

古巴挺立着。

挺立着的顶天立地的警惕的国家和人民，面临着强大凶狠卑鄙无耻的帝国主义，是绝对不能有一刻松懈的。而与此同时，革命中的，战斗中的真正的人民国家，在国内，还要加紧建设，解决国家的贫穷问题，解决人民的贫穷的问题，改善人民的生活，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发展国家的生产水平，壮大国家的国力，工作总是无尽的，困难总是沉重的，重担千钧，几乎总是令人难以支撑的，何况是这样的国家里挑着最沉重的担子的人们。纳赛尔总统太忙了。卡斯特罗总理也太忙了。

他们匆匆相会，匆匆地告别。他们很难长久地相聚在一起共度彼此最珍视的日子，他们往往不得不长久的分离，虽然总各自满怀着热情的召唤，然而，大忙人互访的机会，总是难以兑现。从1960年9、10月间，卡斯特罗和纳赛尔总统相聚和分离，又几年以后，他们虽然总是鸿雁传书，沟通来往总是不断，但是他们重逢愉悦的时刻，总还没有再来得及创造出来。而且，不仅如此，不仅卡斯特罗与纳赛尔一别几年难得再相聚会和见面，包括切·格瓦拉少校和劳尔·卡斯特罗少校，也难得再有机会来到开罗，虽然分别的时间越久，越是在加深着同样英雄心性的人们的热切的思念，但是，他们还是分别的太久了。他们之间的友谊的思念，总是在日日地加深着。

终于，1965年2月11日，风从东方来。切·格瓦拉少校，作为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的代表团长，又率领革命古巴的政治代表团来到了他久别重逢的开罗。

纳赛尔总统是感情丰富而细腻的革命领导人。他仍然牢牢地记着几年前，美帝国主义在十五届联大期间，蓄意要欺凌和侮辱古巴领导人，不容古巴领导人下榻纽约的高档饭店，而逼使古巴领导人不得不屈身住进哈莱姆区的普通饭店。纳赛尔记着这笔旧账，所以，他下达严格的命令，接待古巴领导人，包括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格瓦拉，只要他们来开罗，就绝对要

安排住进开罗最高级的，最高档的无以复加的高级饭店去。纳赛尔至今不忘这口气，至今还想着要给古巴的同志和兄弟以补偿。

所以，这一回，1965年2月11日，切格瓦拉第二次来到开罗，他因此被破格按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的规格来接待，他被安排住进了开罗的最高级的谢泼德饭店的总统套房里，他要让切·格瓦拉在这里充分地享受排场，充分地显赫一番。纳赛尔总统不无这样的用意，他们仍然想以这样的规格和接待，来让美帝国主义看看，以此来再一次气气美国佬。

不过，纳赛尔总统不会想到，他这样的安排，却使切·格瓦拉感到非常的不安和难以受用，他在谢泼德饭店的总统套房里，不安地来回踱步，简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在他和纳赛尔总统的亲密助手和机要秘书经过一番联系和磋商，得到哈桑·霍利先生的回答，要他一定要按照纳赛尔总统的安排好好住着，等着纳赛尔总统接见时，再作其它议论。于是，切·格瓦拉便更加焦急地开始等待着纳赛尔总统的接见。

切·格瓦拉在开罗一夜的休息，调节了长途奔波飞行来去的疲劳。他来到开罗的第二天上午，接到了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总统会见他的邀请，会见时间还是像第一次见面时一样，商定从这一天的上午九点三十分准时开始。

于是，在开罗，纳赛尔总统和切·格瓦拉，又共同迎接了一个令他们俩人都格外激动的，兄弟见面，战友重逢，朋友聚会的最亲切的、最热烈的、最令他们愉快的时刻。当然，他们的会见，自然也还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的时刻。

第三部在红星的照耀下

回到哈瓦那

1965年3月14日

切·格瓦拉在成功的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埃及、坦桑尼亚等诸多国家以后，凯旋回到哈瓦那。

在哈瓦那“兰乔博那罗斯”机场，热烈欢迎他归来的有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古巴总统、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全国领导委员、书记处书记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以及其他许多古巴的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

到哈瓦那“兰乔博那罗斯”欢迎切·格瓦拉胜利归来的，还有一辆最为欢腾的小型面包车。在这辆车子里，坐着切·格瓦拉亲爱的妻子、往昔的女游击队员阿莱达·马尔奇，以及他们的，年龄都还很小的一群孩子。

这群孩子里，包括格瓦拉和他的前妻伊尔达·加德亚生的十分漂亮而可爱的刚刚度过十周岁生日的小伊尔达，以及在古巴革命胜利后，切·格瓦拉与伊尔达·加德亚离婚，和阿莱达·马尔奇结婚后又生的，当时还不满五周岁的小阿莱达。小阿莱达和小伊尔达一样，都是两个十分漂亮可爱的小姑娘。只是，小伊尔达总是显得更骄傲一些，小阿莱达虽然比姐姐整整小五岁，反而似乎更乖巧，更谦和，当然，她们同样都特别地，异常地天真和活泼。

在这两位十岁、五岁的小姐姐下边，这一天跟着妈妈来飞机场迎接爸爸的，还有她们当时还唯一的小弟弟，刚刚三岁的小卡米洛，以及刚刚只有一岁半的小妹妹小塞莉亚。

小卡米洛长得很像爸爸，他英武而漂亮，只是他当时当然也还没有长着爸爸一样的蓬松卷曲的大胡子，但是他长着完全像爸爸一样的卷曲的金发，他的眼睛，鼻脊都酷似爸爸，简直和爸爸相像的完全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简直是太相像了。只是，他的名字，小卡米洛，与爸爸的名号没有联系，而完全是与一个叔叔的名字联系着的，这就是与爸爸最亲爱最伟大的战友之一，古巴革命最伟大最光荣的英雄之一，即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叔叔联系着。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叔叔，曾经是菲德尔·卡斯特罗伯伯的和切·格瓦拉爸爸手下的，最果敢、最忠勇、功劳最大的爱将之一。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叔叔，就是那个曾经和所有古巴革命勇士一起，从《格拉玛号》登上古巴海岸开始革命战争，最初硕果仅存的十二勇士之一，后来在切·格瓦拉爸爸的第四纵队，作为主要的勇敢战将，后来又根据菲德尔总司令的决定，代替切·格瓦拉爸爸指挥第四纵队，最后又和指挥着第八纵队的格瓦拉爸爸，一起解放拉斯维利亚斯省，攻下圣克拉腊，和切·格瓦拉爸爸统率着起义军，最先进入到首都哈瓦那，为解放哈瓦那，最后彻底消灭巴蒂斯塔政权，建立革命的古巴的人民政权，可以完全算作是开国元勋的英雄。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位英雄的叔叔，在胜利后不久，在他继续进行着勇敢战斗和辛勤工作的岗位上，被帝国主义的走狗暗藏的敌人伸出卑鄙的黑手，令人痛惜地被杀害了。对于他的牺牲，菲德尔·卡斯特罗伯伯和切·格瓦拉爸爸，都痛惜万分。而就在卡米洛叔叔被敌人暗杀牺牲的那一年，小卡米洛来到了世界上，英雄爸爸切·格瓦拉，为了永远纪念他不幸牺牲的伟大的战友和同志，他给他新生的儿子起名叫小卡米洛，以让他的儿子不仅是他的儿子，也成为卡米洛的生命和名字的延续。

这样，切·格瓦拉和阿莱达·马尔奇共有的小儿子小卡米洛，事实上因为名叫小卡米洛，所以他还是一个难忘的英雄的战友和兄弟的宝贵的纪念“物”。

切·格瓦拉是特别地喜欢和宠爱着小卡米洛的。

当然，那时候，在 1965 年 3 月 14 日的这时节，切·格瓦拉和阿莱达·马尔奇最后一个孩子，他们的小儿子小埃内斯托还没有出生。因此，其时，他们的另一个最小的孩子，小女儿小赛莉亚，还只是个刚刚一岁半的小囡囡，不过，这小囡囡也已经长的像是初绽的鲜花一般，十分可爱了，她已经特别地懂得了不能拒绝把自己的有如鲜花一般细嫩美丽的小脸，无条件地埋伏在爸爸的，长满着蓬松的大胡子的脸颊上，让亲爱的爸爸尽情尽意的热吻她了。

格瓦拉回来了。

整个“兰乔博耶罗斯”机场，欢声笑语，一片欢腾。

那一天，整个古巴，整个哈瓦那，似乎都为切·格瓦拉的归来而欢腾，而喜气洋洋。

那一天，整个哈瓦那的上空都一片晴朗，整个古巴全岛的天气，都异乎寻常地好，环绕古巴岛国的加勒比海的蓝湛湛碧水，都十分的风平浪静，海流十分安稳。

份然显得十分年轻的，非常美丽漂亮的切·格瓦拉的妻子阿莱达·马尔奇，在飞机的舷梯旁，领着一大班孩子，热情地迎接她最亲最爱的丈夫时，她一任丈夫伸开健壮的双臂，让她浑身的骨骼都咯咯响着，紧紧地拥抱她，热情地，完全张开着嘴巴，热情地亲吻她。

但是，此时此刻无比幸福和激动的阿莱达·马尔奇，则总是一直的默默无语，除了眼睛，她不用嘴巴说话。这是因为，她每逢此刻，总是不能说话，不敢说话。她能说什么？能说想念，能说甜言蜜语，能说说亲爱的孩子们的故事吗？

她几乎都不能说。

她几乎都不敢说。

她怕她一说话就眼泪汪汪，一说话就痛哭起来。

阿莱达·马尔奇实在是太爱她的丈夫了。

阿莱达·马尔奇实在不能想象，世界上在什么地方，还能找到比切·格瓦拉更好的丈夫。

只是，阿莱达·马尔奇，除了无比的热爱着切·格瓦拉，热爱着这个丈夫之外，她还总是在无比的心疼着他，总是在差不多是令人心碎地牵挂着他。

今天，他一去数月，又是走过了千山万水，为着完成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古巴人民交托给他的使命，他差不多又千辛万苦，无比紧张劳累地走遍了半个世界。今天，他完成使命，终于又胜利地归来了。

但是，有一句话，叫作是“久别胜似新婚”。这一句话，现在用在切·格瓦拉和阿莱达·马尔奇这一对年龄还完全处在青壮时期，正在盛年的恩爱的夫妻身上，还可以适用吗？

适用当然无疑是适用的。

只是，适用却有时也不能适用。

因为，切·格瓦拉不仅是阿莱达·马尔奇的丈夫，不仅是他们亲爱的孩子们的无比亲爱的父亲，而且，他还是古巴人民忠诚的儿子，他还是古巴革命的重要领袖人物之一。

因此，切·格瓦拉不仅属于作为妻子的阿莱达·马尔奇，不仅属于作为他的子女的亲爱的父亲，他还首先是无条件地属于伟大的古巴革命事业。所以，即使在飞机的舷梯旁，夫妻们忘情而热烈的拥抱时，一直默默无语的阿

莱达·马尔奇，也没有向丈夫说出“先回家吧”的这句话来。

于是，接下来，阿莱达·马尔奇又张双臂，拉扯，拦拢着来到飞机场欢天喜地地迎接到了亲爱的爸爸，又一个接一个地爬上了运载他们来机场迎接爸爸的那辆小型面包车，当孩子们从拉开的面包车的车窗里，伸出小手，露出小脸，热情地招呼他们的爸爸也到这一辆车上来，来和他们在一起时，他们的爸爸却只是在飞机场停机坪上，也向他们招招手，然后钻进了另一辆车体很长的黑色轿车。

孩子们注意到了，站在爸爸身旁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大胡子伯伯也在向他们招手，然后他便也钻进了爸爸已经进入的那辆车体很长的黑色轿车。

孩子们无不感到遗憾和失望。不过，好在，与他们本来同车的妈妈现在发话了：

“孩子们，坐好。你们的爸爸还得先去办公，然后才能再回家和我们大家一起团聚。孩子们，团聚的时刻会有的，再忍耐一下吧！”

阿莱达·马尔奇妈妈这样来安慰孩子们。

但是，首先还是大姑娘小伊尔达，开始发牢骚，表示她对爸爸的不满了。

“我已经忍耐十年了。他还要我忍耐多久！”

接着，小卡米洛究竟是男子汉，他也开始不高兴地表示着对爸爸的不满：

“唉！真是的，爸爸怎么老是去办什么公啊！见他，比见我们院子里的警卫员叔叔都难多了。真是的！”

唯有二姑娘小阿莱达最乖巧，似乎能懂得体谅他们的爸爸的苦衷，她不高兴地教训着兄弟们说：

“不许你们再抱怨我们的亲爱的好爸爸，谁抱怨，再见到爸爸时，就不许抡着让爸爸来抱，看你们怕不怕！”

小阿莱达的话很有威力。她的话果然把小姐弟、小妹妹们震慑住了。他们不再吵吵嚷嚷，一律闭起了嘴巴，沉默了下来。

只是，孩子们这时不知道他们的阿莱达·马尔奇妈妈，此刻的心里会有多么苦。她扭歪着嘴，扭歪着脸，也使劲儿地沉默，更不敢多说一句什么话了。

居无定所的国家领导人

切·格瓦拉长时间地远离古巴出国访问，归来时并不马上回到自己的小家和快乐的窝巢里去。这在一般人看来，也会深感离奇。但是，在古巴领导人们的眼里看来，并不感到有丝毫的离奇之处。他们已经完全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事业观念，一向大大地，远远地胜于家庭观念。虽然他们事实上往往比寻常的人对家人更富挚爱和深情，往往更具亲切的亲情和无比的爱心。

在这一方面，无疑，菲德尔·卡斯特罗，似乎也不折不扣地提供了一个表率范例。

菲德尔·卡斯特罗出生在古巴奥连特省的一个在全古巴都知名的富足的大地主家庭，他父亲曾经拥有过一万三千多公顷已被开垦的土地和甘蔗田。菲德尔·卡斯特罗从小过着非常优裕的生活。他在哈瓦那大学学习法律，接着当博士研究生的时候，曾经是非常吸引众多女大学生瞩目的英姿勃勃的美男子，他曾经是许许多多女同学追逐企图建立爱恋关系的目标。但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禀性独特，他在很年轻的时候，热衷于研究学问，极大地富有着关注社会的热情。富有着关注政治的激情，但是对女色，他却总是难为所动，总是激发不起很大的浓烈兴趣，年轻时候，他除了读书、研究学问和关心社会，关心政治以外，对女色的兴趣，似乎还不如他进行体育锻炼，打垒球和游泳钓鱼。

不过，后来，在1948年，在他二十三岁的时候，终于也发生过一次恋爱，并且他也拥有过一次婚姻，他的那一次婚姻，与他结发的妻子，原是在哈瓦那大学的同学，名字叫美莎·达雅兹·巴拉特。

卡斯特罗和美莎·达雅兹·巴拉特婚后，还生育过一个儿子。这个孩子后来长大成人，成了卡斯特罗最亲密的家庭生活部分。只是，卡斯特罗和美莎·达雅兹·巴拉特的婚姻，并没有维持非常久。1955年，卡斯特罗从巴蒂斯塔的松树监狱被释放出来，当他决计潜往墨西哥继续进行革命造反的斗争活动时，他和美莎·达雅兹·巴拉特宣告了离婚，然后，卡斯特罗就没有续弦过妻子。

一直到古巴革命胜利许多年以后，卡斯特罗也没有续弦过妻子。

因为没有再续弦妻子，所以，卡斯特罗在古巴革命胜利后，他也就没有过有妻室的家庭。虽然他后来还曾收养过许多革命遗孤，作为他的养子、养女，但是，他实际上仍然并没有再构造过什么家庭。

由于没有这样的构造，当然，事实上他就是没有家庭，他没有属于自己的“家”。他几乎没有拥有过自己的“私宅”。

而且，他不仅没有构造过这样的“家”，这样的“私宅”，他后来甚至也放弃了他私人办公室和甚至国务办公室的拥有。在古巴革命胜利最初的月份里，菲德尔·卡斯特罗刚刚出任古巴革命政府总理的时候，他在指挥新政权取代旧政权，以新的国家机器取代旧的国家机器的过程中，有许多国家机器，是被原封不动地接收了过来。比如政府大厦，总统府堂皇的国家宫，那都是豪华的、排场的、牢固的可以令老爷安然居住，发号施令的地方。在最初的月份里，古巴革命政府的卡斯特罗总理，在原先国家总理的府第里，也建立起了原模原样的总理府。卡斯特罗一度，也曾进到了这样的总理府内来办公和处理事务。但是，他在这里只坐了几天，为时不久，他就发现在这个官僚机器的组成部分里，他不能够像鱼儿得水般的获得美好的自由，相反，

他好像是开始被套上了枷锁，他发现总理府的宦门深似海，普通工农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起义军的士兵，很难有在这里来去的自由，而令他极为乏味和难得有兴趣的人，却纷纷奔到这里来，要求与他“幸会”和交谈，请求和期望他给予无量的慷慨的赐予。

卡斯特罗坐在这样的总理府上，不到几天，就完全彻底地烦透了，然而，烦透了还并不要紧，后来，他的最亲密的助手，也可以说是他的首席书记吧，也就是从马埃斯特腊山区游击战争时期开始就和他再没有分开过的也是昔日的哈瓦那大学的女同学塞莉亚·桑切斯，向他报告说：

“菲德尔，可了不得了，我已经计算过，你的这个总理府，如果像旧政权的总理府同样不差地支撑下去，一年下来，不说别的，仅仅办公费开销，就要最少花费一百多万比索！”

卡斯特罗一听塞莉亚·桑切斯的如此报告，他简直马上吓了一跳。

“要花这么多钱吗？多么可怕的浪费，是罪恶的奢侈！”

卡斯特罗在一声惊呼中，马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而这样的结论得出来，卡斯特罗就决不能听之任之。他几乎是毫不犹豫，马上和塞莉亚·桑切斯商量：

“那就撤消这个总理府，停止在它们总理府的办公机构的运转吧。我们可以在总理府之外，找一栋什么小些的房子。你塞莉亚·桑切斯，再带上少数几个助手，去开辟一处更为简便的，实在的，而不是官僚机器庞然大物的办公处吧。”

塞莉亚·桑切斯物赞成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这个决定，说了一声“好！”然后，她就开始推行这个决定，照着这个决定办事，马上向总理府的全体工作人员，传达了总理府从此停止办公的总理决定。

嗣后，塞莉亚·桑切斯就带领着另外很少几个助手，在另一个地方，搞到一套楼房，开设起了卡斯特罗总理的联络办公室来。

在这个联络办公室里，安排了几部自动录音电话。每当电话铃声响起来的时候，附加在电话机上的录音磁盘就开始工作，反复播放这样的录音：

“晚上七点以后，不要来电话。如果不是急事，不要来电话。如果你打电话是为了谈个人的事，诸如有关住房，被征用的土地，海滩上的住所、家具、冰箱、汽车、汽车零件、奖学金、出境签证或囚犯等等问题，请你找有关机关，我不管这些部门的工作。”

这个录音磁带播送完毕，还会重复一遍，如果两遍重复录音以后，打电话的人还不放下电话，卡斯特罗联络办公处的工作人员，便开始收接电话，这收接电话的人，有的时候是塞莉亚·桑切斯，有的时候会是别的工作人员。他们在接受电话以后，负责接洽和卡斯特罗总理取得联系，如果卡斯特罗总理同意会见和商谈什么，或共同研究处理办一些什么事情，他就会向你具体的约定在某一个时间，并且约定好会见的具体地点，这可能在某个工厂，也可能是在一个甘蔗园，或者是渔村，或者是在农业部的办公地，或者在全国土改工作委员会的办公处，有的时候，还可能在起义军的某一个要塞司令部或者是训练营地。

因为，在卡斯特罗作出决定，关闭了他的总理府庞大的官僚机器以后，他实行了无办公室的作法。研究土地改革，他就到土地改革委员会来办公，研究军队事务，他就到武装力量部去办公，研究工业问题，他就到工业部去。他到一切地方去现场办公。他完全摒弃了发号施令的官僚办公室。他到哪里

办公，就吃住在哪里，节省往返的时间，似乎也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他的工作效率，似乎也更便于他养精蓄锐。

而这样一来，菲德尔·卡斯特罗也就成了一个既无家室、私宅的、全身心了无牵挂的革命者，同时也成为了全世界唯一的一个没有官邸的国家领导人。对于这样的领导人，金碧辉煌的宫殿大厦是没有意义的。豪华的别墅和排场奢侈的居室，也是了无意义的。这样的伟大，仅仅在这个方面，也有着绝非平庸的神采和神姿，他每年每月每日，生活在人民中间，生活在一切劳动战斗的岗位上，他经常来到卡马圭省无垠的甘蔗田里参加体力劳动，经常到工厂里去，经常到兵营里去，和工人士兵们一起开动机器，参加掌握火炮武器驾驶坦克喷发火箭筒的训练，即使胜利的日子年复一年地过去，他每年总还要在那当年踏上马埃斯特腊山区扯开战斗旗帜的日子，约几名老战友、老伙伴，还是蹬着伞兵靴，背着加满子弹和给养、书籍和药品的战斗行军包，重回到那条行军路线上去，沿着当年的行军路线，爬山涉水，披荆斩棘地走一趟，饿了仍然野炊，困倦时，也还坚持在山间野地荒草和榛莽丛中，实行露营，有的时候，也还仅仅用点燃篝火的办法，来警戒野兽的袭击，来驱逐蚊蚋。

卡斯特罗就是这样不可腐蚀地生活着，因此，他的战友们，真正的百炼成钢，纯金一样的战友们，自然也会是这般如此地不可腐蚀地生活着。

所以，当切·格瓦拉从万里之外重又飞回来，重又回到古巴的时候，他几乎仍然完全是十分自然的，不是首先回到他的私宅和小家里去，他首先的动作，仍然是来到革命的大本营，战斗的司令部，首先要向无可置疑的领袖和总司令，作他进行完一场或几番工作任务、战斗使命后的履职报告。

因为这是最主要的。

因为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这是最必要的。

伟大的兄弟聚会

切·格瓦拉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坐在非常朴素的这辆奥斯比尔牌轿车上。在进入哈瓦那市区后。卡斯特罗再一次要给他开车的一名起义军战士按按钮摇下车后排座上的车窗，卡斯特罗和格瓦拉再一次伸出手臂，朝着跟在他们这一辆车之后的阿莱达·马尔奇和格瓦拉的孩子们乘坐的小型面包车招手告别。然后，看着这辆车从卡斯特罗轿车的车队分了出去，在一辆警卫随车的护送下，回归格瓦拉的私邸。

而切·格瓦拉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坐的轿车，现在在一行几辆轿车的车队陪同下，驶向了哈瓦那总统府的“革命宫”。

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总统，以及一直陪同切·格瓦拉在国外访问并且同时归来的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负责对外联络的领导人，全国领导委员会委员奥斯马尼·西恩富戈斯·戈里亚兰同坐在后边一辆车上，也同车队一起，来到了总统府的“革命宫”。

劳尔·卡斯特罗因为有要事处理，今天没有到“兰乔博耶罗斯”机场迎接切·格瓦拉，现在在总统府的“革命宫”门前，他和其他一些党政领导成员，以及塞莉亚·桑切斯、比尔马·埃斯平等同志，等着热烈迎接切·格瓦拉归来。

塞莉亚·桑切斯最初在哈瓦那作“七二六运动”组织的地下联络工作，1958年年初离开哈瓦那进入马埃斯特腊山区参加革命战争。她一直和菲德尔一起，作为菲德尔的主要助手之一，他和切·格瓦拉自然也是感情笃深的老战友和老同志，当初马埃斯特腊山区革命武装成立第四纵队，菲德尔下令晋升格瓦拉为起义军的第二名少校时，少校的星徽，还是塞莉亚·桑切斯亲手用针线给格瓦拉缝缀在软帽上的。

塞莉亚·桑切斯比切·格瓦拉年长许多。切·格瓦拉一直视她为可尊敬的老大姐。

至于比尔马·埃斯平，是一个高挑儿的漂亮人物，如果说塞莉亚·桑切斯热情可亲，十分招人尊敬和喜爱，但却难说是很漂亮的话，比尔马·埃斯平却是实实在在，不折不扣的漂亮人物。她最初是马埃斯特腊山区临近的古巴第二大城市圣地亚哥的大学生，也是“七·二六运动”组织的参加者，后来也在1958年初，进入马埃斯特腊山区参加战斗活动，一直留在劳尔·卡斯特罗纵队纵横转战，后来在战斗中和劳尔·卡斯特罗发展友谊，建立爱情关系，终于也成了劳尔·卡斯特的夫人，古巴革命胜利后，她开始领导着古巴妇女联合会的工作。

切·格瓦拉出访外国，久别归来了。

所有战友，都像久别归来的，回到家里来的亲人和兄弟一样地欢迎他。

在这样的迎接亲密的兄弟和战友归来的时刻，往往也是都很忙碌的兄弟和战友们难得聚会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候，战友和兄弟们还可以有聚在一起吃一顿便饭的机会。当然，大家即使在一起吃一顿便饭的时候，也会考虑到最好不要使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生活习惯受到干扰。古巴革命领导集团的战友们，从很早开始，就非常自觉地十分注意保护自己的革命领袖。在马埃斯特腊山区进行革命战争的中期，革命的领导集团就开始限制卡斯特罗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从那时候开始，他们就强调卡斯特罗必须很好地，只应该站在他应该站着的位置上，不能无端的超前，无谓的冒险，在每一场交锋激烈，纵队司令进入前沿指挥的时候，革命的领导核心，宁肯让卡斯特罗去直接指

挥一个迫击炮连，也不让他暴露在前沿阵地上。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人们总是自觉地考虑到和处处维护卡斯特罗，注意保护他，注意照顾他，包括人们往往照顾甚至迁就他的生活习惯。

今天，大家聚在一起，在总统府的“革命宫”吃一顿便饭，因为怕打乱卡斯特罗的生活习惯和生活规律，因此，不管谁饿谁不饿，开饭的时间还是定在晚上的七点钟以后开始。因为，卡斯特罗每天规定的两餐饭，其中的第二顿饭，也是每天的最后一餐饭，总是规定在晚上的七、八点钟，因此，提前开饭怕他吃不下，拖后开饭怕影响他第二天的胃口，考虑到这样的细节，他们欢迎格瓦拉归来的聚餐，还就是定在了卡斯特罗平时开晚饭的时间。

终于，他们高高兴兴在一起吃喝了起来。不过，他们即使是这样的聚餐，也十分简单，不过是米饭、面包、糕点、鸡块、炼乳、蔬菜和水果。他们基本没有人喝酒。

饭很快吃罢了。

吃饭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不会慢条斯理，都不会文文皱皱，都好像是赶着进度，要抢着吃完饭似的。原来，吃完饭的气氛，才能说明大家为什么都要赶着用餐了，因为，吃完饭的时候，大家就该每个人操着又粗又长的雪茄烟，喝着又甜又浓的黑咖啡，要开始比吃饭更重要也更热闹，最为无拘无束的开怀畅谈了。

他们不谈女人，倒不是因为有塞莉亚·桑切斯和比尔马·埃斯平这样的一些女同志在场，怕对她们引起失礼或失敬。不是的，原因实在并不出在这里，而是完全出于能聚在这里谈话的人们，几乎都有更为广阔和重要的兴趣，他们往往要为深刻的哲学问题，展开至为深刻的讨论、也会为非常迫切的社会政治是非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为采取至为重大的决策或紧急措施，进行几乎是不可调和，难以调和的争论。

在这样的讨论、辩论和争论中，无疑菲德尔·卡斯特罗是一个最雄辩的角色。但是，在任何讨论，辩论和争论的民主决策过程中，在集思广益的过程中，菲德尔·卡斯特罗从来绝不作独裁者和霸主，他是绝不会武断和霸道的。

而与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行为从来差不多是天然吻合，总是非常默契而性格又很不相同的切·格瓦拉，在平时的生活中，他往往静如处子，喜欢沉默而寡言少语，他从来也不爱热闹，别人拉他来网球场上打网球，他也往往略略参与，然后就静坐在网球场的看台上，去默默读书或思考，仿佛懒与人为伍，极不合群。但是，一到辩论学问，辩论是非，争论问题的时候，情况立刻就会不同了，他几乎总是立刻就会活跃起来，极为热情奔放地参与进来，使他自己也完全能够扮演雄辩的角色。而且，有趣的是，尽管他的思想意识包括敏锐的感觉，经常会与菲德尔·卡斯特罗非常默契和几乎总是天然般的吻合，但是，他们俩人，也常常不乏争论和辩论，有的时候也会各持己见，寸步不让，当然最后他们又总能由衷地找到共鸣和一致，非常诚挚地又走到一起来。

正因为如此，在他们之间展开对话、讨论和交流的时候，再加上别的其他一些思想水平，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相近的同志来参加，他们在聚会讨论中的所有话题，都将会是世界上最高水平的，最富激越情致的最为精彩的话题。所以，这样的谈话和聚会讨论交流的宝贵时刻，是几乎任何布满佳肴美酒的盛宴都不可比拟的，是任何酒吧和夜总会游乐场俱乐部跳舞厅都寻觅不

到的欢乐。他们高级的、壮丽的、激越辉煌的话题那么多，因此，他们自然不会，绝对不会在这样宝贵的时间里浪费哪怕是仅只一秒钟，来谈论任何鄙琐的话题、无聊的话题，包括谈性、谈女人的话题。即使必须谈，有必要谈，他们也只能到另外的适当的场合去谈，他们是身心最为健康的人，他们绝不会一有机会就津津乐道地咀嚼那些不该咀嚼不休的事情。特别是在最为珍贵的，往往有可能是世界历史里程碑的时刻。

古巴革命，无疑集合着这样一些崇高的、纯粹的精英，他们的生存方式，确实在一定的意义上，是相当地独特的。

今晚，他们准备要请切·格瓦拉彻夜畅谈他出访外国的印象，特别是出访中华人民共和国，出访埃及，和出访诸多非洲的战斗国家的印象，由于话题的重要，而且可能引发更为重要的话题，所以，刚才大家吃饭都是急迫的，是相当草率行事的，只有大家点起粗粗大大的雪茄烟，品味着香喷喷的浓咖啡，准备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主持下，请切·格瓦拉扮演今天聚会谈话场上的主角的时候，大家才神情最为倾注，觉得是开始走进了难得的、重要的、同时是最有情趣的时刻。

忽然，切·格瓦拉即使在这样的兄弟们、战友们的中间，也又习惯似的涌起了一种男性的羞怯和腼腆，他不知道该如何对所有的在场的同志致一个得体的开场白了。

菲德尔·卡斯特罗本来是相当老成，相当严肃的，可是，他忽然看到切·格瓦拉的羞怯的样子，也忍不住笑了。接着，他对格瓦拉说：

“切！你在从飞机场进入哈瓦那市区的汽车上，你对我提起了，你在埃及访问的时候，我们的朋友纳赛尔总统给你讲过一个关于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故事。今晚，你不妨就从纳赛尔总统所讲的这个故事讲起吧。也许是很有趣的。不是吗？”

切·格瓦拉说：

“也许是的吧。”

于是，切·格瓦拉就在亲密的领袖和朋友，尊敬的同志和战友们面前，展开了一个大家似乎熟悉却又并不完全熟悉的话题。

从赫鲁晓夫的故事说起

1962年10月间，古巴发生了震动世界的所谓“导弹危机。”

在这场危机发生之后，古巴和美国的关系，趋于更加紧张。而与此同时，古巴和苏联的关系，也趋于紧张起来。苏联几乎不再是古巴领导人强烈向往的一个地方。古巴最主要的革命领袖和领导人，都尽量避免出访苏联。不过，出于斗争的大局的需要，1964年的10月，古巴党和政府，还是派遣当时的古巴总统，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全国领导委员，书记处书记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出访苏联，协调古、苏关系。

多尔蒂科斯是1961年10月14日到达莫斯科的。然而，就在这一天，苏联发生了一桩同样能够令世界震动的非常事件。这即是，曾经张扬一时的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这一天已经被宣布下台。

尼基塔·赫鲁晓夫下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赫鲁晓夫的政策和影响已经在苏联结束？还是意味着苏联的政策，将要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化呢？一时价，苏联的情况肯定出现了巨大的未知数。一时是难以完全辨析清楚的。

于是，10月14日到达莫斯科的多尔蒂科斯，和刚刚取代赫鲁晓夫成为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刚刚取代赫鲁晓夫成为苏联政府部长会议主席的柯西金，以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米高扬草草见过面，草草地进行了一番不涉及任何重大实质性问题的会谈，然后就草草地离开了苏联，紧马返回到古巴，向菲德尔·卡斯特罗及古巴最高领导机构汇报刚刚发生的崭新情况。

情况当然还是一时难明，很是令人摸不着头脑。苏联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新的趋向将要向什么方向发展，这对古巴来说，无疑会有着十分深刻的关系，因此，情况是不能不进一步的清楚和明了的。

于是，在多尔蒂科斯回到古巴二十多天以后，切·格瓦拉作为古巴负责决策权力的核心领导人之一，由于他不仅负责古巴的经济工作，同时还是负责分管外交和对外联络，同时还主管着古巴的意识形态事务，所以，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及古巴最高领导核心，就又派遣他，率领古巴党政代表团，以参加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为由，赴莫斯科进行访问。

在切·格瓦拉这一次访问苏联的过程中，格瓦拉被邀请安排登上列宁墓，参加了莫斯科红场庆祝活动阅兵盛典的检阅和群众游行。

这一次切·格瓦拉的访问苏联，是他的第三次。

1960年11月，切·格瓦拉率古巴经济代表团访问苏联时，也曾参加过莫斯科十月革命的庆典，也曾登上列宁墓，参加过阅兵盛典和群众游行的检阅。那是他访问苏联的第一次。

他对苏联访问的第二次，来去匆匆是在1962年的8月末到9月初，那次他率古巴党政代表团到莫斯科访问，在当时负有极为高度机密的使命。那次进行的重要谈判，就是后来引出危机的关于苏联在古巴领土上设置导弹问题的谈判。

切·格瓦拉第三次来到莫斯科，以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七周年隆重庆典为由，实际上也负有着不仅对苏联的新领导层摸底的工作，同时，也还负有着艰巨的谈判使命和任务。

主要的目标，当然，古巴是期待着，或者说也是期待着，赫鲁晓夫的下台，新领导人的更替，能够得到一个契机，这就是恢复、改善和进一步发展古苏关系。因为，从1962年10月“导弹危机”之后，古苏关系更加紧张，

古苏关系严重倒退，一度几乎也就要面临着决裂的边缘了。

本来，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最初的起因，实在就是首先来自苏联，首先来自赫鲁晓夫。

1959年1月1日，古巴革命在胜利的最初的日子里，全世界所有这场革命的局外人，几乎都一时摸不清头脑，摸不清楚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革命。

当时的美国当权者，包括许多美国新闻媒体和知识阶层，以为这是一帮大学生、嘻皮士，在闹着玩儿似的干了一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革命涌现出的菲德尔兄弟和切·格瓦拉一班革命英雄，不过是一些欧洲革命传说中的行侠仗义，杀富济贫的“罗宾汉”式的人物。他们对这场革命和这场革命所产生的英雄人物，在一开始的时候，是大不以为然，绝没有引起绝对的刮目相看，高度重视的。

美国佬如此。

西方国家的许多各种色彩的人物，最初也是这样认识。

至于东方国家，当时还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为首的苏联，是怎样认识古巴革命的出现，和古巴革命涌现出来的杰出英雄呢？

当时在苏联，把持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领导权的赫鲁晓夫，一贯自以为是，自作聪明。在最初的时候，他特别认真，特别卖劲儿地表示，说古巴革命和古巴革命的英雄们，和共产主义共产党，都绝无牵连。他唯恐这场革命其实很糟糕，唯恐这场革命和这场革命涌现出的英雄们，给共产主义或共产党沾了包。

赫鲁晓夫当时采取这样的态度，不是没有根据的，而是极有根据的。那就是，当时在古巴革命发生的整个过程中，直到古巴革命的完全胜利，在古巴，确曾存在过一个当时受莫斯科控制和指挥的共产党，这个党的纲领和党章，是共产党性质的，但是它的名称，当时在古巴，被叫做是“人民社会党”。

这个“人民社会党”，在巴蒂斯塔反动政权统治古巴的时候，是一个进行着公开活动的合法政党，它的一部分负责的党的领导人，还曾一直参加巴蒂斯塔政府的工作，在巴蒂斯塔政府里佣有很高的职位，这个政党在巴蒂斯塔政权控制的“议会”里，也有着相当比例的议席。

因此，这个“人民社会党”，在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中，不仅不是这场革命的积极支持和参加者，除了一部分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参加古巴革命的武装斗争外，作为党的组织，它的领导机构，以及多数时候是居住在莫斯科的这个党的领导人，一直是站在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对立面，即使不是激烈的反对派，也绝对不是合作者和参加者。

所以，在古巴革命中，这个人民社会党总是利用一切机会，来表白这个党与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绝无关系，甚至有的时候还发表谴责性的声明，以表明它和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存有着不可融合的界限。

当然，由于这个人民社会党，没有太光彩的行为和作为，甚至为虎作伥，它的名声相当恶臭，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运动，也绝不承认他们的革命与这个党是有牵连有瓜葛的。

当切·格瓦拉最初带领着起义军进军到哈瓦那，和占领哈瓦那之后，一家媒体提问切·格瓦拉是不是共产党员时，切·格瓦拉十分明确地说：

“我是共产党员。但是，我不是古巴人民社会党党员。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起义军，也与古巴人民党绝无关系。”切·格瓦拉的这个回答，是绝对坦率的，也是绝结真实的。

他表示的清清楚楚，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运动和古巴革命的胜利，与古巴当时的人民社会党是绝无关系的。

由于和苏联控制的人民社会党绝无关系，因此，当然，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运动和它的胜利，自然也就没有任何联系。

而正因为如此，当时在苏联，在谈到古巴革命时，赫鲁晓夫总是极力表白古巴革命，与共产党是毫无关系的。为了让人们对此留下深刻的印象，一贯爱编撰谎言和笑话、故事的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还特别编撰一个并到处宣讲广为流传的，关于古巴革命的故事。

赫鲁晓夫在这个故事中说：

古巴革命的领导人，有一天被召到了上帝的殿堂里。他们好大一队人马，站成了两排，于是，上帝就开始下达命令，上帝说：“谁是共产党员？出列！向前三步走！”

“切·格瓦拉第一个站出来了，第一个向前走了三步。

“接着，劳尔·卡斯特罗也出列，向前走了三步。

“接下来呢，就再没有人出列了。

“于是，上帝就冲着菲德尔·卡斯特罗喊了起来：

“喂！你这个大胡子，你怎么不出列，你不是共产党员吗？”

“卡斯特罗愣了一下，说：

“上帝呀！我什么时候是个共产党员了呢？我并不是共产党员呀！”

赫鲁晓夫讲这个故事时，总是绘声绘色，总能引起人们的哄堂大笑。

可是，赫鲁晓夫编撰，讲述这个故事，是要表明什么意思呢？不外乎要表明古巴革命的来历不明和它的非正统体系。

他一开始的时候，总是这样急于地表示着。

然而，接下来呢？由于古巴革命发展的声势越来越大，越来越被世界所瞩目和看重，越来越产生着几乎具有无比冲击力的影响，越来越是个顶天立地的新世界的擎天柱了。这时候，赫鲁晓夫把持的苏联，或作为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赫鲁晓夫，开始想要掌握和控制古巴，开始想着要掌握和控制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以及卡斯特罗本人了。

赫鲁晓夫耳提面命，首先采取的步骤是，赶紧把长期居住在莫斯科的古巴人民社会党的领导人，分批地纷纷派他们返回古巴，赫鲁晓夫开始想通过他们所控制的古巴人民社会党，来逐渐地控制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运动。

卡斯特罗当年还不完全是一个自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是一个有着高度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论修养，思想、感情、实质上饱含着共产主义理想的共产主义者了。

他领导的古巴革命，在赢得政权的伟大胜利以后，它正确地实行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政策。古巴人民社会党，虽然它在古巴革命过程中无所作为，甚至总是不无有不堪的动作，名声实在不好，但是，它毕竟还是一个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号的政党。所以，在古巴革命胜利后，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运动，还是把这个党容纳进了革命的行列中来了。这其中有一个很大的自然的原因是，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起义军，仅仅经过两年多一点时间的奋战即夺取了同家政权，而他当时拥有的革命力量，包括全部起义军的干部和战士在内，也不过一千人，训练有素的党务行政干部，是极为有限的，这样，掌握领导管理一个有六百万人口的国家，事实上是必须拓宽干部力量渠道

的。所以，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运动组织，理所当然地吸纳毕竟以革命组织名义的人民社会党人，来参与古巴革命百废待兴的诸多工作。

然而，这样一来，却也就开始产生着人民社会党渗透、控制甚至有了取而代之为革命领导正统主角的试图。这种试图在强有力的组织形式下，很快加大了实行的力度。在这样的表演中，身在莫斯科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充当着总导演的角色。

古巴革命的胜利，卡斯特罗这样一些古巴革命英雄的出现，在最初的日月里，还在首先并没有引起美国佬的骇怕的时候，就已经充分地引起了赫鲁晓夫的惊恐和惊慌。在行将进入六十年代的时候，由于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始作俑，在世界上的相当广阔的范围内，曾经传播过一种相当鄙污的“恐帝病”和“恐战病”。特别是1959年，就在古巴革命赢得政权，赢得胜利的那一年，赫鲁晓夫第一次访问富强的不可匹敌的美国。他在访问过美国以后，更认为美国几乎完全可以制驭整个世界。赫鲁晓夫的心胸狭隘，目光短浅，他既愚蠢，又卑鄙，他认识了这样的美国后他就试图和美帝国主义达成默契，由美、苏两大家和世界势力抗衡。为此，他当时甚至主张，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排除在外，完全由包括国民党蒋介石代表参加的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来共同主宰世界一切事务，来处理世界一切事务。这实际上，完全是迎合着世界帝国主义的逻辑，迎合着世界帝国主义的需要，可以保障世界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能够完全随心所欲地镇压世界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革命运动，使他们真正成为世界的永恒的霸主和统治者。

而赫鲁晓夫所以要这样，是为什么呢？他也有他的道理和理由，这就是，美帝国主义和世界帝国主义集团太强大了，任何人，任何民族和国家，都万万反抗不得，千万不要再闹什么革命，否则，美帝国主义一发威、一瞪眼、一动怒，星星之火就可以引发世界大战，整个世界就会处在热核的毁灭当中，这可是万万使不得的。

赫鲁晓夫在整个性格中，都包含着蝇营狗苟的苟且灵魂。他没有顶天立地的革命者的骨头。他永远宁肯在强人或帝国主义的压迫下完全苟且偷生地，委曲求全地，忍气吞声地活着，即使是被脚踏在地，即使是五体叩拜，双膝跪下来伏地，他也绝不想再革命、再战斗、反抗，他自己已经是可以养尊处优，可以出人头地，可以颐指气使压迫别人的大老爷了，是大贵族了，他还能要求革命，要求斗争和反抗吗？

因此，他不仅像帝国主义一样害怕各国人民的反抗怒火和革命的战斗的怒火，他在骇怕帝国主义的同时，骇怕这样的怒火，他有双料的骇怕。

正因为这样，他对古巴革命的熊熊烈火，而且是在美帝国主义家门口，眼皮底下燃烧起来的怒火，与他到美国去亲吻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脸颊，向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们乞求缓和，乞求和平的姿态，是完全不相容的。因此，他力图控制古巴革命，力图驾驭古巴革命的发展，几乎完全成了他的一种非常自然本能的热望。

所以，他绝非不无伎俩地当起大导演来，他导演着苏联控制着的古巴人民社会党，展开了越演越烈的窃取革命胜利成果的活动，有的公然的进行，有的开始在暗中谋划。中心目标是夺权，力图取而代之。

赫鲁晓夫从苏联派回古巴的这样一些人民社会党的领导人，首先走到中心舞台上来的，是一个名叫阿尼瓦耳·埃斯卡兰特的人。他是原古巴人民社会党的负责组织干部工作的书记。这个人在卡斯特罗领导古巴革命的过程

中，一直呆在苏联，曾经作为世界共产党组织兄弟党的代表团领导人，参加过苏联共产党的“二十大”和“二十二大”。

苏共的“二十大”和“二十二大”是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打击忠诚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两次最集中地进行丑恶表演的大会。作为赫鲁晓夫门徒的阿尼瓦耳·埃斯卡兰特，忠实地学习了赫鲁晓夫的全部思想、手段和伎俩。

他回到古巴以后，首先在人民社会党内，强力地推行赫鲁晓夫的思想路线和理论，打击和清洗对苏共“二十大”、“二十二大”以及赫鲁晓夫思想路线持有严重怀疑的人民社会党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老党员，一部分有过斗争经历、斗争经验的老干部，和倾向支持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运动的人。他还迫不及待地吧斗争的矛头直指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也试图展开反对卡斯特罗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运动，他开始组织人马，动员舆论，攻击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相差甚远，甚至攻击诬蔑卡斯特罗在攻打蒙卡达兵营后，在敌人法庭上的长篇辩护著作，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东西，由此，他也攻击卡斯特罗的主要助手们，也都统统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攻击他们没有几个能背得出来几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文字，他们甚至也提出了这样的说词：马埃斯特腊山区的山沟沟里，能出马列主义？他们甚至还大张旗鼓地开始了对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起义军中培养出来的领导干部和指挥员，肆无忌惮地进行人身攻击，攻击这个“下流的胖子”，攻击那个是“粗鄙的农民”，攻击这个“政治水平低”，攻击那个“连《资本论》都不知道是一本什么书。”他们先造这样的舆论，然后就借助人民社会党在古巴革命胜利后，在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容纳下，从而使人民社会党在古巴革命运动合流的过程中窃取的权力，开始对“卡斯特罗分子”们动起了手术。

还是在1961年将近岁尾的时候，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为了扩大革命的核心和阵线，在原先以“七·二六运动”组织为主体的革命起义军的基础上，联合了当时在古巴革命进行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在城市里确实坚持着一定的斗争范围的另一个大学生革命组织，即“革命指导委员会”，以及当时虽然没有参与什么斗争，但毕竟是有马克思主义纲领的古巴人民社会党，组合成了一个新的革命组织，便是叫：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

古巴人民社会党的部分领导人，就是在这样的组合合并的过程中，获得了古巴革命领导方面的一部分实质性的领导权，比如那一位阿尼瓦耳·埃斯卡兰特，他原在人民社会党内，是主管组织干部工作的书记，进入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以后，他仍然充作了主管组织干部工作的领导，掌握了很大一部分在这方面的权力。而因此，他在接下来进行的，在明目张胆地已经展开的反卡斯特罗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进程中，开始大批地打扫卡斯特罗的忠诚战友和追随者的时候，他也就有了操手术刀的权力，他手中也就有了大手术的手术刀。

他开出了长长的名单，开始以他的亲信干将和信徒，以古巴的赫鲁晓夫主义者，来取代属于卡斯特罗体系的干部，一级一级政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省、各市、各大厂矿，全国和地方的土改工作委员会，他都动起了这样的手术。甚至，在古巴革命军中。他们也开始如此这般动起手术来了。

有一天，菲德尔·卡斯特罗到一个军区去视察部队，他忽然发现，这个军区，已经有一百多位经过马埃斯特腊山区革命战争锻炼培养出来的起义军军官，业已被免职。

菲德尔·卡斯特罗马上问：

“这是为什么？”

属于阿民瓦耳·埃斯卡兰特体系的，已经在这里掌了权的人回答说：

“因为他们政治水平低，而且都没有较长的党龄资格。”

菲德尔立刻表示了愤怒：

“我知道你阁下可能有人民社会党二十年的党龄资格，可是，你有一天实际战斗和斗争的经历吗？你是救世主？你是神仙和皇帝？按照你们的理论，你们的逻辑，我们的创造古巴革命胜利的英雄之一，军区司令员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同志是不是也要被免职呢？他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我们任命他为第四纵队的纵队司令员时，也并没有要他鹦鹉学舌地背过几条《资本论》的文字，你们是否也认为他的政治水平低，因而要接下来免除他的司令员职务呢？”

卡斯特罗愤怒地质问着执行阿尼瓦耳·埃斯卡兰特路线的人。

卡斯特罗最后的结论和留下来的话语是：

“你们演的好戏该收场了！你们要干的好事，你们干不成！”

卡斯特罗的这结论是明确的，这样的话语是斩钉截铁的。

而且，卡斯特罗的这样的结论，并非仅仅只是即兴的，他的斩钉截铁的话语，也并不是出于一时的激情说出来的话语。

因为，事实上，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及以他为核心的古巴革命的最高领导核心，经过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洗礼和锻炼，经过无数次的生死迭宕的严峻考验，同时，有过那样的开天劈地，耕云播雨，扭转乾坤，排山倒海，指点江山的革命领导经历，他们已经是一个完全成熟了的不仅是坚强的，而且也是能够把握一切风云气候，明察秋毫的，非常英明的领导集体。虽然在这个集体中，都是一些年轻的人物，全部所有的成员，都不过在三十五岁上下，当然包括菲德尔、劳尔和格瓦拉，他们实在全部都还年轻，但是，他们却绝对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幼稚和轻飘的年轻人，他们都已经是成熟的领导革命运动的大家，是挥写世界革命历史的大手笔了，他们在不会被任何小情小趣所吸引的时候，他们也绝不会被冲天的，盖世的，甚至是能够震撼世界的伟大成功，伟大胜利所冲昏头脑，因而陶醉飘飘然起来，因而忘乎所以完全麻木不仁起来。

不，菲德尔和他的伟大战友们，决不是这样一班无心无肺无头脑和心计城府的低水平的人。相反，事实上，他们都已经是至臻成熟的统帅和大将了。

他们的头脑，始终是清醒的。

他们的眼睛，始终是明亮的。

他们在任何困难和曲折挫折面前能够坚韧如钢，坚强如铁，他们在任何胜利和成功顺利的情况下，也能够心平如水，波澜不惊。

一场巨大的革命胜利几乎是一夜之间被赢得到他们的手上，赢得到他们的面前的，虽然他们并无把握和经营过这般如此巨大胜利的经历，因此虽然他们还都在少壮年纪都还没有过领导和管理一个相当富有特色的国家的经验。但是，接下来的工作，他们既然能够把政权精彩地、漂亮地赢得到手，他们几乎是理所当然的，可以照样的精彩地、漂亮地领导和管理这个国家。

他们能够夺取政权。

他们也能够巩固政权和掌握政权。

他们懂得，学会了夺取政权。

他们也将学会和懂得将怎样把握和巩固政权。

他们不仅有聪明的头脑，他们事实上还都已经有了深厚的学问，都已经有了运转世界的能力。

因此，在一切都在顺利发展和前进的过程中，他们并没有在什么环节上脱节，因而造成任何革命的车轮失散的凌乱。

在古巴革命胜利最初的日子里，虽然一切工作和事情，忽然像大海的海啸一般，突然涌流到了古巴革命领导人们的头上，在一开始的时候，确实出现过忽然间的忙乱现象。

不过，就是在那样的时候，古巴革命的舵手，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忙而失措的张慌。即使在大风大浪最险急的关头，他也总还是目光如注，牢牢地把握航向，紧紧地把握着舵盘，同时，总是发出权威而正确的指令，指挥着他的大副、二副和三副以及水手长们，和他协同作战，协力前进。

在古巴革命赢得完全的胜利的最初的时候，菲德尔·卡斯特罗作为无可置疑的领袖，在古巴革命的最高领导核心里，事实上是曾经作过非常明确的，同时是细致的革命分工的。比如，除了菲德尔·卡斯特罗作为革命的主要领袖和革命的像征总理一切，总司令一切工作，他下属的主要助手，也作了明确的分兵把守环节的分工。比如切·格瓦拉很快被分工管古巴的全部钱财，因为钱财十分重要，还要求他直接插手管，好管住和管好钱财同时，让他当国家银行行长之外，还让他当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主席、工业部长，负责国家建设和工业化的实现，然而，在这样的明确分工，具体工作之外，切·格瓦拉还事实上被分工分管外交工作，对外联络和意识形态文化宣传工作，同时他一直在兼任一个前线大军区的司令员职务之外，他还兼着相当于总政治部主任一职的古巴武装部队训练部的部长，同时，他还负责主管古巴起义军的干部训练和古巴民兵的组织武装等等诸多方面的工作。

切·格瓦拉分管着如此大面积的工作。

作为古巴革命三足鼎立的重要领导人中的另一个，即劳尔·卡斯特罗，在古巴革命胜利后，他被分工统管的工作方面，大体上也是一个非常宽大的面积。他首先是披分配但任了古巴武装力量部的部长，统管古巴一切武装力量。同时，他还被分配领导和负责国家的内务治安，统帅警察部队和司法行政部门。此外，劳尔·卡斯特罗，还被分配主管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紧要的机构，这就是古巴革命保卫委员会。这个革命保卫委员会，主管一切情报反谍和除奸以及肃反工作，包括十分广泛的职权和重要的工作内容。

于是，正是在劳尔·卡斯特罗主管的这个革命保卫委员会负责的工作领导领域里，在1961年岁尾开始的前后，他们的正在工作和战斗生活中摸索工作经验的工作人员和干部们，开始日逐渐多地积累着印象，他们在发现古巴人民社会党的原领导人，现在属于古巴社会主义革命党的组织书记，在令人迷惑不解地大批解除和清洗古巴革命的元老、开国元勋和马埃斯特腊山区革命战争参加者同时，还有着另外一个令人迷惑不解的，非常活跃的习惯性的行动，这就是，他和苏联驻古巴大使馆的大使，几乎保持着比与任何领导人都多的联系。而这个苏联驻古巴哈瓦那的大使谢尔盖·库特尼亚伏切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对于这个人物，古巴革命的领导人们，早已经领教过了。他首先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大人物，架子很大，派头很足，面目可憎，有一副狼一样的喜欢嗅嗅的鼻子，有一双鹰眼。

这个人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但是，他的形象和作派，他的架子和

气势，叫人立刻能想起从前美国驻哈瓦那的大使。那时候，不管是艾森豪威尔派给巴蒂斯塔政权的第一任大使阿瑟·加纳德也好，还是他的继任者，第二任大使厄尔·史密斯也好，虽然他们都是巴蒂斯塔的坚决支持者和密友，但他们同时也是置身在巴蒂斯塔总统头上的太上皇，他们不仅比巴蒂斯塔更尊贵，也比巴蒂斯塔更威风，他们在哈瓦那的街市上，不仅仅是在政府大厦和各种要害部门，包括在酒吧间，夜总会来来去去出没的时候，他们的身边都不仅簇拥着大批巴蒂斯塔政府的官员，同时还簇拥着大批的保镖。

在巴蒂斯塔政权统治古巴的时候，古巴和苏联也有外交关系，但是没有在双方的首都互派大使，并没有设置大使馆。古巴革命胜利后，苏联在古巴设置大使馆，并且派来了谢尔盖·库特尼亚伏切夫当大使。这位谢尔盖·库特尼亚伏切夫，实际上是苏联克格勃机构的一个高级官员，许多年来，一直是披着外交官的身份，在世界许多国家从事情报工作。他曾在奥地利、土耳其、加拿大、西德、法国等重要国家和地区从事过重要使命，他被遴选来到古巴当大使，事实上肩负着准备控制古巴的重要使命，他也是抱着要成为古巴革命的太上皇的目标，来到古巴履职的。

所以，他一到古巴，就端起了太上皇的架子，有些很是放不下来，当他第一次会见菲德尔·卡斯特罗时，提出来的一项要求，就是，苏联大使在古巴应该受到特别的尊敬和安全保卫，他要求首先给他本人提供特别的保镖。

仅仅这一项要求，就令卡斯特罗对他感到格外的反感和泄气，诸多的古巴领导人，许多人身负重任和要职，匆匆忙忙来来去去，在很不安宁复杂的情况下，保持着充分的警惕，但却也都是自带枪械武器，主要靠自己来保卫自己，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曾经提出这样的请求，即配置特别的保镖。

但是，现在，苏联大使来了，这位以贵族自居，以未来古巴的太上皇自居的苏联大使，他第一个提出了配置特别保镖的请求，而且，竟然是这样理直气壮的请求，似乎他提出的请求，完全应该是理所当然的，是应该应份的。

然而，卡斯特罗却立刻产生了一种仿佛苏联大使要临驾其上的感觉，而卡斯特罗决不像曾经心甘情愿接受美国奴役的巴蒂斯塔，他绝对不会产生接受美国，也包括接受苏联奴役的任何想法，而如果不不管是来自美国，还是来自苏联的任何这样的奴役思想，几乎是自然的，非常的必然，是一定绝对引起卡斯特罗的不仅是反感和憎恶，而且肯定还有百倍的，百分之百的警惕。

为此，菲德尔·卡斯特罗第一次和苏联这位谢尔盖·库特尼亚伏切夫大使接触会晤以后，他就特别地向切·格瓦拉提出，要警惕这位苏联大使，要警惕他的越权。同时，菲德尔·卡斯特罗也向劳尔·卡斯特罗发出通报，要他注意这位苏联大使的行为，要注意他的行为出格。

切·格瓦拉和劳尔·卡斯特罗，都是绝对忠诚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他们不仅尊敬和绝对地服从卡斯特罗的指示和命令，他们有充分的经验，知道卡斯特罗的敏感性和预见性，总是包含着绝对正确的真知的见，所以，他们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通报和提示，总是高度重视和谨慎缜密地非常认真的对待，绝对不会有半点塞责和敷衍，所以，当菲德尔·卡斯特罗提醒他们警惕和注意苏联大使的姿态和行为以后，他们都理所当然地睁大了眼睛，开始警惕地注视着他，开始相当严密的注意着他。

于是，这个苏联大使越格的行为，自然首先是被负责古巴革命保卫委员会的工作的劳尔·卡斯特罗注意到了。他的助手们，很快开始，把阿尼瓦耳·埃斯卡兰特和苏联大使的异乎寻常的，总是紧锣密鼓的联系活动，写成日日报

告，不断地送到了劳尔·卡斯特罗的高度机密的办公室的案头上来。

头脑一贯清晰、冷静，又总是果断处置事务的劳尔·卡斯特罗，于是决断，指示采取进一步监视措施，包括启动一些非常的技术手段。

于是，罪恶的，可耻卑鄙的阴谋活动，开始被渐次地发现了。原来，阿尼瓦耳·埃斯卡兰特的全部活动，都是在苏联大使谢尔盖·库特尼亚伏切夫的操纵和控制下展开的，他们展开的这样的活动，最终的目标和目的是什么呢？无可置疑地就是要实现古巴被苏联所控制，古巴被赫鲁晓夫所控制。而实现这样的目标他们就必须首先瓦解卡斯特罗的基础，进而把矛头直指卡斯特罗，败坏卡斯特罗，以便最终取而代之，这样，苏联控制古巴赫鲁晓夫控制古巴的目标，才有可能最终实现。

由于劳尔·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保卫委员会系统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这样的阿尼瓦耳·埃斯卡兰特和苏联大使谢尔盖·库特尼亚伏切夫代表各自系统内外勾连进行阴谋活动的大量确凿的事实证据被掌握，他们自然也就与他们的愿望适得其反地走向了覆灭。

卡斯特罗果决决断，迅速采取了差不多是迅雷不及掩耳的反击措施。

菲德尔·卡斯特罗直接指挥，亲自采取步骤。

1962年3月26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电视台，不拿事先准备好的任何文字材料，以《关于统一革命组织工作方法的某些问题》为题，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电视演说。

这篇演说，从一开始就充满着战斗的锐利，锋芒毫不含糊，毫不隐晦地指向着妄图非分地控制古巴的阴谋集团和阴谋分子，明确地指出他们的阴谋活动，实质上是通过宗派活动达到政变的目的，卡斯特罗绝不含糊地点名道姓，揪出了苏联派回古巴，准备控制古巴的代表人物阿尼瓦耳·埃斯卡兰特，点了苏联派回古巴的原人民社会党总书记布拉斯·罗加等人的名。菲德尔·卡斯特罗指出，阿尼瓦耳·埃斯卡兰特妄图实行一系列的方法，把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建成一个由他控制的组织，建成一个由他控制的“枷锁”，建成一件由他控制的“疯人束身衣。”

卡斯特罗在这里愤怒的提到的，阿尼瓦耳·埃斯卡兰特要建“一件疯人束身衣，”是不是一个简单的形容词呢？不是的。卡斯特罗点到这样的话，事实上的矛头已经是直接指着苏联，直接指着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因为，那一句的来头，首先就是从赫鲁晓夫那里来的。正是赫鲁晓夫，在向苏联驻古巴大使谢尔盖·库特尼亚伏切夫布置任务，交待任务提到他对古巴的评价，他对卡斯特罗的评价时，他曾经说过：“古巴那伙闹革命的猴子，全是一班玩火的疯子，他们在美国的眼皮底下玩火，玩不好就触发世界大战，导致人类的覆灭，因此，苏联大使到古巴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把这群猴子赶进笼子里，要给这班玩火的疯子，穿上一件不容他们乱打乱跳的束身衣。”

赫鲁晓夫给他所派的驻古巴的大使发出的这样的圣旨，他的大使立刻鸡毛当令箭，捧在手里当上方宝剑，动不动就搬出这套话来，教训他们拳养控制多年的古巴走卒。而古巴的这些走卒们，也就把这套鬼话当成了“圣经”，当成了旗帜和他们行动的口号，到处张扬，四处宣称，结果成了一条完全暴露在外的狐狸尾巴。

这狐狸尾巴被抓住了，这狐狸尾巴自然也就成了连着狐狸脑袋和心肝肺的罪证。所以卡斯特罗在他的揭露苏联控制的阴谋集团时，他很自然地点到

了这从老根上传道过来的指令和口号。

三个小时的长篇讲话，卡斯特罗一条又一条，一层又一层地抽阿尼瓦耳·埃斯卡兰特这些苏联控制的阴谋家们的筋，剥他们的皮，触目惊心，完全是豺狼恶鬼，他们的罪恶累累、罪恶昭彰，他们的魔爪已经伸向了古巴革命各个领域，他们已经在完全准备着实行最后一击的政变，完全夺取古巴的革命赢来的政权，完全要由他们来控制制驭古巴了。

这样一伙人，这不是明明白白的一伙豺狼野兽吗？

对于这样的豺狼野兽，应该怎么办呢？是养痍为患，纵容他们，姑息他们，迁就他们，还是应该除恶务尽，彻底铲除他们，彻底动他们的手术呢？

现在，终于，该是真正的古巴革命派采取操起手术刀来动手术的时候了。

菲德尔·卡斯特罗还在古巴哈瓦那电视台，仍然心平气静，娓娓道来，一条一条陈述，展示着妄图取而代之，控制古巴的野心家、阴谋家们的种种罪恶事实和确凿的证据，延续着讲话的时间。而在古巴哈瓦那电视台可以复盖着的几乎全部区域里，另一个战斗的果决的行动，也已经开始了不容迟缓的进程序。

劳尔·卡斯特罗少校同志，正在挥动着他的铁的手腕。他安然在坐在他的警备森严的司令部里，平静耐心地等待从哈瓦那以及古巴全国各省各地区发来的报告，在此一时刻，古巴革命保卫委员会，正在全国开始搜捕阿尼瓦耳·埃斯卡兰特阴谋集团的全部走卒，当然也包括逮捕身居高位的阿尼瓦耳·埃斯卡兰特本人。

而同样也在这同一的时刻，切·格瓦拉少校同志，根据古巴最高领导核心的授命。业已出现在古巴革命政府外交部的办公大楼里，他正在古巴革命革命作家、外交部长罗亚的办公室里，一边抽着长长的粗粗的雪茄烟，同时端着一杯浓咖啡在来回踱步，他和罗亚部长一起在等待一个消息，等待着一位正在执行任务和使命的外交部的负责行政事务的副部长，在执行使命完成任务后归来的述职报告。

这位外交部的负责行政事务的副部长，此刻也是在这一座古巴外交部的办公大楼里，只是，他是在大楼的最下边的一层，那是在外交部的会见厅内，他在紧急召见苏联驻古巴特命全权大使谢尔盖·库特尼亚伏切夫先生。副部长根据古巴革命政府的授权，向这位苏联大使宣布，由于他从事了与外交官职责不相适应的，干涉古巴内政的非法活动，因此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人，对他的驱逐令是命令他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离开哈瓦那，离开古巴。

谢尔盖·库特尼亚伏切夫是苏联老资格的外交官，是拥有将军军衔的克格勃官员，他有丰富的工作和生活经验，他知道事已至此，肯定只能是他卷铺盖离开古巴的时刻了。他完全知道古巴方面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行动，他也不是没有想到古巴方面会采取这样的行动。他从1960年开始来到古巴当大使，在已经过去近两年的时间里，他已经得出了这样的认识，古巴不是东欧的那些本来就是完全由苏联一手制造出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古巴也像南斯拉夫一样，因为完全是自己创造出来的社会主义政权，所以，它也像南斯拉夫一样，不易被苏联控制，而且甚至更甚。作为有洞察能力的情报军官和外交官，他是有这样的观察能力和认识水平的。不过，在前此的时候，尽管他得到了这样的看法和认识，而且，正是因为他得到了这样的看法和认识，他不是想放弃控制古巴的努力，相反，他肯定是更加拼命地进行了努力，他竭尽全力地推动了控制古巴的工作，他知道越是困难而必要做的工作，在完成任

务以后，他的功劳越大，奖赏也就越多越高，最少如果他真正能够成为古巴的总督，那也将是非常辉煌和非常够排场的，古巴虽然是个不大的国家，但它实在太甜美了，实在太漂亮了。

然而，他的努力，现在却终于失败了。而且，他马上知道这失败已经永远无法挽回，他的前景，肯定也不会再存在光明的斑斓色彩了，所以，当他听到古巴外交部这位负责行政的，像是一位上尉连长一样年轻而英武的副部长，好像是给一个班长下达降职命令似地向他宣布古巴政府对他的驱逐令时，他的内心深处立刻变成了泛滥的苦海，他的精神灵魂立刻陷入了完全崩溃的境地，所以，他再也没有力量像一个受辱的贵族一样大发雷霆，大大发作和咆哮起来，而是，他几乎是无力再说什么，他只能勉强地支撑着他的龙钟老态，迈开仿佛是久已疲惫的双脚，步履蹒跚的悄然离开了古巴外交部的会见大厅，他竟然不想留下任何一句说词。他没有留下任何一句申辩。

等这位本来原先准备来古巴充当太上皇的，原先有一身贵族气派的苏联大使先生，躬着突然严重的弯曲下来的肩背，终于走到会见大厅的门外，钻进他的伏尔加牌轿车离去以后，古巴外交部的，像一名上尉连长一样年轻的行政副部长，差不多是以跑百米的飞快速度，来不及等电梯，而是跑过楼梯，跑上位置在第四层上的部长办公室，他马上像完成一次战斗任务的连长向团长报告完成任务的情况一样，首先直接是向切·格瓦拉少校，当然也同时向着罗亚部长，进行了郑重其事的，然而同时又是绘声绘色的报告。

切·格瓦拉听完报告，和罗亚部长会心地交换了一个目光，然后，说了一句：

“谢谢外交部长的咖啡招待！”

说罢，他说准备走了。但忽然又回过头来，转过身来，拍了一下刚才执行对苏联大使下达驱逐令的那位年轻的副部长的肩膀，又说了一句：

“吓！好样的！”

偷鸡不成的苏联大使

偷鸡不成蚀了一把米。苏联大使谢尔盖·库特尼亚伏切夫灰溜溜地，严格遵照古巴政府的驱逐令里给他规定的时间，在四十八小时最后一小时到来的时候，泪眼潸然地离开了哈瓦那，永远地离开了曾经使他拥有过最灿烂辉煌梦想的古巴。

经过一天的转机飞行，他在离开古巴又四十几小时以后，飞回了时令虽说已经是春天，但是大地仍然迟迟没有解冻的莫斯科。

在莫斯科的努伏科沃民用机场上，苏联外交部和克格勃总部两个级别并不很低的官员迎接了他。

谢尔盖·库特尼亚伏切夫在莫斯科有他的后方基地，有他的公寓和别墅。他的已经不再是尊贵的大使夫人和他们的孩子，以及从古巴带回来的许多大包小包的行李，被安排到另外的车上，送回了在莫斯科他们的私宅。

而他，谢尔盖·库特尼亚伏切夫本人，却被拥上了另一辆车，径直飞驶进入莫斯科，沿着莫斯科河岸飞奔，然后从斯巴斯克门进入克里姆林宫。汽车在苏共“二十大”以后翻修的辉煌排场的政府大厦前阶的下面停下。然后，车门打开，谢尔盖·库特尼亚伏切夫被请下车。从飞机场迎接他归来的两位外交部和克格勃总部的官员，陪他走上梯阶，进入大厦后，交托给一位库特尼亚伏切夫完全不熟识的官员，他们就告退了。

这位库特尼亚伏切夫不熟识的官员，只轻声地对库特尼亚伏切夫说了一句：

“跟我来吧。”

随后，库特尼亚伏切夫，被引进了克里姆林宫内当时最豪华、最排场的宏大的办公室内。

这是在苏联斯大林时期，包括斯大林本人和老一代的斯大林时期的领导人们，绝不曾使用过的豪华的办公室。

不过、陈设也还简单，只是在整个地面上，都铺着厚厚的纯毛的提花地毯。

过去，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只是在他习惯踱步的地当央，才铺着不厚的、朴素的粗毛地毯。现在在这间宏大的办公室内，包括在茶几和桌子底下，都被厚厚的提花地毯覆盖着。

而在这间办公室里，全部可坐的真皮沙发，不像斯大林时期的办公室坐椅，多是可以旋转的椅子，现在在这间办公室里的沙发，都是扶手离地面很近的见方形的、半方形沙发。这说明了这个办公室的主人，一定是个又粗又圆的矮胖子，他很注意和讲究，在这个办公室里，如果是体型高大的客人再坐较为高大的沙发坐椅里，他一定会使这间办公室里的客人，产生一种压抑的感觉，好像在这里坐下来的客人，忽然可以居高临下于这里的主人似人。那是很不适宜的。

因为这间宏大的办公室的主人，现在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

谢尔盖·库特尼亚伏切夫现在被领进了这间宏大的办公室。当然，他现在明白了。他现在已经清楚地知道了他是被领进了谁的办公室。因为在他到古巴出任大使之初，也曾来过这间办公室，那是他临行告别莫斯科即将踏上赴任的征程的前一天，他也曾被召到这里来过。那一次，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也曾与他就坐在这间办公室的两只低矮的方型沙发上，赫鲁晓夫笑容可

鞠，非常亲切，侃侃而谈，向他交待步骤，讲述策略，面授机宜，指点库特尼亚伏切夫到达古巴，到达哈瓦那以后，就应该如何如何，怎样怎样行事。要把古巴闹革命的大胡子猴子们关进笼子，要给古巴玩革命之火的“猴子们”带上束身衣的话，就是那一回赫鲁晓夫亲自向库特尼亚伏切夫讲说过和交待的。

然而，库特尼亚伏切夫，现在没有完成赫鲁晓夫交托的任务，而且有辱使命，像一只癞狗似的被从古巴赶回来了，他将怎样来见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又将会怎样来会见他呢？

库特尼亚伏切夫知道赫鲁晓夫脾气暴躁、粗野，没有文化，有的时候，会变得像老虎一般的凶暴，特别是对苏联国内他手下的人，他的狂暴往往是肆无忌惮的，人们可想而知，这个人，堂堂一个大国的国家领导人，既然可能在联合国大会的高层会议上，当着世界上诸多国家的领导人的面，会脱下皮鞋来猛敲桌子。会和西班牙大使大打出手，那么，在国内，在他的官邸或办公室内，他就不可能脱下他的皮鞋来，用皮鞋头也来敲给他带来烦恼和不快的手下人们的脑袋吗？在赫鲁晓夫身边，谁能想到，什么磨难不会发生呢？

库特尼亚伏切夫的心“砰砰”地跳动着，他胆突突地跟着赫鲁晓夫的侍卫官走进了赫鲁晓夫的办公室，他料想他是难得看见赫鲁晓夫还会有一张笑容可掬的脸，怎么可能呢？很可能的是，赫鲁晓夫会愤怒地，圆睁着两只炯炯有神的哥萨克人特有的翻白的圆眼，他会狠狠地像吃人兽一般的瞪着你，他会脸色铁青，猛然间像一只皮球似地弹跳起来，然后向你扑了过来，向你咆哮着、吼叫着、恶毒地骂你“败类！”“蠢猪！”“白痴！”“叛徒！”“变节者！”“你这个傻瓜！”“你这个可耻的叛徒！”据说赫鲁晓夫经常会这样。他是很爱发狂、发燥、很爱满嘴粗话，恣意侮辱人，恣意骂人的。虽然人们说他在斯大林面前曾经是最善奉承，最善阿谀，也是最有好脾气的一个人，可是，后来，这就谈不上了，现在，克格勃总部的官员们都知道，美国情报部门已经遥测出了赫鲁晓夫的身患病况。美国中央情报局集合了二十多名生理、病理、心理、神经病学专家。遥测中的赫鲁晓夫，现在已经完全是一个燥郁症的病患者，常常的在脑海里产生幻觉的冲动，产生难以抑制的狂燥，都是自然的，必然的病态反映，是一种病理现象，因此，遭遇他的发病折磨，就是在正常情况下，也是难免的，何况现在出现在他面前的，已经是一个吃了败仗，砸了大锅，捅下大漏子的灰溜溜的家伙呢。

库特尼亚伏切夫，实在胆胆突突，他缩着脖子，高高的个子忽然好像矮了半尺，他缩头缩脑来见赫鲁晓夫，他实在骇怕极了，他不仅骇怕今天的遭遇，他还担心骇怕着接下的恶果，也许从明天就开始的暗谈前景。库特尼亚伏切夫，完全陷在了一种可怕的深渊中，一种深不可测的深渊中。

但是，不管他多么恐惧和骇怕、担心，他终于还是走到了赫鲁晓夫的面前。他终于看到了正站在办公室的地当央，两手插在衣兜里，好像是叉腰站着的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似乎平静地站在他的对面，迎接着库特尼亚伏切夫的到来，谢天谢地。库特尼亚伏切夫开始在心里默念着。他发现赫鲁晓夫脸上没有乌云，没有怒气。赫鲁晓夫仍然好似上次一样，笑容可掬，似乎和蔼可亲。他一点儿也没有生气的样子，显然库特尼亚伏切夫现在可以放心，他今天遇上了赫鲁晓夫的好天“您好！尊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同志，请接

受我们对您最忠心的敬意！”

赫鲁晓夫走过来，张开双臂，竟然拥抱起了库特尼亚伏切夫来。赫鲁晓夫一边拥抱库特尼亚伏切夫，一边说：

“亲爱的谢尔盖·库特尼亚伏切夫同志，欢迎你回国。我们要谢谢你为苏维埃祖国所进行的创造性劳动。您干得很好。你无私地贡献了您的力量。特别是后来风云骤变，出现不测，你处理的很得体，很机智，很有分寸，很有远见，你没有愤怒地回报向你宣布驱逐今的古巴毛猴子，这就对了，不然，和他们闹翻，完全彻底地闹翻，就更不会有办法控制他们了，你立刻采取了进退裕如的聪明办法，你不愧是苏维埃国家的老资格的外交家，你的分寸掌握得很好，所以，我们将准备决定授你一枚劳动红旗勋章，以表彰你为苏维埃国家建立的功勋。”

赫鲁晓夫亲切地说着。

这倒叫库特尼亚伏切夫大出所料，喜出望外，他没有想到亲爱的尼斯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同志会是这样的通情达理，这么样儿的心怀广阔。

库特尼亚伏切夫简直要感动的掉出泪来了，他忽然像是受了委屈的孩子似地嘟哝着：

“亲爱的，尊敬的，最亲爱的赫鲁晓夫同志，我本来还寻思，您会批评处分我呢，真没想到您会对我这样，有这么样儿的伟大的宽宏。真是的……”

赫鲁晓夫说：

“你在古巴的全部活动，都表明着您对苏维埃祖国的忠诚，因此，我们怎么能批评您呢？你虽然现在退出来了，从那里撤出来了，你不是在那里留了很好的工作基础嘛？我们要进行的工作，我们要预期达到的目标，不是还可以继续努力吗？难道我们就不能再改变一种方式，再调换一种方式吗？难道我们就不能用，投其所好的方法吗？我们为什么不呢？特别是对待古巴的那一班子年轻人，那一班大胡子猴子，我们为什么不试一试这另一种办法呢！……”

赫鲁晓夫派来了新的合适人选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抓得很紧。在他接见谢尔盖·库特尼亚伏切夫仅仅几天以后，仍然是在他在克里姆林宫内的他的那间宏大排场的办公室里，他又接见了一位刚刚紧急应招从苏联驻古使馆紧急赶回莫斯科的年轻人，此人便是亚·阿列克谢耶夫。

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夫，首先也是苏联克格勃的一名积极活动的官员。他曾以苏联塔斯社记者的身份，在法国、荷兰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工作过。1959年古巴开展革命胜利最初的日子里，他从阿根廷来到古巴，以塔斯社记者的身份，在古巴开展采访活动。1960年古巴和苏联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后，苏联在哈瓦那建馆，选馆址筹建工作，就是亚·阿列克谢耶夫进行的。接下来，当苏联大使谢尔盖·库特尼亚伏切夫来哈瓦那上任时，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夫也就由塔斯社记者摇身一变，而成为了苏联驻古巴大使馆的政务参赞。

亚·阿列克谢耶夫和谢尔盖·库特尼亚伏切夫有很大的不同。本来，库特尼亚伏切夫，在克格勃机构内，就享有着将军的军衔，而亚·阿列克谢耶夫，充其量不过是个校官。从年龄上说，阿列克谢耶夫也比库特尼亚伏切夫年轻的多。同时，从职业上看，库特尼亚伏切夫在哈瓦那出现之始，就是以一個贵族官僚的面目出现的，令卡斯特罗第一次会见他，就立刻让卡斯特罗想起了美国从前驻古巴的大使，这印象肯定是很难令卡斯特罗愉快的，而有了这样的印象，此后的交道就很不好打了。

可是，阿列克谢耶夫呢？他一开始，不是以一个官僚的面目出现在古巴的。在古巴革命刚刚胜利的日子里，正在哈瓦那还处在乱腾腾的欢庆胜利的气氛中时，阿列克谢耶夫急忙匆匆从阿根廷赶到了哈瓦那来。他以一个衣着朴素，既有身份却又似一个牛仔或嘻皮士的记者的姿态，出现在哈瓦那满脸大胡子的起义军面前，而且，他是苏联记者，他立刻被认为是来自伟大苏联的代表，他立刻受到了进入哈瓦那的古巴革命起义军的热烈欢迎，何况他本人还会操用西班牙语文字，可以与哈瓦那的起义军官兵直接交流。当时由于菲德尔·卡斯特罗特别忙，切·格瓦拉在忙碌之外严重地犯着哮喘病，因此，最初和阿列克谢耶夫接上头，取得联系的古巴领导人，是劳尔·卡斯特罗。

劳尔·卡斯特罗一见这个苏联记者，只见他年轻漂亮，风度翩翩，却没有架子，而且异常的热情开朗，对古巴革命的胜利满怀惊喜和敬意，因此，劳尔·卡斯特罗对他印象很好，很愿意马上成为他的朋友，很愿意对他开展工作给予一切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在古巴革命胜利以前，最早反映和报道古巴革命的，是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马修斯。正是因为他的报道，对古巴革命的胜利进程，产生了特别巨大的影响。

而由此，古巴革命的领导人们，即使在战争年代，也充分认识到了新闻报道、舆论宣传的重要。他们非常遗憾当时没有更多的新闻工作者，来到他们的战斗地区。而当时，为了进行舆论宣传，在卡斯特罗的受命下，切·格瓦拉甚至创办过手抄体的小报，当然后来也还办起了油印的小报，甚至在后来也还办起了无线电广播电台，以进行舆论宣传工作。

古巴领导人们，参加领导核心的成员，无一例外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所以他们知道思想舆论阵地的重要。他们渴望看到苏联的代表，苏联的记者已

久，而现在，苏联的记者、苏联的代表终于来了，他理所当然会受到古巴革命领导人的最热情的欢迎。

在劳尔·卡斯特罗引荐下，阿列克谢耶夫很快也见到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虽然在病中，后来也很快接见了他们。

年轻的阿列克谢耶夫，像年轻的古巴领导人们一样，不乏有奔放的革命激情。这激情，很容易使他们共鸣起来，很快地更为接近起来，同时，因为他们的年龄也似相仿佛，又相互拥有交流会话的方便，所以，阿列克谢耶夫很快成了古巴主要领导人们的朋友，他和菲德尔、劳尔、格瓦拉都建立了相当紧密的联系。

而且，他也实在和库特尼亚伏切夫不同，不仅在形象上不同，大约在思想上也有不同。库特尼亚伏切夫由于地位的显赫，已经是一身官僚习气，而这种习气，对他和当时最嫉恨这种习气，也最蔑视鄙夷这种习气的古巴领导人打交道时，无论谁来，都是最坏菜的。而阿列克谢耶夫当时只是一个下级官员，离普通劳动者革命群众的色彩还相距不远，所以，他自然较少染上官僚主义的臭习气。而由此，阿列克谢耶夫的思想，也还并不僵化，再说，他当时也并没有直接从上头那里领受旨在控制古巴领导人和古巴的明确任务，同时在后来，在使馆当参赞的期间，他也没有被分工从事过与古巴人民社会党的原班人马打交道的工作，那时候库特尼亚伏切夫非常自信而专横地直接把持着那一项工作，他甚至是绝不容别人来插手于这项工作的。而这样一来。在苏联驻古巴大使馆操纵着一个库特尼亚伏切夫为核心的反对古巴革命的阴谋集团展开嚣张的活动时，也就使阿列克谢耶夫置身在了这样的瓜葛之外。

当时，作为苏联驻古巴大使馆政务参赞的阿列克谢耶夫，他在成为参赞前还是新闻记者，那时，就已经是古巴诸多领导人的朋友，和许多人都建立了私谊，成为参赞后，他主要还是被安排从正面与古巴领导人的联系，确实没有让他参与反面联系的工作。而且，当他在工作中，发现在他正面与古巴领导人加强联系的过程中，别人也在积极地开展着反面联系的工作进程时，他不知道其间的来头，他还有过异议，利用他与莫斯科属于他活动范围的克格勃渠道，越过大使库特尼亚伏切夫，直接打过反对进行负面联系的报告。他的报告在当时，在急功近利利令智昏的莫斯科，没有引起任何人的理睬。然而，在他这一方面，由于他对那种负面的联系活动持有不同的甚至是反对的看法，所以，他对那些积极与苏联驻古巴大使馆直接搞有负面联系关系而来往的古巴人民社会党的活跃人物，也持有着疏远和反感的态度，这样一来，他就没有沾染上与古巴人民社会党阴谋分子们合流的黑污。

年轻的，基本上少有侦察工作经验的古巴革命保卫委员会的工作机构，在后来不排除技术手段的侦察活动中，他们成功地对苏联驻古巴大使馆与以阿尼瓦耳·埃斯卡兰特为首的古巴阴谋分子们进行了长时间大量有成效的监视。他们从中没有发现阿列克谢耶夫这位苏联参赞，与这一阴谋活动有任何联系和牵连。于是，阿列克谢耶夫，在库特尼亚伏切夫被驱逐以后，他被古巴方面认为是唯一可靠的朋友。

而这样的状况，使远在莫斯科的尼基塔·赫鲁晓夫，看到了在与古巴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已经走了一步几乎使全盘棋皆输的臭棋之后，忽然又好像看到了一步可行致胜的好棋。

当库特尼亚伏切夫领受了赫鲁晓夫的褒扬和安慰，并在胸前领受了一枚不难看的劳动红旗勋章以后，库特尼亚伏切夫在接下来被赫鲁晓夫问及下一

步应该怎样对付古巴人时，库特尼亚伏切夫告诉了赫鲁晓夫他在古巴大使馆开展工作时留着的一手，那就是他始终严格地没有让阿列克谢耶夫染指与人民社会党联系的秘密工作，始终让他完全地扮演着古巴卡斯特罗派领导人真正的朋友的角色。因此，库特尼亚伏切夫向赫鲁晓夫献计献策说：现在这个阿列克谢耶夫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完全可以利用他仍然被古巴人信任的条件，再继续进行把古巴那群大胡子猴子最终能够抓进笼子里的工作，只是，方法要换全新的方法，要从全新的角度了。看起来，用人民社会党的领导人去搞渗透、篡权，以期取而代之的那一套策略手段，是很难用的上了。因为，第一，卡斯特罗他们太强，第二古巴人民社会党的人，实在没有基础，名声太臭，事实上也真是一班扶不起来的天子，一班乌七八糟的家伙。库特尼亚伏切夫毕竟最后献的计策，就是赞成赫鲁晓夫所说的投其所好的控制古巴人的办法，至于投什么所好才能使古巴人好起来呢？库特尼亚伏切夫说：

“给他们武器！多多给他们武器！那确实是一伙最喜欢武器的猴子，只要你给他们武器，他们就愿意当你的兵士，就愿意听你的指挥了，那时候，只要你的一声哨响，他们就可以规规矩矩听你的口令，听你的命令，向着任何一个可以关住猴群的笼子，一二一地齐步走了。那时候，您就可以把他们集合管住在猴笼子里了。我们的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库特尼亚伏切夫兴奋地说着。

他的献计献策，马上给了赫鲁晓夫极为深刻的启示。于是，赫鲁晓夫也忽然欢天喜地激动起来，拍着他肥肉厚厚的大脸，从半方不见圆的沙发上跳起来了，高兴得直搓手。然后，他亲昵地扶着库特尼亚伏切夫的肩背，把他送出了办公室，还激动地说了一声：“再见，亲爱的库特尼亚伏切夫同志！”

转过身来，赫鲁晓夫就立刻抓起电话筒来，不是给苏联外交部，而是给在党中央协助赫鲁晓夫本人主管苏共和苏联国家全部干部人事工作的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显赫而忠诚的赫鲁晓夫的帮手科兹洛夫打电话，下命令，让科兹洛夫马上协调一切渠道，立刻把苏联驻古巴大使馆的政务参赞急调回莫斯科来，以便给他交托更为重大的任务。

这样，在苏联驻古巴特使全权大使库特尼亚伏切夫被逐山古巴的极短时间内，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夫急匆匆奉命赶回莫斯科。

他回到莫斯科的第二天，赫鲁晓夫便又在克里姆林宫他的办公室内，紧急地召见了他的。

召见也是在愉快的气氛中开始的。

阿列克谢耶夫一开始有些惊讶。他第一次单独来见赫鲁晓夫。他有些紧张。也有些拘束。但是，赫鲁晓夫十分亲切，十分平易近人，他看到阿列克谢耶夫，并不像是见到一个陌生的年轻人，而是好像是见到了一个久已熟识的老朋友。

“哦！亲爱的阿列克谢耶夫同志。欢迎你回到苏维埃祖国来！”赫鲁晓夫见到了名不见经传的阿列克谢耶夫，简直是在欢呼着了。他接着说：“坐下，坐下，阿列克谢耶夫同志。你在古巴干得很好。你挽救了我们在古巴的局势。谢尔盖·库特尼亚切伏，那是一个猪罗、白痴、大笨蛋，完全把古巴的事情搞糟了。他不该，完全不该支持那些什么人民社会党的野心家、阴谋家们，妄想去夺什么卡斯特的权，他们是妄费心机。菲德尔·卡斯特罗，是成熟的革命家，他有经验，有能力，完全粉碎那些阴谋家、野心家阴谋篡权的罪恶伎俩，事实已经很清楚的证明了，人民社会党那些猪罗，完全不是

卡斯特罗的对手。卡斯特罗是完全有能力镇压他们。对，对，什么？他们已经也来苏联了？卡斯特罗把阿尼瓦耳·埃斯卡兰特一伙也逐出了古巴？卡斯特罗没有枪毙他们？啊，卡斯特罗真伟大，他做得很有分寸，很照顾了我们苏联的面子，他懂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需要团结。哦，哦……”

赫鲁晓夫一开始，就像是打机关枪似的，发表着长篇大论，当他提到卡斯特罗逮捕镇压阿尼瓦耳·埃斯卡兰特阴谋集团时，阿列克谢耶夫插话说，卡斯特罗对这些人采取了逐出古巴的办法，因此这些人。现在也就还由古巴转回到苏联来了。阿列克谢耶夫还告诉赫鲁晓夫，被古巴逐出的阴谋集团头目阿尼瓦耳·埃斯卡兰特，已由苏联大使馆安排，包括代他购买了机票，让他和阿列克谢耶夫同道从古巴又来到了苏联。赫鲁晓夫听到阿列克谢耶夫介绍的这情况后，似乎马上又感到宽慰地表扬和夸赞卡斯特罗伟大，接着他又急匆匆地操起了他的坐位一侧的台子上的电话机来，他还是大声地呼喊：

“科兹洛夫同志！古巴逐出的那些他们的同胞，已经来到莫斯科了。对，这是阿列克谢耶夫同志刚刚向我报告过的。对，这位同志现在就坐在我的身边。好，我向他转达您的致意。好，科兹洛夫同志，您通知安德罗波夫同志，从古巴回来的那些人，要控制起来，要给他们面包吃，但是不准他们乱说乱动，那全是一帮蠢猪，但是喂肥了，也许还是会有用处的，只是不要让他们再跑到圈外去，以免叫人看见了又会讨厌他们。对，对，科兹洛夫同志，现在还不是该叫他们挨刀的时候。好，您安排吧。我现在就和阿列克谢耶夫同志谈关于他的任命的问题。”

接着，赫鲁晓夫搁下了电话。然后，他又转过来，和阿列克谢耶夫继续对话。他接着又说：

“亲爱的阿列克谢耶夫同志，我们知道了。我们听说了。你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你像朋友一样地出现在卡斯特罗兄弟面前，还有那个切，哦，据说这个人尤其不好对付，哦，不过，据说连他也喜欢你，于是，你就和古巴的主要领导人，几乎全部交上了朋友了，而且交上了真正的朋友，你一直坦诚地支持他们，和他们推心置腹，而因此，他们也信任你，信赖你，所以，在库特尼亚伏切夫这个蠢猪把事情搞砸了锅，搞糟了，把苏联和古巴的关系搞僵了以后，你还能来挽救局势，这你就给我们的党和我们的苏维埃国家，建立了很大的功劳。我们准备要向你颁发光荣的红星勋章，最高苏维埃主席会发布命令的，我已经向阿·伊·米高杨同志亲自发出了指示。他会很高兴给你颁发勋章，他知道你，他到古巴都是你给当翻译，他对你印象很好，他对你有很好的评价。哦，哦，不过，现在，让我来谈一谈我要和你谈的郑重题目吧，亲爱的阿列克谢耶夫同志，我们鉴于库特尼亚伏切夫这个无能的蠢家伙，一个十足的贵族老爷，不能再返回古巴去当大使了，因此，我们中央政治局的主要领导成员们已经决定，准备遴选你来接着干，准备派你回到古巴去担任苏联驻那里的特命全权大使。关于这一个决定，我们已经通知了苏联外交部。但是，外交部向我们报告说，在现在的情况下，苏联驻古巴大使的重新任命人选，尤其需要争得古巴政府和领导人的同意。我们也考虑了这样的必要，所以，向古巴政府争求的努力，还需要你自己亲自来作，你不妨给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兄弟和切他们，先打一个专递的外交电报。你可以告诉菲德尔、劳尔和切，你可以说尼基塔·谢尔耶维奇·赫鲁晓夫同志以及苏联党和政府，是完全、彻底的、全心全意和古巴人民站在一起的，他们都严厉地谴责了古巴人民社会党阴谋集团的活动，他们也严厉批评了库特尼亚

伏切夫。你就说赫鲁晓夫同志已经命令库特尼亚伏切夫，向着西伯利亚起步走了。你就说，赫鲁晓夫同志，和菲德尔、切和劳尔同志，是完全一致的。你就说，哦，哦，阿列克谢耶夫同志，我们的谈话该结束了，你同意了吧。派你去当苏联驻古巴大使，很光荣，我想你一定会是很同意的，是吧？哦！...

赫鲁晓夫也许确实很忙。他说结束谈话，他就开始站起身来送客。

赫鲁晓夫出妙招奇谋

亚·阿列克谢耶夫很乐于重返哈瓦那到古巴工作。他当然更高兴成为苏联驻古巴大使。他实在也由衷的很想支持和帮助古巴革命。他很想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兄弟和切·格瓦拉，一起多干点儿什么。

他和赫鲁晓夫见面以后，他遵命通过外交电讯，他直接给劳尔·卡斯特罗发了电报，电报内容写得很长、很详细，把他与赫鲁晓夫谈话的内容都含括进去了。他为什么把这封电报先发给劳尔·卡斯特罗呢？这是因为，确实的，他从一开始的时候，就与劳尔接触的时候较多，所以，他觉得他与劳尔的友情也更深些，可以更自然些，也可以更随便些。在他的印象中，卡斯特罗毕竟比较老成，而且总是很郑重，总是很庄严，切·格瓦拉呢，又特别敏锐，许多时候都是显得凌厉和警觉，因此，菲德尔和切，都不如劳尔更随和，所以，阿列克谢耶夫，要找菲德尔、切和劳尔办事说话联系接洽什么事时，他总是首先找到劳尔，通过劳尔，再与菲德尔或切打交道。

这一回，他传达赫鲁晓夫意图的传话电报，也是首先直接打给劳尔·卡斯特罗，又请劳尔·卡斯特罗转致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以及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周知的。

阿列克谢耶夫办事效率快，他迅速打出这样的电报。

令他欣慰和兴奋的是，仅只就在他发出这份电报的第二天早上，古巴驻苏联大使就亲自把电话给他打到了他在莫斯科的寓所，转告他说他给劳尔·卡斯特罗的长篇电报，古巴领导同志们都已经看过，经过郑重的研究，决定以多尔蒂科斯总统的名义，通知苏联驻古巴大使馆并转致苏联政府，古巴政府准备同意苏联政府委派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夫出任苏联驻古巴大使的正式任命。

接到这样的信息反馈以后，他在欣慰兴奋的同时，马上通过专线电话，打进了克里姆林宫，他被允许直接把电话打进了赫鲁晓夫的办公室，马上不无兴奋的向赫鲁晓夫报告了反馈的信息。

在电话那边，赫鲁晓夫好像有几分难以相信地迟疑了一下。但是只间隔了不到一秒钟，赫鲁晓夫就说：

“好极了！阿列克谢耶夫同志，我要祝贺你。那么，你将就是我们的准备走马上任的驻古巴大使了。因此，从现在起，你不要到任何地方去，请您等着我们进一步的重要通知！”

说着，赫鲁晓夫搁下了电话。

阿列克谢耶夫不无焦急地等了两天。他接到赫鲁晓夫在电话里的那样的指示，他哪里也不敢随便走动，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重要通知和命令。

果然，赫鲁晓夫有的时候说话是算数的。阿列克谢耶夫并没有被晒起来久等，就在他返回莫斯科的第四天头上，可以说真是来得够快的了，他终于夏的接到了新的急迫重要的通知，让他马上进入克里姆林宫，到党中央大厦的政治局会议室，参加重要会议。

阿列克谢耶夫应命迅速来到这间宏大的讲究的设备齐全能够令人感到惬意和舒服的会议室，这里也几乎是铺天盖地地铺展着厚厚的提花地毯，坐在这样的会议室里开会的人，一般得不了寒腿病，也难得患上流行性感冒。

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赫鲁晓夫其时最依重的书记处书记科兹洛夫，以及米高扬，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已经坐在这里了。而令阿列克谢耶夫吃惊的是，现在在这间会议室里，还坐着另外两个威风凛凛的人物，他们中一位是

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另一位是苏联火箭部队司令比留佐夫元帅。最末的一位，是苏共中央负责对外援助工作的主席团候补委员拉希多夫。

与阿列克谢耶夫来到会议室的差不多同时，赫鲁晓夫从另一个侧门也走进了会议室。

赫鲁晓夫还没有走到他主席的位置上，也还没有等阿列克谢耶夫在被指定的位置上坐好，就一只左手插在衣兜里，扬起了一只右手来，几乎是忽然间动了怒，严厉地指着阿列克谢耶夫说：

“阿列克谢耶夫同志，我们将全力支持古巴，我们将全力支持卡斯特罗，为了对付万恶的美帝国主义，为了支持古巴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的决心，我们准备把我们的导弹部队开到古巴去，开到哈瓦那去。你看这个决策怎么样？你看这个决策怎么样！”

阿列克谢耶夫一听赫鲁晓夫的这句话差一点吓跳起来。

阿列克谢耶夫的反应还是灵敏的。他马上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不，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同志，我们派导弹部队开进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未必能同意。他们很珍视他们的国家主权。”

赫鲁晓夫“嘿嘿”地笑了起来。他忽然好像逗乐子一样似的乐得很开心。他指着阿列克谢耶夫说：

“你听错了，阿列克谢耶夫！我们不是帝国主义，我们不是去搞侵略，我们怎么会把导弹部队开到古巴去呢？我们仅仅是想，提出这样的建议，这就是，为了支持古巴，为了支持卡斯特罗，我们把现在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可以运载一切核弹头和别的一切威力巨大的杀伤力的导弹，运送到古巴去，像在那个小小的美丽的岛国栽花种草一般，把苏联的导弹栽下来，布署下来，这样，强有力的古巴，就会有着强有力的依仗，美国佬也就不敢不动就欺凌他们了。你看我们这个想法，是不是一个最美妙的想法呢！”

赫鲁晓夫仅在一到两分钟的时间内，就把说话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而且，接下来把在古巴栽花种草一般栽种苏联导弹的美妙想法，说得如此天花乱坠。可是，很了解古巴情况，很了解古巴人思想感情状态的阿列克谢耶夫，一时思想上还持不出清晰的头绪，他不能非常把握地说出或认可，赫鲁晓夫的这个美妙想法，在古巴一定会受欢迎。因此，他一时迷惑着眼睛，似乎有些难以所云，不知所云。

而他的这种表情，似乎立刻在马利诺夫斯基元帅那里遭到了不良的反映。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拉着令人很难感到轻松的猪肚子脸，不是严肃，简直是冷酷地瞪了阿列克谢耶夫一眼，说：

“现在不是允许你犹豫的时候，是该你回答怎样坚决执行赫鲁晓夫同志的意志和命令的时候，我们对古巴给予最强大的军事援助，古巴人还不会乐得跳？这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这时候，米高扬也说：

“阿列克谢耶夫同志，你应该认识到，我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他的天才思想，总是深思熟虑的，永远会包含着正确的预见性和广阔的战略胸襟。刚刚过去的历史，我们是知道的。仅仅就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之前，在古巴发生过一件什么事情？那就是众所周知的，所谓的猪湾事件，美帝国主义派出了他们转手操纵着的飞机、军舰、坦克、大炮和强大的雇佣军，浩浩荡荡地对古巴进行了明目张胆的侵略和入侵。那来头是很大的。当然，卡斯特罗他们坚决地进行了抗击，而且最终消灭了美帝国主义全力支持的雇佣

军，他们赢得了巨大的胜利，他们狠狠地教训了美国。然而，不要忘了，美帝国主义毕竟是一个强大的美帝国主义，他们是很有能量，也很有胃口，是能吃掉小小的古巴，也是很想吃掉在他们嘴巴下游动的小小的沙丁鱼的。前不久，经过美国佬相当认真的努力，他们通过一些体面的方式，通过美国的私人团体，答应了古巴提出的条件和要求，古巴在猪湾事件中，消灭了很大一部分美国雇佣军的同时，他们还俘虏了一千二百多名美国佬武装起来的雇佣军。美国佬向古巴提出释放这些俘虏的要求，古巴提出了条件，卡斯特罗真是别出心裁，他答应美国佬说，释放这些雇佣军俘虏是可以的。但是，由于他们的入侵给古巴带来了经济损失，所以必须赔偿，赔偿的条件是，美国佬可以用一台拖拉机，换回一个雇佣军俘虏，一台换一个，不能讨价还价。这很为难美国佬的威风 and 面子，有点儿可笑，但也包含合理的合理的要求。最后，美国佬转个弯儿，通过民间组织，还是满足古巴的条件，用拖拉机和其他种类的一些工农业生产器具和机械，把那些古巴在猪湾事件中俘虏的一千二百名雇佣军都释放，让美国人来船，把他们又都接回到了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而这些美国雇佣军重新登上美国海岸时，他们受到了怎样的欢迎呢？他们受到像英雄凯旋一般的，最隆重的欢迎，美国总统肯尼迪先生，都从华盛顿的白宫赶到了迈阿密，来亲自参加欢迎雇佣军战俘归来的仪式，而且，这还不算，肯尼迪还把他的美若天仙的漂亮的夫人，美国第一夫人杰奎琳·杰基，带到了欢迎雇佣军战俘归来的棕榈滩。在欢迎仪式上，肯尼迪向雇佣军归来的战俘们发表了讲话，他也让他的夫人，风流的第一夫人向雇佣军们讲了话，而且，他还特别赏了一个大光，让杰基走到雇佣军归来的战俘们的人群中去，和一些战俘握手，还亲吻了一些释放归来战俘的脸颊，好不隆重，好不动人！而肯尼迪，包括他的夫人杰基，在欢迎大会上的演说讲话中说了一些什么内容呢？他们都明白无误地说出了这样的话：在美国的近处出现这样政权的事实，他们是永远也不能接受的。而这话是表明什么意思呢？这话的意思是明白无误的，这就是，美国的入侵，终还是要卷土重来的，美国的报复，终归还是要搞起来的。”

米高杨罗哩罗索地说着。

他说到这里，赫鲁晓夫粗着脖子大着嗓门打断了米高杨的发言，但他是说出喝彩的话，他说：

“对啦！阿纳斯塔斯说的对极啦！万恶的美帝国主义，一定还是要寻机对古巴发动入侵，寻机要对古巴进行报复的，因此，我们把强大的、无敌的、不可战胜的苏联武器，我们的导弹送给古巴一些，布署在那里一些，就可以万无一失地、绝对地保障古巴的安全了，何况，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的苏联，我们有的的是导弹，我们能够像制做香肠一般容易地制造导弹，我们制造出来的导弹干什么？不就是要对付万恶的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吗？不要犹豫了，阿列克谢耶夫同志，我们就这样决定吧；我们下决心要在古巴布署导弹了，你的下一步的任务，就是走马上任，到古巴去当大使，并且立刻去向菲德尔·卡斯特罗通报，向他传达这样的好消息，告诉他，你就说，我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同志，已经下定了决心决定在古巴布署苏联导弹，要用苏联的导弹，来保卫古巴人民，保卫古巴革命。你也可以喊一句古巴人的口号：誓死保卫祖国！我们必胜！”

赫鲁晓夫可以堪称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演说家之一，他一旦演说起来的时候，极富爆发力，声音特别宏亮，在他讲话的会议室里，就像回响着“嘎

嘎”的回响。

然而，奇怪的是，即将被正式任命为苏联驻古巴大使阿列克谢耶夫，听着各位领导的所有这些斩钉截铁的话，他还是不敢马上激动起来，高呼“乌拉”，反而他还是保持着相对的冷静，他坚持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和请求，这就是，他认为关于在古巴布署苏联导弹的事，有可能会被古巴领导人同意和接受，但是必须和他们进行协商，如果苏联单方面做出决定，通告他们接受和执行，恐怕也会引起他们各种可能的判断和误会，从而加以拒绝，因此，阿列克谢耶夫认为，最好先由苏联党的政府方面，派出一个权威的代表团，去和古巴领导人协商谈判，提出这样的意向，而不是首先作出决定，让苏联大使去通知古巴人来执行。

阿列克谢耶夫冷静地陈述着这样的意见。

赫鲁晓夫沉下了脸来。

他忽然回过头来，冲着一直坐在坐席上默默一言不发的苏联外交部长安·安·葛罗米柯问了一句：

“葛罗米柯同志，你说说应该怎么办？”

葛罗米柯反应迟缓。但他终还是回答了一句：

“阿列克谢耶夫同志的意见附合外交规则和程序。”

赫鲁晓夫忽然气嘟嘟呶起了嘴来，他把放在桌子上的两只又粗胖，又短小的手，在这一刹间握成了好像烤制的很好的面包似的拳头，两只拳头一起并没有用很大的力量擂在桌子的台布上，他不无感情地说：“什么外交规则、程序！你什么时候才能开始和教条主义彻底决裂呢？安·葛罗米柯同志！不过，好吧，也许你们是对的，就照你们的说法来办，我们不妨就先来一些外交规则和程序吧。”

赫鲁晓夫这样一锤定音。接下来就作出了相应的决定，立即决定由负责援外事务的主席团候补委员拉希多夫，以及比留佐夫元帅，以及尚未正式任命和上任的苏联驻古巴的内定大使阿列克谢耶夫，组成关于苏联导弹在古巴布署问题的谈判全权代表会团。

并且，这样的决定作出后，接下来的紧锣密鼓，便是在尚不及正式通知古巴政府的情况下，这个急促组成的级别甚高的代表团，便秘密地飞到了哈瓦那。

比留佐夫元帅把他的元帅服和元帅服胸前横竖数排的奖章勋章一起留在了莫斯科。他只穿了仿佛是军工生产部门的工程师所穿戴的军便服和轻便帽，以瓦夏的名号，出现在哈瓦那的街头，完全不为人们所注意。

阿列克谢耶夫马上紧急约见劳尔·卡斯特罗。

劳尔·卡斯特罗一见阿列克谢耶夫，还不等阿列克谢耶夫说什么话，劳尔倒先说话：

“阿列克谢耶夫！你这个尚未正式上任的大使多排场，不仅有一位主席团的候补委员来伴驾，还来了一位元帅级的保镖，你真行呀！”

阿列克谢耶夫感到吃惊，劳尔怎么已知比留佐夫元帅也来到了哈瓦那呢？真是聪明机警的古巴人！劳尔指挥的革命保卫委员会，真也都不是一些吃素的善行使者了。

阿列克谢耶夫笑了起来，马上抬头对劳尔·卡斯特罗少校说：

“部长同志，既然您似乎什么都知道了，请您安排我们尽快地与菲德尔见面吧，这是最重要的。”

劳尔诡秘地一笑，算是给了阿列克谢耶夫一个肯定的答复。

几个小时以后，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一起，接见了前来古巴秘密访问的苏联高级代表团。

菲德尔·卡斯特罗完全不提已经过去的古巴和苏联两国之间或人士之间发生的完全不能叫人愉快的事件，好像什么事情也不曾发生过似的，绝无尴尬而坦然从容地接待拉希多夫，和用着瓦夏这样一个假名的比留佐夫元帅，以及阿列克谢耶夫。

拉希多夫立刻向卡斯特罗传达了赫鲁晓夫亲自决定的，准备在古巴布署苏联强大导弹的建议。

卡斯特罗没有激动起来。

他几乎完全不动声色地说：

“这是重大问题。这样的重大问题，需要和我们领导核心的所有成员共同讨论。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定在明天。怎么样？”

苏联人当然只能表示同意。

于是，第二天，苏联党政军高级代表团的成员，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劳尔·卡斯特罗、以及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总统，进行了高级秘密会谈。

苏联代表团，陈述了苏联，特别是赫鲁晓夫同志，坚决支持古巴反对和抗击美帝国主义可能强加在古巴人民头上的侵略，因此，建议在古巴的领土上，布署针对美帝国主义的强力导弹。苏联代表团临出发离开莫斯科时，还又接到赫鲁晓夫的直接指示，还又加了两项，即在布署导弹的同时，苏联准备还要向古巴提供可以用来作高速远距离飞行，从而可以运输和投掷原子弹的伊尔—28轰炸机，还准备再向古巴提供用于海上作战的“蚊型”鱼雷快艇。现在，苏联代表团把所有这些建议，都一揽子提了出来。

这是一盘多么丰美，多么丰盛的好菜啊！

古巴领导人们，听着苏联代表团陈述，一个个眼睛都睁亮起来。他们明显感到欢欣鼓舞，也许他们甚至还想到了：还是苏联，真不亏是伟大的苏联，多么坚决的革命，多么伟大的慷慨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啊！

古巴领导人一到欢欣鼓舞的时候，便会竞相抽大抽起长筒的古巴自制的雪茄烟来，并且，立刻会要来古巴自产的黑色浓咖啡，来招待朋友和客人。

不过，古巴领导人仍然是谨慎的，是慎重的。

他们虽然是面对着包括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和苏联元帅，苏联大使的高级代表团，但是，决策如此重大重要的问题，似乎还应该在更高一层的权威决策人之间，制定出决断施行的决策。何况，许多方面，事关国家主权，都是必须经过更为缜密的研究，郑重谈判，然后才能正式形成国家协议，才能实施执行的。

想到了这些方面。

于是，古巴领导人们在耐心而认真专注地倾听完苏联代表团的全部建议后，他们立刻郑重的表示：第一，古巴方面准备同意苏联的建议；第二，愿意和苏联方面就苏联建议的实施的细节，进行周密的讨论和达成明确无误的具体条款和协议；第三，古巴最高领导核心决定派遣古巴武装力量部部长劳尔·卡斯特罗少校，率古巴高级代表团，赴苏联，和苏联最高决策机构领导人，进行进一步的，明确协议的会谈。

古巴年轻的革命领导人们，决策办事是十分周密的。

苏联代表团觉得他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肩负使命的任务，他们同时完全接受了古巴领导人派遣劳尔·卡斯特罗部长率代表团访问苏联，和苏联最高决策机构作最后谈判，作出最后议定书的要求。

雷厉风行，闻鸡起舞的古巴领导人，办事效率更高，行动更快，当苏联代表团准备返回莫斯科时，劳尔·卡斯特罗部长率领的古巴高级代表团，也已经和他们一起乘机同行了。当然，劳尔·卡斯特罗的这次出访，也是秘而不宣，是绝对机密的。

劳尔·卡斯特罗来到了莫斯科。

赫鲁晓夫几乎是迫不及待地立刻会见了。并且，马上组织了范围很小，但是最高级别的会谈。赫鲁晓夫亲自代表苏联方面，他选择的主要谈判助手是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比留佐夫元帅，还包括海军空军的两名将军和克格勃的一位上将。

会谈军事性质的色彩胜于政治性质的色彩，军事性质的格调更胜于政治性质的格调。

这种格调和色彩，也许是赫鲁晓夫刻意制造出来的；一班子航空母舰、重型巡洋舰般的元帅和将军，包围着一名充其量不过像一艘鱼雷快艇的古巴少校。

苏联代表团的全体人员，最少都拥有中将军衔，马利诺夫斯基是元帅、比留佐夫是元帅、一名空军上将、一名海军上将、一名克格勃上将，只有一名中将，这就是赫鲁晓夫本人。

在赫鲁晓夫当政的年代里，曾经发生过有人为他闹军衔的问题。那就是还算是赫鲁晓夫的老朋友，曾经和赫鲁晓夫一起在顿河方面军工作过的老搭档，后来的苏联元帅叶廖缅科，也许是受到了赫鲁晓夫的鼓动和驱使，总之他拟定了一个签名争求单，亲自出马，到处去登门争求战争时期被授予元帅军衔的元帅们的签名，要求给赫鲁晓夫补授元帅军衔。因为在苏联二战以后，有过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战后授予元帅军衔的元帅，都应该得到战时授予元帅军衔的元帅的一半人以上的签名同意。可是，当叶廖缅科元帅拿着这样的答名单，分别去登门拜访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戈洛瓦诺夫、库兹涅佐夫等元帅时。朱可夫元帅说：“元帅军衔是战争才能创造出来的，不是签名单可以创造出来的。”因此，朱可夫元帅拒绝签字。罗科索夫斯基元帅也说：“赫鲁晓夫同志在战争期间真正领导过结果是胜利的战役吗？授中将军衔难道不也还是斯大林偏着他授予他的荣誉军衔吗？最好还是请他保留着这样的荣誉吧，这就不错了。”于是，罗科索夫斯基元帅拒绝签字，其他一些元帅呢，签字的几乎全部只有寥寥那么两三个本来就有马屁精名声的人。

于是，虽然，赫鲁晓夫很是认真地闹过一番军衔待遇问题，但是最终，他还是只拥有中将军衔。而中将军衔，在少校面前，那不也会像是一只恶虎，在面对着一只年轻的牡鹿吗？

总之，这样的谈判阵势，难免不能不使劳尔·卡斯特罗少校感到压抑。他似乎还很少面临过这样的阵势。特别是，与总是仿佛非常激动，总是挥舞着拳头狂吼滥喊要惩罚帝国主义的赫鲁晓夫形影相照的是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这位元帅永远不像赫鲁晓夫一样奔放热情，而是，他的猪肚子大脸，总好像是生铁铸出来的，永远也没有一丝笑容，他的胳膊总是伏在会议桌上，他的手掌总是握着拳头，从来也不伸展开，而且总是一说话就轻轻地，但同时是有力的擂着会议桌，他声调不高，嗓门不大，但声音宽厚、有力，他总

是一字一句地说话，每说一句话，几乎都要捶一拳头桌子，他在发言中，反复强调的，几乎是命令似的词语是：战略导弹，现代化的强大武器，必须由高度现代化，人员技术水平经过强化训练的部队才能掌握，因此，在古巴布署苏联强力导弹的同时，必须有训练有素的苏联战斗部队的同步进入，因此，苏联设置在古巴的导弹，指挥、操纵、使用的权力，还只能是完全地掌握在苏联派驻古巴的苏联军事指挥员的手里，在军事职权的行使范围内，是不能有含糊的概念的。

劳尔·卡斯特罗不懂俄语。

而他的谈判对手们，几乎无不例外一律全部操用俄语。好在，在这次谈判中，劳尔熟悉的尚未正式上任的苏联驻古巴大使阿列克谢耶夫，亲自充当着谈判勾通语言信息的翻译。阿列克谢耶夫的西班牙语语言文字和会话能力都好，所以，他能准确无误地使西班牙语和俄语变通交流。

而且，在两种语言翻译变通的过程中，劳尔·卡斯特罗可以有时间进行对话的思考，他虽然是面对着威严无比的将军和元帅们的一名少校，而且，这些将军元帅们，是像一堵墙似的横在他的面前，劳尔·卡斯特罗并不怯阵，并不惧怕这种阵势，他不仅全力以赴，而且也还可以说是胜任愉快地承担着他的古巴祖国赋予他的使命和职责。

在谈判中，他得到了明确的，令人可以鼓舞的印象，这就是，不管赫鲁晓夫也好，还是其他将军、元帅们也好，他们在发言中，这样一点是充满了真心诚意的，这就是，苏联确实真是下定了决心，要以强大的武器来支援古巴，来支持赫鲁晓夫革命，支持赫鲁晓夫反对和抗击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这样的支持和支援，无疑是非常伟大的，是非常了不起，也是非常慷慨的。当年，古巴革命还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打游击的时候，当时武器奇缺，有一天，城市地下组织送来了他们为起义军购买的武器，其中有三挺机关枪，几支自动步枪和长杆枪，几千发子弹，为了得到这些枪支弹药，起义军几乎迎来了世界上一个最能振奋人心的场面，大家简直高兴的发狂。在那一次的武器分配中，切·格瓦拉被菲德尔特别颁发了一支马德林式自动枪，切高兴得只掉泪，而劳尔自己，得到了是一支有三脚架的机关枪，也是高兴的难以言喻，简直说不出话来。同志们当时得到这些枪支弹药时，真想呼喊城市地下工作的同志们万岁。而这样的印象，曾几何时，不是晃如昨日吗？现在，苏联人，慷慨伟大的苏联革命者，这样的苏联领袖，这样的苏联元帅和将军，现在会是如此出手大方，不仅要把导弹送到古巴，而且要把能扔原子弹的飞机，比蚊子还快的鱼雷艇，无条件地布置到古巴去，这样的壮举，这样的好事，古巴人还能到何处去求呢？

为此一条，劳尔·卡斯特罗就由衷的感到鼓舞和激动，感到由衷的满意。

当然，接下来的问题关于导弹、飞机和快艇进入古巴以后的控制操纵权，使用办法，苏联方面提出一套办法，劳尔·卡斯特罗引起了一些思考，但是，马上觉得，这不过是一些细枝末节问题，仅仅是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不管怎么说，导弹、飞机和快艇弄到古巴去，当然首先归属古巴所拥有，这是主要的，出于技术方面的考虑，苏联人开赴古巴，帮助古巴操纵这些武器，似乎也是合理的。何况，掌握先进武器，确实是需要技术人才的，比如开飞机吧，就必须是经过严格训练的飞行员，而古巴有多少飞行员呢？1961年在吉隆滩消灭入侵的美国雇佣军的战斗中，古巴拥有十架飞机可以投入战斗，而能驾驶飞机的驾驶员，却只有七个人，因此，即使在最需要的时候，也不能把十

架飞机都开到天上去，因为这是实际困难决定的。现在，苏联不仅提出要慷慨给予导弹、飞机和快艇，同时还提出了要支援人马，派出操纵这些武器的专家，甚至还要派出指挥使用和这些作战武器指挥人员，这真是帮忙帮到家，想得也太周到，帮得太周到了，世界上哪儿还能有这样的大好事呢？

好！

劳尔·卡斯特罗开始一项一项拍板。

只是，劳尔毕竟还是聪明的劳尔少校，他在所有的拍板之后，声明他的授权只能是草签谈判协议，草签过的协议，还要有待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古巴最高领导机构的批准。

赫鲁晓夫说：

“好！劳尔·卡斯特罗少校，亲爱的部长同志，看起来你也是个滴水不漏的厉害人。米高扬说过，你们古巴有一个可以号称‘不’字的大将，我说的是你们的切·格瓦拉少校。在亚美尼亚语中，‘切’就是‘不’。米高扬说，他是个不懈地维护古巴利益的谈判专家，很可怕。但是，我却没有领教过他的招数，我现在倒领教到你劳尔同志的招数了，很好。你说你拥有的授权，只有草签协议的权力，但是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可以负责任的权力。所以，我们认为，协议草签之后，我们可以等待你们古巴最高领导机构的批准，但是，在我们方面，我是苏联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我就是苏联的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机构，因此，我就可以决定一切，我就可以说了算，所以，在我们这一方面，也就是完全批准了。在你们方面，你可以再履行批准程序，但是，有一条我希望您能同意，这就是，我们的已拟草签的协议，在你履行古巴最高权力机构批准的程序的同时，马上付诸实施，因为我们不是美帝国主义的心肝儿，我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要发动侵略，什么时候要开始战争，所以，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我们必须赶前不赶后，赶快行动起来，超前一步。我想你是会同意如此的。对不对，劳尔少校？顺便我先告诉您，我真想现在就授给你苏联军队的少将军衔！”

赫鲁晓夫风趣幽默，有条有理的说着，他令劳尔·卡斯特罗感到是一个通情达理的长者，于是，他表示对赫鲁晓夫有经验的论点，将不持异议。

这样，经过一度紧张郑重而认真的谈判，大体上逐条逐项达成可以草签的协议，为了保密的必要，协议文本由俄文、西班牙文两种文字形成，西班牙文本的形成，由劳尔和阿列克谢耶夫亲自动手共同草拟。

然后，在赫鲁晓夫出席的情况下，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代表苏联方面：古巴武装力量部长劳尔·卡斯特罗少校代表古巴方面正式进行了文本草签的签字仪式。

所有这一切程序的动作，都是在高效率的进程中进行了。

五月初，赫鲁晓夫首先提出了在古巴布署苏联导弹的想法。接着，拉希多夫、比留佐夫一行秘访古巴，六月初，劳尔·卡斯特罗来到莫斯科，通过正式会谈，草签协议后，劳尔拿着尚待批准，并且行将在正式批准以后还需交换的文本，飞回了古巴。

而在劳尔·卡斯特罗的坐机尚未回到哈瓦那机场的时候，在苏联这里，被严密伪装起来的长达二十米之巨的四十二枚导弹，已经在波罗的海封锁最为严密的军事港口，开始秘密分解装船，在进入这一年七月初的时候，这些装载重型武器的运输船，在苏联的核动力潜艇的一级护卫下，从波罗的海驶出，通过北海穿越大西洋，已经在公海上全速前进，向着加勒比海的岛国古

巴，急速的进发了。

格瓦拉二赴莫斯科

1962年8月初，业已正式被任命为苏联驻古巴共和国大使馆特命全权大使的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夫，正式来到古巴上任，他郑重地向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递交了国书。

但是，他做的实际比递交国书还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在他风尘扑扑重返古巴，重归哈瓦那以后的当天，即也就是他正式递交国书的头一天，他首先拜会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时候进行的。他拜会菲德尔·卡斯特罗所进行的最重要工作就是，向菲德尔·卡斯特罗呈交关于苏古导弹的协定的正式换文。苏联方面交来的正文换文，有着苏联最高苏维埃领导人和部长会议主席的签字。

然而，当即，菲德尔·卡斯特罗却严然拒绝了接受这样的换文文本。

菲德尔·卡斯特罗明确告诉阿列克谢耶夫大使说：

“大使同志，这样的换文文本，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忙于进行。不过，你可以放心我们并不对已经部分运到古巴的导弹设场安装会持有异议。对此，我们是不会持有异议的。但是，有一些明显的问题我们还是必须进行明确的讨论，比如，协议中，有些涉及古巴主权的款项，我们最高领导核心，经过深入研究，认为至为必要进行恰当的修改，有些条文，是必须修改的。所以，我们已经确定‘切’拿着我们领导核心讨论的修改意见，即日可以飞赴莫斯科，以便和苏联最权威的领导同志作最后的文本修定，我们已经作出全权的授权，切·格瓦拉同志拥有全权，和苏联最高领导人，在莫斯科签署和互换最后经过修改的文本。”

对于卡斯特罗这样的回答，阿列克谢耶夫的心，禁不住就砰砰地跳了起来。他马上已经预感到了，事情将要出现麻烦。

阿列克谢耶夫可以认为，切·格瓦拉也是他的朋友。特别是，阿列克谢耶夫在古巴革命胜利之前，他有很长时间是在阿根廷工作，在那里充当塔斯社的驻南美记者，而阿根廷是格瓦拉的老家，他们之间，多有一份关于阿根廷的话题可以交流，因此，事实上，阿列克谢耶夫和切·格瓦拉的亲切谈话、交流，来往也是很多的。不过，在阿列克谢耶夫的印象中，切·格瓦拉喜欢沉默寡言，懒与人共，他有的时候似乎不很合群，不很随和，特别不喜欢过分的亲昵和热闹，性喜沉静，总是专注认真的样子，有的时候显得过分严肃，所以，阿列克谢耶夫觉得，切·格瓦拉远不如劳尔·卡斯特罗更容易亲近，更容易建立私人间的友谊关系。在这一方面，菲德尔·卡斯特罗与劳尔·卡斯特罗有不同，切·格瓦拉似乎有更大的不同。很明显，切·格瓦拉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一样，思想更深邃，意志坚强，行为坚定，因此也更严谨，更老练和更成熟。阿列克谢耶夫已经很透彻地知道，切·格瓦拉，在原则问题上，从来是不会被感情通融的。在这一点上，有的时候，他甚至能够令人生畏。所以，法国伟大而杰出的现代作家萨特，在访问古巴，和切·格瓦拉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流和接触后，曾经给过切·格瓦拉两“人”字的评价，第一个人字的评价是说：切·格瓦拉是最完整的人；第二个人的评价是：切·是不可腐蚀的人。

事实上，阿列克谢耶夫谈到萨特这样评价切·格瓦拉的文字时，他是极为共鸣的。他对切·格瓦拉也是充满了由衷的敬重。正像切·格瓦拉在古巴革命起义军中，在古巴人民中的人的形象和他的影响；虽然他不善于像菲德尔那样容易接触普通战士、普通群众，他更富一些知识分子的习气，但是，

他由衷的平等待人的坦诚和绝对的真挚和诚恳，还是被人们所热烈的喜欢、信任，甚至也像菲德尔一样，也在战斗和人群中，备受赞叹和爱戴。虽然他是个阿根廷人，在 1959 年古巴革命胜利后，卡斯特罗在那一年的 2 月 9 日郑重地宣布了切·格瓦拉已经拥有了古巴国籍，其实，不谈国籍不国籍的问题，但从人这个字眼上来说，切·格瓦拉在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有组织的人群中，都会成为一个最被人们所喜爱的人。

新任苏联驻古巴大使馆特命全权大使阿列克谢耶夫，事实上也真诚的敬重和喜欢切·格瓦拉。但他听卡斯特罗说将要派切·格瓦拉就导弹协议问题赴莫斯科进一步打交道时，他不由的还是感到有些紧张。他感到了问题似将很严峻。

他在告辞卡斯特罗，回到哈瓦那的苏联大使馆后，他立刻亲自草拟了一份电文，马上向莫斯科报告了切·格瓦拉将要奉命前往莫斯科进行进一步谈判的情况。

8 月 27 日。切·格瓦拉飞到了莫斯科。

这是他第二次来到莫斯科。

1960 年 11 月间，切·格瓦拉率领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访问过莫斯科，参加过那一年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四周年的隆重庆典，在那一次的访问中，他也曾受到过苏联党和政府的高规格的接待。不过，在那一次的访问中，有一些不微妙的情況存在。当时，在莫斯科举行十月革命四十四周年庆典时，以这次纪念活动为契机，赫鲁晓夫试图加强对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控制，进一步确立苏联“老大哥”的地位，其间在莫斯科举行了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会议，当时，古巴革命的领导组织号称“七·二六运动”，还没有标明自己是共产党的性质，因此，古巴的“七·二六运动”，没有受到参加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邀请，受到邀请的，当时只是古巴人民社会党，而当时，在古巴，虽然古巴革命阵线容纳着古巴人民社会党，但从组织程序上来说，还没有正式产生瓜葛。因此，古巴革命组织，和人民社会党，还是单独行事当时，人民社会党无疑已经是苏联完全可以控制的古巴党，而古巴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组织还完全不是。因此，在苏联支持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运动的时候，总还不忘突出强调和尽可能显示古巴人民社会党的正统地位。所以，在切·格瓦拉那次访问苏联时，虽然也可以说是受到了非常高规格的接待，但是，在许多规格微妙的场合，并不把切·格瓦拉的接待，超过对古巴人民社会党总书记布拉斯·罗加的规格。而布拉斯·罗加，作为总书记领导的古巴人民社会党，完全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党，在苏联“老大哥”的眼里是没有什么高规格的地位的，因此，为了不使古巴人民社会党的表面过份地显得失衡，对切·格瓦拉的高规格的接待，也控制在一个一定的程序范围里。那一次出现在莫斯科的切·格瓦拉，不管从什么意义上说，都没有成为苏联党和政府，特别是当时的最高领导有赫鲁晓夫的主要接待对象。

但是，1962 年 8 月 27 日，这一次，从远距莫斯科一万三千公里之外的遥遥岛国古巴来的切·格瓦拉，虽然他的访问当时也是不事张扬的秘密访问，但是，他在莫斯科还是受到了远比第一次访问时规格更为高的高得简直不可思议的隆重接待，为了严加保密，在不举行任何欢迎仪式的情况下，在莫斯科努伏沃政府首脑专用的二号机场上，切·格瓦拉走下飞机舷梯时，他还是受到了苏联共产党资格最老的主席团委员，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

阿·伊·米高扬，以及主席团另外两个级别突出的委员科兹洛夫和苏斯洛夫，还包括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苏共中央负责对外联络的书记安德罗波夫，以及拉希多夫，比留佐夫元帅等等好一大批苏联党政军的当权人物，一一热情拥抱和热烈欢迎。

切·格瓦拉由阿·伊·米高扬陪同，坐上一辆苏联党政最高官员乘坐的特别专车，长长的流体型“海鸥”牌轿车，飞驰进入了莫斯科，一路红灯紧闭，线路上显然进行了最严格的戒严，以保证一队长长的高级轿车车队，风驰电掣地驰入克里姆林宫。

海鸥牌轿车在克里姆林宫部长会议大厦的办公楼前停下来。前面的轿车略迟延几分钟，等着后面的几辆主要的人乘坐的轿车，也驰过来，平稳地停好以后，车门才由专门迎上来的礼宾官员轻轻打开，不久，他们请车上的官员们下车。

阿·伊·米高扬亲切地挽着切·格瓦拉的手，苏斯洛夫、科兹洛夫紧紧跟在其后，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葛罗米柯夫们，更拉开一些距离，跟在后面的台阶上。

从部长会议大厦的第一层宽敞的大厅穿过，就可以进入到门庭宏伟豪华的部长会议主席的会见厅了。

门被打开了。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已经在门首里有一段距离的那边站着。他虽然身材矮小粗胖，但是，厚敦敦的，不失魁伟。

他的穿着显然十分考究，今天似乎穿扎的尤其气派，锃亮的皮鞋，一身十分合身的黑色西装，雪白的衬衫，扎着一条相当鲜艳的褐色的领带。他在左胸前的衣襟前上，别着三枚红星勋章。斯大林在生前，他在二战后穿大元帅便服时胸前也曾别着一枚秀美夺目的红星勋章，因此，他的这一排星章，显然更为耀眼，何况，他在右面的胸前，也另外别着一枚什么星章，显然，他是一个喜欢装饰和打扮的人。

不过，仅仅这一条，在赫鲁晓夫和切·格瓦拉在此刻的第一眼照面的过程中，不是马上把距离缩短了起来，恰恰相反，却是拉大了距离。

与年纪已近七十古稀穿扎打扮考究的赫鲁晓夫比较起来，年纪刚过三十多岁的古巴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切·格瓦拉，他的穿着也绝对不会让任何人会涌起寒酸之感，相反，他的穿着显然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目和振奋。革命胜利已经四年，作为国家领导成员出入古巴到各国来去访问，率领党政、军事、和经济代表团参加所有重要国际性活动和会议，切·格瓦拉从来不穿第二套服装，他始终只是这一套服装，这一套橄榄绿的戎装，基本上是橄榄绿的军便装。而且，尽管古巴革命胜利后，给马埃斯特腊山区参加革命战争的老战士，给古巴革命和解放战争的全部参加者，以及在反击美帝国主义雇佣军猪湾战役中的英雄们，都颁发了相当数量，种类品级繁多的奖章和勋章，菲德尔·卡斯特罗和革命的最高领导核心，颁发奖授给切·格瓦拉的奖章和勋章少说也不下数十枚，但是，他从来不喜欢炫耀他的功勋，在国内，他从来不戴这些勋章、奖章，到国外访问的时候，他也从来不戴这样的装饰品。

切·格瓦拉有着对自身价值的绝对的自信，所以，他从来不喜欢借助装饰来标榜自己。

不过，接下来，切·格瓦拉和尼·谢·赫鲁晓夫一照面所立刻拉大加长了距离，尼基塔·谢尔盖耶奇却还是有办法迅速缩短、缩小的。

尼基塔·赫鲁晓夫忽然从洞开的门边口外看到了像火一样热情洋溢的切·格瓦拉少校。

没有迟疑，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仿佛马上完全变成了一个生性活泼的年青人，他几乎是手舞足蹈地立刻放声地呼喊了起来：

“唔！切·格瓦拉少校！亲爱的，最亲爱的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少校，古巴革命真正的伟大的英雄，您不能知道，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一直是在怎样的地渴望地想着欢迎你这个古巴革命领导中心的第一个共产党员。亲爱的，从真正的政治意义上来看，你才是古巴革命运动真正的正统和核心。所以，我们一直在准备着，准备着最热烈的欢迎您。”

切·格瓦拉不慌不忙，不紧不慢，他从容地听着主人的欢迎词，但马上也冷静而语调徐缓，几乎是一字一句地致词说：“我们古巴的革命运动，从一开始的时候起，就经历着独特的创造形式。这个创造形式的最主要的设计者，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因此，他才是我们革命的最主要的核心和灵魂。我只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全部热情，真正全心全意地投入参加了他领导的革命的、正义的事业。不过，作为拉丁美洲的共产党员，我的心，自然的，多少年来，是向着列宁的故乡，十月革命的发源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最主导的力量，战胜了法西斯、拯救人类免于灾难的伟大的苏联的。因此，我踏上伟大苏联的土地，来到了世界瞩目的莫斯科，见到在苏联的各个历史时期为建设和保卫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出了劳动和牺牲，作出了巨大贡献的老共产党员，我理所当然，满怀着赤诚的尊敬和敬意，不仅我的心情是这样的，我还带来了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及古巴其他领导人，对赫鲁晓夫同志，以及其他苏联同志和人民最尊敬的敬意和最亲切地问候。

切·格瓦拉朗声地说着，他的语言亲切、朴素，却同时充满了几乎是诗一般的意蕴。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文化不高，他受教育的历程，不过是在苏联的革命过程中，在对工农干部培训的过程中，使他拥有了工农速成中学到工农兵大学生的学历，他在1932年从莫斯科大林工业学院肄业开始再次走上工作岗位时，其时已经是一个年近四十岁的壮年人了，而且，那时候，他也已经是一个拥有四个儿女的父亲，所以，他也就不再可能得到更多的受教育的机会了。因此，他的文化素养，文化水平，始终是很低的。

但是文化素养、文化水平的低下，并不就等于是一个智力水平的绝对低下。其实，赫鲁晓夫虽然家庭出身清贫，他是出生在沙皇帝国时代南俄顿河地区一个完全名不见经传的贫穷的农奴村庄一户乡村铁匠的家庭，他最初开始的家庭生活，可以说比一贫如洗还要贫穷。然而，使赫鲁晓夫有幸的是，他的这样的家庭，并没有影响他早期的，非常及时重要的智力开发。这是因为他摊上了一个非常杰出而聪明的母亲，他的母亲名字叫阿卡西尼娅，曾经是嗓子很好，嗓子十分高亢的南俄地区著名的民间歌手，能够演唱许许多多非常忧郁而又非常抒情，也有激情和欢快的南俄民歌。这些大量的民歌，使赫鲁晓夫在很小的时候，受到了深刻的熏陶，因此，后来不仅造就了他热情奔放的性格，也扩大了他的思维能力，特别训练了他的表演能力，和掌握词语音韵的表达能力，再加上后来的乡村工矿底层的生活磨练，使他特别的具有了非常狡黠的头脑和思维方式，因此，他后来在所有的行为处事方面，他都显得特别特别的机警和聪明，以至世界上最可堪称伟大的英雄和伟大的聪明人之二的斯大林，无疑也被他所蒙骗，被他所耍了。他是在斯大林进行内

部肃反严重扩大化最灼热的年代里，蹿进了苏联最高的领导层，而且，他当时，蹿入苏联最高领导层之前，也不过是个小小的煤矿的副矿长，而且是个后来的工农兵大学生，但是，他就凭借着极善逢圆的狡黠和机智，他极善于抓住和把握一闪而过的机会，然后一步登天，平步青云。

当然，这也是需要非凡的器量和胆识的。

因此，无论怎么说，在人类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如果在这个世纪里确实出现过一些天才人物的话，不管怎么评价，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都可以毫不逊色地算一个。

而所以，在赫鲁晓夫往往显得缺乏文化教养，显出一派完全粗俗的习性时，有的时候，他却也能并非附庸风雅的谈论一些有关文化艺术的话题。而且，他曾经说过：“在艺术问题上，我是个斯大林主义者。”确实，斯大林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聪敏好学，后来接受过神学院的高等教育。他读过许许多多哲学的、社会学的、文学的、艺术的经典作品，他尤其喜欢文学，非常专长音乐，特别喜欢戏剧和绘画艺术，因此，他实在不能说是一个文学艺术领域里的外行，在他生前，他也总是十分关注和重视文学艺术领域里的所有现象和活动，斯大林在日理万机工作量十分浩繁巨大的情况下，他每天规定在晚间的阅读量，还一定要达到阅读四至五百页书，因此，他在大量阅读各种文件、各种电报和呈文的同时，他不仅几乎阅读遍了俄罗斯的所有的古典文学著作，而且，他甚至也阅读遍了产生在他所在世的苏联时期的差不多全部的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和诗歌作品，苏联时期最伟大的作家和诗人，都曾受过他的关注和关心，他一向对文学艺术领域的工作和指导，都是相当热心的。因此，这也使总是逢迎斯大林左右的赫鲁晓夫耳濡目染，他从中也聪明地学到了许多的东西。正因为如此，赫鲁晓夫也在后来，经常热衷于和作家、诗人们打交道，交朋友，他经常也会绝非附庸风雅，而是作为一种学习的手段和渠道。应该肯定地说，赫鲁晓夫是十分善于学习的，有的时候，他为了学习，为了打开眼界，深受启发，他也愿意和作家、法人、艺术家们，不仅是苏联的，还包括一些国外来访的，进行尽可能多的聚会和交流。

有许多苏联和外国的作家、诗人和艺术家；也是十分喜欢赫鲁晓夫，愿意和他见面和交流的。当然。这不包括全部的被视为是革命者的作家，有些这样的作家甚至看不起他，他们有的人甚至指责赫鲁晓夫只反斯大林而不反他自己，骂他是犹太，骂他是偷天换日的骗子，因而也不愿意理睬他，拒绝接受他邀请会见的请柬。

不过，有一个世界上很有影响，非常有名的诗人，是来自智利的大诗人巴勃罗·聂鲁达。这是一个智利共产党的老党员，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在世界上，特别是在世界上的共产党国家的人民中间，他受到了至为真诚的广泛的尊敬。他曾经是斯大林文学奖金的世界评委。这样的评委当初不仅包括苏联的法捷耶夫、西蒙诺夫和爱伦堡，还包括中国的郭沫若和法国的阿拉以及其他一些人。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掀起反斯大林的风暴以后，斯大林的形象一时间在苏联被打翻在地，后来甚至被扒坟掘墓，极尽侮辱，当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文学奖金，也取消了他的名字，而改成了列宁的名字，更名叫成了列宁文学奖金，评委有一些变化，有一些人拒绝了再当评委的聘书，但有一些人仍然还愿意干这样的评委，巴勃罗·聂鲁达这就是这些愿意继续干评委中的一个。巴勃罗·聂鲁达直到后来许多年，他仍然坚持说，如果有什么斯大林分子的话，他宁肯也是一个这样的分子，

因为正是斯大林，在法西斯行将灭绝人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领导苏联人民作为抗击法西斯的中流砥柱，战胜了法西斯，拯救了世界，拯救了人类文明，所以，当一个有这样功德的斯大林分子没有什么不好。正因为巴勃罗·聂鲁达一直这样坚持认识宣称自己，所以，他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明显的言过其实，甚至无中生有的蜚短流长以至恶毒攻讦，都十分反感，但是作为苏联的领袖，尼基塔·赫鲁晓夫有的方面，聂鲁达还能够保持着适当的尊敬。而赫鲁晓夫的了不起之处，也在这里。他是知道聂鲁达对斯大林的尊敬和信仰十分死硬，明知道聂鲁达对他本人颇有看法，但是尽管如此，聂鲁达每次来到莫斯科，赫鲁晓夫只要有可能会在他的宽大排场的别墅式的住宅里，让人们安排他与聂鲁达的见面。前不久，聂鲁达又一次来到莫斯科。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就又一次安排了这样的会见，又一次见到了聂鲁达。

当赫鲁晓夫问聂鲁达：

“您从哪里来？”

聂鲁达说：

“我从哈瓦那来。我刚刚访问过革命的古巴。”

“见到了谁？”

“见到了菲德尔·卡斯特罗，见到了劳尔，见到了切·格瓦拉，见到了多尔蒂科斯，见到了罗亚。”

“你对谁的印象最深？”

“对每一个人。古巴现在是一个充满真正革命英雄群像的列岛。那里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真正的自由的人，真正站起来的人。”

赫鲁晓夫坚持问：

“我是说，在古巴领导人中，你对哪几个人的印象最深？”

聂鲁达说：

“当然，给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是菲德尔、劳尔和切·格瓦拉。”

赫鲁晓夫似乎很内行的给大诗人聂鲁达出了个题目。赫鲁晓夫突然对聂鲁达说：“亲爱的朋友，作为伟大的诗人，您能不能用诗人的笔调，来给我用诗的语言描绘一下，那位菲德尔，那位劳尔，切·格瓦拉，他们各自有什么像诗一般的特点？”

聂鲁达很高兴赫鲁晓夫能出如此智慧的题目。但他同时几乎是不假思索，马上回答赫鲁晓夫说：

“尼基塔！你提的这三个人，他们的特点，确实是像最亮丽的诗句一样，菲德尔最亮丽的特点和色彩看出，无疑是他天才领袖的特征；劳尔最亮丽的特点和色彩，一眼便可以看出这个人是个如钢铁般沉静的战士，而切·格瓦拉呢，我觉得他完全可以让我们全世界的伟大诗人感到骄傲，因为切·格瓦拉，也是一个感情最丰富，感情最为迤丽的诗人。萨特、伏波瓦两人，一见切·格瓦拉，就完全迷上了他，据我们说，他们所以被切·格瓦拉的魅力所吸引就是格瓦拉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诗人的激情。此外，我们伟大的朋友，我们智利的伟大的希望之星萨尔瓦多·阿连德，在最初见到切·格瓦拉的时候，就认定切·格瓦拉是感情最为圣洁、崇高的诗人。以至，这位诗人魅力会强烈到这样的程度，在美国佬的雇佣军人入侵古巴，在猪湾的战斗前线，切·格瓦拉在起义军战士和民兵们中间，正在指挥作战，却被一名来到战地采访的法国女记者撞上了。女记者看到切·格瓦拉严肃的，苍白而疲惫但又全神贯

注的脸，她看到切·格瓦拉在那里从容指挥战斗，从容不迫，平静而了无恶怒地审问着年轻的黑人战俘，忽然不知是一种什么力量，使那位女记者，突然就抱着头高叫起来：“天哪！切·格瓦拉！你多么像是一首诗啊！不仅整个拉丁美洲的少女会倾倒你，整个的法国少女也会倾倒你的，你真是上帝造出来的最美妙的诗行！……”

聂鲁达绘声绘色地给赫鲁晓夫说着，他差不多是在给赫鲁晓夫讲着一堂诗学或美学的课。

赫鲁晓夫静静地听着，此一刻，他好像又变成了一个很好的规规矩矩的小学生，聂鲁达关于切·格瓦拉的话，竟然把他说得两眼泪浸浸的，眼眶里转动着泪水。

而此刻，当切·格瓦拉出现在尼·谢·赫鲁晓夫身边，他果真是像诗人一样般、包含诗蕴，充满着诗人的激情，这样生动而动人的像诗人一样朗声说话，侃侃道来最为严谨而得体的话语言同时，赫鲁晓夫忽然猛想起了巴勃罗·聂鲁达那位智利老党员，世界著名老诗人给他讲过的，关于他对切·格瓦拉的评语。

赫鲁晓夫热情奔放地热烈拥抱切·格瓦拉，最亲切地热吻切·格瓦拉的双颊，出于难以抑制的激动，也可能确实还包含着难以抑制的挚爱，他不仅热情地挎起了切·格瓦拉的胳膊，还热情地攥着，紧紧地攥着切·格瓦拉的手背，他几乎是用力拖拽着格瓦拉，赶快进到部长会议主席的会见厅里，直奔有糖果和茶点，可以使用饮品的，中间没有红木茶几的，围在其外的一圈宽大的真皮沙发上坐了下来。

赫鲁晓夫马上询问切·格瓦拉：

“你想喝点什么？葛瓦斯？矿泉水？还是热咖啡？”

格瓦拉一笑说：

“喝热咖啡吧。”

赫鲁晓夫说：

“好，喝热咖啡吧，我们可以慷慨地请您多放些糖。因为，这是我们从你们那里买来的，世界上最好的糖，也是三美分一磅的，最便宜的糖，最甜美的糖。”

赫鲁晓夫说得很亲切，很俏皮。

只是，切·格瓦拉还没有喝到这赫鲁晓夫准备慷慨地多加些包含着友谊情感的最甜的糖时，他似乎忽然感到了嘴里有些发苦，他情不自禁地就朝着现在也在附近一只真皮沙发上坐下来的阿·伊·米高杨那边看了一眼。切·格瓦拉想到了自己作为古巴经济代表团的团长和进行贸易谈判的首席代表，在古巴建国后，第一桩的外贸谈判中，由于自己缺乏经验，而同时又逢临碰上了像阿·伊·米高杨这样的老资格的苏联对外贸易部长，谈判和作买卖的老手，结果，第一次的谈判下来，第一桩的苏古贸易，苏联就拼命地提高他们易货贸易的物价，而比美国佬几乎还狠心地压低古巴的糖价，结果使古巴奉献着甜蜜，收获着苦果，吃了好大的亏。

切·格瓦拉想到了和苏联作食糖生意的买卖时所定的糖价，赫鲁晓夫也很清楚明白。米高杨在古巴占了便宜回来，一定也在赫鲁晓夫面前卖过乖，显示过，不然赫鲁晓夫未必一定会过问和知道苏联只用3美分就买来古巴的一磅糖，他肯定也许还知道，当时世界市场的食糖价格是4、5美分一磅，他甚至也一定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贸易部，明知亚洲食糖市场价格低

于世界市场食糖价格，却宁肯出4、7美分一磅的价格，大量进口古巴生产的全部产量中的五分之一，一百万吨的古巴食糖，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不富，自己的困难很多，但他们却宁肯自己吃亏，绝不让朋友感到心里发苦。真正伟大，真正的好朋友还是难说存真心的好朋友，是完全能够看出来的。

坐下来，切·格瓦拉忽然间就又想到了这样的许多事情。忍不住把目光投向了米高杨。

这时候，赫鲁晓夫一边招呼服务人员给切·格瓦拉端来了咖啡，一边把一只肥肥胖胖，厚厚敦敦的手，放在了切·格瓦拉放在沙发扶手的胳膊腕上。

“切·格瓦拉同志，包含着苏古两国革命情感的古巴糖，确实是更甜吧。多放点儿，多放点儿。应该说，我们能吃到这么甜的糖，有你切·格瓦拉同志的功劳，因为，这是你主持卖给苏联的。”

赫鲁晓夫现在不知切·格瓦拉的心思表里，他还接着往下借题发挥地唠话。

格瓦拉说：

“这是因为，美帝国主义搞了我们的经济封锁，他们断了我们在美国国内的传统食糖市场，过去，美国人包销古巴食糖的五分之四，大约是四百万吨，现在，他们想切断这样的市场来扼杀古巴的经济。”

赫鲁晓夫说：

“但是，我们是可以为朋友解难的。美国佬封锁你们，切断了你们的市場，但是苏联却把市場向你们打开了，我们在你们困难的时候，总是拔刀相助。不过，我听说，尽管如此，您精明的切·格瓦拉同志，好像还很有意见，很有看法，因而也还很有一些说法，当然，我们的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杨同志，首先还是很称赞你的，米高杨同志，您是怎样称赞切·格瓦拉同志来着？”

赫鲁晓夫说着，转过脸去，抬起头来向坐在格瓦拉下手一边的阿·伊·米高杨发问。

米高杨一笑，欣然说：

“尼基塔，我不是称赞，我只是如实地说过，这个古巴的小小的少校，一个年轻的娃娃，被菲德尔派出来管古巴的钱财，管古巴的经济命脉，他好像天上掉下来的魔术师似的，立刻便由一个外科医生，一个革命起义军的少校，变成了一个可以与世界上第一流经济学家比拟的真正经济学家，很会算账，很会作买卖，很会尽最大可能争取和维护古巴的最大利益，同时又善于掌握买卖成交，即使没有大利可图然而可以达到成功贸易目标的机会，这确实就是太天才，太难得的，真正了不起的经济学家了。确实是这样的，切·格瓦拉同志，我是曾经这样向赫鲁晓夫同志提起过您，介绍过您的。而且，我还说过，我们苏联，如果发现有你这样的人才，我们也抓他来当国家对外经济关系委员会的主席或者当苏联国家银行管理委员会主席，或者当对外贸易部长，不过，我们的尼基塔也还说，甚至也还可以请他来当我们的苏联的，主管经济事务的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您是这样说过吧，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同志！”

米高杨善于词令，同时他也知道不能抢了赫鲁晓夫的话筒，于是，他又把与格瓦拉对话的话头，很快给赫鲁晓夫传了回来。

赫鲁晓夫很高兴米高杨及时把话筒又给他传了回来。他依然不减与切·格瓦拉叙话的热情，马上接着米高杨的话头说：“不过，切·格瓦拉同志，你

不要光听米高杨同志的甜言蜜语，他有的时候，也会说您的坏话的，我刚才说的苏古贸易成交有了买卖好做，你卖糖，我买糖，各取所需，但是据说你还有微词，有看法，曾经和米高杨同志也红过脸，也争吵过，甚至还吵得很凶，因此，他曾经告诉过你说你在古巴可以引以为荣，引为骄傲的绰号‘切’，在苏联的亚美尼亚语中，就是‘不’。因此，米高杨同志对你说过，你的名字干脆也就叫‘不’好了。当然，他实质上，对您这样说，并不是人身攻击，并无恶意，甚至，当然也还是深含爱意的。不过，这个‘切’，如果在苏联人面前变成了‘不’，那可是太不应该了，我们是不能欢迎，也不能允许的。”

赫鲁晓夫笑着说，他的这一串话，也还含着玩笑和幽默的意味，但是似乎也不无骨子里流露出来的一些别的意味。

于是，机敏的切·格瓦拉几乎是不欠时机，却不动声色的说话，对着赫鲁晓夫满含笑意地说：

“可是赫鲁晓夫同志，您知道我这个名字，我这个在古巴革命生活中产生的‘切’的名字，在中国同志们那里，会被认为是什么意思吗？他和苏联亚美尼亚语中的‘切’就是‘不’的含义有完全相反的含意，中国的一些同志告诉过我说，在中国的汉语中‘切’只含亲切，热切，美好的意思，也还能含着‘是’、‘好’、‘对’的深意。”

切·格瓦拉徐缓不急，清楚明白地说出了这样一串话来。

切·格瓦拉在说出这些话时，在内内心深处，确实不乏对中国思念一些机带双敲的深切含意，只是，他以为是近乎微妙，是深藏不露的，他以为，苏联人甚至不会听出任何弦外之音，弦外之意来。

但是，完全出乎切·格瓦拉的意外，赫鲁晓夫的不知那一个穴位，忽然好像被针扎了一下，他的脸蛋子突然嘟噜了下来，他忽然冲着切·格瓦拉，不是再说话，而是好像喷发喀秋莎火箭炮似的喷射起话来，他甚至立刻“腾”地一下站了起来，扬了一下手，仿佛是深痛恶绝地，差不多是喊了一句：

“不要提中国人！亲爱的切·格瓦拉同志，他们完全是一些忘恩负义的人，苏联无私的援助，帮助毛泽东打败了蒋介石，取得了他们最喜欢的政权；苏联无私的援助，在美国侵略朝鲜的时候，让他们安然无恙，苏联拿出了多少钱，帮助他们搞社会主义建设，过去他们的长江天险，南北中国人都不得来往，只因为苏联帮他们造了一座长江大桥，南北两个中国才联系成了一个中国，可是，可是，这些黄祸的后代，他们完全忘恩负义！”

赫鲁晓夫说着这样的语言，十分地气咻咻起来。

切·格瓦拉这人确实从来不随和，确实几乎是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就形成了一种不喜欢看人眼色说话，绝不顺情说好话，或者违心附和迎合别人胡说八道的习惯，他听着赫鲁晓夫对中国同志的不正确评价，他马上想起了马克思的一句话：无知是一种恶魔般的力量。然而，切·格瓦拉从来不允许让这样的力量具有压倒的优势。于是，他就冲着赫鲁晓夫，说出了语调平静，词语仍然徐缓，却不无辩论意味的话来。他说：

“尊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同志，根据我们的观察和所知，您对中国同志的评价，已经离开了客观的真实。首先，我们不认为中国同志是什么忘恩负义的人，他们在与蒋介石作战的时候，斯大林宁肯援助蒋介石，并不十分热心援助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当然，有的时候，自然也会有些援助的，然而，据我们所知，有许多我们是亲自听到看到的，中国同志，在他们的革命取得胜利后，几乎总是口口声声表示苏

联支持了中国革命，口口声声感谢斯大林给过的所有援助，但是他们几乎从来不提，或从来不公开地提到斯大林和苏联对他们的敌人蒋介石的大力支持和大量援助。还有关于朝鲜战争，是中国人民援助了朝鲜人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同作战，挡住了美帝国主义可能对苏联进行的战争挑衅试探，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保卫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前沿。但是，在赫鲁晓夫同志刚才的话中，却是后方保卫了前方，这是违背事实，也是违背逻辑的。此外还有一条，我到过中国，在中国的长江上行过船，确实，我在中国的湖北省的省会武汉市，也参观游览过武汉长江大桥，可以向您报告的是，中国人是很乐于告诉参观者，在这座大桥的建筑过程中，确实得到过苏联的无私援助，他们经常提到苏联专家的功劳。但是，也仅此而已，他们并没有说过因为苏联帮他们造成了一座大桥，才把南北两个中国联系起来，中国从来是一个完整统一的国家，长江作为国家的内河，是与陆地可以浑然为一体的，就像苏联的伏尔加河一样，从来也不可能把一个苏联分割成两个苏联。有桥没桥，都是完全一样的，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不能言过其辞，不能言过其实。总之，您在向我评述中国同志是忘恩负义者的时候，我必须向您表明，我们是不能认同您的这样的观点的。”

切·格瓦拉似乎是本能地非常严肃和郑重起来。确实，他对于任何胡说八道，绝没有苟同的习惯。不管是在什么场合或什么人物面前，他对说明真相，辩明是非，澄清事实，都有表明看法，参加讨论，甚至进行辩论的激情。他从来热爱追求真理。

实在的，切·格瓦拉也是一个最认真的，喜欢辩论的人，是喜欢追求真理的人。

不过，今天，他可是来到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面前，赫鲁晓夫的脾气和个性，从来并不是喜欢任何的辩论，他对是非，从来并不太过认真，他的倾向性太强，有的时候他会为真理而斗争，有的时候，他也会为错误，明明知道的错误而拼命，拼命地进行斗争和维护。他对是非的要求从来并不十分严格，在这一方面，他的辩证法学得最好，是耶，非耶，完全可以不在话下，只要我取我要，就是好的，就是宝贝。他对追求真理，从来也不傻得可以，执着得痴迷。

然而，他也喜欢吵吵嚷嚷，大喊大叫，大嚷大闹，也许这不能叫喜欢辩论，而是可以叫作喜欢打嘴仗。

一个喜欢辩论的人，遇到了一个喜欢打嘴仗的人，他们很有可能在有的时候，也会产生文不对题的语言冲突，辩论和吵嚷，有的时候就会参杂起来，状态相当恣肆的进行。

切·格瓦拉在任何场合，任何时间，任何人面前，都不怯场进行辩论和争论。

尼·谢·赫鲁晓夫，在何种时候，何种场合，何人面前，不敢恣意地进行大吵大嚷呢？在他成为苏联党政一把手以后，那样的时间、地点、人物，几乎已经完全没有有了。

所以，现在，他当然也不可能骇怕与一个小小的，来自古巴的少校部长，展开一番大吵大嚷和吼叫。

他忽然好像也严肃了起来，郑重了起来。他完全站了起来。他伸出了一只手上的圆圆滚滚的手指头来。他忽然直端端地指向了切·格瓦拉。他说：

“切·格瓦拉同志，我应该向您发出警告，我应该向您年轻的少校同志

提个醒了，亲爱的同志，你看今天都有谁在场？我们的苏斯洛夫同志也来了。”赫鲁晓夫说着，转过身来，手指指着苏斯洛夫。

戴眼镜的、瘦高挑有些水蛇腰的苏斯洛夫，此刻正好坐在切·格瓦拉的斜对面。他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最显要的委员之一，是被称为克里姆林宫红衣主教的最权威的理论家，一向主管苏联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

赫鲁晓夫现在指着他，对切·格瓦拉说：

“你知道我们的米·安·苏斯洛夫同志吧？切·格瓦拉同志！他是最权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是我们党的最高意识形态专家，据我们所知，你切·格瓦拉少校，你在古巴最高领导核心里，你也是分管意识形态的。我们的苏斯洛夫同志，曾读过你切·格瓦拉同志发表在古巴《绿橄榄树》军内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叫什么题目来着？”

赫鲁晓夫转身回头又问苏斯洛夫。

苏斯洛夫回答说：

“叫做《研究古巴革命思想意识形态的笔记》。”

赫鲁晓夫又转过身来，依然还是用胖手大指头指住切·格瓦拉说：“对啦，是这样的题目。苏斯洛夫同志把俄文翻译件拿来，也给我看过，你这篇文章写得真妙，对苏联共产党创造性的伟大的新思想，新观念，‘二十大’、‘二十二’的伟大理论和指导思想的贡献，你几乎一句话也不肯提及，相反的，你倒在这篇文章中，竟然列出了这样一个名单，还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排在了一起。而且，如此这般还不算数，更有甚者，你还把毛泽东排在了斯大林其后，接下来还有谁呢？接下来就没有人了，好像当今的世界上，在当今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就一个毛泽东可以成为领袖，好像别人都不行，都不在你们古巴人的眼里，都不在你切·格瓦拉同志的眼里了。对不对？是不是？”

赫鲁晓夫开始质问切·格瓦拉。

切·格瓦拉依然沉静，他回答赫鲁晓夫的质问的话语，只是轻轻地说了句：“还有什么？赫鲁晓夫同志，请您把您的话讲完，把您的论点讲透。”

格瓦拉话说的从容不迫，不急不怒。

赫鲁晓夫激动地转了一个圈圈，他环视了一圈在场的人，大家都相当沉默而严肃紧张地坐着。

这里坐着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以及米高扬、苏斯洛夫、科兹洛夫等多名苏共中央的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多名元帅、部长和将军。

古巴方面，只有切·格瓦拉少校一人。一方面，古巴领导人轻车简从业已成为习惯。另一方面切·格瓦拉此次出行所负使命事关绝对机密，而且，事前约定和苏联方面只进行最高层会谈，所以，他没有率领一个代表团，而仅仅是他一个人，作为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古巴最高领导核心委派的唯一的全权代表。为了高度的保密，切·格瓦拉的此行，甚至连古巴驻苏联大使，事先也没有招呼 and 通告，暂时越过任何渠道，直通到了苏联的最高层。

赫鲁晓夫现在环视一圈以后，他又开始面对着切·格瓦拉。

他接着说：

“我们知道您，切·格瓦拉同志，你很想成为一位伟大的著作家，你很想成为一位伟大的理论家，你确实写了许多文章，你有许多文章，我们是写不来的。甚至，连我们的苏斯洛夫同志，也不一定能写得来。”

苏斯洛夫插话说：

“切·格瓦拉同志，确实才气横溢，他现在确实是古巴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权威之一，他确实已经写出了许多能使人产生兴趣的文章，他什么文章都写，研究土地改革的，研究农业生产的，他提出了在古巴不能仅有甘蔗——糖生产的单一经济，他提出了要多种经营，甚至也要大养其猪，大养北京鸭，这一方面，他有许多新鲜的思想，他还写了许多关于论述金融财政方面的文章，非常难得，看来他确实很有经济头脑，他提出的建立外贸专业银行的思想，对我们苏联的国家银行管理，也是有启发的，还有，他还写出了大量的研究国家工业化，发展什么小水电，什么两条腿走路搞工业企业的论文，他不仅就工业、农业、金融财贸等等建设问题，写了大量的研究文章，在意识形态的著作方面，他还写出了一部《古巴革命史》，他还写出了一部《古巴：是历史上的例外，还是反殖斗争的先锋？》而在他全部著作中，他写的研究和记录古巴革命战争，特别是论述古巴革命战争的性质、方法和战略战术艺术的文章，他写得是更富文采和激情的。比如他写的《游击战：一种手段》以及发表在古巴军内刊物《绿橄榄树》《波希米亚》上的系列文章：《革命战争随笔》，他的这些研究战争的文章，似乎也有所谓积小胜为大胜，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倾向，包含着一些几乎与毛泽东论述革命战争战略战术的似乎相同相近的观点。”

苏斯洛夫说着。显然，他思想清晰，确实是研究意识形态的专家，他一定掌握和了解大量的情况，包括一些苏联国外的情况，因此，他在谈到格瓦拉的理论思想时，好像也是一个研究切·格瓦拉的专家，他几乎能够说出好些条1、2、3、4来。

不过，他说起话来，不免略显繁琐、冗长。所以，赫鲁晓夫等他把话说到要害点子上，已经有些急不可耐，等着他刚刚说到格瓦拉的思想倾向，有的方面带有与毛泽东思想观点有相同相近之处时，赫鲁晓夫终于忍不住了，他打断了苏斯洛夫的讲话说：

“苏斯洛夫同志，你为什么不能直接向切·格瓦拉同志指出，指出他，告诉他，他毕竟是一个年轻的革命家，应该向他指出和告诉他，就说他已经走近了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我们不要再绕圈子了。为什么不能直接向切·格瓦拉同志敲警钟，告诉他，应该让他知道，在我们这里，已经有人在议论：切·格瓦拉可能是古巴的斯大林主义分子，可能是古巴的毛分子。切·格瓦拉同志，你能自己回答您是不是古巴的斯大林主义分子，是不是古巴的毛分子吗？我看你那么喜欢研究游击战，也想研究什么想入非非的农村包围城市，还有，你们在建设方面，也接过了许多中国人的口号，也要搞什么‘大养其猪’也要搞什么呱呱叫的北京鸭。你切·格瓦拉同志难道就真愿意是一个毛的信徒吗？他有什么了不起？他不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吗？他总是喜欢说一些古怪话的，比如什么东风压倒西风，还有什么纸老虎，他完完全全，是一只好斗的公鸡，阴天打鸣儿，都是胡说八道！”赫鲁晓夫说着，嗓门越提越高，简直有些激动不已起来。

赫鲁晓夫这样说着。

忽然，也许他想到了应该控制自己，或者，也许因为他的脑动脉硬化，血流输氧有些周转不继，思维忽然阻断，他语塞了起来，他抬起来的胖手，禁不住哆嗦了一下，不知接下去该怎么说，说什么才好了，他眼盯盯地盯住切·格瓦拉，他终于还是又喷出一句话来：

“你说说吧，切同志！你说说你到底是否有倾向要真的当一个斯大林主义者，当一个毛分子吧！”

赫鲁晓夫坐了下来。

切·格瓦拉请求在坐的同志能够允许他抽烟。他得到了大多数同志宽容的手势许可以后，他没有取用搁在茶几桌面上的苏联烟草，而是从自己的旅行提包里，拽出了一根又粗又长的雪茄烟来。

切·格瓦拉点燃了雪茄烟，他饮着咖啡，他终于开始了沉着、冷静的答辩。

未曾说话，他先笑了一下。他满脸蓬松的卷曲胡子，笑起来的时候，十分生动，更显得他十分年轻。

切·格瓦拉开始说话，他徐声慢语，完全不使自己说话的声音达到刚才赫鲁晓夫说话和吵嚷的那种高度。

切·格瓦拉首先还是“吓”的一声笑了。他几乎是俏皮地亮着眼睛，看着赫鲁晓夫说：

“尊敬的赫鲁晓夫同志，实在不敢当，如果有人说是斯大林主义分子的话，那是他们的事，我在您的面前，我是不敢当的，如果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斯大林主义分子的话，我看赫鲁晓夫同志是最有资格的，我从许多文字记录材料上看到过，你最少有一万次，宣布过自己是斯大林的最忠诚的学生。我想，您也确实是斯大林培养、塑造和树立起来的，许多时候，你不也坦然承认这一点吗？所以，如果说我是斯大林主义分子的话，即使我愿意是，恐怕也还没有这样的资格，而您赫鲁晓夫同志，是完全有资格的。这种资格你不必否认，因为事实上，您是否定不了的。”

格瓦拉从容地说着。他接着说：

“至于你问我是不是甘当毛分子，我不能理解您的指属。如果说你说的是毛泽东同志革命精神胆略所在的话，我可以告诉您，毛泽东同志的许多论断，对古巴革命是有启发，有鼓舞作用的，比如你刚才提到的，关于毛泽东同志对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我们确实很欣赏，对我们确实也很鼓舞。如果我们确实只知道帝国主义是真老虎而不知道帝国主义同时还是纸老虎的话，我们很难有勇气，有信心，坚决地和帝国主义展开无畏的战斗。当然，毛泽东同志，在论述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时候，也曾论述到了帝国主义是真老虎，是铁老虎，是吃人的老虎的一面，但是，毛泽东同志主要强调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一面，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教育和鼓舞革命者，任何时候，都不要被帝国主义和任何强大的敌人以及他们的走狗所吓倒；不要不敢反抗，不敢革命，不敢斗争，不敢胜利，在这些方面，毛泽东同志的论述和他的阐明的思想，是极为正确的，也是极为宝贵的，我们没有理由不从其中受到启发和教益。”

切·格瓦拉从容地说话，他从容地抽着他的雪茄烟，从容地喝着咖啡茶。他接着说：

“至于说到关于游击战的研究和论述，你们，包括苏斯洛夫同志，你们可能不无误会。我们古巴革命所进行的革命战争，我们所进行的游击战，和毛泽东同志所论述，在中国实行过的革命的游击战，是几乎完全不同的，如果有不无相同的地方，也是完全出于巧合。只是，我们后来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在展开古巴的革命战争以前，展开古巴的革命的游击战争之前，我们当时虽然也学习了大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比如菲德尔、劳尔与我，我

们在大学的时候，大约就读过了《共产党宣言》，啃《资本论》，一直是我们的—种强烈的渴望，我们知道《资本论》的重要，但是，《资本论》不好啃，菲德尔说，在他当博士研究生的时候，啃过《资本论》，但是读到第三百七十页，他就搁下了，他说他当时没有读进去，情况我也—样，在古巴革命开始前，我读过了第一卷，但也觉得难懂，后来革命胜利后，革命政府分配我分管经济，再不读《资本论》不行了，我补习自学了高等数学，掌握了高等数学知识，这才帮助我能够理解读懂《资本论》，终于通读了三卷本，而且通读了两遍，受益自然匪浅，如果细叙，是可以写成—部大书的。”

格瓦拉从容不迫，有板有眼地说着。

赫鲁晓夫听着，他不感厌烦。他这个人有这样的好处，有时候会十分专注。他很希望从格瓦拉的谈话中，找到—些他可以用来驳洁他的谈话对象的机会。

至于别的人，对切·格瓦拉的谈吐也很注意听，他们往往被切·格瓦拉谈吐的睿智和深刻所吸引。特别是米·安·苏斯洛夫，听到格瓦拉谈到古巴革命领导人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刻苦学习和精研，心中深感惊异，由衷地暗暗佩服，所以，他听着格瓦拉的话，有的时候禁不住就似乎是引以共鸣般地深深地、缓缓地低着头、意味着表示赞同。

也许只有两三个人，对赫鲁晓夫和格瓦拉的谈话，特别是对格瓦拉的谈话，听起来有些心不在焉。其中第一位是科兹洛夫，此人心脏状况不好，体态、面部都虚胖臃肿，他平白坐着，有的时候也会喘息起来，他显然是受着冠状动脉硬化的压迫，因而不时地引起窒闷。他是苏共中央现在几乎是仅次于赫鲁晓夫的第二把手，可以说是除了赫鲁晓夫以外，他是级别最高的主席团委员和中央书记。1957年，在—场特别的非常会议上，以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为领袖的反赫鲁晓夫集团，在—次中央主席团委员的投票表决中，以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别尔乌辛和萨布罗夫的七票，对米高扬，苏斯洛夫和基里钦科的三票，罢免了赫鲁晓夫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书记的官职。就在这个赫鲁晓夫岌岌可危的时候，早已被赫鲁晓夫提拔重用安排在列宁格勒的当州委书记的科兹洛夫，闻讯立刻组合—帮被赫鲁晓夫安排为中央委员的亲信，啸聚到莫斯科来，他们争取到了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和克格勃头目谢罗夫的支持，从而，事实上是通过了—场政变，保住了赫鲁晓夫，而把赫鲁晓夫的反对者们统统打成了反党集团，完全反被成了罢官免职的对象。

就是在那次相当惊心动魄的夺权政变斗争中，科兹洛夫显示了中心骨干的组织领导才能，同时也充分地表现出了对赫鲁晓夫的绝对忠诚，而且立卜堪称头功的汗马功劳，所以，在那次政变后，科兹洛夫就进入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主管组织和干部工作。只是，此人除了对赫鲁晓夫的绝对忠信之外，脑满肠肥，沉迷酒色，经常酒气醜醜，酒精中毒病相毕露，目光呆滞，脸上的肌肉几乎总是僵硬的，脸上往往还拥着—种仿佛正在呕逆欲吐的气色。

对切·格瓦拉谈话了无兴趣的，自然首推此人，因此，虽然他由于官职地位显赫，在坐下来的时候，被安排在了显赫的坐位上，是紧挨着赫鲁晓夫—侧的，可是，就在这样的位置上，格瓦拉和赫鲁晓夫相当热烈地进行谈话的过程中，他先是开始打盹儿，后来干脆就睡着了。

因此，此人似乎成了第一个赫鲁晓夫、格瓦拉谈话场合里的局外人。

第二人是哪一位呢？大约是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这一个曾经是农民出身的沙俄士兵，在斯大林时代经过战争的锻炼和培养，成长为了元帅。但他的文化水平也还不高，所以，当他听到格瓦拉提到菲德尔·卡斯特罗曾读过《法兰西内战》、《拿破仑·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两部书时，他以为那是提到两本小说之类的文艺作品。马利诺夫斯基一向很喜欢坦克大炮之类的重型武器，他喜欢战场上的炮火硝烟和整个战争机器的机声轰鸣。他不像有一些苏联元帅一样，也喜欢文艺作品，在他眼里，他很看不起那些玩弄笔杆子的作家。小说和诗他从来一本也没有读过，他甚至觉得，作为一个国防部长和苏联元帅，读那种劳什子胡说八道的东西，简直掉价。

因此，在切·格瓦拉和赫鲁晓夫的谈话圈子里，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显然也是一个不断把目光投向天棚上挂着的水晶吊灯的风从耳边吹过的局外人。

然而，格瓦拉的谈话，仍然还在继续中。

他向赫鲁晓夫、苏斯洛夫、阿·伊·米高杨提到古巴一些包括菲德尔·卡斯特罗为首的领导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和精研精读的情况。

阿·伊·米高杨，是在列宁时期就进入苏共领导层的元老。列宁在世时，在苏共最高领导层中的成员，绝大多数是著作家和理论家，很罕见有人不是高级知识分子，比如托洛茨基、布哈林、斯大林，在进入最高领导层时，都已经堪谓是大理论家了。

后来，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开始主政。斯大林开始大量吸收工农兵革命骨干进入苏共的领导层，其中赫鲁晓夫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但是，就是在斯大林主政时期，斯大林也很注意理论工作，很注意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著作的学习，很强调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的提高。阿·伊·米高杨，可以说是难得罕见的聪明人，因此，在斯大林时期，他也非常刻苦认真地阅读学习过大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所以，当切·格瓦拉提到这样一些话题时他并不觉得太陌生，并不觉得格瓦拉是在谈论他差不多完全不懂的解析几何和高等代数，因此，他似也还能听得进去，并且似也还能有一些兴味，他甚至也在暗暗地想：这些年轻的古巴领导人，年龄不大，但是学问根深，颇有造旨，思想确实成熟，因此确实不能等闲视之。

阿·伊·米高杨甚至暗想，真的如果是切·格瓦拉在理论问题上，在哲学问题亦或是在世界战略的分析认识上，如果真的和尼·谢·赫鲁晓夫展开对阵对垒的辩论，如果他们针锋相对起来，恐怕善于吼叫吵嚷的赫鲁晓夫，绝不会一定站在优势的方面，他甚至简直可能完全不是切·格瓦拉的对手。

米高杨是很了解尼·谢·赫鲁晓夫的水平。

所以，现在，米高杨能够欣赏到切·格瓦拉对赫鲁晓夫的驳诘，简直也还可以说是一种令人舒服愉快的享受。

赫鲁晓夫在苏联当政已经数年，党政大权一总抓在他的手里，他已经越来越自信，越来越霸道，越来越横行无忌，胡说八道和恣意妄为，在国外，当然不乏有人总是在无情地攻他，驳难他，但是在苏联国内，在苏共党内，大约除了莫洛托夫在坚持战斗之外，似乎就再也不会会有什么人有那样的胆量了。

所以，现在在克里姆林宫这个地方，驳诘赫鲁晓夫的言谈，简直可比是令人开心的怒放的奇花异草在这里的花坛草坪上出现。

因此，阿·伊·米高杨听着格瓦拉的谈话，也还真的悄悄开心。他不会

像科兹洛夫一样打盹儿大睡其觉，也不会像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同志一样乏味得发慌。

切·格瓦拉相当详尽地向他的主要谈话对象们，讲述了一番他本人，以及古巴其他主要革命领导人学习和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情况，接着他又谈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古巴革命发生联系和进入结合的历史。

切·格瓦拉谈到了菲德尔·卡斯特罗最初寻求革命道路的过程。

“我们当然也走过非常幼稚的阶段。”切·格瓦拉说，“比如，我们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当然，他是天主的革命家。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就有着强烈的革命要求。最初，作为一个法学博士，他开始在自己的祖国古巴生活时，他绝对不能对无法无天的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巴蒂斯塔政权对古巴人民的残酷剥削压榨和血腥的屠杀镇压熟视无睹，于是，他就采取革命行动的步骤。他最初的革命步骤是什么呢？这就是以他法学博士的博学，向当时古巴巴蒂斯塔政权下的古巴哈瓦那法院，提起了状告巴蒂斯塔政权的起诉书，他希望哈瓦那法院，能够受理他的起诉书。这样一个杰出的人，但是他也曾经是那样天真烂漫，以为资产阶级的民主确实是有保障了。可是，当巴蒂斯塔政权控制下的哈瓦那法院，退回了他的起诉书，拒不受理他的起诉后，他开始想到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暴力革命的论述。于是在1952年发生卡斯特罗又在古巴的圣地亚哥组织了有162名大学生参加的攻打有1500名政府军守备的蒙卡达兵营的行动，结果遭到了巴蒂斯塔政权最为令人发指的残酷血腥镇压，使一场在城市展开的武装革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遭到了悲惨的失败，卡斯特罗和劳尔，几乎是都遭到了被敌人推上断头台的危险。经过这样一文一武的两次失败，总结了经验教训，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墨西哥又把革命力量集合起来，这才决定了在古巴农村、山区，展开游击战争的步骤。以后来，古巴革命确实也是走了一条由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并且赢得了最终的胜利。然而，只是在古巴革命胜利后，我们才发现，在一定意义上，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古巴的革命，是走了一条与中国革命相似相近的道路，从游击战争起家，进而实行农村包围城市，这一点上，确实，是大有相似之处的。有过，不管中国同志会不会强调他们对这种革命方式，赢得胜利的方式，拥有绝对的专利权，也许他们有权可以拥有这样的专利权，因为他们利用这种方式，经过了二十二年漫长的时间和历史，才赢得了胜利，无疑，他们是这种方式的伟大发明家和伟大实践家。他们拥有这种方式的专利权，也会是被我们的古巴革命所尊重和所承认的，因为，古巴革命确实发生在他们赢得胜利之后，而且，运用和实践的时间，也只短短不到两年多一点的时间，所以，我们是完全可以尊重和承认中国同志的专利权的。但是，我们说的这种尊重和承认，却并不是等于说，我们古巴革命是抄袭了中国革命的样板。完全不是这样的。”

格瓦拉这样说着。

赫鲁晓夫听着，他一会儿皱眉，一会儿舒眉。听到格瓦拉强调说古巴革命不是抄袭中国革命的样式时，他以为格瓦拉准备向他表明古巴和中国的距离了。所以，他马上高兴地舒展开了眉头。

从1960年赫鲁晓夫采取和中国共产党公开决裂的行动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导层，特别是它的领袖毛泽东；在赫鲁晓夫心目中，已经被认为是势不两立的敌手，他对中国共产党以及它的领导人几乎已经是满怀着铭心刻骨的仇恨了。

所以，他一听格瓦拉强调古巴革命不是抄袭中国革命而来，他就显然高兴起来，并且，马上插上一句话来说：

“你完全是对的，切·格瓦拉同志，你们应该记住，古巴革命，确实与中国没有联系，中国是一个大国不错，但是那是一个人民喝大锅清水汤，穷得连裤子也穿不上的国家，他们怎么会援助古巴，他们怎么会与古巴革命有联系呢？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实上，古巴革命与中国革命，是不存在任何联系的。”

赫鲁晓夫说得很绝对，似乎也很有感情色彩。

格瓦拉还是从容不迫接着说话，但是，他似乎刻意要给赫鲁晓夫上课。他接着又说：

“不错，赫鲁晓夫同志，您的这话，在一定意义上，部分是对的。我们所说的古巴革命与中国革命不存在联系，是说在形式上不存在联系。中国革命，是中国人民的创造，古巴革命，也是我们古巴人的一种创造，是经过巨大的牺牲和流血探索实践摸索出来的一种创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是抄袭中国革命的图形，完全搬用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我们不是那样进行革命和开展古巴革命，并且赢得了古巴革命的胜利的。但是，在革命胜利以后，当我们回首革命的往事，开始总结古巴革命走过历程和我们的经验时，我们忽然发现，古巴的革命，与中国革命，虽然在形式上没有联系，在内蕴的，深刻的方面，却有着几乎是完全相近相同的联系，因此，我们在总结的过程中，有的时候，我们实在不失感到遗憾，这就是，在古巴革命的过程中，我们虽然也曾把中国革命引为榜样，但是我们并没有更直接、更自觉地展开这面榜样的旗帜，然而，这面榜样的旗帜，如果在我们的面前展开，我们相信一定可以有着更宽阔的通向战斗胜利和革命胜利的道路，是可供我们选择的。”

切·格瓦拉说到了这里。

赫鲁晓夫听到这里，他忽然有些耐不住性子，有些实在听不下去了。他“嚯”地一闪身，马上又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这一次，他站起来的冲力似乎更大，他几乎冲到了一圈沙发围着的会见厅的中心，他激动地打着转转，在大厅里转了个大圈儿。然而，他还是又回到切·格瓦拉坐着的沙发前来，他居高临下，他站在了切·格瓦拉的面前，又一次挥起胖手，指着格瓦拉几乎是质问一般地发问：

“亲爱的切·格瓦拉同志，你的话，我实在听不懂，也实在听不进去。我实在不能相信，中国的旗帜，能给你们提供什么样的，可供选择的好道路呢？我不相信会有这样的道路。我不相信会有这样的道路！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格瓦拉说：

马克思主义只能承认辩证唯物主义是真理。永远不能认为唯心主义的绝对化会是真理。刚才，有的同志以非常不屑的语调，提到了我们向中国同志学习‘大养其猪’，养殖北京鸭的经验。其实，我们这样的学习，有什么不好呢？按照中国同志的说法，这叫做多种经营。中国人有一个著名的伟大战略思想，叫做‘自力更生’，这个思想，这个口号，对我们的启发和教益，就是极为深刻的。我们要学‘大养其猪’，我们要养殖鸭，都是因为受到了中国同志的‘自力更生’思想的启发。我们从这个思想里，得到启发就是必须打破古巴传统的种植甘蔗和制糖的单一经济。我们必须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地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绝不能在单一经济的钢丝上只走钢丝的来回。我们必须一切方面学会两条腿走路，创造立足‘自力更生’的条件，我们不仅要养猪、养鸭，我们还要学会种水稻，学会种玉米，学会种棉花，这样，不仅我们可以真正创造出‘自力更生’的基础和条件，打破太脆弱的单一经济，事实上我们还能加速我们农业生产的周转速度。你们知道我们种植甘蔗的生产周期的‘死季’吗？什么是种植甘蔗的周期‘死季’呢？就是，所有的甘蔗农工，在每年的一二三，三个月份，砍甘蔗收获的同时又耕植，然后一年余下来的其他九个月，甘蔗农工就都形同无业游民了。

“这是生产力的最大浪费。为此，我们也要打破甘蔗、制糖这单一经济模式，我要发展多种经营，我们要立足于创造这样的‘自力更生’条件。假如有一天，美帝国主义用他们的飞机、大炮、中远程导弹和海军窒息古巴，扼杀古巴的经济生命线的活，完全封锁我们的活，我们仍然能够不仅有甘蔗、不仅有糖吃，我们可以引进埃及的长丝绒棉花，我们也可以自己纺纱织布，我们还可以不仅大养其猪，而且大养其牛，我们要让古巴十二万农户每户养上一头奶牛，这样，古巴全岛的所有小孩和老人，就不再只靠购买外国进口的炼乳来补充营养了。

“我们创造这样的自力更生条件，有什么不好呢？相反，形势迫使着我们，正好恰恰相反，我们这样下决心立足自力更生，是至为必要的。而这个伟大的自力更生的思想，应该说，也可以说，正是中国革命的旗帜启示我们的。”

格瓦拉说着。

赫鲁晓夫一听说格瓦拉讲中国人的好话，简直好像孙猴子听到了唐僧大念紧箍咒，使他实在头疼得很，于是，他就实在忍耐不住，再一次跳起来，而且，在这一次他跳起来的时候，他抓起了一只摆在前边茶几上的装矿泉水的玻璃瓶。

赫鲁晓夫在1960年的联合国的会议厅内大喊大叫，脱下皮鞋来大敲讲台，其实不是一时激动，不是偶然发生的情况，斯大林去世以后，没有人再约束他了，他官升脾气长，脾气越来越大，越来越邪，他有的时候，一要发急发火的时候，经常还会发歪，冲着任何人挥拳头，那是常事几，更有甚者，他还有的时候会冲着令他愤怒，令他气恼的人挥东西，比如摔烟灰缸，摔水杯，甚至还吐唾沫，喊“滚”！喊“让谢列平给他发放签证，让他滚到外国去！”等等。

谢列平曾经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上台后提拔他当了克格勃主席，所以，出国签证在总体上，是由他来管的。

今天，赫鲁晓夫在格瓦拉面前，听着一些令他头疼、气恼的话，他操着玻璃瓶子跳起来，会不会在格瓦拉面前，冲着格瓦拉也摔玻璃瓶子呢？他当时确实又是很激动，很冲动了。

所以，阿·米高扬还是提醒了他一句：

“尼基塔，控制住自己，冷静点儿。”

赫鲁晓夫瞪大了眼睛，他盯着切·格瓦拉。在米高扬插话时，他也瞪了米高扬一眼，一种观念，一种提醒，可能起了作用，告诉他，无论如何，在外国客人面前不能太放肆地肆无忌惮地摔瓶子，这种观念一定在他脑海里转了个弯儿，所以，他的玻璃瓶子没有摔下来，只是成了他似乎想在手中把玩的角色表演的道具。

经过米高扬的提醒，赫鲁晓夫确实冷静下来一点儿，他本来想激动地喊着说话了，但是，现在，忽然又平缓了语调和口气，他一时差不多是温和了起来，他冲着米高扬，当然也还冲着格瓦拉说：

“切·格瓦拉同志，实在还是太年轻了。在理论问题上，作为同是共产党员，我们老资格的共产党员，还是可以给年轻的共产党员上课的。切·格瓦拉同志，尼·谢赫鲁晓夫同志我本人，是191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的，而你切·格瓦拉同志是出生在1928年，赫鲁晓夫同志的党龄，比较切·格瓦拉的年龄还长十岁，所以，我以老共产党员的名义，也是可以给你上课的，你刚才讲的那一套什么中国的‘自力更生’主义，完全是一套糊涂的东西，你完全是上了中国人的大当，他们用狭隘的民族主义伎俩，使你蒙上了眼睛。中国人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不是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者。他们是一帮子农民和从山沟里打游击走出来的游击队员，是些大兵，他们没有文化，甚至连2+2等于4也算不出来，他们还能有什么思想，他们还能有什么眼界，他们完全看不到现在世界上，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他们不相信社会主义阵营可以进行国际分工，可以互通有无，互相帮助，特别还可以受到强大的苏联的无私援助，因此，本来在社会主义各国的国际分工中，我们可以充分地利用和发挥各自的优点。这样的结构，其实在苏联内部，也是这样进行的，比如我们的乌克兰，就是苏联的大粮仓，主要以发展农业为主，我们在中亚的乌兹别克，那里气候温热，和埃及差不多。我们就在那里专门大种棉花，而在另外一个地方，你知道的，我要说的是阿塞拜疆，那里盛产天然气和石油，我们就把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建设成一个石油天然气的加盟共和国。等等。在苏联国内，我们有这样非常协调的分工，在苏联国外，在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经互会范围内，我们事实上也在成功地进行着这样的分工的尝试，当然我们有我们的发明专利权，这就是国际分工的尝试，比如，捷克斯洛伐克，他们那里玻璃生产工艺好，我们就强调要他们多多生产玻璃器皿，什么高脚杯啦，酒杯啦，玻璃装饰品啦，这是各国人民生活中必需的物品，很宝贵，捷克斯洛伐克的玻璃器皿，确实是最上乘的，你看，你面前的烟灰罐，也就是。”

赫鲁晓夫也善演说，演说起来也会滔滔不绝，往往也能说得头头是道。

他接着说话。由于他顺畅地说出了一大段话，他又注意到切·格瓦拉也还确实专注地听着他说话，所以，赫鲁晓夫现在一边说话，一边掩去了刚才开始说话时红头涨脸的神色，开始又变得笑容可掬，和蔼可亲起来。

他说着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的玻璃烟灰缸的质量很好，形态秀美，简直是艺术品，他说着，还放下了玻璃瓶，抓起一只烟灰缸来，递到格瓦拉手上，请格瓦拉欣赏。切·格瓦拉确实也欣赏一番，左看右看了一番这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的玻璃烟灰缸，他脸上不无赞许的神色。

赫鲁晓夫看着切·格瓦拉的表情，有些不无得意起来，他接着说话，现在他把两只胖手抱在了胸前，显然更有兴味要娓娓道来一些有思想，有意味的话：

“除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玻璃器皿很有特色，可以大量生产之外，在保加利亚，哦，在保加利亚，特别是在保加利亚，有更美妙的东西，顺便说一句，亲爱的切·格瓦拉同志，我可以告诉您的一件事是，正是我在保加利亚访问的时候，我突发奇想，想到了要把苏联的导弹，运送安装到古巴的岛上去，把古巴彻底武装起来，强化起来，完全变成一个反对和抗击帝国主义的强

大基地。正是在保加利亚，我在那里访问的时候，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这是在今年的三四月间发生的事情，那时候，我正在保加利亚的玫瑰谷里欣赏那里如火如荼的玫瑰花。唉，亲爱的切·格瓦拉同志，保加利亚真是个好美丽的地方，可惜你还没去过，你已经去过了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你还去过了南斯拉夫，你将来也该去保加利亚，最好是在玫瑰花盛开的季节，实在的，保加利亚，真可以就说是一个玫瑰国，保加利亚的玫瑰花，简直又肥又大，因此，那样大量的玫瑰花，就可以大量地收获，来制香料、香精、玫瑰酱。保加利亚的玫瑰酱简直好极了，因此，在社会主义阵营的经互会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分工专门请保加利亚这样的兄弟之帮，来专门生产玫瑰酱做玫瑰酱王国呢？这有什么不好呢？”

赫鲁晓夫越说，似乎越能言之成理。接下来，他又说到了蒙古。

“那里有广阔的草原和戈壁，他们能生产什么？那是个地广人稀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喜欢过游牧生活，这样，我们就要求蒙古国，专门以生产牛、羊、奶品、肉食和皮毛为主。这又有什么不好呢？这不正好是发挥着他们的优势和特长吗？而他们所需要的粮食、布匹，生产机械和生活用品，又是在以苏联为首的经互会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调济，可以得到充分的供应和保障的，特别是伟大的苏联，最无私的援助，总是可以是他们最可靠的后盾和保障的。而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蒙古的蒙古人们，还要闹什么‘自力更生’，他们有这种必要吗？不完全是胡闹吗？”

赫鲁晓夫说着，他好像已经把道理说得很圆，说得很透了。他甚至相信，他几乎已经可以说动切·格瓦拉，说服这个切·格瓦拉了。

所以，赫鲁晓夫想停下话来，歇息一下，喘上一口气了。于是，他重又坐了下来。然而，切·格瓦拉似乎不让赫鲁晓夫喘息似的，他等赫鲁晓夫刚刚重又坐好，就又冲着赫鲁晓夫发问了一句。

格瓦拉向着赫鲁晓夫发问：

“赫鲁晓夫同志，你刚才说的，是一种情况，假如说突然有另一种情况来临时，比如在蒙古，假如说忽然有一天，一切外来援助和交换都停止了，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如果他们光是生产牛羊，届时，难道他们就永远只能以奶品和肉类为食？他们就不再需要面包、蔬菜和水果了吗？他们将穿戴什么？难道就只能是穿戴兽皮，而不再穿戴任何衣料和绸缎了吗？据我所知，蒙古人民，还是个特别喜欢穿绸缎衣服的民族呢！”

赫鲁晓夫听着格瓦拉的这一发问，惊讶起来，瞪大了眼睛，他好像忽然奇怪起来，这个切·格瓦拉，怎么这么榆木脑袋，不可开化，他苦口婆心这么耐心地一番说教，怎么竟硬是说不通他呢？

赫鲁晓夫圆睁着眼睛，忍不住心里又开始发火，他终于又有了一种准备向切·格瓦拉喊的冲动。

但是，一开始，赫鲁晓夫还是只又冷静地反问了一句切·格瓦拉：

“怎么？格瓦拉同志，尼·谢·赫鲁晓夫同志这么耐心，细致地给你讲道理，讲述伟大的共产主义真理，怎么还是说服不了你，你是不是还要死抱着中国人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自力更生’的思想不放呀？”

格瓦拉说：

“老实说，坦诚地说，我们只能这样说话，赫鲁晓夫同志，你说的那些道理，我看不足以成为共产主义的真理，因为，它与生活中的实际，是有很大的距离的，比如说，您强调的苏联无私援助，有的时候是否无私，是可以表

示怀疑的,因此,有的时候的援助,也就自然不能说绝对有把握可以靠得住。”

“什么,你说什么?格瓦拉同志,你说什么?你说苏联的无私援助的无私,有的时候是可以被怀疑的,因此援助有时候也是没有把握靠不住的吗?你是不是这样说了?”

“我是这样说的,确实是这样说的。”

“这就是你的恶毒攻击了!”

“可是,我说出的是事实。”

“你传染上了中国人的忘恩负义的病!”

“我们古巴人从来不会忘恩负义。我同样认为,中国的同志们,也不是忘恩负义之辈。相反,我倒认为,中国的同志们,是真正喜欢义气行事的,比如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侵略军将要消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时候,是刚刚建国仅仅只有一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支援朝鲜兄弟打败了美国侵略者,这是世界上最为行侠仗义的行为。这种情况,在我们古巴,同样也是有例可寻的,我们古巴革命,从来绝不遗忘任何一个为古巴革命作出贡献,作出牺牲的人,而且,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是古巴人,还是外国人,这是有目共睹的。一个资产阶级的法官,在卡斯特罗领导革命者攻打蒙卡达兵营失败后,在圣地亚哥的法庭上被审判的时候,这个法官主持了正义,提出反对定卡斯特罗有罪,他这样的恩德和正义行动,在古巴革命胜利后,对他的报答,就是卡斯特罗请他来当古巴革命后第一任国家总统。当然,后来因为此人反对古巴的革命政策而解职,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这足以说明,古巴的革命者,确实不会是忘恩负义的人,正像中国人不会背信弃义一样,古巴人也不会背信弃义。我们决不会像有的人那样,在自以为是聪明起来的时候,会去恶毒地咒骂他们的过去的恩师是什么白痴,是什么胆小鬼和昏庸无能的家伙。”

切·格瓦拉义正严词地说着,他的话语虽然也含委婉,但是也还是太直了。

他的话,马上又刺到了赫鲁晓夫的痛处。

赫鲁晓夫能听出来,切·格瓦拉所说的后来聪明的学生咒骂他先前的恩师是白痴,明显是指责他在“二十大”上对斯大林的攻击的。在赫鲁晓夫在“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最少有四五次在提到斯大林的时候,咒骂过斯大林是白痴,是胆小鬼,是恶棍。

切·格瓦拉现在话语中,如此直接地刺到了赫晓夫的痛处,这可就要使赫鲁晓夫着实地恼怒起来了,他忽然把胖乎乎的大手猛然间攥成了拳头,“嘭”地一声砸在真皮沙发宽厚的扶手上,他终于又一次激动得跳了起来:

“切·格瓦拉同志,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不是派遣你来侮辱苏联领导人,不是派遣你来进行攻击和挑衅行为的。可是,你却处处攻击,处处挑衅,甚至竟敢放肆侮辱苏联领导人,你是太放肆了,而且,因为你死抱着中国人的自力更生的臭观点不放,我们有可能也学你们的样子,宣布你切·格瓦拉同志为不受欢迎的人,请你回古巴去吧!请你死抱着你的自力更生观点去自力更生吧,我们可能就不准备再向古巴提供导弹了,看你们古巴人在美帝国主义的老虎嘴巴下会不会发抖,看你们在美帝国主义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侵略威胁面前,你们将怎样生存?是的,我警告你切·格瓦拉同志,由于你的恶劣态度,我们将准备再提起研究,和重新作出决定,将可能作出从古巴撤回导弹的决定,那时候,我看你切·格瓦拉同志回古巴后,将会怎样向菲

德尔·卡斯特罗同志复命和交差，我想看到你会捅下多大的漏子惹出多大的麻烦，看你还能不能再来当古巴的最高全权代表！您听见我的这些警告了吗？切·格瓦拉同志！”

赫鲁晓夫猛的又是一阵这样的狂喊怒吼。

切·格瓦拉接着说：

“尼基塔·谢尔盖那维奇·赫鲁晓夫同志，您的话，是不是严肃的，郑重的，是负责的？”

切·格瓦拉接着说：

“不过，赫鲁晓夫同志，请您不要混淆这样的事实：关于在古巴安置苏联导弹，配置伊尔—28飞机和“蚊型”鱼雷快艇的提议，并不是首先由古巴提出请求的，而是，首先是由苏联方面提出来的。是在苏联方面提出这样的意向以后，我们才派遣劳尔·卡斯特罗同志，来到莫斯科和你们会谈谈判，草签了关于在古巴设置苏联导弹、飞机和快艇事宜的军事合作协定。而且，这样的协定，是在古苏两国各自作为主权国家，是在权力完全平等的基础上，是在共同的意向下达成的，我们决不把这一协定看成是仅仅是苏联方面加在古巴方面头上的决定。所以，既然作为是草签的协定，理所当然还需经过双方最高领导层和有关当局最后批准程序，为了正确地履行这种程序，我是受命作为古巴方面的最高全权代表，来到莫斯科，进行和修改最终签署这一协议的使命的，所以，我不是作为一般的外交代表，苏联方面可以恣意地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如果办联方面作出这样的宣布，我们唯一的认识是，这即意味着古苏两国军事合作协定已为被苏联方面的撕毁，我们已经不再具有谈判的余地。如果退一步讲，苏联方面仅仅是认为古巴领导人抱有自力更生的思想观念，苏联方面也要撤回导弹、飞机和鱼雷快艇的话，那就请你们尽管这样决定，这样办好了，古巴革命过去没有导弹、飞机和鱼雷快艇我们也进行了自己的革命动作，今后，没有这些，我们也还会发展和挺立，我们的战斗口号是誓死保卫祖国，我们必胜！我们的战斗信念是坚定的，我们的信心也是坚定的，美帝国主义吓不倒我们，美帝国主义也压不倒我们，真正站起来的人民，是完全不会屈服的，再说，全世界，包括苏联、中国、埃及、亚非拉各国人民，都不会让古巴革命永远处在孤立的地位，这样的信心，我们也是有的。所以，如果苏联方面，赫鲁晓夫同志，认为我们古巴领导人同意和持有自力更生的观念和思想，因为这完全不合你们的口味，而要单方面撕毁古苏两国军事合作协议的话，我们也只好说：悉听尊便。因为，事实上，我这次到莫斯科来的最根本的使命，是来争古巴的主权的。在已经草签的协议上，有这样一条，即：在古巴列岛各导弹基地、伊尔—28轰炸机场和“蚊型”鱼雷快艇船位的军港，其操纵、使用和指挥权，全部由苏联军事指挥人员管辖和统制。经过我们古巴最高领导核心的研究，我们建议务必彻底修改这一条，古苏军事合作协议，只能表明是古巴方面向苏联方面提供军事基地，而不是苏联方面向古巴提供防卫支持和援助，这是事关古巴国家主权性质不能含糊混淆的原则问题、重大问题，所以，是绝不能含糊和马虎不清的。古巴要求的最低纲领是古苏军事协定在古巴方面执行的时候，必须由古巴方面肩负主导的节制责任。苏联运进并设置在古巴列岛上的支持古巴防卫任务的全部导弹基地、轰炸机地、鱼雷快艇军港，在苏联军事指挥技术人员的援助下，在可以建立联合国司令部负责作战指挥的同时，必须在古巴革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的统帅范围里，接受古巴革命武装部队的最高司令的节制和指挥。

这是绝对必要的。我来到莫斯科，修改和最后负责全权签署古苏这一军事合作协定，最主要、最重要，也是要使这一条得以确立。我们必须拥有这样确立的权利。如果苏联方面和苏联的最高领导人，拒绝我们这样的权力要求的话，我们将同时否决已经草签的古苏军事合作协议的存在。”

切·格瓦拉侃侃而言，有的时候是提出雄辩的论证，有的时候是操用着逻辑严密、掷地有声的外交词令，他简直是一阵一阵的排炮，把刚才妄图一意恐吓和恣意施压胡说八道的赫鲁晓夫的嘴巴完全打哑了。

赫鲁晓夫目瞪口呆，一时他完全说不上任何别的什么话来了。

但是，堂堂的苏联最高领导人，论军衔也还是个中将，怎么能如此这般就败倒在一个小小古巴的少校部长面前呢？

赫鲁晓夫终于大发威了，他抡着两条胳膊同时高举，同时猛抡了一个很大的动作，终于完全是吼喊起来，他冲着切·格瓦拉吼喊：

“好吧！切·格瓦拉少校，请你走吧，苏古之间，关于军事合作，关于导弹问题，完全吹了！吹的责任完全就在你切·格瓦拉身上！你走吧！”

赫鲁晓夫把手一样，作出了一个请格瓦拉开步姿态。

切·格瓦拉不慌不忙。他弯下腰，拎起了他的公文包。他说：

“如果我们刚才所说的全部话题，全是正式的谈判话题，那么，现在赫鲁晓夫同志正式宣布，古苏两国军事合作，导弹设置的草签协定已经告吹的话，我们的谈判任务，自然也就全部结束了。这样的谈判结果，自然，我是敢于对之负责的，因为我拥有古巴最高领导核心的授权，但是，说吹的责任全在我的方面，我想赫鲁晓夫同志不是开玩笑吧！好吧，再见了，亲爱的同志们！”

切·格瓦拉说着，迈开他少校特有的矫捷的步伐，就要从这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接见大厅里走出去了。

阿·伊·米高扬这时候急忙站起来，拉住了切·格瓦拉的一条胳膊，说：

“别忙，切·格瓦拉同志，我们还可以再谈一谈。”

格瓦拉说：

“会议已经结束，协议已经完全撕毁、完全破裂了，还谈什么？我们还有谈闲话的时间吗？没有了吧！”

米高扬回过头来要招呼赫鲁晓夫，想劝说赫鲁晓夫留住的客人，留住从古巴迎来的贵宾。

然而，尼基塔·赫鲁晓夫用得着米高扬多此一举吗？他早已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早就拽着格瓦拉，紧紧不放。

赫鲁晓夫，这才叫地道的，真正了不起的大政治家呢，他最善于表演，最善于逢场作戏。

他此刻，哪里象是刚才和切·格瓦拉面红耳赤地争吵过，辩论过，打过嘴架，好像从来根本就没有发生过那样的事情，他紧拉着切·格瓦拉的手，忽然语调又亲切和完全平和起来说：

“少校，亲爱的少校，你忙什么？我们的正式谈判还没有开始呢！刚才进行的，只是同志间，非正式谈话，不过，我们也不能再干谈下去了，我们也都有些累了吧？我们也该休息一阵了。你看看，亲爱的少校，你看一看我们这位可爱的尊贵的主席团委员，我们的科兹洛夫同志，他是个多么可怜的人啊，他有心脏病，完全累坏了，看看，他睡得多香，他还正在打酣呢。”

赫鲁晓夫说着，他一手拽着切·格瓦拉的手背，另一只胖手开始扯住了

正在沙发上确实仍然在喷发着酣声的科兹洛夫的一只肥厚的大耳朵。

“唔，唔，醒来吧，可怜的伊万，可怜的人儿，我们还要招待亲爱的，尊贵的客人，我们的尊贵的，亲爱的切·格瓦拉少校，要好好喝一场呢，快起来吧，科斯佳，该是您露威风的时候到了，多少酌满伏特卡美酒的高脚杯，已经在向您招手了呢！”

接下来，气氛完全扭转了，缓和了。在赫鲁晓夫开玩笑，闹鳄鱼般的幽默中，在大厅中的人们都轰然笑了起来，包括马利诺夫斯基都绽开铁青的大脸笑了起来，苏斯洛夫更是前仰后合，其乐不止。

这时候，安德罗波夫提示赫鲁晓夫说，欢迎切·格瓦拉同志宴会已经安排好了，大家还是入席以后，边吃，边喝，边说一些轻松的话题吧。

赫鲁晓夫大声称赞这样的安排，说：“好！”但他同时又好像郑重地对切·格瓦拉说：“咱们就此打住任何不轻松的话题，把所有不轻松的话题，还是推到明天开始的正式会谈的谈判桌子去说吧，今天我们可是再也不谈了，可以谈酒，谈醉鬼，甚至也还可以谈姑娘们，今天福尔采娃同志不在这里，谈谈姑娘们，是不会有人吃醋的，对不对，科兹洛夫同志。”

科兹洛夫现在有了精神，他接着赫鲁晓夫的话头说：

“当然，赫鲁晓夫同志总是对的。”

于是，切·格瓦拉被赫鲁晓夫牵着手，被米高扬、苏斯洛夫、科兹洛夫等人簇拥着，从部长会议主席的会见大厅又穿过楼道，走进了后边一侧的宴会大厅，这里果然已经铺陈设置好了几桌佳肴丰盛，杯盘琳琅的酒席，同时，几乎举目遍地站着一些穿着洁白衬衫的苏联服务员姑娘，她们一个个几乎都是可以令人眼花缭乱，真正金发碧眼的美女。

宴会上响起了“正当梨花开遍的季节”的“喀秋莎”的乐曲。祝酒致词，马上就热烈地展开了。但是，切·格瓦拉好像打不起很大的精神，全力以赴地投入这热情洋溢的欢宴气氛中。他的思绪，忽然开始了对伟大苏联大地的漫游，对伟大苏联的历史的漫游。

宴会终于结束了。

宴会结束后，切·格瓦拉在主客分手散去的时候，他忽然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苏联同志能允许他，就在今晚，就在这静静的明亮的夏夜里，让他到克里姆林宫的宫墙外的红场上去，让他在那里徜徉一番，散一会儿步。

当然，切·格瓦拉的这个请求，被完全地满足了。

切·格瓦拉在苏共中央负责对外联络的中央书记安德罗波夫同志和克里姆林宫卫队司令的陪同卜，驱车来到了克里姆林宫外的红场上。

他们的小小车队来到红场的中心。

他们的小小的车队，在红场的列宁墓前停下来。他们依次下了车。

他们一行人，向列宁墓走来。

这里即使在夜间，也像白昼一样，被辉煌的灯火照映得十分明亮。

列宁墓前，苏维埃国家几乎人所共知的光荣的一号哨位，英雄的苏联红军战士，在肃穆而机警地，警惕百倍，同时又无比骄傲地守卫着伟大列宁安睡的地方。

1960年，切·格瓦拉代表英雄的革命的古巴，第一次来到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三周年庆典的时候，他曾经拜谒过列宁的陵墓，那时候，苏联的“二十大”开过了，但“二十二大”还没有召开，因此，当时的斯大林，还没有被实行扒坟掘墓的处置，因此，那时候的列宁墓，还被

称为列宁——斯大林陵墓。在陵墓里，伟大列宁栩栩如生，躺在这里；穿着大元帅服的斯大林，也安详地躺在这里。这两位伟大苏联的缔造者，在为苏联的伟大事业辛勤工作战斗奉献，把胜利的基业留给他们的伟大国家和人民以后，安静地睡了，他们好像都得到了安息的权利。

在那一次的拜谒中，切·格瓦拉以古巴革命政府代表团和他本人的名义向列宁，也向斯大林敬献了花圈。

切·格瓦拉，和他的同志们，都在列宁、斯大林的水晶棺前，怀着崇敬的心情，默立了很久，他们当时，感到能看到两位伟大的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忠骸，是一非常神圣的、重要的事情，是一种产生伟大的鼓舞力量的宝贵的机遇，是一种难得的机遇。

然而，又几年，仅仅几年过去以后，切·格瓦拉再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物换星移，这里已经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苏联“二十二大”以后，赫鲁晓夫以及他的一些忠实的追随者，一阵鼓噪，他们扒坟掘墓，把斯大林的忠骸从这里搬出去了。这是为什么呢？皆因为，赫鲁晓夫在“二十大”做过一个秘密报告，大肆底毁一番斯大林后。一开始很令许多人兴奋、激动甚至高兴。斯大林作为一个国家统治力量的象征，他毕竟曾经高踞在亿万人民之上·不管他为这亿万人民作过多少好事，赢来过多大的胜利。但他毕竟也严格地管理过这个国家，甚至不惜用铁的手腕保护这个国家的利益和维持这个国家的秩序，何况，他毕竟也是人而不是能够绝对明察秋毫的上帝和神灵，所以，他肯定也有过大量的失察和危急关头和紧迫的情况下处置失当的错误。在他活着的时候，人们生活在大体上比较康乐的生活条件下，在战胜法西斯以后又长时间地生活在胜利的欢乐的气氛中，人民感念斯大林的领导，感念他的丰功伟绩，衷心地热爱他，敬仰他，爱戴他，从内心深处呼喊他“乌拉”！

可是，他死了。

而就在他死后，他的人民和国家，由于忽然失去了胆略震惊世界的伟大形象的支撑，这样的国家和人民甚至出现了一时间的张惶和绝望情绪，一时几乎找不着了他们的梦魂可依之处。

也正是在这样的時候，忽然有一位自命非凡的神仙，他利用在斯大林逝世之后抓到的话筒，在苏联各地，在上上下下的人民中间，到处提拔他所青睐的干部，到处给老百姓开具着空头支票，作出提供更好的房子住、更漂亮的衣服穿，更多的猪油和面包给大家吃的许诺，在一个四面受敌，被帝国主义严重包围，因而管理严格，纪律严酷的国家，在被严格要求和约束惯了的人民中间，肯定会有更大的诱惑力。

赫鲁晓夫压根儿上，绝不是一个笃信马克思主义的人物。在斯大林在世的时候，他是不敢大肆胡说八道的。可是，斯大林一死，他就开始真相毕露，他开始到处发表讲话说：“马克思主义好是好，只是再抹点儿猪油就更好了！”正因为他如此胡说八道，四处吹牛，八方许诺，收买人心，当年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一班苏共领导层的元老，才要奋起罢他的官。只是因为那些老人们太斯文了一些，赫鲁晓夫哺育了一帮兄弟，打了一番无赖行径流氓拳，终还是把那班斯文的老人打下去，完全由赫鲁晓夫篡夺了苏联的一切大权。

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上，打击斯大林，抬高他自己，这样，叫人们一时看到了十分开眼的被展示的一大堆斯大林的错误、罪恶的

丑行，而赫鲁晓夫自己，扮演成一个多行善事的释加摩尼和美丽可人的护花使者，使人们的目光一下子包含着希望和更大的光明注视到了赫鲁晓夫的身上，而同时，开始唾弃和厌恶憎嫉斯大林。

然而，这样的偷天换日的伎俩，很快就开始了败露和破产的机缘，赫鲁晓夫的一切许诺，日渐都成了泡影，苏联国内出现了饥饿和粮荒，赫鲁晓夫开始抛售斯大林保存下来的黄金收购外国的发霉剩余的粮食打发苏联人的肚子，牛皮到处开始吹破，苏联的国际地位日落千丈地下降。可以制约的地盘越来越缩小，苏联进入了几乎是空前黑暗的内外交困的时期，人民和苏共广大的党员，开始明显地感觉到了行将亡党亡国的危机，于是，他们开始又想起斯大林的伟大，怀念起斯大林的伟大功劳来。

在这样的状态下，赫鲁晓夫能采取什么办法呢？他采取的得心应手的办法，还是力图打击斯大林，而力图抬高自己，他在更加咒骂鞭笞斯大林的时候，同时宣布他将让苏联人在1980年到来的时候过上完全富裕的，物质极大涌流的，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生活，于是，他在1961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抛出了这样的天花乱坠的纲领，以迷惑苏联人民的眼睛，是时，他下决心拆除能引起人民怀念和祭奠斯大林的斯大林陵墓，把斯大林从列宁——斯大林陵墓搬了出去，就在列宁墓后的旁边，又用推土机挖了一个深达十八米的大坑，然后把斯大林的水晶棺和斯大林的忠骸一同扔下去，然后浇筑水泥，进行了封闭，只是在这一片地上，又立了一个小小的朴素的墓碑，只写着一行字：斯大林墓。

赫鲁晓夫以为，从此，伟大的斯大林便将永不再成为令他生畏的形象，从此，斯大林的伟大形象，就会被他一劳永逸地淹灭掉了。

然而，这是可能的吗？

伟大的历史，什么样的魑魅魍魉有本事可以对其加以更改呢？

历史，只能是不朽的。

现在，一个远从天涯岛国来的年轻的伟大的革命家——切·格瓦拉，他在这个夏夜的夜阑沉静中，特意来到这伟大莫斯科的伟大红场，当他在这里漫步，他在列宁的陵墓外位立许久以后，他又来到了斯大林的墓碑旁，他不近不远地站着，他默立了许久。后来，他更走近一步，他伸手轻摸俄文写的“斯大林墓”的几个字时，他发现在斯大林墓碑的石墓上，安放着一束鲜艳俏丽的矢车菊。

切·格瓦拉在这里又默立了许久。

后来，他在红场上又长久地徘徊，不时地停下来，抬头仰望着克里姆林宫上空的主塔尖上的，那颗几乎为全世界人民熟悉和渴念向往的红星。

他一次又一次地仰望。

他久久的，久久的不肯离去。

后来，当他再次仰望着那宝塔上的闪闪红星时，正好有一团烟云从红星闪亮的上空飘过。正在这个时候，安德罗波夫提议请他结束散步，回到克里姆林宫内的苏共中央招待所休息。但是，切·格瓦拉宁肯耐心地等着那团罩在闪闪红星之上的烟云飘过，散开以后，他才终于同意结束这一番的散步，登上轿车，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他的心中的崇高的圣地一般的伟大莫斯科的红场，红星照耀的红场。

不吃素食的美国总统肯尼迪

苏联向古巴秘密运送重武器的船只，首先被联邦德国的军事情报机关发现，然后深入一步地进行了秘密的侦探和追踪遥测。

当联邦德国的情报机关，确信无疑地掌握了苏联向古巴运送大量重武器和军事装备的秘密后，联邦情报机关经过联邦德国政府总理阿登纳的批准，迅速把他们所掌握到的有关苏联向古巴运送重型武器的机密，提供给了他们的友邦，美国的同行。

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军事情报部门同时得到联邦德国情报机关提供的报告资料以后，美国中央情报局迅速加强了美国在古巴本土的派遣特务的侦察活动。

这些被派遣活跃在古巴本土上的派遣特务们，很快通过红外线夜视望远镜，侦察到了古巴封锁严密，戒备森严的军用海港码头，几乎在 1962 年的 8、9、10 月间的每天的夜晚，都处在一种纷乱忙碌的景像中。

古巴革命保卫委员指导下的保密协调行动，大量的调动军事警戒和民兵的武装巡逻，使活跃起来的，隐蔽活动的美国派遣特务，几乎靠近不了任何一个军事秘密港湾和码头，虽然这些美国的派遣特务，主要的，多数也还是古巴人，他们有的人原本就是美帝国主义走狗巴蒂斯塔政权的爪牙。他们有的人在古巴革命后逃出古巴，逃到了美国，他们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招募成为特务，在美国佛吉尼亚州美国中央情报局所在地经过严格的培养训练以后，作为浑身有特务解数本领的特工人员又派回到古巴活动，因此，他们能够相当成功地在古巴隐蔽下来。虽然他们被警惕的古巴革命保密措施封锁在一定的保密界限范围以外，但是，他们靠着相当先进的特工手段和工作器械，最主要的是红外线夜视望远镜。他们侦察到了在夜幕中，从军港里停泊着的苏联货船上卸下来的物品，又被运载能力在二十吨以上的载重汽车拖着，足有二十米见长的伪装严密的物体，开进了古巴岛上的秘密阵地，特务们进行了红外线摄影拍照。

这些特务把他们侦察到的秘密资料和信息，迅速反馈传递回美国佛吉尼亚州的中央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有关专家，立刻进行透视性分析，他们马上得出了苏联正在向古巴运送和装置中程以上强力导弹的结论。

但他们的结论，仍然是判断性质的。为了进一步确定这些情报和结论的正确性，中央情报局马上展开了最高层机器的运转，经过美国总统肯尼迪的批准，美国开始出动 U—2 高空侦察机，对古巴列岛进行贯穿性的侦察工作。

苏联把重武器，特别是把可以进行核打击的运载武器运进古巴，安置在距美国仅 90 海里之外的大门口，这对美国安全来说，无论怎么看，都是严重的问题，是重大问题。

因此，1962 年 9 月 4 日，美国总统肯尼迪亲自给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发送了一份总统函电，向赫鲁晓夫提出了警告，郑重警告苏联不得把进攻性武器运进古巴和在古巴设置阵地。否则，美国将作出必要的强烈反映。

赫鲁晓夫在接到肯尼迪总统的这封警告电报后，立刻给肯尼迪总统复电说，苏联将绝对不会向古巴运送战略核武器，保证不作给美国带来紧张，给肯尼迪总统带来麻烦的事情。

赫鲁晓夫信誓旦旦，言之凿凿。

也许，这就叫作是赫鲁晓夫的战术选择，叫做：兵不厌诈。

在国际生活里，像赫鲁晓夫这样信誓旦旦实行“兵不厌诈”的战术，实

在是空前的，因此当然也是极为危险的。

美国的情报专家，在认真阅读肯尼迪总统批转的赫鲁晓夫的复电电文以后，郑重建议肯尼迪总统对赫鲁晓夫的复电持严重怀疑的态度，并且同时建议不停顿地继续进行对古巴全岛的U—2飞机的飞行侦察。

肯尼迪总统是一个绰号被叫作是“枪骑兵”的总统。但是也是一个头脑冷静，视野广阔的聪明的年轻总统。当时的年纪只有四十四岁，风流倜傥，当美国总统正当得胜任愉快，相当机智和潇洒。

他的绰号所以被叫作是“枪骑兵”，不是指什么别的事情，而主要是指他的性攻击能力。他是一个对性攻击非常积极的美国年轻总统。当时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们曾经散布过这样的流言蜚语玩笑话，他们根据肯尼迪总统的前任艾森豪威尔总统是一个高尔夫球迷，而肯尼迪总统是一个性攻击的能手，所以，他们说过：在上一届政府时期，主要是为了高尔夫球工作，在这一届政府的时下，主要是为总统的性攻击工作。

对这样的流言蜚语玩笑，传到肯尼迪总统的耳朵里，总统不仅不特别气恼，反而总是报之一笑，全然不在话下。肯尼迪总统对性，实在非常热衷，而且也实在并不喜欢遮遮掩掩，他人长得十分帅气，而且特别机智、风趣、幽默而热情，所以对女性，也特具魅力，再加上他总是热情不懈的勾引女人，所以许多漂亮女人都可能成为他的猎物和俘虏。好莱坞著名的影星玛丽莲·梦露，是尽人皆知的肯尼迪总统的情妇，其实好莱坞另一个著名的性感明星珍妮·曼斯菲尔德，也基本上是肯尼迪总统差不多半公开的情妇，他还和其他许多女演员、红歌星、红舞星、飞机上的空姐，大饭店里的女服务员，白宫的女工作人员有染，有的妓女，甚至赤身裸体进出他在白宫里的总统办公室，即使如此，肯尼迪也并不特别引以为意。他喜欢经常与女性为伍和厮混，甚至他每到一处巡察和办事，他从来不限他的手下工作人员进行适当的性游戏，但是，在他们进行性游戏的时候，绝对不能忘记了给肯尼迪本人安排好这样的性游戏，不然他就会批评他的这些手下人了：“你们恣意玩乐，可是，你们怎么忘了给总司令也得准备好女人呀！”

肯尼迪在性方面，总是能玩得很恣肆、很开心的。只是在一个女人身上，他的功夫没有到家，没有追求成功，这个女人就是意大利著名的女演员索菲娅·罗兰，在美国迈阿密的棕榈滩，肯尼迪总统几次三番麻烦美国前驻古巴大使斯福罗·斯密斯给他和索菲娅·罗兰搭桥，但是总是遭到女方的断然拒绝。不过，尽管如此，肯尼迪也绝不对这个女人略有嫉恨。合则来，不合则不来，肯尼迪总统确实也还不以势凌人。

肯尼迪所以如此，大约与他还有一个比较开放的妻子，也是美国当时的第一夫人杰奎琳·布维尔·肯尼迪的开明不无关系。

杰奎琳明称杰基，和富家子弟出身的肯尼迪一样，也是来自大家的闺秀，性格外向甚至流于乖张，但身段脸蛋都宛若天仙，堪称十分美丽漂亮。她喜欢打网球，喜欢在有鲨鱼出没的大海里游泳，有的时候也喜欢狂放豪饮，喜欢只穿着三点式的遮拦物，光着脚丫赤着脚板大跳扭摆舞，据说她的情人也相当不少，美国当时的国防部长，身材修长脸条俊俏的麦克纳马拉，身材健美的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将军，还有一位芭蕾舞演员尼鲁雷耶夫，一位歌星库克，也都与她关系密切而有染。

因此，既然她也如此这般，所以，她对她的丈夫肯尼迪总统成为“枪骑兵”式的性攻击能手，经常猎艳，也是甚不为意。有的时候，在白宫的寝室

里，女仆在整理总统的睡具时，偶尔发现一条黑色的丝质连袜裤，以为是杰基的物品，给她送过来时，杰基一看不是她的东西，她就会似乎毫不介意地再送给肯尼迪总统说：“还是你拿去转交这条连袜裤的主人吧，这不是我的尺码，你这杂种！”

当然，肯尼迪也就一笑，然后也不特别在意地把这条连袜裤收拾起来。

总之，美国这位四十岁刚刚出头的肯尼迪总统，和他的第一夫人杰奎琳，实在是两个非常浪漫而杰出的人物。他们的特色个性，确实具有许多惊世骇俗之处，但同时，他们在政治思想，头脑的聪明机智，性格的顽强方面。也还有着似乎是更多的共鸣和默契一致，在总统竞选，治理国家处理重大政治事务方面，他们总是相互一致，携手并进，全力以赴的，特别是，这一位总统和美国第一夫人，都不会因为他们非常热衷于性游戏而丝毫地影响了别的更为重要的事情。

肯尼迪，事实上一直是忠于职守，胜任裕如地坚守在他的美国总统的岗位上，在一定意义上说，他是个制定国家重大决策的大家，是一个处理重大政治事务和国际事务的头脑冷静的天才。

9月4日，当肯尼迪总统给赫鲁晓夫发出警告电报，并且当日即就收到这位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信誓旦旦的复电。当赫鲁晓夫的这一纸复电被美国的情报分析专家，立刻认定是一种骗局的时候，事实上赫鲁晓夫的这份假凤虚凰的诈骗电文，几乎也完全蒙蔽不了肯尼迪的眼睛。

肯尼迪不是再有什么犹豫，而是立刻又下达新的命令和指示，指示美国中央情报局进一步搜集情报，命令美国的高空间谍飞机，继续对古巴实行更为严密的全方位侦察。

于是，在赫鲁晓夫给肯尼迪复电，保证不把苏联战略核武器运进古巴的外交辞令许诺过的第二天，9月5日，美国的U—2高空侦察机，再一次掠过了古巴的上空。

应该说，美国人的嗅觉很灵敏，侦察情况的系统很健全。但是，也还可以说，古巴人和苏联人，干活儿的手脚也还是特别漂亮的。

他们就在美国人的眼皮底下干活儿，他们明显承受着美国佬的严密监视，可是，美国佬硬是看不清，看不到他们手脚干活的动作。美国佬硬是只听到辘辘把响，找不到井绳在哪里。

古巴人和苏联人秘密从海船上卸下导弹和其他武器装备，一切都在灯火管制的夜幕中进行，古巴革命保卫委员会有成效的工作，和古巴武装部队以及民兵的设防，硬是叫美国的派遣特务们，只能看到影，不能摸到踪，他们始终只能从远处观察，却永远接近不了，接触不到正在运进的导弹和正在建筑中的导弹发射场。由于一切都在夜间进行，而且伪装得十分严密巧妙，同时，也由于在白天的时候绝不进行任何施工，以至美国飞掠古巴上空的高空可以进行有效侦察的U—2间谍飞机，硬是很难发现在古巴列岛上已经动作很大的装置导弹的手脚。

但是，美国人干事情也相当执着，他们既然听到了辘辘把响，就一定不放弃找到井绳在哪里的机会。

9月17日、26日、29日，以及10月5日、7日，美国的U—2高空侦察机仍然不间断地，连续地对古巴列岛进行全方位的搜索侦察，侦察每一片山地，过滤每一片密林，拍摄下了长达几万公尺长的摄影胶片。

尽管古巴人和苏联人配合默契，一直在紧锣密鼓地卸下、运输和设场装

置苏联导弹，布置伊尔—28 轰炸机群，但是，时至 10 月上旬，美国的高科技侦察手段，仍然还是瞎子，仍然还是在古巴岛上找不到什么，查不到什么，发现不了什么异常现象。

赫鲁晓夫同志的保证也许是可靠的，是真的？

这样的闪念，在肯尼迪总统的脑海里一闪而过，但却马上便被完全的排除了。

肯尼迪命令中央情报局：U—2 飞机继续在古巴上空飞行侦察，继续加大侦察力度，在没有弄清楚结果时，绝不能停下手来。

于是，美国的高空侦察，依然在畅行无阻的继续中。

终于，这样的高空侦察，在 10 月 14 日的时候，突然有了极为惊人的重大突破性的发现。在古巴西部的比那尔德里奥省的圣安东尼奥角的近处的圣克鲁斯地区，美国的侦察飞机，终于清楚地发现了已经暴露出来的装置安装起来的进攻性导弹基地，挺直起来的苏联中程强力导弹，已经昂扬起头来，把瞄准的方向对准着美国。

美国高空侦察机，在这里立刻盘旋下去，来回的拍照和摄影，最少拍下了一千张清晰的照片，然后才平安返航，去汇报它的侦察结果。

这样的侦察结果，显然是吓人的，是惊人的。

美国中央情报局长麦科恩刻不容缓地行动起来。他拿着一大皮包资料和图象清晰的照片，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乔治·邦迪一起，疾步走进了坐阵等待他们到来的肯尼迪总统在白宫的办公室。

肯尼迪限定时间听毕麦科恩和邦迪的言简意赅的汇报。肯尼迪亲自审阅了不下十张 U—2 飞机在古巴岛上空拍摄下来的导弹发射场上导弹林立的照片。

肯尼迪只骂了一句：

“赫鲁晓夫是个骗子！是个无耻的骗子！他干得是明目张胆的挑衅，是对美国大国地位的挑衅，他是一个杂种，是一个蠢猪，蠢笨的俄国猪！”

肯尼迪很生气，很恼怒，但他并不暴跳如雷，一时没有任何慌乱和激动，他只是马上向乔治·邦迪特别助理下达清晰明白的命令：立刻向美国最高安全会议成员发出通知，请他们不得有误地参加定于 10 月 16 日上午 11 点 45 分开始的讨论美国国家最高安全利益的紧急会议。

这个会议理所当然地如期得以召开，参加会议的有肯尼迪最得力的高级顾问和参谋，他的亲兄弟美国政府的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接下来是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国务卿腊斯克，副总统约翰逊，中央情报局长麦科恩，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上将，负责拉丁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马丁，国防助理部长尼采，还包括美国政府的财政部长道格拉斯·狄龙。

这些人组成的会议，也是美国的最高防务会议。

所有人的发言，都是限时的。

肯尼迪总统让乔治·邦迪向与会者通报情况，并且向每个与会者散发了一套会议结束必须收缴的文件，文件装在精致的文件袋里，附有各种简略的背景材料和加有分析说明的图片资料。

由于肯尼迪总统认为这一次的会议的重要程度，可能会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临战状态最严重的会议中的一次，所以，他还特别邀请了美国老资格的政治家，曾经参与过二战以后美国最严重临战状态重大决策步骤的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的紧张气氛，由于它的高效率要求，在召开不到 30 分钟以后，就开始进入了沸点的状态，大家不是仍然讨论应对办法和措施，而是开始明确无误地表述各自的决策意志。

会议进行到又过了将近 30 分钟的时候，开始出现了两种决策意志的组合，以泰勒上将，国防部副部长助理尼采和财政部长为同一组合的观点，主张立刻对古巴实行不宣而战的“外科手术”打击，要毫不犹豫，毫不留情地行动起来。

而以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和国务卿腊斯克以及邦迪为一方的组合，却提出了可以首先试探使用政治解决、外交解决的办法会议只进行了不到 100 分钟，肯尼迪总统宣布散会，同时宣布在第二天，10 月 17 日的同一时间，接着召开第二次同样人员参加，同样性质的会议。

散会后，肯尼迪总统继续从容不迫的处理各种国家事务，他不急不燥，不慌不乱，出现在一些来访的客人和新闻记者们面前的时候，仍然乐天潇洒，仿佛若无其事，身边并不存在任何紧急要务。他甚至仍然在谈笑风生地与出入白宫的特别漂亮的女人们主动搭话，说着一些几乎是仅有热情而无紧要的话语。

然而，不管以往如何，今天的肯尼迪总统的所有这些表演，似乎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这就是：掩饰。

肯尼迪总统在“掩饰”这种伎俩的掩护下，事实上他是在进行着彻底的冷静的独立的思考。

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他知道作为美国这样一个伟大的现代化国家的总统，在处理国家大事，世界大事的时候，他必须是一个能够高瞻远瞩的，既不能举棋不定，又不能胡乱贸然走出臭棋和错步的棋手。他懂得他应该是一个并不平庸的高明的棋手。他下棋，最少还是能够想到三步棋之外，能够想到更长远一些的棋路的。

10 月 17 日，还是在前一天的同一时间，肯尼迪总统正式简称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执委会”，如期在白宫的保密措施异常严密的会议厅内，举行了第二次会议。

前一次会议上的两种决策意志的两种组合，现在出现了一个强弱的对比。采取以“外科手术”强硬立场观点的组合，现在占据了压倒的优势。

有一个据查可情的背景，给这种占压倒多数主张动“外科手术”突袭打击古巴苏联导弹基地组合者们，提供了强而有力的依据，这就是，根据美国确实核准的材料表明，苏联当时已经拥有的核弹头，充其量，不过三百枚。而美国当时已经现成的核弹头，是五千枚。五千对三百，正好是 17：1，这就是说，美国最少拥有十七次对苏联为目标的进行热核战争的机会，而苏联充其量，也只有一次。17 比 1，优势和劣势实在太明显了。显然的，如果进行一场热核战争的话，美国几乎绝对掌握着覆灭苏联的机会。

所以，既然如此，而苏联人又把他们的势力逼到了美国的大门口，美国人为什么不抓住这难得的战机大打一场呢？

肯定可以打赢一场大战的胜利的把握，激动和热昏着多数参加肯尼迪总统主持的“执委会”第二次会议的美国高级官员，他们主张大打出手，先下手为强的意志更坚决，建议也更坚决了。特别是美国的财政部长道格拉斯·狄龙；他已经进行了一番大体粗略的预算，如果这一场大战打起来，美国的财政肯定可以赢得再生的新生，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将军，这位

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败将，却知道即使在败战的战争年代，军人也只有战争发生的时期，可以处在历史和国家政治的中心舞台，为了渴望进入中心舞台充当表演角色，他也是主战的，他是坚决主张美国立刻刻不容缓地打击古巴的苏联导弹基地的。

不过，尽管在第二次的紧急“执委会”上，主张立刻开展打击，动“外科手术”的鹰派们，越来越占据了压倒的多数，集合起了更多的人马，但是，前一天主张政治解决外交解决的势力，也还没有退让，麦克纳马拉向主战派提供了大量的可以证明美国在一场对苏联的大战中占绝对优势的背景材料，尽管如此，他却仍然和国务卿腊斯克一样，宁肯属于少数，处在“鹰派”行列之外。

最后，在肯尼迪总统主持的第二次“执委会”上，平行地记录下了不属于决策决定的，仅供选择的六项方案，第一，继续静观事态的发展，进一步地掌握情况；第二，派特使出访赫鲁晓夫，秘密协商化解矛盾，了结此事；第三，向联合国提出对苏联的检举和控告；第四，封锁古巴海域空域；第五，实施空袭，对古巴的导弹基地实行空中打击；第六，向古巴全面宣战，举兵入侵古巴，彻底解决危机。

第二次“执委会”后，肯尼迪决定继续进行深入的独立思考。他决不为人左右地掌握着他的最高决策和最后决策的权力。

他越出了“执委会”的圈子，他更进一步地了解情况和了解实际，他要力求考虑到全部可能出现的可能。

他频繁地秘密召见美国的战略基地的司令官和战术基地的司令官，他要清楚明白地掌握各种情况，和各式各样的实际。

正是战略基地的司令官和参谋人员们告诉总统，一旦美国和苏联真正地触发了一场热核战争，不管美国和苏联的核弹头是17:1，还是1:17，结果在第一天的时候可能会是这样的，在这样的热核冲突中，第一天欧洲，当然以苏联为主体，伤亡的人数大约会是在一亿左右；而美国这边呢？当然是以美国为主体的，伤亡人数可能不会低于八千万人左右。

当美国的战略司令部的司令和参谋长们，非常平静而条理明了地告诉肯尼迪总统这个状况时，他们总是显得朝气蓬勃，年轻乐天的总统，几乎立刻满脸苍白，失去了血色，半天都没有说出话来。

接着，他在召见美国军队的战术空军司令问及关于空袭的一切可能性时，这些司令们几乎众口一词，告诉他们年轻的总统说：美国战术空军的作战能力，肯定将会是强有力的，但是，能否一举压倒和全部消灭敌人的反击力量，是绝对没有把握的。因此，美国任何的空袭和突然袭击，也必须甘冒被空袭和反袭击的报复，我们可以袭击敌人的任何目标，敌人也可以任意选择他们报复袭击的目标，既然是战争，就总是难以完全预测战争的结果。包括胜败，有的时候可能是长期的，永恒的，有的时候可能是临时的，短暂的，任何战争都往往会包含着一些令人永难解密的不解之谜。

肯尼迪总统倒真善于掌握着作为统治者最难于掌握的一种高超超绝的艺术：兼听的艺术。当然他还有着另一种独到的天份，真正能够天才地进行冷静的独立思考。

在高度紧张严肃的第二次“执委会”后，肯尼迪总统仍然在一定的“掩饰”的伎俩的掩饰下，仍然相对从容地进行了充分的必要的详尽的会外调查活动。

此时，肯尼迪总统开始在心底和脑海深处，逐渐成形地形成了他准备应付这场重大事件的横竖总谱。

10月19日，还是在前两次会议开始的那个时间，肯尼迪总统在白宫前两次会议的同一会场里，举行了第三次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三次“执委会”。

肯尼迪总统再一次一任“执委会”的两种观点组合的两派成员，各自充分地阐述他们各自的战略和战术意志。这一次，肯尼迪总统不限他们时间，让他们透彻地表述他们各自的思想、观点、见解和主张。

天才的，年轻的，有本事的美国总统一言不发，脸上没有任何倾向性的表情，坐在他很大的，高靠背的安乐椅上，腿脚高翘着，只是并没有这样的腿脚摆到桌面上来，但他似乎完全沉埋到了安乐椅内，紧紧地，牢牢地闭着他的嘴巴，合着两只平放在胸前的手，不停地拨弄着他的两只大姆指。

不限时间发言的“执委会”于是便如此这般开成了相当漫长道路的马拉松会。时间比第一、二次的“执委会”用去的时间，大约延长了不知多少倍，一直开到了这一天的深夜，直到大家终于口干舌燥，扯尽了话题，拖大家都精疲力竭，实在也没得什么好谈好议的了。这时候，肯尼迪总统终于冷冷地笑出了声来。他接着，正襟危坐起来，他把两只手抱成拳头，放在会议桌上，他目光炯炯扫射着与会的所有委员。他充分地显示着他的最高权威。

会议室里所有的人，一时都屏息起来，把目光投向了肯尼迪总统。

肯尼迪说话了。他的声音不是很大，但是也不是很轻，他的声音不管多么平直，却无疑包含着一种斩钉截铁的意味。

他说：

“好吧。我们决定和赫鲁晓夫，展开一场较量。我们要准备从现在起，展开这一场较量。”

总统的话语很有分量。立刻使全部参加“执委会”的老少成员，文武成员的心，都砰砰地跳了起来。所有与会的人，都急切想知道总统的最高决策，最后决策是怎样的。他说出来的较量，主要包含着怎样的内容，什么样的实质。肯尼迪总统的这一句话，好像完全可以关练着差不多是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的命运。

肯尼迪总统是决定进行一场美苏的严重对抗，进行一场足令举世皆惊和震颤的热核战争吗？

肯尼迪总统控制着他的冷静思维，控制着他语言表达的速度。

他接下来说：

“我们要充分地调动我们的实力。我们要作好一切战争的准备，包括进行一场殊死的热核大战的准备，一定要有备无患。但是我们同时要不懈地努力，要争取绝对地避免这样的大战发生，但是我们必须万无一失。而我们现在接下来将要全力以赴进行的较量，中心的目标、战略的目标，正是为着制止这样的大战的可能发生，制止热核战争的可能发生。而为此，我们必须把握和进行最坚决、最彻底的较量，同时也要有效地进行必须有效的较量，必须规定和达到我们规定的目标，我们必须赢得我们所必要的最终结果，为此，我们要准备付出代价，但是代价又是必须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我们将不抱过分的，难以期求和不可期求达到目标的幻想。我们必须赢得胜利，同时我们必须适可而止，我们在这场棋局，我们将只走五步棋，最多只走五步棋，决不多走一步臭棋。”

肯尼迪总统阐述着他的思想逻辑。他也懂得所有斗士们的武装，必须首先是思想上的武装，必须有清醒的头脑，正确地确定目标和正确地决定战法，以鼓起无往不胜的战斗意志和勇气。

肯尼迪总统讲明白他的战略思想以后，他开始阐明他的战略战术决策决定。

这位年轻的总统，真堪谓是一位美国的最杰出的艺术家，他肯定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在美国的国民中，曾经出现过的最为明智，最为聪明的人才中的一个。

他面对着他的智囊团，他的“执委会”参与重大决策的一大批有资格的老的少的有水平，有分量的人物，他开始像是蜜蜂采蜜一般采撷他们头脑、思想中的花粉，然后来酝酿成蜜。

肯尼迪没有让“执委会”鹰派们的人物，感到他们在一场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辩论中，落到了输的方面。没有。肯尼迪总统已经决定采纳他们主战的主导思想，肯尼迪总统已经作出了这样的决策：以主战的实力，来作为较量行动的基础。但是肯尼迪总统准备走出这样的第一步棋的时候，他准备仅此而已。只把实力作为一种基础，而不把实力即刻投入运转。

肯尼迪总统作出了这样的决定：首先不是对古巴和苏联导弹基地实行“外科手术”，而是采取对其封闭的办法。首先不施以空中打击和陆海方面的入侵，而是开始命令美国海军的 180 艘舰艇，在加勒比海海域环绕古巴领海环行，派遣 B—52 轰炸机群满载各类原子武器在古巴领空之外的空间 24 小时轮班不停地航行，并且马上调集包括一个装甲师在内的六个一级战备师的共约二十万陆军以及相当数量的海军陆战队，进入到毗邻古巴只有九十海里，一水之隔的佛罗里达洲的军事基地和港口，完全进入准备投入战斗的状态。

而在这样的决策基础和前提下，肯尼迪在决定对古巴实行严密封锁的同时，准备展开对苏联强有力的外交攻势。并且，试图最终达到以外交攻势取胜的目标。而肯尼迪的这一决定，又同样使他的“执委会”中被列为鸽派的人们，也没有落到在“执委会”决策辩论中输家的位置上。

实际上，肯尼迪天才地把他的“执委会”的全班人马都集合调动在他的大权之下，他志在必得，使美国人都成为赢家，而只使赫鲁晓夫丢人现眼，成为唯一的输家。

肯尼迪有条不紊地调兵遣将。一切都在高度绝密的状态下进行。

美国所为时已久迅速展开的紧锣密鼓的行动措施，一直不动声色，完全把苏联赫鲁晓夫之流全然地埋在鼓里，让他们几乎一点儿也没有觉察。

直到 1962 年 10 月 22 日之前，苏联方面还完全蒙在鼓里，完全不知道美国人已经不仅知道了，而且完全掌握了苏联在古巴设置导弹的机密。赫鲁晓夫们更不知道，美国人已经开始布置着可以令人窒息的巨大行动。

在 8 月末 9 月初，切·格瓦拉赴莫斯科，受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古巴最高领导机构的派遣，作为古巴最高领导机构，同时也作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全权代表，在莫斯科就苏联在古巴设置导弹、战略轰炸机和鱼雷快艇的军事合作协定，在草签协议稿的基础上，进行修改条文的谈判。

这个谈判，在不愉快的，甚至是剑拔弩张的气氛中开始的，同时，也是在更为不愉快的，甚至是更为剑拔弩张的气氛中结束的。

切·格瓦拉在谈判中，忠诚地，坚决地坚守着，表述着古巴最高领导机构决定持有的态度和观点，这就是，关于在古巴设置的苏联导弹，飞机和快

艇的控制权和指挥权，在联合司令部的协调下，古巴最高当局和总司令，不容置疑应该拥有对这些军事设备和军事力量的统辖权和统帅权，否则，势必就会产生出这样的不合理的逻辑：苏联控制设置在古巴的导弹，而设置在古巴的苏联导弹控制着古巴，也就是说，苏联的武装力量如果在古巴不受古巴当局的控制，那么古巴当局自然地就被苏联的武装力量控制了，这是古巴方面决不能接受的。

切·格瓦拉坚决坚持着这样的原则性的谈判，从第一天与赫鲁晓夫针锋相对地开吵，后来接着又整整吵了一个星期，又和米高扬吵，和苏斯洛夫吵，和马利诺夫斯基吵。切·格瓦拉以一当十，舌战群儒，决不妥协，无所畏惧，志在必得，坚持着他的战斗任务、谈判目标。

可是，光吵有什么用呢？

赫鲁晓夫也还是有头脑的。

问题是他的头脑有的时候就确实是太简单一些了。

一开始，他只考虑着这一着棋好：在古巴布置苏联导弹，这一着棋一旦走出，他相信他就可以完全取得古巴领导人的信任，进而就完全可以控制着古巴领导人了。他从一开始的时候，也许就从未想过，这苏联导弹设置在古巴岛上受不受古巴领导人指挥节制的问题。他肯定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样的第二步棋该怎么走。然而，现在轮到该走第二步棋了，他就该被“将”住了。怎么办呢？苏联设置在古巴的导弹、核弹头，真的能交给古巴领导人来控制，驾驭和指挥吗？

赫鲁晓夫有把握这样放手吗？

显然，他没有这种把握。

他已经尝试过了，他已经最少有一次期望控制古巴革命领导人的图谋，是完全失败的。

因此，他怎么可以认为他能够控制得了古巴革命领导人呢？

无论如何，他不敢那样认为。

而如果没有能够控制古巴革命领导人手段和能力，他把在他看来是极为危险可怕的家伙，完全信任地，放心地完全交托到古巴人手上，他不是立刻犹豫了，而是立刻感到胆怯了。

他现在才想到原来走完一步棋，还要接着走第二步棋才行，否则，一盘棋怎么能下得下去呢？

可是，他如果按照古巴人的意愿，他再走出了第二步棋的话，第三步棋又怎么走？如果古巴人真的和美国对峙起来，干起了仗来，那该怎么办呢？

这时候，赫鲁晓夫才想到了第三步棋还有个对美国的问题，这时候他才想到了这盘棋如果走下去，将如何与美国对峙，如何与美国准备干仗的问题。

这可不得了！

赫鲁晓夫想也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

赫鲁晓夫由于他的愚蠢、鲁莽，他在他头脑发热的轻率的举措决定中，他显然已经陷进了一个无法拔腿的烂泥污沼泽地上的怪圈。

他害怕古巴革命引发世界大战，因此要千方百计地控制古巴革命领导人，为了达到控制古巴革命领导人的目的，他轻率提出把导弹安装到古巴列岛上去，以期取得古巴领导人的信任，进而加以控制，然而，现在，苏联的导弹和重轰炸机安装到古巴去了，古巴领导人仍然警惕地拒不接受苏联的全面控制，而且反过来又提出了控制苏联武装力量的要求，而这样一来，理所

当然，就又把赫鲁晓夫更逼到一个他本来力图躲避的深渊的边缘上这样，赫鲁晓夫就又不干了。他目光短浅，但却也还坚决不肯干失算的事情。

所以，他在亲自领导苏联代表团和切·格瓦拉的谈判中，他死磨硬泡，拐弯抹角，调动人马，与切·格瓦拉轮番对阵，唇枪舌剑地你来我往。

切·格瓦拉看透了这样的谈判一时不能解决问题，而只能无谓地浪费时间，因为使谈判破裂也是完全不可能的。于是，切·格瓦拉和国内经过联系，和菲德尔有过信息互通以后，就宣布和苏联方面暂时中断谈判，暂时也不最后签署协定，而把问题搁置起来，拖延时间，以期慢慢再待时日进行充分的协商得以最终解决。

这样，来到莫斯科仅只一周时间的切·格瓦拉，就不得解决问题，无所重要收获，但已作出了充分的努力和工作，对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形成了一种“将军”的棋势，然后就离开了莫斯科，赶赴捷克斯洛伐克，看望正在那里接受培养和训练的古巴飞行员去了。

切·格瓦拉离开莫斯科以后，尼·谢·赫鲁晓夫和苏共其他领导人、军界首脑，又进行了进一步的磋商。他们总结了与劳尔以及格瓦拉谈判的经验，他们决定，还是把导弹与军事设备，加紧运进古巴，加紧在古巴设置起来，到了一旦生米煮熟饭的时候，再和古巴领导人协商讨论指挥权和控制权的问题，到了那时候，既然苏联的导弹、飞机、快艇和武装力量已经集合在那里，控制权的讨论，自然也就可以是一个永远实际掌握在苏联人手中的而对古巴人却是永远可以沉寂在马拉松谈判争论中悬而不决的问题了。

赫鲁晓夫也会掌握小九九，打好小算盘的。

于是，苏联人，便一直怀着满肚子的如意算盘，赶着时间，拚着进度，拚命地使着劲儿，加紧把42枚巨型中程导弹，和伊尔-28轰炸机群，运进古巴，开进古巴，接着把“蚊型”鱼雷快艇也弄进了古巴军港。苏联人一时热情奋发，得意洋洋，以为他们在走着制胜绝招的一步高棋。

然而，苏联人，这里指的苏联人，主要是指尼基塔和他的伙伴们，正是他们在1962年秋天最为得意忘形的时候，忽然就在10月22日的这天，在他们的头顶上，猛然间响起一声晴天霹雳。

这一日，是一个星期一的一天，刚刚经过一个星期日的休息。苏联驻美国华盛顿的大使馆，在刚刚上班的时候，就收到了美国国务院腊斯克国务卿将在本日的下午五点三十分准时召见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的通知。

多勃雷宁是苏联驻美国大使馆履职多年的老资格的外交官，腊斯克召见他的事，是经常有的。所以，在接到通知后，他没有感到应该向莫斯科报告什么，只准备在召见之后，知道有什么样的事情以后，再向他的国家和政府报告。

但是，尽管如此，多勃雷宁大使还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在美国国务院规定召见他的那个时刻，准时地来到了美国国务院的外国大使会见厅。

多勃雷宁大使尽管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进入大厅的，但他进入大厅时，仍然是从容地迈着款款的方步，仪表不俗，神态雍容地走进来的。

然而，仅只很短一段时间过去以后，多勃雷宁大使从召见大厅走出来时，他面色如土，仿佛是变成了刚刚在拳击台上被打倒在地，满脸青紫而神情沮丧的吃了大败仗的拳手，他禁不住哆嗦的嘴巴，显然是扭歪了。

这位大使走出美国国务院的办公大厦，惊慌万状地赶忙钻进他的伏尔加牌轿车。急忙命令司机启动车轮，赶快向着本国使馆大厦飞奔。

35 分钟以后，当多勃雷宁回到苏联使馆，启动最机密的应急电话，直接要通莫斯科的尼·谢·赫鲁晓夫的电话，开始哆哆嗦嗦，差不多是完全前言不答后语，语气急迫而慌乱地向苏共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直接报告腊斯克国务卿在紧急召见中提出的强烈抗议照会时，赫鲁晓夫在接电话的那边，好像想说一句“ 亲爱的人，多勃雷宁同志，您是害上了虐疾病了吗？”赫鲁晓夫似乎还想说出这样一句玩笑的话，可是，当他终于听清楚多勃雷宁忽然向他说出什么样的话来后，赫鲁晓夫似乎也哆哆嗦嗦起来，他几乎像一时变成了聋子似的，急忙向多勃雷宁喊着：

“ 什，什，什么，多勃雷宁，你再说一遍！多勃雷宁，你再说一遍！”

赫鲁晓夫开始在紧急启动的加密电话上喊个不停。

而就在同一时刻，美国政府通令美国的本土和国外的一切广播电讯机构和电视网络，一律停止一切其他节目，而来转播肯尼迪总统正在他在美国白宫总统办公室向美国全国和全世界发表的讲话。

肯尼迪总统明白而简要地说明了苏联把核导弹运进并设置在古巴岛屿上的事实；

肯尼迪总统宣布了尚不意味着宣战的对古巴列岛实行“ 隔离措施” 的决定；这虽然并非正式宣战，但明白无误地表明美国军事力量已经投入到了临战的状态；

接下来，肯尼迪总统明确指出：从现在起，从古巴发射的任何导弹，将被认为是苏联对美国的战争攻击，美苏即将进入完全的战争状态。

因此，为了避免一场世界热核大战的发生，美国的既定目标是，赫鲁晓夫必须完全放弃他们准备统治世界的方针，否则，一切严重的后果，责任都在苏联方面。

在肯尼迪总统向全美国、全世界发出这样的内容明确，态度强硬的讲话的时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科勒，同时把一份美国的强烈抗议照会的外交电报，送到了苏联外交部。

一时间，整个苏联和美国，似乎已经跌到了一场基本上是一触即发的热核大战的边缘。

明显的，赫鲁晓夫已经把这场火，玩得太大了。好像世界就要进入末日了。

然而，这时候，第一个发抖的是他，第一个抖颤的再也站不直身子骨的也是他：尼·谢·赫鲁晓夫。

怎么办呢？

赫鲁晓夫一时完全吓傻了眼。

怎么办呢？

他完全说不出话来了。

他连他在莫斯科列宁山上的他的豪华别墅般的家室，他都回不去了。他开始居住在他在克里姆林宫内的办公室里，吃住都在这里，艰难地度过以后一连许多个令他头皮发麻，满身心悸，手脚冰凉颤抖不停的日子。

他完全不曾料想到在古巴设置苏联导弹，会如此严重地招惹了美国人。他完全没有预料过，美国人还会来这一手，因此，在接下来的一些日子里，他只能是处在了一种完全手足无措的慌乱中，好像他真的已经面临着了可怕的深渊，可怕的灭顶之灾。

格瓦拉出任西部前线最高指挥

苏联火箭部队古巴分遣兵团司令别尔乌金中将，第一次见到闻名已久的切·格瓦拉少校，是在一次苏军运输车队，运送最后几枚巨型导弹和其他一些重要装备，从哈瓦那省的某一秘密军港开出，向着正在最后建筑起来的位置在比那尔德里奥省圣安东尼奥角附近不远的圣克鲁斯基地在一次暴风雨袭扰后行进的途中，在遇到公路上山体重大的塌方事故，车队被严重受阻的情况下，这甚至是在一个紧急关头的时刻，别尔乌金中将和切·格瓦拉少校不期相遇了。

这正好是在 1962 年 10 月 22 日的午夜以后，在 23 日的黎明拂晓行将到来之前。

10 月 22 日，古巴革命保卫委员会的情报监听电话，几乎就是在这天下午的 6 点 25 分，在美国总统肯尼迪就在那个时刻发表关于苏联导弹设置在古巴的强硬声明讲话的同一时刻，他们收听记录了讲话的全部内容。

这是极为重要的情报信息。

劳尔·卡斯特罗这一位古巴武装力量部的部长，革命保卫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其时不在哈瓦那的武装力量部的办公大楼，也不在革命保卫委员会的戒备森严的总部大楼，当时，他正在古巴东部的奥连特省奥尔金海岸地区，视察那里的海防设施和海岸炮兵部队，因此，他不在哈瓦那。

但是，革命保卫委员会监听电台收录的来自美国的重要情报信息，还是在最短的时限内，通过非常健全的渠道，送到了古巴革命部队的最高总司令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手里。

在 1960 年以后，美国已经和古巴断绝了外交关系，因此，美国在哈瓦那，古巴在华盛顿，都不再设置外交使馆，因此，自然的，美国也就不会召见什么古巴大使，自然也不会对古巴发出什么抗议声明和照会。

所以，古巴领导人得到来自美国的情报信息，只能是通过监听电台的记录。

得到革命保卫委员会监听电台的重要报告以后，菲德尔·卡斯特罗并没有立刻引起任何惊慌，他的头脑依然冷静如铁，他当然已经立刻判断清楚了正在发生中的严重事态，他立刻请塞莉亚·桑切斯马上亲自打电话通知在哈瓦那的古巴革命最高领导核心成员，马上紧急集合到古巴总统府的革命宫来开会。他布置完这样的通知后，他坐到一台高功率的收音机前，拨定出一个最清晰的美国电台，他又亲自收听了一遍关于肯尼迪在白宫讲话的新闻播报。

在这一个晚间，在肯尼迪从 6 点 35 分钟开始在白宫美国总统办公室向全美国、全世界发表关于苏联在古巴设置导弹的抗议声明讲话以后，美国的新闻广播电台和电视网，完全把美国的天空炒成了一锅肯尼迪声音的粥，你随便拨到哪一个美国电台，重复的几乎都是肯尼迪的声音。

当然，菲德尔·卡斯特罗听到这样的肯尼迪的声音以后，他当然知道紧急的情况已经发生，当然知道情况已经发生和接下来可能发展到何等的严重状态，他完全判断清楚了局势，古巴事实上已经处在了一种严重的临战状态的局势中了。

但是，尽管如此，无论如何，菲德尔·卡斯特罗没有惊慌。他不会惊慌。他绝不可能像远在一万三千里之外的赫鲁晓夫一样，一听到肯尼迪的声音就发抖，一听到肯尼迪的声音就惊慌失措，几乎立刻就吓散了架子。

卡斯特罗是绝不会如此的。

不过，卡斯特罗虽然不会惊慌万状，但他却也不会不马上在严重的事态面前，迅速地采取紧急而有条不紊的断然行动，不会不在突发事件的突然到来时，采取必要的在沉着冷静的前提下的果决应急措施。

在总统府的革命宫。菲德尔·卡斯特罗是从哈瓦那正在卸下从中国运来的大米港口上，坐着他的奥斯莫比尔轿车，飞速赶回这里来的。

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总统本来已经在这里。

接着，切·格瓦拉也从哈瓦那远郊之外的一家新建的，今天正在试车的制糖厂，亲自驾着他的吉普车，而他的警卫员和司机坐在首长的位置上，迅速飞驶赶回了这里。

远在数百公里之外的劳尔·卡斯特罗也接到了速归哈瓦那的通知。但是他不可能马上飞速地赶回到这里来。他还需要些时间才能赶回到哈瓦那来。

因此，现在，在总统府的革命宫，最高领导核心的紧急会议，只能在劳尔缺席的情况下，开始进行了。

在会议的开始前，菲德尔·卡斯特罗请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总统从现在开始，加强和保持与苏联驻古巴大使馆的联系。

多尔蒂科斯总统已经几次打电话，亲自与苏联驻古巴大使阿列克谢耶夫通话。多尔蒂科斯总统告诉阿列克谢耶夫，古巴领导人希望能及时听到从莫斯科传来的信息。但是，阿列克谢耶夫告诉多尔蒂科斯总统说：除了他们大使馆也只是从美国的广播中听到了关于肯尼迪讲话的信息之外，还没有收到过来自莫斯科的片言只字和任何一点儿声音。

“怎么办呢？”

在革命宫，坐下来主持最高领导核心会议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沉着冷静，一如平常地环顾左右。只是，他点燃起了又粗又长的雪茄烟，现在增多了一些吸入口内的频率，同时，他现在也在眼前，摆好了一杯好黑的浓咖啡。他要的这杯好黑的浓咖啡，是不要加糖的。

“怎么办呢？”

卡斯特罗轻轻的，仿佛是在自言自语，他是在问自己，还是在向他的战友发问？

切·格瓦拉说：

“菲德尔！，没有任何别的办法。你曾经不止一次，甚至是千回万回的说过，我们不能靠任何神仙和上帝。没有救世主。我们自己的事，只能靠自己，还能有别的什么办法吗？我想是不会有的。”

菲德尔·卡斯特罗抬起头来，他们目光如炬地盯着切·格瓦拉。

切·格瓦拉的炯炯目光，也是如炬一般地盯着菲德尔·卡斯特罗。

他们俩个人的目光，完全交汇在了一起，简直是开始了一种完全是深刻共鸣和感应的交汇流通。

多少年了，从 1955 年在墨西哥城的那个 7 月的夜晚开始，菲德尔和格瓦拉，他们两人的目光，如果交汇在一起，似乎就会立刻产生一种奇异的热流，或者说是奇异的电流，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奇异的脑电波，几乎就会差不多是有形的，非常激荡的交通和流汇，那中间包含着几乎是无限的语言也不能表达或难以表达清楚的感应和共鸣，他们相互共鸣的目光，也许在一刹那间，便会交汇和流通千言万语的语言。

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的思想信息，脑电波频率，也许实在是

太吻合、太默契、太一致了。他们的思想信息，他们的脑电波，几乎总是吻合共鸣默契地在一起，几乎总是不会出现距离和差异的。

切·格瓦拉，在8月末，领衔受命，肩负着重任重托，代表古巴革命最高领导核心，代表非德尔·卡斯特罗，出使莫斯科，在莫斯科展开了完全料想不到的，完全不会有任何可以期望结果的艰难艰巨的谈判，后来在不必导致谈判完全破裂又不得不中断谈判的情况下，切·格瓦拉经过国内同志们的同意，决然中断了在那里不可能很快取得满意结果的谈判，然后就匆忙地告别莫斯科，离开苏联，赶赴捷克斯洛伐克，去看望视察那里正在培训中的战斗轰炸机飞行员，同时，到那里考察一些古巴准备从捷克斯洛伐克进口的机器设备，但是，他在布拉格并没久留，办完在那里该办的事情之后，他便又昼夜兼程地返回了古巴。

其时，古巴国内一派紧张繁忙的景象，国家建设，人民群众劳动生产忙，到处都在突击生产，突击建设，古巴人民不可抑制在意气风发的激情中，努力创造着完全可以自力更生的一切条件，各条战线，都在齐头并进，都在突飞猛进，而战备事宜，理所当然，也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上，积极地，非常紧迫地加紧进行。

因为，刚刚在一年多一点时间以前，美帝国主义已经组织过一次几乎是海陆空并进的雇佣军对古巴的大规模入侵。这就是所谓的猪湾事件。但是，在那次事件和那次入侵中，美帝国主义和他们的雇佣军，遭到的是完全的，彻底的，最可耻的失败，一千数百名雇佣军和近百艘舰船和还有不少的作战飞机，被卡斯特罗指挥的古巴军民，只用了72小时的时间，就完全彻底地消灭了个干干净净，古巴人那真是打出了二十世纪世界各个战场上可以比较的最为奇观的漂亮仗，那可真是对美帝国主义羞辱最为严重的一次教训，也是最令美帝国主义悲哀沉痛威名扫地的一次教训。

在那样可耻的惨败发生以后，自认为是全世界无可匹敌的世界宪兵，老大帝国的美帝国主义，能够完全地，老老实实地蒙受羞辱，甘于接受他们的失败吗？显然，那不可能是美帝国主义的个性和脾气。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才有可能终止他们的再捣乱，而只要现在美帝国主义还真实地，而且也确实是强大而不可一世地存在着，那么，它的捣乱，它的压迫和欺诈，他们的侵略和暴行，就总是可能随时发生的。

猪湾事件发生后，美国的国会通过决议案，叫嚣绝不允许古巴革命政权在加勒比海地区存在下去。美国总统肯尼迪和他的第一夫人杰基，在迈阿密欢迎从古巴释放归来的雇佣军战俘时，也公然作出允诺，美国政府终归会有一天，要使这些从古巴释放回来的雇佣军喽罗们再重返古巴，而最终成为古巴的主人。

因此，美帝国主义亡古巴革命之心不死，它是一直把侵略战争的威胁，差不多是由来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强加在古巴人民的头上的。

所以，古巴，革命的古巴，不可能，也不得不，在紧张繁忙的国家建设的沉重劳动的同时，进行着必须加强的战备活动。

作为古巴国家的经济生活的最主要的大管家和当家人，作为古巴工业部长的切·格瓦拉少校，同时他还是古巴经济建设计划委员会的主席，古巴的一切建设和经济生活，都是他主管和必须关心备至的工作范畴。而同时，作为古巴革命最高领导核心的成员，作为菲德尔·卡斯特罗最得力的左右手，他随时都可能肩负起最高领导机构和卡斯特罗交付给他的一切更为重要的和

特殊的使命，去挑起一切更沉重的担子，去完成更为艰巨或艰险的一切任务。

切·格瓦拉从莫斯科、布拉格回到古巴，回到哈瓦那以后，他向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古巴革命最高领导机构的成员们，汇报和介绍了他的莫斯科之行以及全部谈判过程和全部谈判情况。

他谈到了他完全没有达到谈判目标的谈判情况。

菲德尔·卡斯特罗高度评价了切·格瓦拉出使莫斯科所进行的全部艰巨的工作。菲德尔·卡斯特罗甚至指出，切·格瓦拉出使莫斯科所要完成的工作任务，是只有切·格瓦拉才能够愉快胜任的。菲德尔·卡斯特罗胸怀广阔，目光大度，他在评价切·格瓦拉在出使莫斯科进行谈判的工作中，虽然没有达到期望达到的谈判目标，没有把这样的目标用文字的形式确定下来，但是，在实质上，在无形中，切·格瓦拉事实上已经非常完美地，非常漂亮地完成了他的使命，而且是再好也不过地完成了使命。菲德尔·卡斯特罗指出，切·格瓦拉在赫鲁晓夫同志面前，毫不畏惧，了无怯色，绝不退让，明确无误地声明和指出古苏两国在导弹设置等一系列军事合作协定中，必须平等而又独立存在的古巴主权，强调了这种平等独立的主权存在的地位，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对苏联可能凌驾于古巴主权之上的控制权的一种明确无误的否决，从这个意义上讲，切·格瓦拉出使莫斯科，虽然没有签定目标明确的文字协议，但是谈判本身已经实现了既定的目标。

菲德尔·卡斯特的这个结论的评价和认识，是非常了不起，非常英明的。

而正是基于这样的结论和认识，在切·格瓦拉归来后，在进一步研究如何实施苏联导弹、飞机和快艇在古巴设置的军事合作协定时，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以及劳尔·卡斯特罗，他们很快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不管在那一份协议中，都没有存在过苏联可以节制和指挥古巴的条款。因此，尽管在草签的协议上，有苏联设置在古巴的导弹，由苏联军事技术人员指挥、管辖，操纵和使用的条款，但是，这不妨碍在古巴主权国家土地上活动的所有苏联军事人员和技术人员，受古巴一切国家法令的约束，包括他们接受古巴国家领导人对他们发出的全部指令，因为古巴是主权国家，古巴不是苏联的军事基地，因此，一切合理的程序只能是这样的，不应该，也不可以是另外别样的。

这个共识和认识很重要。

有了这样的认识和共识，古巴革命领导人，就完全可以更为自觉地，清楚明白地节制和把握苏联设置在古巴的军事装备和武装人员了。

无可置疑，菲德尔·卡斯特罗，作为古巴武装力量的最高总司令，他可以对包括所有援助古巴的苏联军事力量的全部属于古巴的军事力量，含有绝对地发布任何必须坚决执行的命令的权力。

这将是十分明确的。

这将是十分明确的确定着的。

而有了这样的明确的确定，卡斯特罗事实上便开始发布着这样的，完全有据可依的，一条又一条的命令，这些命令，在向古巴各武装力量和部队下达的同时，理所当然地也下达到了苏联进入古巴领土援助古巴进行防卫战备工作的所有苏联军事人员。

无可例外，苏联火箭部队驻古巴分遣兵团司令部，自然也收签收到了这样一些可以遵循行事的命令。这样一些指示明确的命令，有的是属于在必要

条件下投入战斗的预设性命令。在后来古巴形势发生急剧骤变的时候，这样一些预设的命令，起到了极为关键的，重要的制敌作用。

不过，下达不下达明确的指令和命令是一回事，执行和不执行命令是又一回事。

古巴领导人，特别是卡斯特罗和格瓦拉，深深地懂得和明白，下达正确的命令，需要指挥英明的统帅，而执行正确的命令，也还必须是有觉悟的战士，没有觉悟的战士，是不会有执行命令的热情和勇敢献身精神的，所以，在进行任何系统的组织工程中，进行深入的政治思想工作，是至为必要的。

古巴革命在从开始走向胜利的过程中，它的聪明而杰出的领导人们，不仅很快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学会了指挥武装斗争的军事指挥艺术，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很快学会和掌握了政治斗争和政治工作的领导艺术。古巴革命由于政治工作的开展和加强，保障了古巴革命胜利的进程。而在古巴革命赢得政权，赢得胜利以后，古巴领导人从来也没有忽略过进行有声有色的政治工作。

在这一方面，菲德尔·卡斯特罗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是一个非常天才的专家，他几乎是一个天生的宣传鼓动专家，在最杰出的演说家们行列里也属最出类拔萃的人物。

他非常具有学识，他特别善于学习和思考，他像酷爱垒球运动，酷爱游泳捕鱼，酷爱拳击和排球运动一样，非常酷爱博览群书，他读的马列主义著作几乎已经穷尽，世界上一切有才智的人的著作，几乎都是他涉猎的范围，因此，他实在也知多识广，具有透彻分析问题的能力，具有全面观察问题的目光，而且对于任何复杂错综的事物，他都不乏进行准确描述详尽表达的词汇。

因此，只要是需要他前往演说的场合，凡是需要他宣传鼓动去的地方，他都从不拒绝，他都绝对不会不去，绝对不会放弃这样的宣传鼓动机会。

所以，他一般的不拒绝被新闻记者采访。

不过，他一般的不会热衷于见到专门的摄影记者，一见到这样的摄影家，他往往会说：“你们要照美男子的照片，可以去找切或劳尔，他们俩都比我漂亮。”但是他在这样作出选择的时候，他又特别不拒绝会见电视摄影记者，而且，他甚至特别愿意到电视台去，接受任何的电视现场采访，而且，这样的电视采访，他并不要求任何记者在开镜给他录相录音之前，向他提供任何回答问题的备忘资料。他完全不用这些东西，他脑子里有一部很好的词典，有一部很好的电子计算机，有一部连英国的大百科全书也不一定能赶得上的包罗万象和各种知识资料的百科全书，他可以在现场请任何记者提出任何问题，他特别不怕任何难予回答或者难予启齿回答的刁钻问题和古怪问题，他最最不乏的是他的辩论才能和他的无穷的机智，只要站在任何可以讲话的宣传话筒旁边，他可以手中不拿任何讲话稿或者别的任何文件，娓娓道来，有条有理，绝不同义反复地进行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甚至四至五个小时的，令人听来振奋，令人听来兴趣盎然的，具有透彻说服力的讲话和畅谈。在电视直播中，他也绝对与此同样，永远不会有怯场或者思维阻断和语滞语迟的时候。

而因此，他的讲话，他的宣传讲话的声音，总是围绕在古巴的空间，总是传播在人们的生活中，菲德尔好像总是和大家在一起，他好像总是在呼喊

着：“一二一，起步走！”带领着古巴革命人民，步调一致地向前进，向前进。

由此可见，菲德尔·卡斯特罗，实在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最热情的宣传家，他无疑是完备的宣传鼓动大师，在这方面，他实在是非常杰出的。

除了卡斯特罗以外，古巴革命领导人中，也还并不缺乏在宣传鼓动方面，也就是在政治工作方面，思想工作方面同样杰出的人物。

切·格瓦拉当然也就是一个。

他的特长更多的是舞文弄墨。在革命领导核心里，他主管和负责宣传鼓动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这是尽人皆知的。他喜欢办报办刊，他到哪个部门工作，都要创办报纸，创办刊物，在马埃斯特腊山区还在打游击的时候，他就创办手抄体的小报、抽印小报，创办无线电广播电台，后来他到古巴国家银行工作，他创办了《古巴金融》杂志，他到工业部工作，创办了《我国工业》，他兼任古巴武装力量训练部部长，这是相当于古巴军队总政治部主任的位置，他在这里又创办了《绿橄榄树》《波希米亚》等综合性刊物和文艺刊物。

他大量地写文章，什么内容的文章都有，归总的内容都是积极的，健康的，向上的，绝没有无病呻吟，而且绝没有粗制滥造，为了写好一篇文章，他好像是干任何一件工作一样热情而专注，长长会通宵达旦，彻夜不眠，以至，菲德尔·卡斯特罗不只一次，在深夜以后，走到他挑灯夜战的窗下，看着他全神贯注的学习和写作，那么聚精会神，那么专注，以至连心疼他的菲德尔·卡斯特罗都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定，拿不好主意，不知是该催他去休息，还是万万不该打断他的思路。

切·格瓦拉写的不管什么文章，都好看，都好读，首先一般都比较短小，即使谈根复杂的问题，包括谈重大的哲学问题，政治问题，他也尽量不把文字写得太长，尽量做到鞭辟入里，明了透彻却又言简意赅，往往即使意味深长，也只不过点到为止。

他写文章好看好读的第二个特色，是思想深刻而又总是充满了激情。他永远不用干巴巴的官样文章那样的臭瘪三文字，也永远不会像教师爷说教那样的居高临下地说教和教训人，他总是以他的文章代替分送给人们的花束，他给人们的花束里，总是充满着最新鲜的绽开的鲜花的幽香和芳菲，他写的文章，有的时候好像是人们在沙漠里行走，正在你干渴的时候，他双手合十给你捧来了一捧晶亮的清泉。

人们如果读切·格瓦拉的文章，你会听到他的心跳，你会听到他的脉流的激流回荡的声音，你会听到什么叫真正的伟大的纯洁的信息，你会听到什么叫真正的诚挚和善良的情愫发出来的回响。

读切·格瓦拉的文章，你抑制不住会感到他人格的亲切和美好，你抑制不住会热爱他，向往他，把他引为朋友，把他引为亲人。

切·格瓦拉的文字充满了激情，像诗。

他写的信，更是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最独特的诗行。

格瓦拉在他身居要职，作为古巴革命领导最高核心成员的时候，他最少身兼十个以上统管全国的非常重要的实质性的职务，他有的时候，简直忙极了，工作繁杂，负担沉重，他经常没有享受家庭生活和热爱妻子儿女的权利，这些权利总是被他的繁忙的工作剥夺了。他有爱妻，他的爱妻阿莱达·马尔奇又健壮，又漂亮，而且贤慧温柔极了，是切·格瓦拉不折不扣的贤内助。

他们的爱情的结晶，他的亲爱的孩子，一个又一个，像绽放的鲜花，比任何鲜花都美丽，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他们的孩子都比鲜花美丽，因为他们都比鲜花更可爱，更能动人。遗憾的是，这样的亲爱和动人的时候并不能常有，切·格瓦拉经常不会有时间回家看望他们，不能看望他们的母亲，不能看望他们兄弟姊妹。以至他的小女儿小阿莱达也会总是不无报怨地对他说：“爸爸，我们见你的时候，比你的警卫员叔叔见你的时候少多了。爸爸，我们可是你的孩子呀！”

切·格瓦拉热爱家庭。

切·格瓦拉热爱妻子。

切·格瓦拉热爱他的孩子们。

可是，格瓦拉的爱心，他还包容着更为广阔的方面，在他那个有着严重哮喘病的并不特别魁梧发达和健壮的身躯里，他包容着更大的爱心和更多的关心，当他处在他作为古巴革命的最高领导人之一的位置上时，他的爱，他的关心，在整个古巴，几乎是无微不至，无所不在的。

他工作，紧张繁忙地工作。

他学习，刻苦地废寝忘食地学习。

他写文章，作学问，进行呕心沥血地研究和思考。

他少有家庭生活的享受，他几乎也少有休息和嗜好投入的权利。他也狂热地喜欢运动，但他经常不能去看网球比赛，经常不能去看拳击比赛，也经常不能去参加类似打乔牌的游戏。他实在没有更多的在他来说几乎每一分钟都是无比宝贵的时间。

因此，如果他能挤出来一些略为宽裕的时间的话，他还特别热衷做另一项在他看来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大批量地亲自处理人民群众的来访来信，古巴国内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作家、诗人、拳击手和记者等等各色的人物，还包括一些世界各国向往他的人物，想与他取得联系的人物，甚至还包括许多古巴的刚刚踏入小学的校园刚刚启蒙懂事的孩子，也会给他一封一封地把信寄来。

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无耻官僚，有的时候也会装模作样标榜他们非常重视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但是对人民群众的来信，他们多半是看也不看，不是随随便便往废纸篓里扔，就是一麻袋一麻袋地卖给拣破烂的工人，让他们去往造纸厂的纸浆池里去随便一扔，他们全然不管这里边扔掉了多少对不公正的控诉，饱含热望的乞求，甚至还饱含着的赤诚的信任。

切·格瓦拉，在任何国家的领导职位上，不管他的职位是怎样低或怎样高，他的人品禀赋，会决定他一定不会堕落成为如此这般的官僚。

在古巴国家的领导岗位上，切·格瓦拉的勤政，表现在他对人民来信的处理方面，也是最感动人的。

他尽量地阅读所有人的来信。

他尽可能地亲自处理这些信件，尽可能地给所有给他因公、因私来信的人复信，解答他们的问题，尽可能帮助他们解决一切可以解决和可能解决的问题，他甚至郑重其事地给一个八岁的小学生复信，接受他的某种批评建议，并且因为复信太晚而向他道歉。

格瓦拉这样的大量的复信，像是放飞的鲜活的鸽子，飞上古巴的蓝天，飞向古巴的四面八方，像是一篮专递邮送的花篮，送给了普通的寻常人家；像把一个节日的彩球，甚至送到某一个孩子的手上。

切·格瓦拉的所有这些复信，给古巴多少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给多少寻常的人，普通的人，包括许许多多老人和孩子，带来了多少惊喜和多少难以比拟的珍贵赠予啊！

切·格瓦拉牺牲以后，他的许多这样的信件集结起来，印成读物出版发行，多少人把它们当作诗来读，当作最富丽的音乐和美术作品来欣赏、来读。甚至埃及人民的伟大领袖加麦尔·纳赛尔总统读到这些格瓦拉生前给他的人民和朋友的书信时，都垂泪不止，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切·格瓦拉给人民群众，给所有的朋友和同志的大量书信，不也是一种热流的赠予，不也是一种伟大思想和感情的交流和汇通吗？其中，不也包含着绝非面目可憎的政治思想工作的感染力吗？

总之所有这些种种，能够充分表明古巴革命领导人们，一个个也真都是杰出的，政治工作专家，宣传鼓动专家，他们完全拥有着这方面绝对的优势，而且，他们也清楚地知道他们掌握着这样的优势，他们可以充分地利用这样的优势。

因此，正因为他们拥有并善于掌握和运用这样的优势，在切·格瓦拉从莫斯科谈判归来后，在确定了一系列的方针和既定政最后，他们在加强古巴革命军民的宣传鼓动和政治思想工作时，他们也深入地展开了对进入古巴的，参加援助古巴的苏联军事和技术人员，以及其他各行各业苏联同志的宣传鼓动和政治思想工作。古巴同志体贴入微地尊敬和爱护关怀所有来古巴工作的苏联同志。完全把他们视若亲人、兄弟、同志和朋友，感染和感召这些来到古巴的苏联同志，完全能和古巴同志、古巴人民肝胆相照，心心相印，彼此的思想感情能够相知相通地融合起来，以期身心合力，全心全意，携手并肩，同仇敌忾，拥有共同的决心和意志，共同面对横在他们面前的美帝国主义。

古巴这样的工作，是最有成效的。

其时，整个古巴列岛，全体古巴人民，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领导下，充满了昂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爱国主义的热情，充满了决不畏惧任何敌人，敢于决战决胜的战斗意志。“誓死保卫祖国！我们必胜！”的口号，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古巴列岛的每一个角落回响。

在古巴人民革命斗志和革命热情的影响下，进入古巴，备受传统国际主义教育的所有苏联人，包括军人和所有技术人员以及其他各方面工作的同志，也都热血沸腾，备受古巴革命人民的鼓舞和感染，他们也差不多和古巴革命人民浑为一体，交融起来，真正联合了起来，充满了与古巴人民相仿佛的战斗激情和战斗意志。他们也激荡着革命英雄主义的激情，激发着为战胜共同的敌人不惜贡献出一切的决心，他们也真心诚意热情奔放地呼喊“誓死保卫祖国，我们必胜！”的战斗口号。

而就是在这样的气氛和环境氛围里，古巴迎来了1962年10月22日这个形势骤然间急剧严峻起来的日子。

怎么办呢？

该怎么办呢？

在这一天的下午6点35分，肯尼迪在美国白宫总统办公室的讲话，无疑已经在把战争的魔剑，突然间垂悬在了古巴人民的头上。

菲德尔·卡斯特罗紧急召开最高领导核心会议，与他的最亲密的战友，从容冷静，沉着镇定地研究必须准备迅速实施的应急措施。

会议进行的过程中，菲德尔·卡斯特罗连续请多尔蒂科斯总统多次给苏联驻古巴大使馆打电话，希望从阿列克谢耶夫大使那里，听到苏联对肯尼迪讲话反馈的信息。

但是，没有。

在此严峻的时刻，没有莫斯科的任何信息。

阿列克谢耶夫大使一再表明，他已经在与克里姆林宫进行着高频率的紧急联系，但是，莫斯科不作任何反响。莫斯科不作任何回答。

这样，在哈瓦那，在古巴总统府内的革命宫里，菲德尔·卡斯特罗主持召开的古巴最高领导核心会议，将该作出怎样的应急决策呢？

切·格瓦拉已经迅速表明了他的观点和态度：我们自己的事，首先必须自己靠自己。

但是，怎样自己靠自己呢？

是立刻跪下来祷告上帝的救助吗？

遗憾的是：上帝太远，美国太近了！

那么，是该跪下来向美国佬叩头，向美国佬求饶吗？

美国佬也许会大度开恩施以饶恕的，但是从此必须带上他们拴狗的项圈或者早已给你准备好的镣铐，从而永远失去你全部生命的最为美妙的自由。

可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早已明确地否定了这样的意思。

菲德尔·卡斯特罗不只一次说过：

“宁肯为自由生活一秒钟，也要不惜拚死去战斗。”

有着这样的崇高思想，有着这样的战斗意志，其实，接下来，古巴的应付突发事件的应急决策，根底就已经有了。

这就是：宁肯站着死，也绝不跪着活。宁肯在战斗中死去，也不能在苟且中生存。

自由的古巴人，是绝不能再戴上美国的镣铐的。

有了这样的根底，有着这样的信念，而且，卡斯特罗和他最亲密的兄弟和战友，这样的根底，这样的信念，是如此这般的相同和一致，简直不存在任何分差，这样，古巴革命最高领导核心在空前严峻的形势事态面前所可选择的应急决策，几乎就立刻耀眼而明确地出现在他们的心头，出现在他们的唇边，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了。

首先只是一个字：打。

要立足于打。

要不怕打。

要准备打。

要打到底，打到胜利。如果不胜利，毋宁死。而且，宁肯死，决不投降。同时如果我们可能被野兽吃掉，也一定要使野兽落下不可愈合的伤痛，或者，也许我们也可以与敌人同归于尽，总之，我们绝不能像羔羊一样，被帝国主义这样的俄虎恶狼像不塞牙缝的小菜一样吃掉。

在站起来的古巴人面前，任何野兽准备张开血盆大口，它都必须准备着承受，它就一定要付出被痛击，被致伤，甚至也被致死的代价。

有了这样的明确的决策思想，接下来的所有事情，几乎便也不再存在着太大的难题了。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他立刻想到的第一条最重要的具体决策就是，立刻把切·格瓦拉派遣到最关键、最紧迫的重要战斗前线指挥

位置上去。

于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当即就作出决定，并且马上命令总司令部向古巴全国发出通令，从1962年10月22日6点35分钟开始，切·格瓦拉已经是古巴西部最前线的省份，也是最临近美国佛罗里达州海岸，同时也还是苏联导弹设置的主要中心基地的，比那尔德里奥省的最高军事指挥员。

菲德尔·卡斯特罗签署的这一军事指挥员的任命，立刻也通知了古苏防卫联合司令部。特别通知了比那尔德里奥省驻扎着的苏联火箭部队分遣兵团的作战司令部。

由于形势紧迫，危急的情况可能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最高核心领导成员不能再陷落在总统府“革命宫”的会议室里。

所以，最重要的决定作出以后，菲德尔·卡斯特罗又作出相应的决定，请多尔蒂科斯总统坐阵总统府，负责和苏联大使馆的联系，以及处理其他一般外交事务。而菲德尔本人将去坐阵古巴总司令部的作战室，并且宣布全国已经进入战备状态，全国立即实行全面灯火管制并进入戒严。

而切·格瓦拉呢？他从总统府的“革命宫”走出来，他和菲德尔握别以后，就跳上了他的吉普车。

他没有时间给妻子和孩子们往家里打一个电话，更没有时间赶回家去和那里的亲人作一次吻别。他只是不得已，恐怕不带药品犯了哮喘病无法工作，他不得不驱车赶回在工业部的他的小小的办公室里，取出了挂在那里墙上专供备战用的药箱。那里面装置着急救包和简单的手术器械。主要是装置着他须臾不能离身不备的治疗和控制哮喘病的特效药。

当然，此外，在药箱旁边，也还挂着一支他的，永远充满着弹夹的冲锋枪，平时他活动的时候，总是佩带着压着子弹的手枪，并不带这支冲锋枪，现在因为是到最前线的指挥位置上去，他当然也还要把这支冲锋枪从墙上的铁钉上摘下来，拎在手中，然后差不多是跑着跳着赶到楼下，再一次地登上了他的越野吉普车。

当他的吉普车行将驶出哈瓦那市区的警戒区时，卡斯特罗亲自命令和布置警卫切·格瓦拉少校的一个配置着多种火器，加强了警卫排，分乘几辆装甲运兵车，在他的车后紧随上来。

沿着从哈瓦那驶出的沿海岸线西进的公路，穿过一阵突然飞卷而来的暴风雨袭拢，仅只在数十分钟以后，切·格瓦拉的吉普车与跟他疾进的警卫车队，已经穿出哈瓦那省的马里亚奥市。进入到了比那尔德里奥省的防区，接着又很快飞驰越过比那尔德里奥省的较大城市阿特米莎和帕拉西奥斯，进入到比那尔德里奥的省城。在这里，他检查了比那尔德里奥省军区的战备值班机构，和军区司令以及防卫部队的几名少校和上尉举行了见面，他只作了简短的讲话，他便又开始登车赶路。

他已经作出决定，他在比那尔德里奥的最高司令部，将设置在靠近最前线地区靠近苏联火箭部队导弹基地最临近的小市瓜内。

而就是在切·格瓦拉的车队驱近比那尔德里奥省最靠西边近海的小市瓜内的时候，在一处不大的小小的山体滑坡阻拦了苏联运载导弹的车队的现场上，切·格瓦拉少校见到了苏联火箭部队古巴分遣兵团司令员别尔乌金中将的指挥车。

当然，接下来，切·格瓦拉少校自然的也就马上见到了高大魁梧的，也颇英俊潇洒的别尔乌金中将。

谢什金上校的奇遇

山体滑坡有很大的一段距离，截断了足有一公里地段的公路。

公路的另一侧是山，公路的一侧是沟。不知怎样才能估量出重量和面积的滑坡塌方，基本上是一侧山体落下来的泥石，现在像山移了一般，横断在原来的公路的路面上。这不是一块两块巨石，也不是十吨八吨重，十立方来八立方米厚的山石泥土，这是整个半座山头滑下来，横在了公路的路面上。要想把这一段路面上的这些横挡物迅速的清除开，是多么巨大的工程，谈何容易！

而且，时间呢？急迫的时间允许人们可以从容地移开横在公路上数万立方米的土石沉土吗？时间似乎是不允许的。

古巴环海的气候条件异常奇特，在深秋的季节，仍然炎热而多风多雨，风来的急，风走的也急，雨来的急，雨走的也急，一场急风暴雨从这里飞掠而过，留下这里巨大的山体滑坡以后，迅速地向远方流逝退去了。而留住这里的空间，现在是满天的星光闪烁。

只是，从远处的沟岔沟涧里，白蒙蒙的雾气，正像升起来的云团，已经在向着这边涌动了。那是从海而上飘来的雾气，而这雾气本身，明明的就是佛晓行将来到的黎明的通知。

黎明的时分，已经就漫步在前边不远的地方了。星光将散去，白日将来临，暴风雨过后，海雾飘起来的时候，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日子，一定是一个万里无云，碧空晴朗的日子。

这样碧空晴朗的日子，如果在寻常的时候，人们一般会认为是一个好天气的日子。

但是，今天，如果这样的好天气的日子，迅速地、太过飞快的来到别尔乌金中将面前的话，这可就是一个大可认为是最糟糕的时刻的到来了。

这是因为，由于巨大的山体滑坡，受阻而不能迅速行进的运载导弹的长长的车队，在这样的时刻，如果不能迅速进入预定的隐蔽地带，不能进入已经修筑完备已经巧妙地伪装起来的掩体阵地，这可就是明晃晃的摆在了光天化日之下，而且，所有导弹现在都是横躺着的，都是横躺在运载它们的车体上的，虽然它们一个个都是有二十米长短的庞然大物，实实在在都是一条条又粗又长的汉子，而且，它们本来还是可以呼风唤雨，腾云驾雾，可以划破长空，翻飞天地的蛟龙，然而，它们现在横躺着、竖卧着，被装载到巨大的重载车辆的车厢板上，却也只得好似是变成了襁褓中的娇儿，一只乌鸦从它们头顶上“呱呱”呱噪着飞过，大约也会惊吓得它们“哇哇”哭泣。因为它们还没有站立起来，因为它们还没有挺起胸膛，因为它们还没有真正成为顶天立地的汉子的时候，因为它们还是车体运载中的襁褓中的娇儿的时候，它们实在是头顶上飞来一只黑鸟也会被恐吓，也会被欺凌的。

正因为如此，在黎明行将到来之前，在白日行将来临之时，现在横躺竖卧在向四面八方天空和山路裸露着形体的强攻击力的导弹，是不可以再继续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明晃晃地横陈在这里的，它们必须照着预定的时间，进入早已安置好了的掩体方位，它们决不应该完全暴露在无遮无掩的地方，如果这样，巨大的危险系数，是可怕的，是不可估量的。

然而，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正因为如此，当运载导弹的车队被滑坡所阻挡在这里，情况出现严重紧急的状态时，指挥导弹运载车队行进的谢什金上校，立刻通过无线电话直接

向自己的导弹基地指挥中心紧急报告严重情况，请求紧急支援。

这情况当然是至为紧急，至为严重的。

因此，分遣兵团司令员，也即是圣克鲁斯导弹基地司令别尔乌金中将，立刻在夜雾中，登上了他的“云雀”坐机，刻不容缓地立刻亲自飞到这边发生严重情况的现场上来。

他来到现场后，立刻走到泥泞的山体滑坡上去踏查。巨大的山体滑坡堆积在公路路面上的泥石，确实是厚重的，是不可能不付出巨大的劳动就能排除的，而付出这样的巨大劳动，仅靠运载车队的两百来人的司机和警卫战士是不够的。用他们仅有备用的一些锹镐来铲除，远不可能达到目的。

别尔乌金中将踩着泥泞的泥石，踏查着山体的滑落物。他目睹着这天外飞来的横祸，一时也几乎想不到会有什么好办法来解决了。他愤怒地踢踏着脚下的泥石，嘴巴紧闭，脸颊上明显地横起了几道棱肉。他焦愁着，急想着，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果决措施和办法才好。

而正在他焦思枯想，在脑海里紧张地搜索着可以解决问题的可取可行的办法的时候，忽然间，导弹运载车队指挥员谢什金上校气喘吁吁地从车队的后边跑步过来，向身子还站在山体滑落物间的别尔乌金中将报告说：“中、中将同志！报告！中将同志，古巴的切·格瓦拉少校来了！”别尔乌金中将站在泥泞的山体滑落物上，不觉浑身一震。“什么？上校同志，你说什么？我没有听清，请你复述一遍！”也许，可能别尔乌金中将一时什么也没有听清。于是，谢什金上校马上又激动地重复报告着：“是古巴少校切·格瓦拉同志来了。中将同志！”“什么？你说什么？”“是切·格瓦拉同志来了。”“你说什么？是切·格瓦拉同志来了？是‘切’吗？是英雄的‘切’吗？”别尔乌金中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急忙拔腿从山体滑坡的泥泞中走了出来。这时候，飒爽英姿的切·格瓦拉少校，在几名古巴警卫人员的簇拥下，向着别尔乌金中将这边疾步走了过来。别尔乌金中将赶忙迎上去，他差不多是呼喊了起来：“是切·格瓦拉同志吗？是切，格瓦拉少校同志吗？”“是我。中将同志，我是切·格瓦拉少校。”切·格瓦拉少校迎了上来。“啊！报告切·格瓦拉少校同志，苏联火箭部队分遣兵团司令员别尔乌金中将向您报告！”切·格瓦拉走近过来，他拉下了别尔乌金中将举起来向他敬礼的手，他展开了臂膀，和别尔乌金中将拥抱起来：“您好！中将同志，论军衔，我应该向您敬礼报告呢！”别尔乌金中将说：

“可您是古巴的最高指挥成员呀！尊敬的切同志，尊敬的格瓦拉同志，见到您真高兴！”

别尔乌金确实非常激动。他确实为此时此刻能见到切·格瓦拉同志而激动。

别尔乌金中将，是8月下旬来到古巴的。

他来到古巴时，正好切·格瓦拉少校飞到莫斯科去了。因此，他们失去了在哈瓦那及时见面的机会。

后来，切·格瓦拉访问毕莫斯科，然后又到捷克斯洛伐克访问，又用了一些时间。这样，切·格瓦拉再回到古巴时，已经是九月中旬以后的事情了。切·格瓦拉回到古巴以后，一直忙着处理在哈瓦那积累下来的大量工作。

而别尔乌金中将，在哈瓦那拜会过应该拜会和会见的所有领导人和军事领导人，和苏联驻古巴大使馆、武官处，以及到古苏军事合作联合司令部的所有机构作过必要的接洽以后，他就迅速地来到了古巴西部的省份比那尔德

里奥省，并且马上进入隐落在群山环绕中的，被珊瑚礁海域包围的圣克鲁斯导弹基地指挥中心。他的分遣兵团的司令部，在他来到之前，已经设置在这里了。

别尔乌金中将对切·格瓦拉的名字，是非常熟悉的。并且，他非常熟知切·格瓦拉少校的英雄事迹。他特别读过著名的苏联军旅作家波列伏依的文学特写：《切同志》。他觉得切·格瓦拉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也是一个“真正的人”，是一个很值得尊重的真正的英雄。所以，事实上别尔乌金中将，是早已渴望着与切·格瓦拉少校相会，早已经渴望着见到他了。

切·格瓦拉呢，他对别尔乌金中将的名字，也是熟知的。不仅中将的名字他熟知，就是刚才运输导弹车队的指挥员谢什金上校的名字，格瓦拉也是早就熟知的了。

切·格瓦拉今天和别尔乌金中将是第一次见面。但是和谢什金上校见面，却已经很难说清楚是第几次了。

这是因为，谢什金上校是导弹运输车队的指挥员，他已经不只一次，指挥运输导弹的庞大的车队，开进过哈瓦那远海湾的秘密军港码头，在那里装载从苏联驶来的商船卸下的包括导弹以及其他军事物质装备的货物，有一次，就在卸货场上，在强烈的聚光灯下，谢什金上校在指挥他的战士们既开动机器，也当然还要肩扛背抬地卸船和装货，忽然，在匆忙和苏联士兵一起干活的古巴士兵群中，谢什金上校看到一位身穿战士训练服的，直干得汗流夹背，大汗淋漓的古巴大胡子士兵，显然，这人干活太卖力气，从他汗水漉漉塌透了训练服的前襟后襟，就能看得出来。作为中级指挥员的谢什金上校，经常和普通战士打交道，他特别喜欢勤奋肯干，不怕苦累的士兵，所以，他看这个苦干勤干的古巴大胡子兵，干得这么卖劲儿，他就特别喜欢，特别欣赏，于是，在聚光灯下，他就多看了几眼，一看不要紧，眨眨眼再一细看，这个大胡子兵咋这么面熟？“噢！”了一声，谢什金上校想起来了，这个大胡子兵，不很像是一个人吗？那个人的照片，在古巴的报纸上，有时还在电视广播网中，能够经常见到，那就是切·格瓦拉少校。眼前这个大胡子兵，不明明也很像他吗？于是，谢什金就冲着这位大胡子兵喊了一声：“喂，当兵的，过来！奖赏你一支烟，抽一口，歇一歇再干，不然你要累坏了，看你满身满脸的汗！”

谢什金上校这样呼喊。

那位大胡子古巴士兵抬起头来看着上校，迟疑了一下，但是马上张开嘴巴笑了，露出了一排整齐的白生生的牙齿。他朝谢什金上校这边走过来。谢什金上校把一支香烟给大胡子兵递过去。大胡子兵接过了香烟来，欣赏了一下烟杆，捻了捻，然后摇头，把烟夹在了耳朵根上。上校说：“抽一口吧，这里没关系，你没看见我是站在四面安有防火玻璃的吸烟区吗？这里抽烟没关系。”大胡子兵说：“不行，上校。我害怕指挥员抽烟，招得战士同志们犯烟瘾。您站的这个地域，战士们是不能进入的。”谢什金上校笑了，他立刻称赞起大胡子兵来：“哦，你还真是有个觉悟的战士呢！你老兄知道你的这副模样儿象谁吗？”“不知道。”“你像你们古巴人的领袖。你很像是切·格瓦拉。”大胡子忍俊不禁，也笑起来。然后，他说：“我就是切·格瓦拉。不过，我不是领袖。我们的领袖是菲德尔！”“什么？你是切·格瓦拉？你不是吓唬我吧，老弟！”谢什金说着，差一点喊了起来，差一点是跳了起来。切·格瓦拉伸出手来。谢什金赶忙拔下嘴角上含着的烟火，飞快在地上踩灭，

也把手伸向了切·格瓦拉。“你尊姓？”“报告少校同志，我是苏军上校谢什金，导弹运载车队指挥员。”

“唔，您辛苦了！谢什金上校同志，很高兴我们的相识。你的西班牙语怎么说的这么好？”

“报告少校同志，我原来也是西班牙人，我的父亲在二战的时候参加了苏联红军，所以，我们后来也就成了苏联公民。”

切·格瓦拉说：

“这样看来，我们还是有血缘关系的近亲啦，我母亲的家族，也是原先的西班牙家族。”

谢什金说：

“是！少校！”

谢什金不知怎么地，忽然还给格瓦拉打起立正来，也许他脑海里转了好大一阵弯儿，才确知了他眼前的，果真就是古巴革命的领袖人物之一切·格瓦拉吧。

不过，谢什金从此就和切·格瓦拉成了相识相知的朋友，以后再在卸货场上与参加劳动的切·格瓦拉见面相遇时，切·格瓦拉总是向他招手呼喊：“您好！谢什金上校，我的乡亲！”

今天，刚才，也就是切·格瓦拉以及他的警卫车队，从后面上来，行将接近苏联运载导弹的车队，进入导弹车队的临时警戒线后，谢什金上校亲自迎上来查问后面跟进的车辆是什么人，结果，他用西班牙语一发问，切·格瓦拉立刻从吉普车上跳了下来，先喊了他一声：“是谢什金上校吗？”

“您是——”谢什金上校已经好像听出来了是谁，但他一时也还不敢相信，所以，他想再验证一下，于是他又想发问一声，但是，不等他把发问的话语说完，这这就响亮地回答他了：

“我是切·格瓦拉少校。上校同志！”

谢什金几乎完全还像第一次见到切·格瓦拉一样，满心窝发出了“咚咚”激越的声音。

“这里发生了什么情况？”切·格瓦拉走了过来。他马上发问。

谢什金马上报告说：

“我们的别尔乌金司令员在这里，这里发生了山体塌方，阻断了公路，阻断了导弹准时进入阵地的道路，情况很严重，切·格瓦拉同志！”

切·格瓦拉说：

“不要急。上校同志，请带我去见中将同志，我们会有办法的。”

于是，谢什金便马上把切·格瓦拉带到了别尔乌金中将这边来。而在此一刻前，首先是切·格瓦拉和谢什金，两位乡亲，两位老朋友又见面了。

而此刻，切·格瓦拉见到别尔乌金中将时，却似乎也早有神交，并不完全陌生，关于别尔乌金司令员的情况，除了他的大名和军衔级别以外，其他的情况，也还知道的不少。比如说，切·格瓦拉未曾与别尔乌金中将谋面以前，他已经知道这位中将同志，也能娴熟地完全用西班牙语与古巴同志交流和对话，因为据说别尔乌金中将的父亲，也是曾参加过保卫马德里西班牙内战的西班牙老共产党员。

别尔乌金中将现在与切·格瓦拉见面了。

他们一见如故，虽然在朦胧的夜色中互相并不能非常细微地看到他们脸上各自的惊喜相逢相识的表情，但他们的心的感应，激情的交流，是完全可

以通畅地相通的。

“切·格瓦拉同志，您来的正好，我们正好碰到了非常严重的情况，碰到了几乎是一时非常难于克服的困难，正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呢。”

别尔乌金司令员非常坦诚地向切·格瓦拉说出了这样的话来。

情况，刚才从车队后面走到前边来的路上，谢什金上校已经粗略地向格瓦拉作了汇报。格瓦拉能够非常容易地理解他经常能够听到的几乎所有的复杂情况，他有丰富的想象力和丰富的联想能力，他能够对任何情况迅速地在脑海里进行快速的思维逻辑类推，因而能够同步迅速的作出差不多总能接近正确的判断，和对任何事物接近正确的认识和估量。

确实，切·格瓦拉现在完全认识到了眼前发生情况的严重性。何况，目前，在这里，有谁能比他更清楚的知道，从几个小时之前开始，美帝国主义元凶，已经事实上把一种状态强加在了古巴人民头上，这就是战争状态。

这样骤变的情况，切·格瓦拉离开哈瓦那时，苏联大使馆还了无反馈的信息，因此，想必远在基地这边的别尔乌金将军，也不一定已经知道，目前这里事实上业已处在一种怎样的局势中吧？

然而，现在，在这里发生了的情况，是怎样严重的情况呢？

这是无需费力估量的。

这是可以一目了然的。

横陈竖卧着的庞大的导弹躯体，赤裸裸地暴露在这样的了无遮掩的地方，无疑是露出屁股来让敌人踢，而敌人的任何一种小小的打击，不是立刻在这里，造成一种惊天动地的灾难吗？

夜雾正在缓缓散开，拂晓来临的时刻已经越来越逼近了。

如果天将黎明的时候，即使敌人不派任何侦察飞机在古巴的上空飞掠，仅就从美国的佛罗里达海岸高高的了望塔，在晴朗的天气状况下，也会完全能够看清够这里是摆放着一些什么样的物体了。

而这样的情况，是绝对不允许也不可以发生的。

那么？怎么办呢？怎么处置呢？

切·格瓦拉紧急开动他脑海思维的机器，让他的聪明和灵秀最充分地转动起来，他开始了在几乎无边的选择范围里，迅速地过滤和选择最好的办法，挑拣着完全存在唯一最好，唯一最为正确和有效的办法。

切·格瓦拉，作为古巴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心中装着整个古巴，他心中装着古巴的一切部分和所有细微末节的所在，他非常非常了解古巴各处的情况，他也非常熟悉山体塌方阻挡着导弹车队迅速通过，不得进入安全位置和阵地的，这段发生了严重困难局面，造成了严重局势的地段左近的一切情况。

想到了很多办法。

切·格瓦拉很快想出了办法，拿出了主意，下定了解决问题的决心。

他立刻把他的决心和办法告诉了别尔乌金中将和谢什金上校。

别尔乌金中将惊异地睁大了眼睛。

谢什金上校马上攥紧了拳头，耸起了肩膀来。

因为，他们听到切·格瓦拉少校拿定的主意，想出来的办法，下定的战斗决心，听来简直就是要创造任何人都不敢想象，几乎简直不可能办到的奇迹。因为，创造这样的奇迹的前提条件是，仅从眼下即刻开始，在两个小时之内，紧急集合和调动强而有力的两万只人手，也就是调动起一万名能够投

入战斗的劳动者来，锹挖，镐抱，用一切有效的办法，把数万吨，数万立方米的塌方泥土，在黎明前的大雾笼罩中，拨开、清除出可以行军的路面。这是可能的吗？

切·格瓦拉果决地下达了执行他决定的命令。他马上迅速地用他的一切手段调兵遣将。

别尔乌金中将和谢什金上校终于也认定了切·格瓦拉少校的决定，也许确实是唯一正确的决定。因为，他们在听到切·格瓦拉少校作出这样决定的同时，他还同时提出一个以备万一有失的防备措施，决定导弹车队实行分散隐蔽，后退到一些可以隐蔽的场地上去，而后立即辅以尽可能的伪装，并且始终保持准备疾进，进入预定掩体和阵地的姿态。

格瓦拉与苏军中将的友谊

古巴比那尔德里奥省西部城市瓜内，只是一个不到四万居民的小城。可是，就在这样一个小城之内，当市政当局，城市卫戍司令部、民兵指挥部，通过遍布全市差不多各个角落的有线广播喇叭，在午夜零点刚过的时刻，突然发布通告，传达切·格瓦拉少校的命令和号召，请大家马上紧急集合、紧急出动，投入战斗性质的突击劳动，来帮助古巴革命武装部队解决受山体滑坡阻拦不能进入战位的困难的时候。人们差不多都是从睡梦中被惊醒、被呼唤了起来，但是，当他们听到了紧急集合、紧急出动，特别是，他们听到了这是切·格瓦拉少校直接发出的动员令和命令，整个瓜内市，马上完全沸腾起来，男人，女人，老人和孩子们，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集合地点，都有自己的组织指挥中心，他们都蜂涌一般的飞来，他们浩浩荡荡，但是，他们的阵列分明，纵队、横队，完完全全，井然有序。整个古巴已经组织起来。”这里当然也不例外。因此，本来只准备调动一万人两万只劳动的手、战斗的手，然而，倾刻之间，瓜内市集合起了三万人、六万只手，每一个人、每一双手，都急切地跃跃欲试，争取要参加劳动、参加战斗。

但是，指挥是有效的、指挥是有节奏的，好像弹钢琴一样，必须节奏分明才能成为乐章，才能好听，成为艺术的乐曲，钢琴是不能没有节奏的乱弹的！乱弹的乐曲，不可能成为好听的乐曲。

切·格瓦拉，不止一次地指挥过攻城略地的重大战役，在古巴解放战争中，他带领和指挥他的英雄第八纵队，在拉斯维利亚斯省的一系列攻坚战中，他胜利挺进，连续作战，死打硬拼，巧夺智取，在一连串的重大战役中，他指挥部队几乎日下一城，有的时候甚至两日之内连连攻夺三城，他一次又一次地创造小鱼吃大鱼的奇迹，他指挥二百人，在一连串的战役中，竟然能一连串的消灭和克敌数千人，近万人。

切·格瓦拉从来是个打硬仗的能手，是个赢得大胜利、创造大奇迹的能手，他有丰富的指挥作战和进行任何战斗的经验，包括指挥劳动大军进行大兵团作战劳动建设的战斗。所以，他在任何一次战役中，总是调度有方，布阵有序。

他说定从瓜内市调动六千精兵，他一个也不多要，但一定要精兵，而且，自行解决装备，自行解决交通，但却必须准时赶到战斗现场，限时完成清理滑落山体泥石的规定任务。

于是，切·格瓦拉比他规定的时限还快了一些，从瓜内市调来了六千战斗劳动的精兵；主要是战斗骨干的工人民兵。

切·格瓦拉熟悉山体滑坡阻塞公路地段附近的情况，他知道有一个人民农场就在沟坡的对面，他有把握从那里也可以调来最少一千二百人的突击力量。那里至少有十台推土机，也是可以投入工程的。切·格瓦拉还知道，有一个糖业工人技术干部军训营，正在野营拉练在附近一带宿营，他当然还知道有两个战斗值班野战营也布置在此附近，现在也可以应急出动。这样他解决一万兵力、两万只劳动战斗的手的问题，似乎本来就是心中有数、胸有成竹的。切·格瓦拉紧张运筹，从容指挥，在几个小时以后，在凌晨的晓雾还正浓密的时刻，终于疏通了被山体滑坡阻断了的公路。然后，队伍迅速撤离，散开，让导弹运载车迅疾地通过，终于保证这些宝物还是按照规定的时限，进入和消隐到了它们应该进入和消隐而去的地方。在黎明的晨光里，在排除万难而胜利的时刻，别尔乌金中将满眶盈盈热泪。他睁着泪花转动的热目，

仔仔细细地看着切·格瓦拉少校的脸。中将仿佛要一根一根数清楚少校脸上总共有多少根卷曲的胡子，他也许在猜想，是不是这些根胡子里饱含着无限的聪明，无限的毅力，可以帮这样杰出的人物一场一场，一桩一桩，令人不可思议，不可想象地创造奇迹。

别尔乌金中将一遍又一遍地拥抱切·格瓦拉少校，一遍又一遍地亲吻着切·格瓦拉的脸颊，他还一句一句地嘟哝着这样的话：

“尊敬的切同志，尊敬的格瓦拉少校，你应该是我的上将，你应该是我的元帅。”

切·格瓦拉却说：

“我们的统帅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让我们倾听着他的号令，并且携手，齐步前进吧，将军同志！”

别尔乌金中将双手攥成拳头，热切地松开拥抱格瓦拉的身子，捶着格瓦拉的两臂说：

“好的，少校同志，让我们共同倾听着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的号令，为着战胜我们的共同敌人，永远携手并肩，战斗前进吧，亲爱的同志！”

别尔乌金作常激动，非常赤诚。

切·格瓦拉也以同样的赤诚，同样的激动，视别尔乌金中将为真正的亲爱的同志，真正的亲爱的朋友。

于是，接下来，这两个真正的同志和朋友，在1962年10月震动世界的所谓古巴“导弹危机”的月份里，正是他们俩个亲密的、赤诚的朋友，在那次的严重的危机时刻，最为轰动地创造了一个最为响亮的奇迹：他们在一起，几乎差不多是完全默契地携手合作，一起按动了一个小小的键盘，送给了美国佬一个在其历史上永远也不能忘怀的，让他们当时肝裂胆碎，此后也会永远心惊不止的“黑色星期六”。

那是在1962年的10月27日。

那一天，是一个星期六的日子。

那一天，是一个周末的日子。

美国的权贵和大老板们，在这样的日子通常，会驱动着他们豪华的轿车，携带着他们衣装华丽的太太和儿女，自然也还不忘带上酒柜和满满一大花篮营养丰富的食品，到好山好水的地方，到森林里或金风吹动着红叶的山涧里，或者仅只就到他们的私家别墅或牧场上去，他们可以去那里消闲和欢度他们的周末，并且享受第二天主赐的一个传统的休息日。

美国佬的大多数权贵和资本家，甚至更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的人们，本来也都完全可以这样安然无事地去享乐，他们的本来甚至还可以选择更为恣意的玩乐和消遣，他们完全有那样的机会，完全有那样的条件。

他们是很强大的国家。

他们是很富足的国家。

然而，正好像为富不仁几乎总会成为一些富人的天性一样，为富不仁似乎也总会成为一些富国强国的天性。为富不仁似乎久已成为了美帝国主义者的天性。他们在本来该去平安无事悠哉悠哉消闲度假，恣意玩乐的日子，偏偏还要派出他们的间谍飞机，来不厌其烦，无量无度地、恣意无穷地，侵犯小小的古巴的领空，随心所欲地来欺凌这里的人民。

美帝国主义实在是无以复加，欺人太甚了。

10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在美国总统白宫办公室，向全美国全世

界发出强硬的声音，由于发现了古巴用于防卫的苏联导弹，美国佬因而怒不可遏，暴跳如雷，马上厉声发出了可怕的讹诈和可怕的威胁。

美国佬天天叫嚣要灭亡古巴人民拥戴的革命政权，天天在武装训练，培植旨在侵犯和灭亡古巴人民政权的雇佣军，美同佬的大炮、飞机、火箭和核弹头，一直重压在古巴人民的头上。而古巴设置了用于反侵略，用于自卫的苏联人援助的导弹，这样美国佬就坚决不干了。这样，美国佬就说古巴威胁了美国。

于是，自美国发现古巴设置了苏联导弹开始，同肯尼迪总统发表强硬的讲话开始，美国事实上就如临大敌，对古巴开始了大兵压境如黑云压城的军事封锁。

在肯尼迪总统公开发出战争威胁的强硬声音以后，突然闻听其声的苏联领导人，一时完全吓麻了手脚，惶然不知所措，完全惊慌失措。倒是英雄的古巴革命领导人冷静沉着，有条不紊，忙而不乱地开始了针锋相对应付突然事件的透彻准备。

美国的封锁开始。

古巴进入了一级战备，全国军民进入了紧急临战的状态。

箭上弦。

弹上膛。

全国军民完全进入了战位上的角色。

这时候，自然，古巴时刻面临着被侵犯和袭击，面临着被轰炸和致命的打击。

美国的国家决策机构，所谓的国家安全“执委会”的大官僚们，其中绝大部分家伙，不是本来已经叫嚣不断，多日连声不断地叫嚣要轰炸，要空袭，要海陆并进入侵古巴吗？

因此，为了防范敌人的空袭、轰炸和海陆并进的入侵，古巴进入战阵的军民，也必须箭上弦，弹上堂，必须开动和预热他们的战争机器，包括各种各样的现代化武器。

这当然包括已经林立起来的 42 枚苏联中程导弹，12 枚多级远程导弹，以及 144 具地对空萨姆导弹的发射架，当然，也还包括已经装备好的 42 架伊尔—28 轰炸机，还有一些巡逻快艇，鱼雷艇一类的可以自卫，也可以攻击的船只，完全投入了临战状态。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以前没有启动过的防空雷达设备，也都启动起来了。而雷达设备的运转和启动，自然必须启动和投入地对空萨姆导弹的战斗警戒，不然，启动雷达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圣克鲁斯导弹基地，在最后完成安装配置过程时，别尔乌金中将作为苏联火箭部队分遣兵团司令，同时是圣克鲁斯导弹基地指挥中心司令，他特别邀请在瓜内小城设置了古巴比那尔德里奥省最高军事指挥部的最高指挥员切·格瓦拉少校，由他亲自陪同，检阅和视察了苏联火箭分遣兵团的战斗序列和各导弹基地，包括中程远程导弹，以及地对空防空导弹基地，以及雷达兵、电讯部门，后勤基地和野战医院。

因为这是陪同古巴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切·格瓦拉，由于他现在不仅是此处前线地区的最高指挥员，同时还是古巴全国最高领导机构的成员，别尔乌金中将觉得，理所当然，应该让切·格瓦拉同志检阅了解分遣兵团一切方面的情况，包括基地的全部指挥系统，指挥中心。

别尔乌金中将，特别请切·格瓦拉检阅了他本人作为基地司令员和兵团司令员，在可能发生战争中应该所在的指挥中心。

这是现代化战争的指挥员所在的位置。这里不像旧式的战时司令部的环境，这里不允许存在任何参谋人员纷乱繁忙的现象，不准有任何嘈杂的电话铃声和喊话通话的嘈杂声音，这里摆满了台案的是各种仪器、电脑和电子设备。

这里是完全不同凡响的世界上最现代化战争的作战司令部。这样的司令部如果运转工作起来，肯定能使整个世界都立刻随之震动，这是毫不含糊的。

而别尔乌金中将，现在就是这样一个举足轻重、关系重大、责任重大的作战司令部的司令。因此，他当然也完全是一个绝对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过去的几天里，切·格瓦拉少校和别尔乌金中将，从第一天见面伊始，他们就建立起了完全亲密无间的战斗友谊关系。他们几乎也马上成为了须臾不可分开的两只手和形影不离的朋友。切·格瓦拉请别尔乌金中将会见比那尔德里奥的所有军种兵种和省军区各级的司令，同时也检阅了海空军、炮兵、装甲兵、坦克兵、战斗值班野战营，以及许多民兵武装、准军事组织。切·格瓦拉也还请别尔乌金司令员和他一起，会见了比那尔德里奥省众多的党政干部，参加了许多地方的群众集会。

在每一次集会和会见中，切·格瓦拉都进行了充满革命战斗激情的动员讲话。

在每一次这样的集会和会见中，切·格瓦拉都不仅把别尔乌金中将介绍给大家，而且总是坚持也要请别尔乌金来作演讲。

别尔乌金从切·格瓦拉身上看到了火一样的革命激情，看到了无可比拟的人的尊严和自信，看到了最为辉煌灿烂的崇高精神和果敢精神。

别尔乌金也从热情奋发，斗志昂扬的古巴人民身上，看到了站起来的革命人民，会激发出多么巨大的奉献精神 and 革命毅力，他们差不多都完全组织了起来，完全自觉地过起了几乎全然如同战斗部队一般的军事生活。别尔乌金从古巴人民身上，看到了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的风貌。

别尔乌金的心和切·格瓦拉的心，简直完全跳成了同样的节拍，他和古巴人民的血流差不多完全汇合了起来，同样地沸腾了起来。

当然，别尔乌金，作为苏联火箭部队分遣兵团的司令，作为伟大苏联英雄的苏联红军的中将同志，他理所当然地被当成了国际主义的战士和旗帜，他理所当然被视为是为正义事业，为和平事业可以擎天柱地的伟大英雄，他当然的，也能给任何一个古巴同志，包括切·格瓦拉，能给任何一个古巴人，带来巨大的激励和更大的必胜的信念，激发更为有根由的必胜的信心，产生着巨大的鼓舞。

总之，切·格瓦拉和别尔乌金在几天来的相处中，也完全成了情同手足的兄弟，思想默契的战友和无话不可交谈的朋友。

因为他们两人不仅能用西班牙语直接交谈，完全不必需要翻译的帮忙，而且，除了西班牙语之外，他们两人也还可以用法语交谈。别尔乌金中将的妻子阿妮达·科萨阔娃，曾经是留学巴黎的法兰西艺术学院的法国文学研究生，现在是莫斯科苏联文学研究所研究法国文学的专家，同时还兼任着莫斯科大学的法语教授，因此，别尔乌金中将在莫斯科的家庭生活中，有着使用法语的生活环境，所以，别尔乌金中将，除俄语之外，他不仅还本能地掌握着西班牙语，而且也聪明地学会了使用法语，而且，如果不是由于生活的偶

然现象把他规定成为了一名军人，成为了一名将军的话，他也许本来还可以成为一个语言天才，他自己有的时候也奇怪他自己掌握外国语言的能力为什么会是那么强。卫国战争结束之时，作为一个炮兵中尉，他在匈牙利布达佩斯驻军时，他很快学会了匈牙利语，后来到了捷克，他又学会了捷克语，而后又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驻军中，在那里的埃尔富特区，他又学会了德语，后来在列宁格勒高等军事学院进修深造时，他还完全掌握了英语。

别尔乌金中将的语言天才，能够充分表明他的天资聪明。而聪明人和聪明人相聚在一起时，他们之间谈话的热情，至少会比与任何平庸的人们交流谈话的热情增加十倍，他们理所当然会有更多的相通的语言和共同的共通的语言。他们的谈话锋芒，有的时候突然会在哲学的范畴里盎然起来，有的时候又会在政治学的范畴里，开始着机智的逡巡，而即使是目前形势，局势严重，严峻到如此程度的时候，特别是他们俩人：切·格瓦拉和别尔乌金，在目前几乎完全可能一触即发的大战面前，他们俩个人，分明是处在这一触即发的大战的双方中的一方，最前沿、最关键位置上的指挥员，他们的每一缕思绪、每一个神经细胞，无疑也全部集合在了最紧要的，必须全神关注的热点上。然而，尽管如此，尽管几天来一直相处在一起的切·格瓦拉和别尔乌金都是全大候的如此这般的，但是，他们在有的时候，几乎仍然会插空偷闲，来谈上几句家庭、老婆和孩子，谈抽烟的话题，谈喝酒的话题。谈到喝酒的话题，别尔乌金马上告诉切·格瓦拉说，他的妻子阿妮达，有一瓶保存有七年历史的法国酒，因为阿妮达写了一本评价和研究罗曼·罗兰的书，罗曼·罗兰的妻子认为写得很漂亮，所以从罗曼·罗兰的藏酒窖里，特别选一瓶有罗曼·罗兰签名的藏酒，送给阿妮达作为感谢，也作为纪念，别尔乌金说，如果切·格瓦拉再到莫斯科访问，如果恰好他也能在莫斯科，如果他们能在莫斯科相聚的话，他一定要和切·格瓦拉来尝一尝这瓶酒，喝掉这瓶酒，只留下瓶子来作纪念品，也就行了。

于是，这样，他们也就有可能又谈起了罗曼·罗兰，有可能谈起了文学，谈起了他们都曾阅读过的罗曼·罗兰的文学佳作《约翰·克里斯朵夫》，而谈到这个在卑怯虚伪的世俗生活中不屈的灵魂和崇高可爱的音乐家的形象，切·格瓦拉忽然也会把话题岔到他的一个女儿的身上去，他也会满脸幸福的得意，谈到他有一个女儿，奇特地喜欢唱歌，奇特地喜欢音乐、喜欢她妈妈唱歌，特别喜欢听萨克斯管的吹奏，特别喜欢听西班牙牧歌，而谈到女儿，自然也会谈到女儿的母亲，切·格瓦拉也会很有兴味，但只把简明的结论告诉别尔乌金，说：“很漂亮。”当然，他是得意地称赞他的妻子很漂亮。切·格瓦拉还告诉别尔乌金说，他的妻子阿莱达是一个烤玉米面包的能手，烧的咖啡也特别好喝，下次如果别尔乌金到哈瓦那时，切·格瓦拉一定会也请他到舍下去作客的。切·格瓦拉说，他那里也有一打子好酒，是中国驻古巴大使申健同志，听说格瓦拉有过称赞中国四川泸州大曲酒的话，因此特别送给了切·格瓦拉一箱这样的泸州大曲酒。切·格瓦拉告诉别尔乌金说，可惜这箱子酒还没有时间打开尝过呢，如果别尔乌金同志到家作客的时候，那可就要打开了。

总之，切·格瓦拉与别尔乌金中将仅仅几日的形影不离，朝夕相处，使他们完全成为亲密的兄弟、至诚的同志以外，同时成为了完全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的朋友。

当然，不管是在什么时候，他们谈话的主题，最主要的，最中心的，还

是关于形势的分析，谈各种可能的趋向，谈各种可能的选择和结果，而在这样的時候，他们也就每每会更多地谈到他们的战斗决心和战斗的意志，谈到他们对胜利的期待和热望。而他们对他们的热望和期待的胜利果实的共识，也仍然是一致的，这不过就是人们尊严而相安无事地生活，展开对欢乐和幸福的创造和追求，并且热情不懈。

他们两个有情有意的，仿佛是久已有着深情和厚谊的朋友，在他们相聚在一起热烈谈话，热情谈话的时候，不乏音乐、美学和文学的话题，诗和温馨的家庭之爱。妻子儿女之爱的情愫，却绝不存在着任何一丝战争贩子的任何怪诞的热望和激情，而只是有一天，他们俩人，忽然有兴趣在一起，如此专注，如此热烈地研究起了哪些一长串的算数题来。他们最初是从计算关于援古苏联军事技术人员，导弹基地工作的专家和战士同志们所需要的食糖的要求开始的。苏联人，似乎是特别喜欢甜食，特别喜欢吃糖的，喝一杯浓咖啡几乎总是要一大把一大把的放糖。古巴是食糖生产严重过剩的“糖的王国”，有的是糖，完全可以敞开供应援古的苏联同志放开肚子来吃糖。但是，糖这种好东西，放开肚子来吃，可能就会要产生和出现麻烦。糖尿病被激发是可能的，而更麻烦的方面，是热卡含量在人体内的过分吸收，就会造成人体内脂肪的过分的积累和过剩，这样势必就会使人体的机制开始出现失衡现象，而任何失衡现象都可能是危险的，都可能会立即或者逐渐地引起一连串各种可能的连锁反映，这就会造成很大的糟糕，甚至会开始形成不可弥补的缺憾。

切·格瓦拉在检阅视察苏联火箭分遣兵团和导弹基地序列的过程中，他印象深刻地发现了这样的问题。所以，他列出一串并不复杂的算数题，和别尔乌金中将一起运算，以期用科学的数据来说明，吃太多的糖，热卡会失衡到怎样的程度，而蔬菜，水果和鱼、肉、奶制品如果受到热卡过剩的排挤，蛋白质的比例又将会怎样被压抑或遭到废弃。切·格瓦拉以飞速的运算速度，迅速地口算心算，向别尔乌金中将提供着一个又一个数据，他想让别尔乌金中将印象至为深刻地接受他的科学论证，开始采取适当的步骤，控制援古军事技术人员过分的食糖的问题，以免久而久之，最终产生影响部队战斗能力的问题。

切·格瓦拉快速的口算，心算能力，是他在担任古巴国家银行行长的那个时期，埋头苦干，为掌握的各种金融运算法则，在苦学苦钻高等数学，解析几何和大代数的基础之上，锻炼出来的技能，掌握在手的技能，而他的这种惊人的快速运算的技能，当然也会使别尔乌金中将引起惊奇和注意，于是，别尔乌金中将在这样一次的谈话中，他似乎受到了好奇心的支配，他立刻产生了一种想考一考切·格瓦拉这位古巴领导人和他的朋友神奇的运算能力，到底能神奇到一种怎样神奇的程度。

因为切·格瓦拉和别尔乌金中将的这次谈话，本来就是在别尔乌金中将的作战指挥中心的作战室里进行的，所以，别尔乌金中将差不多是灵机一动，他站了起来，忽然走到了他的作战室的指挥仪器前，他开始请切·格瓦拉少校也走到这边来。

别尔乌金中将忽然指着一个电脑机械仪盘，似乎开始测验他的朋友，开始测验这位可尊敬的古巴年轻的领导人的神奇的运算能力了。

“尊敬的切·格瓦拉同志，您看，这是地对空萨姆导弹基地的指挥系统。我现在请您来和我一起来进行一次实战指挥演习，我想给您试一试您的心算

口算能力，能不能达到我们的电子计算机的水平。”

切·格瓦拉禁不住摇了摇头。但是，显然，他对这种测验很感兴趣。于是，他说：

“好吧，试一试吧，中将同志。”

别尔乌金中将开动了计算机。

他终于开始提出正式的题目了。他说：

“注意，格瓦拉同志，开始——请您看，从佛罗里达空军基地起飞的美军B—52轰炸机，现在，从这个距离之间，进入我们雷达监控区，它的飞行高度，是这样—个数据；它们飞行速度，是这样—个数据；而它行将进入我们萨姆导弹飞行控制的空域，是这样—个距离，请你注意看清楚这些数据，马上进行运算，请您看一看如果你作为导弹指挥中心的司令员，你可能能有几分钟的时间，作出您的指挥作战的司令员的决断。”

别尔乌金中将兴致盎然地给切·格瓦拉出着这样的题目。他所指点着的电子仪器上，飞速地变动着一些不断飞速变动着的数据，简直令人眼花缭乱了，目不暇给。

别尔乌金出完了习题，他就转过了脸来，盯住切·格瓦拉，想看看切·格瓦拉会是怎样紧张的口中仿佛念念有词的心算和口算，别尔乌金很想看看切·格瓦拉会不会立刻被这样的刁钻题目考住。

然而，令别尔乌金深感惊奇和怪异的是，他现在发现，切·格瓦拉根本没有任何紧张的样子，而是神情坦然的简直可以，他只是微微地，极富他那种特有的微笑的样子相当含蓄地微笑着。

“哎，切·格瓦拉同志，您运算出您能有几分钟考虑指挥决断时间了吗？”别尔乌金中将有些急切地发问。

切·格瓦拉却笑了，说：

“我不需要有任何考虑决断的时间。我只知道，现在，敌机如果进入我们的导弹可以击落它们的空域，我立刻就会按动这个键钮，立刻发出导弹击发的指令，因为，事实上，我们的所有作战指挥决断，不是已经经过我们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总司令决断了吗？他已经向古巴的一切军事力量，发布过这样的命令：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在古巴的海域、空域和领土上，只要发现任何入侵者，来犯者，都不必再请示命令，也不必再向入侵者来犯来发出警告，坚决开火，坚决消灭它们就是了，因为这样的命令已经下达，这样的警告都已经作过了，因此，绝对不必有任何犹豫，决不允许有任何的犹豫不决！”

切·格瓦拉给别尔乌金中将重新复述着菲德尔·卡斯特罗给古巴所有武装力量发出的这样的通令和命令。

别尔乌金中将顿然地一拍脑瓜，惊悟地说了一句：

“唔！尊敬的格瓦拉同志，我想起来了，我已经也见到过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这样的命令，很好。非常好。不过，切·格瓦拉同志，是您，让我加深了对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这个重要命令的理解。”

切·格瓦拉亲切地拍着他的朋友别尔乌金中将宽大厚实的膀背，亲切地说：

“深切地理解，坚决地执行菲德尔·卡斯特罗总司令的命令，是决不能犹豫不决，当然也是最正确的。”

别尔乌金毫不犹豫地表示了赞同：

“当然。切·格瓦拉同志，这是当然的！”

切·格瓦拉说。

“这就最好，最好了！”

切·格瓦拉向别尔乌金说出了这样的“最好了”的之说。

于是，别尔乌金中将作为古巴人民的无比忠诚的朋友，在1962年的10月27日这一天，终于干出了“最好了”的漂亮事。

那一刻，战斗的警报突然鸣响起来。

别尔乌金作为基地的指挥作战的最高司令，迅速地出现在他的指挥员位置上。

基地高速旋转的精密的雷达仪器的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闪亮的光点。

这个光点一旦出现，就开始了非常活跃的闪烁。

于是，电子显微仪器迅速开始对它进行运算和解析，解析它在时空中存在的形态和质量。接着，计算机马上就推出了这样的结论：一架美国的型号为U—2的高空间谍飞机，从两万二千米高空的空间里，正在以闪电一般的速度，进入了古巴的领空，正在古巴的领空之内，好像一只自由来去的大鸟一样，正准备自由地飞掠而来，飞掠而去，不过，它绝不是一只普通的鸟类，它是一种完全旨在吃人的战鹰，它是一种夹带着血腥气味的战鹰。

于是，在这一刻里，地球，仿佛突然在飞速变小，时间，突然在瞬息万里般的缩紧和流逝着。

来到了作战指挥员位置上的别尔乌金中将，现在面对着地对空萨姆导弹基地的指挥仪器，飞向而来，即将能够飞向而去的这架入侵进入古巴上空的U—2高空间谍飞机，在他所指挥的萨姆导弹可以管制的空域，只包含在仅两分钟的时间之内飞行穿越的辖区，因此，指挥员决策指挥的决断的时间，也都全部完全包括在这仅有的两分钟时间之内。

而仅仅就在美国的U—2飞机从两万二千米的上空，在两分钟之内的穿越最初开始的几秒钟里，在别尔乌金中将的耳根里，马上骤然响起了切·格瓦拉的声音：不需请示，不需警告，坚决彻底消灭来犯之敌，这已经是绝不能犹豫不决不予执行的古巴武装部队最高司令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决然命令，必须坚决执行。

别尔乌金很欣喜地听到了这样的声音，他全部身心回响着，激荡着这样的声音，他完全知道这是一种与真正的革命英雄共鸣的热流。

于是，他的身心，忽然在这令世界紧缩了的两分钟之内，却坚定地宽余起来。他觉得他竟然可以有这样充裕的时间进行如此从容的决策和作战指挥，他是如此地冷静，简直完全可以非常沉着而镇定地仅仅轻按一下他眼前的一个绝不比衣服上的钮扣更大的指挥仪上的按钮。

然而，当这个按钮刚刚按动下去的只一闪之内，在并非相距十分遥远的—一个地场上，忽然应时而起一声喷火的惊雷，只见一缕白烟仿佛骤然在长空里拉开了一条雪白闪亮的丝线，然后，忽然从仿佛是远山和大海那边，传来了一声更大的回响，这时候，人们才猛然惊异的抬起头来，看到了在晶明的天空里，在远距二十二公里的高空深处，闪亮起了一个巨大的火团，接着，在人们头顶上的半空里，开始出现了一些雪片一般飞飘的散落物。不及跳伞的美国飞行员安德松少校和他的被一弹命中的U—2飞机一样，血肉横飞被撕成了飞尘般的碎片，从天空里飘落下来，飘落的无影无踪。而这样一个晴

天霹雳过后，远在九十海里以外的美国，立刻进入了“黑色星期六”的黑暗空间。白宫顿然一片混乱，气焰嚣张不可一世的美国佬当权人物，一个个如丧考妣，一筹莫展，只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麦科恩还算聪明，他躲到白宫挺干净的卫生间里去，蹲在马桶上抽烟斗，喝咖啡，以期躲过四处搜查追寻，向他讨要丈夫的安德松少校的妻子，终于躲过了这个被摧毁的间谍飞机飞行员的妻子，没有被这个刁蛮的泼妇撕破他的脸皮，甚至把他的裤子也撕了下来。

当时，在这个“黑色的星期六”里，美国几乎真是面临着了大塌地陷的黑暗，到处是一片惊慌，到处是无边的恐怖，仿佛美国真的面临着了世纪的末日。仿佛美国的好日子，几乎真的就一去不复返了。

只是，还算美国当时有幸，在白宫的椭圆型办公室内，其时还安坐着一位年轻然而头脑机敏的总统，这就是约翰·肯尼迪总统。他还点燃起一支蜡烛来继续考虑他政治棋盘上的棋子儿，他想到了从此该更冷静更小心地拨动他手下的棋子儿，决不冒出更大的风险，因为他事实上早已经向他手下的众多的各各都自以为是的官僚谋士们说过，他要下的这局棋，绝不能多走一步，绝不能走出开始对抗的第一步棋，进入对峙的第二步棋，开始僵持的第三步棋，开始意志较量的第四步，然后再走出小试进逼的第五步棋后，却绝不能越雷池一步，再迈出第六步棋，那将是一步绝对的死棋，那是绝不可以迈上去的台阶，因为接下来的这一步棋，肯定就是甘冒热核战争的风险。这样的台阶是不能迈上去，也迈不上去的。如果这样的台阶迈上去，如此不顾一切地玩火，肯定将会自取灭亡，走向灭亡。那样争取来的棋局，将还会有什么意义呢？除了疯子，抑或是傻子，略微聪明些的人，总是不能把棋走到那样的道路上去的。

而现在，美国人已经走完了第五步棋，几乎就要迈到最后一个面向毁灭的台阶上去了。那么，棋局还将怎样走下去呢？

聪明的人看得很清楚。

下一步棋只能是“和”。

争取“和棋”，只能是下一步必须争取的目标，几乎不可以再有什么别的选择。

而肯尼迪总统肯定是这样的聪明人。

他肯定不是疯子。

他也不是傻子。

然而，肯尼迪总统不是疯子，不是傻子，这并不表明，现在与他对弈的棋手，也能是个高明的棋手，也能是个聪明的家伙。情况是，恰恰相反，现在与肯尼迪总统对弈的这位棋手，苏共中央的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怎么能是这么一个愚蠢的家伙，他有的时候那么粗野，那么蛮犷，他要高喊高叫起来的时候，简直气壮如牛，简直胜过狮吼，完全正像中国故事中善吼的黔驴一样，而且，他总是蛮犷的很，动不动就要掉转屁股，飞扬起两只蹄子来挥舞，显示要踢人，摆开一种完全是搏击和战斗的架势。可是，实际上，只要他的如此这般黔驴技穷之后，他就实在完全就是一匹可怜而又可笑，甚至是可鄙的蠢驴了。

尼·谢·赫鲁晓夫不是一个国际政治斗争棋盘上的好棋手，他是一个可以说是相当不称职，相当没有分量的，可鄙的滥竽充数的棋手。真难想象斯大林那么伟大精明的富有远见卓识的人物，耕播龙种，却植造出了如此一只

跳蚤。赫鲁晓夫事实上，也许仅仅不过是一个鼓上蚤而已，他只是善跳的一只跳蚤，也善于有的时候咬上人们一口，但他终归似乎没有如狼似虎显示牙齿和扑击力量的威风，他事实上是一个真正胆小如鼠的鼠辈，而且是个鼠目寸光的鼠辈，他心胸狭窄，目光如豆。他跳到国际政治斗争的棋上来试图一显身手，参与杀棋比赛，实在是技薄而智拙，他连三步棋也看不出来，更别说能走四步五步棋了。

赫鲁晓夫最初把苏联导弹运进古巴，迈出事实上确实是针对着美国的对抗性的第一步的棋后，赫鲁晓夫并没有想到第二步的棋该怎样走。

他以为先下手为强，走出这一步棋，就足以把美国佬“将”死了。

他不相信美国佬会有什么办法，他完全想不到美国佬一旦看清楚了他走的第一步棋，立刻也会兵来将挡，水来上屯，完全是对抗性的也来走出迎头针锋相对的一步棋。

问题是这个蠢驴棋手，他怎么真的能够蠢到这样的程度，他似乎真的以为他走出第一步棋后，他的对弈的棋手立刻就会放下棋子儿告输，而当他对弈的棋手并没有如此这般，而是也迎头走出第一步针锋相对的棋路以后，赫鲁晓夫简直就再也想不出他在棋盘上还怎样走出第二步棋来。

这就是，1962年10月22日，当美国总统肯尼迪，在白宫向全美国全世界发表讲话，针对苏联武装古巴导弹，提出强硬抗议和照会，宣布从即日起，对苏联实行对抗的坚决步骤时，赫鲁晓夫立时吓麻了手脚，躺倒在他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长沙发上，哆哆嗦嗦，饮食难进，惊惶失措，完全忘记了所以然，完全忘记了下一步棋该怎么走了。赫鲁晓夫从第一个小时听到肯尼迪怒喝的声音以后，他竟然吓倒在地，躺倒在他的办公室的长沙发上，拖了整整二十三个小时，想不出该怎么回答，一时竟然也作不出任何回答，没有任何反映。

于是，赫鲁晓夫错过了走出第二棋步的时限。他完全放弃了走出第二步棋的主动。

这样，美国佬立刻逮住了机会，马上主动走出了第二步高棋。10月24日，美国派出一支强大的以“特遣——136”为番号的编组舰队，在大西洋通往古巴的五条传统航道，也就是全部可行的航道，突然实行了强力的武装封锁。

在这样的武装封锁下，十八艘苏联巨型轮船，被封锁在了公海上。

在美国人的封锁面前，苏联船怎么办呢？有六艘开始在海面上停泊，余下的十二艘，马上开始掉头返航。

赫鲁晓夫这时候，还是不知道下一步的棋该怎么走，完全茫然无措。对于美国“特遣——136”舰队对苏联商船的军事封锁，赫鲁晓夫只是打了个电报给肯尼迪提出抗议，指责这是“海盗行为”。

对这样的指责，美国人除了置之一笑之外，辅之以的是嗤之以鼻。

美国人显然走过了对抗开局的第一步棋后，开始走出了与苏联人对峙的第二步棋，确实已经完全以实力和苏联人对峙起来。

美国人走出第二步棋。苏联人完全举棋不定，还是走不出第二步棋来。他们在与美国人对峙的面前，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于是，美国人接着又主动走出了第三步棋，不管苏联人抗议不抗议什么“海盗行为”，美国的军事封锁，只是有增不减，有增无已。美国人开始对苏联人展开了僵峙局面的压迫。

苏联的赫鲁晓夫，完全被镇住了，完全被压得喘不上气来了。因此，这个赫鲁晓夫，还是迈不开步，还是走不出第三步棋来。事实上，他的第二步棋还没走，又能走什么第三步棋呢。

老美在第三步棋对苏联开展的僵峙压迫中，开始提出了相当刻苛的条件：苏联的导弹、飞机、鱼雷快艇，必须撤出古巴，怎么运来，就再怎么运走。

赫鲁晓夫终于忽然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想起了请联合国的秘书长吴丹先生出面进行调停。

吴丹是缅甸人，是亚洲人士。在联合国被共推为秘书长，可见此人还很有才能。

他接到了赫鲁晓夫的请求。

吴丹乐于出面调停。

然而，肯尼迪立刻拒绝了吴丹的调停。肯尼迪咄咄逼人地走出了第四步棋，展开了与赫鲁晓夫意志和毅力的较量。

然而，直至今时，赫鲁晓夫仍然一筹莫展，仍然徘徊在第一步棋的棋局里，完全处在被动挨打，被“将死”的位置上，仍然走不出相应的棋路。他走不出任何的第二步棋来。

不过，赫鲁晓夫毕竟也还有一些聪明，他实在走不出第二步棋，又似乎将在棋盘上被“将死”的时候，他忽然又急中生智，他想“缓”棋，他想“回”棋了，他公开地向美国人开始表示，他不想走出第二步棋了，他只想“缓”棋，“回”棋，干脆通过交易而不是打擂，把这盘已经开局的棋再悄声地收局算了。

当然，这样的公开表示，实质上是公开提出交易的表示，但形式上，赫鲁晓夫也还想能够选择一个可以维护和维持体面的渠道。

正式的外交渠道，现在处在完全的对峙和僵峙的较量中，正式渠道已经难以开通。

于是，赫鲁晓夫现在开始启动苏联的特工机器。他不是指示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去正式求见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向人家发出肯定不会有回答的恳求，因为正在较量中的敌手，恳求只能意味着投降，要求宽恕和放此一码的恳求，肯定是得不到回应的。因此，赫鲁晓夫就不得不使用本来秘密的渠道了。苏联驻美国大使馆领有参赞头衔的，实质是克格勃驻美国华盛顿工作站的站长亚历山大·弗明，开始与明显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同行，有着美国广播公司驻美国国务院记者头衔的约翰·斯卡利接触，请他通过他的渠道向肯尼迪总统透透赫鲁晓夫准备作出交易的愿望，赫鲁晓夫在这样的透风中，许诺他准备退回他已经走出的第一步棋，他提出了一个交易的条件是，如果美国撤出布署在苏联大门口外土耳其境内对准苏联的导弹的话，苏联将准备立即同时撤出已经安置在古巴国土上的苏联导弹。

显然，赫鲁晓夫要“回”棋，要“缓”棋，要从他已经走出的第一步棋的棋盘上退出去了。

美国人马上高兴起来。

明显的，赫鲁晓夫这是要逃跑了，要完全的退却了。

但是，美国人实际上所期望的，还不仅是逼使赫鲁晓夫认输，实际上还想逼使赫鲁晓夫投降。

所以，美国人当然很高兴看到赫鲁晓夫将要逃跑的狼狈样儿，很高兴看

到赫鲁晓夫准备退却的惊慌。不过，美国人当然已希望看到赫鲁晓夫完全认输，完全承认失败，完全低下头来，垂头丧气的窘迫情景，在那个时刻，美国人将是要大肆欢呼和庆祝一番胜利的，而美国人的胃口，实际上是越来越大，他们还进而指望着苏联的彻底溃败和投降，让赫鲁晓夫不是低下头来，垂头丧气，而是完全跪倒下来，可怜巴巴的乞求饶命，乞求从此充当美国佬可以任意宰割的猪羊，那才叫更为大快美国人心，那才叫更为痛快呢。

由于美国人不无这样无止境的热望和幻想，所以，经过特务们的联系，虽然美国人已经笑了起来，但是为了希望还能更进一步地大笑和大笑出声来，美国人开始准备再晒一晒赫鲁晓夫。

美国人决定，对苏联派出特务进行联络交易的请求，完全不予理睬，不予理睬。

而这样一来，一直像是在热锅上的蚂蚁，几天来吃住都一直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里惊慌万状的赫鲁晓夫，完全是亲自出马，由他亲自口述，请求他的秘书来捉刀，干脆以私人的身份，来给美国总统肯尼迪写信，他眼泪巴巴地恳陈着可怜巴巴的请求，他的恳请词语实在很能打动人们善良的心肺，所以，他的秘书们完全照抄照录赫鲁晓夫给肯尼迪听的恳求的话语，他给肯尼迪总统这封信，实在可怜巴已的可以。后来，果真给肯尼迪总统以很大的震动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后来又多少年后，当年肯尼迪总统的亲兄弟，也是解决所谓古巴“导弹危机”的美国方面的主要决策人之一罗伯特·肯尼迪，在他那本非常著名的记述所谓古巴“导弹危机”解决处理经过的题为《十三天》的著述中，几乎全文引述了赫鲁晓夫给肯尼迪总统的那封可怜巴巴的求告信，罗伯特·肯尼迪很想以这封信来表述赫鲁晓夫的可怜巴巴的人情味几，当然，他更为的是表述肯尼迪总统因这封赫鲁晓夫的信件所产生的人性的同情感和慈善心。

不过，尽管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赫鲁晓夫亲自向肯尼迪总统苦苦求告，希望以某种交易来了结苏联和美国在这场棋盘上你死我活的对局，尽管肯尼迪总统也确实对赫鲁晓夫产生了人性的同情心和慈善心，但是肯尼迪总统并不是那稣会布道的传教士，专门宣讲博爱，也不是喇嘛教的大喇嘛，总是劝道人们以慈善为怀。肯尼迪总统是美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当然也还是世界上最大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家，是美国的总统，也是美国的总司令，总统和总司令，都是不能凭仗人情味慈善心来干事的。

所以，尽管尼·谢·赫鲁晓夫又是一番苦苦哀求，肯尼迪总统还是绝不肯立马高抬贵手，让他“回”棋，让他罢手，让他“缓”了这盘棋。不行。美国人在这盘棋上，是一定要把赫鲁晓夫完全逼输的。

于是，从10月22日美国宣布和苏联对抗开始，23日完全进入对峙，24日以后开始僵峙的美国对苏联的压迫，接着美国人在优势的位置上展开了和被已经压迫的喘不上气来的赫鲁晓夫进行意志和毅力的较量，志在必得，要看看在这一场掰腕子的过程中，倒底是谁能压倒谁的腕子。

一个有意思的情况是，真要翻起腕子来，不是赫鲁晓夫不是草包，是苏联人其实并不是草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最伟大的主导力量，作为最主要的手，赢得了战胜世界上最凶恶的德国法两斯的伟大的苏联，曾几何时，能完全变成了草包呢？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苏联和美国，真要是硬来较量，翻起腕子来，这本来完全可以是旗鼓相当的一双，最少是棋鼓相当的一双，本来也许是很很难决出谁输谁赢的。

但是，聪明的肯尼迪总统，完全掌握着棋盘上的主动权，他在走出第四步较量的棋招之后，马上决定绕过过分的较量的时间，于是，他就作出了走出第五步棋的决定，看这最后一步险棋，能不能最终叫赫鲁晓夫就范，最终叫他完全认输，叫他马上脱掉裤子，露出屁股来，狠狠地挨板子。

这样，肯尼迪总统下达命令，从10月27日开始，美国佬走出了“小试进逼”的第五步棋，把安德松驾驶的间谍飞机，派遣到了本来已经知道那里雷达启动，萨姆导弹已经朝天昂立的古巴上空去，再试来一次恣意飞行，肯尼迪总统硬是想试一试，看一看苏联人真不真能有些胆量，来迎击一下美国的真枪实弹的挑战。

总统的命令下达，这是美国总司令的命令，安德松少校立刻驾起U—2间谍飞机，从佛罗里达洲的基地，转眼之间就飞到了古巴的上空，本来，他在这里，原也只准备一掠而过，来一次尽可能超过闪电速度的飞行，他想这样可以减少被摧毁和击落的危险，谨慎的美国总统亲自作出指示，他担心这样的危险出现，他要求中央情报局长作出不出现这种危险局面的保证和许诺，但是麦科恩只能作出含糊其词的回答，肯尼迪自然也不会奢望更明确的回答，他决意为着美国的最高利益，铤而走险走出他准备走出，又准备控制的最后一步险棋，这一步棋走过，事实上赫鲁晓夫在这一场对阵的棋盘上，就等于是完全的输了，接下来，就可以逼迫他跪下来求饶，逼迫他抱起脑袋来投降了。

那将是自由世界多么伟大的胜利啊！

肯尼迪总统渴望着要创造惊天动地，足令天翻地覆的伟大奇迹了。

肯尼迪总统把安德松驾驶的U—2飞机，送到了古巴共和国的上空。他准备的时间，只想在这里一闪而过。

然而，这一闪却就闪出了麻烦。

几天来，古巴人在美苏两大国的棋擂对阵中，几乎一直只能站在局外观棋。美国佬似乎并不愿和古巴人下棋。赫鲁晓夫也硬是不想听古巴人“支招儿”，他不想在古巴人的促令下，扮演傀儡戏，所以，古巴人在过去的几天紧张对峙中，一直事实上被排挤在对垒的局外。古巴人想对赫鲁晓夫提个醒儿，想替他走一步绝招的棋来，赫鲁晓夫却硬是不放心，硬是不肯。可是，今天，10月27日，忽然，猛的，安德松驾着美国的间谍飞机来了。于是，机会终于来到了古巴人的手上，古巴人终于抓住了在这一场巨大的国际政治斗争的严重对垒的棋盘上，可以代行一步棋的机会。于是，这步棋，也就是赫鲁晓夫把苏联导弹运进古巴走过的第一步棋之后的第二步棋，古巴人毅然绝然地走了出来。这步棋，就是在古巴的西部地区，在卡斯特罗任命为此时在此前线地区的最高司令，古巴最高领导机构的代表，切·格瓦拉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促令他的忠诚战友和朋友，光荣的苏联英雄别尔乌金中将，在决定性的两分钟内，毅然决然按动了促令萨姆导弹飞起来，让安德松远在两万两千米之外的间谍飞机应声倒栽葱地栽下来的那个切·格瓦拉也不止一次抚摸过的那一枚像钮扣一样差不多的电钮。

就在这个电钮按过的一分钟之后，当圣克鲁斯导弹基地的斜插一边的上空，忽然爆开一团火焰，当那里的U—2间谍飞机已经完全变成了一具会飞的棺材，当安德松的血肉和U—2飞机的碎片正在变成灰尘和垃圾飘下来时，在苏联火箭部队分遣兵团司令员兼导弹基地司令员的指挥室里，专线电话响了起来，别尔乌金拿起电话机来时，他好像立刻又看到了切·格瓦拉

少校同志满脸卷曲蓬松的大胡子上，每一根胡子都挂着一丝迷人的微笑。切·格瓦拉在电话中，用那么徐缓，平静的声调，对别尔乌金中将说着这样亲切的话语：

“祝贺您，中将同志！向所有参战的苏联同志祝贺！古巴党和政府，以及古巴全体军民，向他们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和敬意！”

别尔乌金听着切·格瓦拉少校如此朴素和如此亲切的话语，他满身激荡着热流，他想再和切·格瓦拉少校叙唠几句什么别的话。但是，他马上又想到了，切·格瓦拉同志肯定要投入到更紧张艰巨的工作中去了。

切·格瓦拉同志的时间，是特别宝贵的。

切·格瓦拉同志，是特别宝贵的，他的生命的时间，是应该被同志们、战友们宝贵和爱护的。

美国的黑色星期六

古巴打下了美国飞机。

美国骤然天塌地陷，全国进入可怕的，恐怖的“黑色星期六”。

可以说，这是美国在本世纪最黑暗、最悲惨的日子之一。

年轻的，聪明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全美国骤然进入“黑色星期六”的时刻，他在美国总统的华盛顿白宫办公室内，终还没有完全被击倒，终还没有最后接受一败涂地的结果，他还在支撑着，他知道自己肩膀上的责任，他不能完全被击倒，他不能完全的接受一败涂地的结果，他还要想些办法，他还要问计于他的聪明，问计于他的灵秀。

他的手下的人马中，有好几只面目可憎的乌鸦，又在他耳畔咆哮起来，“哇哇”鼓噪着、吼着、叫着，要他马上下达命令，施以报复，开始连续性的袭击，开始对古巴进行无休止的、地毯式的轰炸。他们早已经在佛罗里达州的军用机场上，准备好了装满核弹头的炸弹，最少一百架 B—52 重轰炸机，有多大的古巴，能经得起这样多的 B—52，向它倾泻炸弹呢？美国该是结束古巴这个国家的命运的时候了。

这样的鼓噪声，在肯尼迪总统的耳边，一时鼓噪得震耳欲聋，他们所产生的噪音和“黑色星期六”带来的黑暗，使肯尼迪总统虽然年轻，但却本来就患有的严重的阿狄森病，马上又严重的犯了。这种阿狄森病，又名“青铜色皮病”，可以导致人的整个肌体僵硬，皮肤都变成棕色。但是，这却并不仅仅是一种皮肤病，它是人的肾上腺机能发生了严重的故障，而肾上腺机能的故障，又可能会使人体的全部重要机能严重失调，因此，肯尼迪总统的这种病一旦严重发作起来的时候，他会出现全身性的痉挛，背痛的厉害，简直站不起来。到了这样的时候，他的病痛的样子，也能叫人感觉到他十分可怜。

不过，尽管如此，尽管肯尼迪总统一时陷入了如此严重的黑暗形势，在严重病痛如火的压迫和烧灼下，他的脑海，却依然是聪明的，依然是灵秀的。聪明和灵秀的最主要的特征和根基，原来在肯尼迪总统的身上，可以被人们这样清楚的发现，这就是他的冷静。

在这样严重的令人不安、令人恐怖、畏惧、冲动的形势下，一个仅仅四十二岁的年轻人，能够是这样心平如海的冷静，这真是天才，这真是了不起的，真是很不简单的。

而正因为这个肯尼迪总统很不简单，他在他耳边响亮的鼓噪着黑乌鸦们“哇哇”的聒噪声时，他绝不马上随帮唱影，一犬吠形，百犬吠声般地一起共鸣起来，他没有这样。

肯尼迪总统有冷静的头脑，他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他当然还可能具有一种非凡的高人一筹的远大目光。

所以，当一大班黑乌鸦在他耳畔鼓噪不休的时候，他不仅不予共鸣，相反在心中暗暗咒骂这些年纪都比他长的这些老家伙们的愚蠢。他们怎么这么废物，总司令已经带领着他们走出了五步高棋，他们怎么会也像赫鲁晓夫一样蠢笨，竟然在如此的时候，还看不出下一步的棋该怎么走。

这棋还能走吗？

这棋不明明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再走一步，不明明就是全然的死棋吗？

怎么这么多黑乌鸦，怎么就硬是看不出来呢？

令肯尼迪总统略感欣慰的是，在他手下的人马中，毕竟不全是一班黑乌鸦，原来也还有这样几只白鸦，他们全然不同黑乌鸦们一起“哇哇”吼叫。

他们也还是只叫响着另外一种声音。这些白鸦就是他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和他的总统国家安全特别助理邦迪。

在肯尼迪总统的眼里和心里，不高不矮的肥肥胖胖的邦迪，无疑是他可以信赖的朋友，但是，麦克纳马拉就不一样，这个家伙身材修长，脸条子漂亮，是个美男子，也是同样有风流病的家伙，肯尼迪总统尤其对这个家伙满心充满了嫉妒，因为这个麦克纳马拉，竟然也会这样胡来，完全不照顾他总统的面子，在迈阿密棕榈滩那边的狂欢舞会上，在众目睽睽的光天化日之下，他便和美国第一夫人杰基胡斯鬼混式的跳舞，杰基赤着脚丫子，漂亮的脸蛋儿深深地贴在敞开了怀的麦克纳马拉多毛的胸口上，实在太暧昧了，令肯尼迪总统实在醋意大发，目不忍睹，他真想闪身飞扑是去，把杰基扯开，然后挥起拳头来，一拳把这个麦克纳马拉打倒在地，这家伙实在也太令人着不下去，也实在太欺负人了，而且简直就欺负到了总统头上，不教训他，如何可以呢！

只是，当时，肯尼迪总统产生灵秀之气的冷静之本，还是占了上风。看不下去吗？看不下去为什么不看呢？看不下去为什么不绕开呢？总统夫人在这边恣意寻欢作乐，总统本人为什么不能到另一边去也同样寻欢作乐呢？总统是可以玩得更漂亮的。哪一个漂亮的女人，不愿意和年轻美貌帅气的总统跳一跳舞呢？肯尼迪应接不暇，但是他尤其陷进了一个名字叫琼尼·曼的混血女人的怀抱，这个混血女人，奶子如峰，性感十足，那才叫棒呢，只跳了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她便立刻扯着总统悄然走了，几乎是悄然便消失了，甚至几乎成功地甩掉了肯尼迪黑压压的七八名保镖。

第二天早上，第一夫人复又见到总统后，语气不无平淡地对总统说：

“那个女人你是玩不过的。注意些身体吧，你这杂种！”

肯尼迪总统只是一笑，但是立刻反唇相讥，说：

“麦克纳马拉那家伙是一个很会深耕土地的犁手吧？你也注意保护你的土地不被深翻沙化了吧！”

肯尼迪总统当时对总统夫人的敲打，实在也是够露骨的。不过，尽管如此，肯尼迪对杰基和麦克纳马拉的暧昧关系，狗扯羊皮的事儿，总还是实行着已经既定的熟视无睹的政策，不过，作为男人，在心怀之中，对此类事情，只是难免还会心怀愤然，心怀嫉恨的。

然而，尽管如此，却也还并不影响肯尼迪总统在政治观点上和麦克纳马拉的共鸣，并不影响肯尼迪在看到麦克纳马拉持有在肯尼迪看来是正确的招数，聪明的思想时，依然表示欣赏。

肯尼迪总统实在有着这样的心怀大度。

而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大度使然，当美国在10月27日这个全美国陷入黑色星期六的时刻，当肯尼迪总统终于还是支撑着病痛的身体，在美国总统白宫办公室里悄然点亮一支蜡烛，在苦昔向上帝祈祷，苦苦寻计问计之时，他看到了麦克纳马拉和他的助理邦迪，也点燃了这样的照亮的灯火。肯尼迪总统和他的情敌，但却是政友的麦克纳马拉，以及邦迪和索伦辛等等政见共同的助手们，一起又运算了一个数学题，这就是，美国在“黑色星期六”后，如果再多走一步棋，如果把美国的脚步踏上目前危机发展的第六个台阶上去，可能会等出怎样的运算结果呢？运算结果还是清楚明了的：第六步棋的迈出，将等于是，在以后的第一天，在以后的第一天的一天之内，主要包括苏联在内的欧洲那边，将有一亿人死亡；而在主要包括美国的这边，至少也

要有八千万人死亡。有了这个运算数字，肯尼迪就坚决地，绝不再有任何犹豫地准备坚决地放弃走出第六步棋的任何冲动了。

然而，接下来还会有没有问题呢？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接下来美国该怎么办？

接下来美国就该是这样悲惨地，这样屈辱而无可奈何地，完全沉沦在“黑色星期六”拉开的黑暗帷幕中了吗？

接下来，美国就该接受已经走出五步好棋，却因古巴走出了一步绝招妙棋，就被彻底“将”死，彻底认输吗？如果不这样，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肯尼迪总统撑着病痛的筋骨，秉着微弱的烛光，为难而伤心地几乎就要落泪，就要咬碎牙根，准备要在彻底认输的同时，蒙耻而蒙羞地大哭上一场了。

无论如何，不能再走第六步棋。第六步棋不能救美国。第六步棋也不能救肯尼迪总统。

现在，美国和肯尼迪都走在了绝路上。

肯尼迪总统只能完全陷在了无可奈何，简直完全无力再摆脱的黑暗和绝望中了。

美国也许必须承认，美国已经可耻地输了，已经可耻的失败了。

然而，简直是意想不到，几乎简直不可想象，正当美国几乎已经迈向深渊绝境的时候，几乎忽然上帝真的更偏向着美国，在美国最困难无奈的时候，它忽然伸出了一只强而有力的手，他不仅已经在过去就造就了一个俄国的祸种赫鲁晓夫，他现在更在此时，忽然又特别地赋予了这个俄国的蠢驴的特别偏执执拗的愚蠢。这个愚蠢执拗的蠢驴，他在最初跃跃欲试，跳上棋盘，不可一世的迈出第一步棋后，以为绝对可以一步致胜，后来美国人给他迎头来了一二三步“将”军，他却又一时完全昏头昏脑，完全吓成了傻冒，再连一步棋也走不出来了，但是，当美国走出第五步棋，忽然古巴人代替赫鲁晓夫走出了第二步棋，一步高棋已经把美国佬置于死地，已经“将”死的状态下，当美国佬被逼得不得不正准备搁下手中的棋子完全准备认输的时候，忽然就在这十分关键的时候，赫鲁晓夫几乎是抢天扑地突然来了灵发劲儿，他抓起棋盘上来的棋子，“砰”地一声，马上走出一急棋，并且马上声嘶力竭地高叫起来：“和！和！”同时，他更为低声下气地仰脸看着美国佬，开始乞求：“和棋吧！和棋吧！怎么样，求求您了！”

美国人简直不能相信他们眼睛里又出现了什么。本来已经走到了绝路死路上的棋，本来已经输掉的棋，怎么只因为赫鲁晓夫先生不走则已，一走便是这样的“高”棋，他只这一步棋下去，美国佬的“死”棋和输棋，忽然又全盘皆活，美国佬忽然在死棋路又活了起来，输棋忽然又出现了变成赢棋的可能。

美国人立刻暗暗嘘出一口气来，立刻偷偷喜欢，他们简直乐不可支，要手舞足蹈地准备跳起来，准备欢庆摆脱危机的胜利了。而赫鲁晓夫呢，一直还在傻呵呵的看着美国人，等着美国人还他一句，同意他求和的话呢。

